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非洲的笑声

African Laughter

[英]多丽丝·莱辛 著　叶肖等 译



非洲的笑声

African Laughter

Four Visits to Zimbabwe

[英]多丽丝·莱辛 著

Doris Lessing

叶肖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 /(英)莱辛著;叶肖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精典文库.莱辛作品)
ISBN 978-7-305-05611-6

Ⅰ.非… Ⅱ.①莱… ②叶… Ⅲ.津巴布韦—概况
Ⅳ.K9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171 号

Doris Lessing
African Laughter
Four Visits to Zimbabwe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莱辛作品
书　　名 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
著　　者 (英)多丽丝·莱辛
译　　者 叶　肖等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李冬梅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 092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306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611-6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

——多丽丝·莱辛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

2007年12月7日

张子清　译

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没被砍伐的森林。昨天我驱车数英里，穿越被大火燃烧过的树桩和灰烬。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森林，如今全被毁灭。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津巴布韦西北部，我访问过曾在伦敦教书的一位教师。他在这里如同我们所说的“帮助非洲”。他是一个比较有理想的人，在此地学校的所见使他震惊得患了抑郁症，难以恢复过来。这所学校像其他的学校一样，是在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一排四间砖砌的大教室，直接砌在沙泥上，一，二，三，四，顶头的半间是图书馆。教室里有黑板，我的朋友把粉笔放在衣袋里，否则便被偷走了。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没有教科书，没有练习簿，没有圆珠笔。图书

馆里没有小学生爱读的图书,只有从美国大学运来的大本子书籍,很难翻阅,是些从白人图书馆里剔除出来的处理书籍:一本本侦探小说,《巴黎周末》、《运气找到了爱》之类的书。

一只山羊在枯草里觅食。校长贪污该校基金,被停职。我的朋友没有钱,他的薪金一拿到手,教师和学生们就向他借钱,可能就再也不还了。这里小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26岁,年龄大的学生小时候失学,到这里补课。每天早晨,一些学生不论下雨还是晴天,要跨越河川,步行许多英里来到这里。村子里不通电,他们晚上不能凭燃烧干柴的火光做家庭作业。女孩子上学前和放学后得去取水做早餐和晚餐。

我坐在我朋友的屋里时,大伙儿害羞不进来,他们都向我要书。"你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书呀,"一个小伙子说道,"他们教我们念书,我们却没有书可读。"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向我要书。

我在那里住了几天。风沙阵阵。水泵坏了,女人们必须去河里取水。另一个从英国来的理想主义的教师看到这所"学校"的状况后,身感不适,病了。

学期结束的那天,他们宰了那只山羊,剁成小块,放在一只大马口铁器皿里煮。这是可以预料的学期结束时的盛宴:煮山羊和粥。在他们的盛宴进行中,我驾车穿越森林燃烧后的灰烬和树桩返回。

我不认为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会获奖。

第二天,我去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作演讲。这是一所很好的男生学校,有着美丽的楼房和美丽的花园。孩子们每周

可以见到名人来访，这些名人可能是他们的父亲、亲戚，甚至是母亲。名人来访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

当我给他们演讲时，我想起了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之中的学校。我看着在我面前的一张张略显期待的英国小孩的面孔，试图告诉他们我在上周所见到的情况。教室里没有书籍，没有课本，没有地图册，甚至连贴在墙上的地图也没有。那里学校的教师请我寄给他们如何进行教学的书本，他们自己才十八九岁。我告诉这些英国孩子关于非洲孩子讨书的情况："请给我们寄些书吧。"但是，他们想象不到我告诉他们的这些情景：一座笼罩在风沙里的学校，那里缺水，那里学期结束时的盛宴是在大锅里煮一只刚宰杀的山羊。

让这些享受特权的学生们想象如此赤贫的景象真的如此不可能吗？

我尽力给他们解释。他们彬彬有礼。

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朝一日会获奖。

我在演讲结束之后，向该校教师询问有关图书馆和小学生读书的情况。在这所特权阶级的学校里，我听到我在这类学校、甚至大学里经常听到的情况。一个教师说："这情况你是知道的，许多孩子从不借书阅读，图书馆里的图书只有一半的使用率。"

是的，我们知道这情况，大家都知道。

我们处在支离破碎的文化中。几十年前，我们的确信受到质疑，受过多年教育的青年男女不了解世界，不读书，只知道一些专业知识，例如计算机，是通常的现象。

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电脑、互联网和电视这些令人惊异的发明。它是一场革命。这不是人类已经对付的第一场革命。印刷革命的发生不是经过几十年,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孤注一掷地,我们接受了它,像接受其他的事情一样,我们从没有问:"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同样,我们从没有想去问:"互联网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它以其种种虚幻诱惑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十分理智的人都会承认,他们一旦上钩,就很难摆脱,甚至会全天耗在博客之类的玩意儿上。"

就在新近,任何哪怕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学问、教育和我们伟大的文学宝库。当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处于这种令人高兴的状况时,人们往往会装着阅读书本,会装着尊重学问。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劳工男女渴求书籍,这从建立的工人图书馆、学术机构和18世纪、19世纪的大学那里可以得到证明。阅读,书籍,通常是普及教育的一部分。同年轻人谈话的年长者必须了解读书教育的情况,因为年轻人的知识太少太少。

我们都知道这糟透了的真相。但是我们不知道其结果。我们想起古老的格言:"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男女掌握信息、历史和各种各样的知识。

前不久,一位在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说,一个村子里的人有三天没有食物吃了,但是他们依然谈论书籍和如何得到书籍,谈论教育。

我属于一个组织，它起始于把书籍送到非洲村庄里去的想法。还有一批人，通过另外的关系，亲自深入到津巴布韦的底层。他们告诉我说，那些村子不像报道的那样，而是住了许多聪明的人：退休教师、度假的教师、假期里的孩子、年龄大的人。我自费去津巴布韦作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发现津巴布韦人想要读书，我的调查结果和一个瑞典人调查的结果一样，这个瑞典人我不认识。非洲人想要阅读欧洲人想阅读的同类书：各种小说、科幻小说、诗歌、侦探小说、戏剧和诸如如何开银行账号之类的导读书籍。他们也想要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这些村民们在找书上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书，所以要有现成的书在那里，例如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碰巧在那里，就很流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出于明显的原因是最流行的一本小说。

我们的组织起初得到挪威的帮助，然后又得到瑞典的帮助。没有这类的支持，我们的图书供应就会枯竭。我们从我们可以得到书的任何地方收集到书。请记住：英国的一本好平装书在津巴布韦就要花上一个月的工资，那还是在穆加贝统治之前的情况。如今通货膨胀，它要花几年的工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把一箱书运到村子里去时，村民们高兴得淌出眼泪，请记住那里的汽油奇缺。那里的图书馆也许是在一棵树下搭在砖头上的一块木板。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出现知识阶级，懂读书的人教那些不懂读书的人——平民阶级。那里没有用汤加语写的小说，于是有几个小伙子坐下来用汤加语创作。在津巴布韦，大约有六种主要

的语言，他们用这六种语言创作小说，内容有暴力、乱伦、犯罪、谋杀。

常言道：人民拥护值得拥护的政府，但是我不认为这符合津巴布韦的情况。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尊重和渴求书籍并不起始于穆加贝政权，而是起始于这个政权之前的白人政权。这种对书籍的渴求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从肯尼亚到好望角处处都能看到。

这真难以置信：我在草屋顶泥土墙的屋子里长大。这类房屋总是在有芦苇或草、合适的泥巴、支墙的竿子的地方建造，例如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我从小就住的草屋有平排四间房，房间里放满了书。我的父母不仅把书从英国带到非洲，我的母亲还为她的小孩从英国订购书。运来的一大包一大包书是用棕色牛皮纸打包的。这些书是我年轻时的欢乐。泥草屋，但堆满了书。

甚至现在，我还接到一个村子里的一些人寄来的一封封信，这个村子可能没有通电或自来水，他们的住房就好像我们以前住家的长排泥草屋。“我也要成为作家，”他们说，“因为我有你从前住的那种屋子。”

但是，困难在于创作。作家，并不来自没有书籍的屋子。

我在阅读一些近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辞。以去年获奖的得主——健美的奥尔罕·帕慕克为例。他说，他的父亲有500本书。他的天才不是凭空得来的，他与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再以V. S. 奈保尔为例。他提到印度的吠陀深刻印在他家庭的记忆里。他的父亲鼓励他创作。他到了英

国后，常常到英国图书馆看书。因此，他紧连传统。让我们再看看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他不但与传统紧密相连，而且他本人就是传统：他在开普敦教授文学。我为从没有听过他的课、没有被他那豪迈英勇的思想熏陶而深感遗憾。为了创作，为了文学创造，就必须与图书馆、与书籍、与传统紧密相连。

我有一个从津巴布韦来的黑人作家朋友。他从果酱罐头商标和水果罐头商标上自学认字。他在我曾驱车路过的黑人居住的农村长大。沿路是粗糙的沙石和稀疏的矮小灌木。泥草屋很简陋，不像家境殷实人家建造的精良的屋子。没有正规的学校，只有一所我已经描述的那种学校。他从垃圾堆上捡到一本被丢弃的儿童百科全书，用这本书自学。

1980 年独立节，有一群津巴布韦的优秀作家，真正是一窝歌唱的鸟儿。他们在老南罗得西亚白人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作家不是在津巴布韦造就的，不是轻易造就的，不是在穆加贝统治之下造就的。

所有的作家都是经过了艰难的路程才识字的，更不必说成为作家。我要说的是，从果酱罐头商标和被丢弃的百科全书上学习阅读并非罕见。我们在谈论一些人，他们渴求超越他们的教育标准，生活在泥草屋里，有许多孩子，有过度劳累的母亲，为衣食而奋斗。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作家还是被造就了。我们也应当记住，这是津巴布韦，不到一百年之前被征服。这些人的祖父母可能是口口相传的讲故事能手。有一两代人，这种口头传

承是先记住故事，然后传下去，印下来，再成书。

书本是从垃圾堆上和白人世界的瓦砾里收集来的。一扎手稿是一回事，出版一本书是另一回事。我收到几则关于非洲出版情况的报道。甚至在像北非这些比较有特权阶级居住地的地方，谈出版前景仍是一个有种种可能性的梦想。

我在此谈论还没有写出来的书籍，谈论不能出版书的作家，因为那里没有出版人，听不到作家的声音。要估计这种才能的大浪费、潜力的大浪费，不太可能。出版书需要出版人，需要预售数，需要鼓励，甚至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依然缺少一些其他的条件。

作家常常被问："你怎么写作呀？使用文字处理机？电动打字机？鹅毛笔？手写？"但实质的问题是："当你写作时，你找到空间了吗？找到那种应当围绕你的空间了吗？进入那种空间，它就像是一种倾听的形式，专注的形式，于是词语，你故事里人物将要讲的词语就来了，思想、灵感就来了。"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现这种空间，那么诗篇和故事可能就会流产。作家们相互谈话时，他们所讨论的经常与这种想象中的空间有关，这是另一种时间。"你发现了它吗？你正紧紧地抓住它吗？"

让我们现在跳到明显是迥然不同的情景里。我们现在在伦敦，大城市之一。有一个新作家。我们玩世不恭地打听："她好看吗？"如果是一个男人，就会问："很有魅力？英俊吗？"我们开玩笑，但这不是玩笑。

这新发现的作家被喝彩，可能还会得到许多金钱。这叽

叽喳喳的传言开始传入他们可怜的耳朵里。他们被盛宴款待,被称赞,被迅速传到整个世界。我们这些老家伙,什么都见识过了,为这新手感到可惜,他/她对所发生的真正情况还一无所知哩。他/她被奉承,被捧得很开心。但问他或她在一年之内一直所想的:“可能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

一些大肆宣传的新作家不再创作了,或者写不出他们想写的作品。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对着那些单纯的耳朵吹吹风:“你们找到空间了吗?你们的灵魂,你们自己必要的地方,在那里,你们自己的声音可以对着你们讲话,只对着你们,在那里,你们可以梦想。哦,抓住它,别让它溜了。”

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对非洲极好的记忆,我可以在我想要的任何时候激活记忆,看到记忆中的情景。那些布满天空的金色、紫色和橘黄色的晚霞怎么样啊?卡拉哈里沙漠的灌木香气四溢,飞在上面的蝴蝶、飞蛾和蜜蜂怎么样啊?坐在长着灰白小草的赞比西河岸上,看着非洲鸟雀飞梭在黑油油亮光光的水面上,感觉如何啊?是的,一只只大象,一只只长颈鹿,一只只狮子,以及其他的各种动物,很多,很多。那里的夜空依然没有受到污染,黑黝黝,妙不可言,满天眨眼的星星,看了感觉又怎样啊?

还有其他的种种记忆。一个非洲青年,大概18岁,眼泪盈眶,站在那里巴望的是他的“图书馆”。一个来访的美国人鉴于他的图书馆没有书籍,便送了他一柳条箱书。那青年把每一本书拿出来,恭恭敬敬地用塑料纸把书包起来。我们问道:“这些书本肯定被送去阅读吗?”“不,”他回答说,“这些书

会被弄脏，我会在哪里得到更多的书呢？”

我见过一个教师，那里的学校没有课本，甚至没有一支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他的班级上的学生年龄 6 岁至 18 岁，他在沙土上摆弄石子教他们数学，嘴里哼着：“2 乘 2 等于……”我见到一个姑娘，也许 20 岁不到，也没有课本、练习簿、圆珠笔，用一根枝条在地上划着写字教书，而这时太阳当空照射，沙灰就飞腾了起来。

我真希望你想象自己在南非的某个地方，站在一个贫困地区的印度人商店里，当时极度干旱。人们（多数是妇女）排着队，拿着各种容器等待取水。这家商店每天下午从城里拖回来一车宝贵的水，这里的人就等着取水。

印度人站着，用他的手掌根撑在柜台上，望着一个黑人妇女，她朝着一沓纸弯身，这沓纸看起来像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她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得很慢，口中念念有词。看起来这是一本难读懂的书。这个年轻妇女的两个小孩紧贴她的大腿。她怀了孕。印度人感到惆怅，因为这年轻妇女的头巾本来应该是白色，现在沾满沙灰，变成黄色。她的胸脯与手臂之间全是沙尘。印度人感到郁郁不乐，因为这些排队的人全都干渴至极，而他没有足够的水供应给他们。他感到恼火，他知道沙尘暴那边的人正在渴死。

印度人很好奇。他问这年轻妇女：“你在读什么呀？”

“是关于俄国的事情，”年轻妇女答道。

“你知道俄国在哪里吗？”他本人不知道。

年轻妇女直盯盯地看着他，一副高贵端庄的样子，虽然她

的眼睛由于沙尘而变得通红。“我可是班级里的优等生哩。我的老师说我最优秀。”

这妇女又俯身阅读，她想要把这段文字读完。

印度人看着两个小孩，便伸手去取芬达饮料，但小孩的母亲说：“喝芬达使他们口渴。”

印度人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朝柜台后面、他身旁的一个大塑料桶弯下身子，倒了两大塑料杯的水，递给两个小孩。他注意到这年轻妇女看着自己的小孩饮水时，嘴在咂吧着。他给她倒了一大杯水。看着她饮水的样子，他感到心痛，她太渴啦。

这时，她把塑料水桶递给他，让他把水灌满。她和孩子紧紧地望着他，怕他把水泼出一点儿来。

她又弯身去阅读，读得很慢，这段文字让她费解，于是她又读了一遍。

“瓦莲卡，白色头巾扎在她的黑发上，被孩子们围住，高高兴兴地同他们玩耍，同时对有可能同她关切的一个男子结婚明显地显得激动。瓦莲卡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科兹内舍夫走在她身旁，一直带着羡慕的眼色瞧着她。他看着她，回想起他从她的口中听到的一切令人愉快的事情，一切他所了解的关于她的好处，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珍贵的，是在老早老早以前他的少年时期曾经怀有的感情。靠近她的快乐一步步加深，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当他把一个带嫩柄和翘起的伞状白桦林大蘑菇放进她的篮子里时，他直盯着她的眼睛，注意到她面孔上弥漫了惊喜，他自己迷乱了，静静地对她

露出足以表明太多深情的微笑。”

这叠印刷品连同几本旧杂志和几页登载穿比基尼泳衣的姑娘们的报纸躺在柜台上。

她离开印度人商店这庇护所的时间到了，走四英里路返回她的村子。店外面排着队等水的妇女们喧嚷着，抱怨着。但是，印度人仍然恋恋不舍。他知道这个带着两个孩子回家的年轻妇女将费多大的劲。他想把那叠使她如此着迷的小说散页给她，可是他真的难以相信这挺着大肚皮的瘦骨伶仃的年轻妇女真的能读懂。

大约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散页何以丢在一家偏僻的印度人商店柜台上的呢？

原来是联合国里的一个高层官员作漂洋过海的旅行时，碰巧在书店买了这本书。他在飞机的商务舱坐定后，把书撕成三等份。他撕书的时候，向四周的乘客看了看，知道自己会看到吃惊、好奇而带着某种有趣的表情。他坐好，束好安全带，大声读，声音之高，谁都能听见。“我长途旅行时总是这样的。你不想要托住一本比较重的大书嘛。”这本小说是平装本，但确实很厚。这个人习惯于人家听他讲话。当乘客们看到他的读书方式时，不管好奇还是不好奇，他向他们吐露他的秘密：“不，这确实是旅行的唯一方法。”

当他读完这本书的这部分时，他叫空中小姐把它送回给他的秘书，她跟随他旅行，坐在普通舱。这引起了很大兴趣和谴责，当然也引起了好奇。这伟大的俄国小说每一部分每次被读完，就放到飞机的后舱，书被肢解了，但可以阅读。

与此同时，在印度人的商店里，这年轻的妇女紧靠柜台，她的两个小孩抓住她的裙褶。她是一个现代女子，穿牛仔裤，裤子外面罩一条厚羊毛裙，非洲人的那种传统服饰，这样，她的小孩可以轻易地抓住裙子的厚皱褶。

她对印度人投去感激的眼光，她知道他喜欢她、可怜她。她跨出商店，走进阵阵卷起的沙尘里。孩子们哭着，沙灰吹进喉咙里了。

这是艰难的跋涉，哦，艰难哪，一步一步，踩进的灰沙堆看起来却像是一堆堆松软的沙丘，骗人的沙丘。艰难呀，艰难呀，但她习惯了艰难，她不习惯吗？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她刚才阅读的故事。她在想："她像我，戴着白头巾，她也照料孩子。我也可以像她，那个俄国姑娘。还有那个男人，他爱她，还会向她提出同他结婚。(她读完的内容没有超过那一段。)是的，一个男人将追求我，把我带离这一切，带我和小孩，是的，他将爱我，照顾我。"

她思忖着。我的老师说过，那里有一个图书馆，比超市还大，一座大楼，摆满了书籍。这年轻女子朝前走时微微地笑了，沙尘吹拂在她的面孔上。我聪明嘛，她暗想。老师说我聪明。学校里最聪明的一个学生。我的孩子将来会像我一样聪明。我要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放满书籍的地方，他们将上学，他们会成为教师——我的老师说我可以当教师。他们将远远地离开这里，赚钱。他们将生活在大图书馆旁边，享受好生活。

你也许会问：印度人商店柜台上的那本俄国小说的那部

分是如何结尾的？

这会是一个好故事。也许有人会讲述它。

那可怜的年轻女子继续向前走去，想着她头顶着的水。一到家，她先要给她的孩子们喝，然后她自己再喝一点儿。她继续走着，穿越非洲干旱造成的可怕沙尘暴。

我们过饱了，饱得发腻了，我们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受到威胁的世界。我们正好是反讽甚至是冷嘲的对象。一些词语和思想我们很少用，以至于变得很陈旧了。但是我们可能要恢复一些已经失效的词语。

我们有文学宝库，回溯到埃及、希腊和罗马。都在那里，这文学财富，被有幸接触到的人一次次发现。假若它不存在，我们将多么贫乏、多么空虚。

我们有一笔故事遗产，从古老的讲故事的人传下来的故事，一些人的名字我们知道，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讲故事的人回溯到森林里的一块空旷地，在那里生了一大堆篝火，老巫师唱着歌、跳着舞，我们的故事遗产起始于篝火、巫术、神灵世界。而今，那就是故事传承的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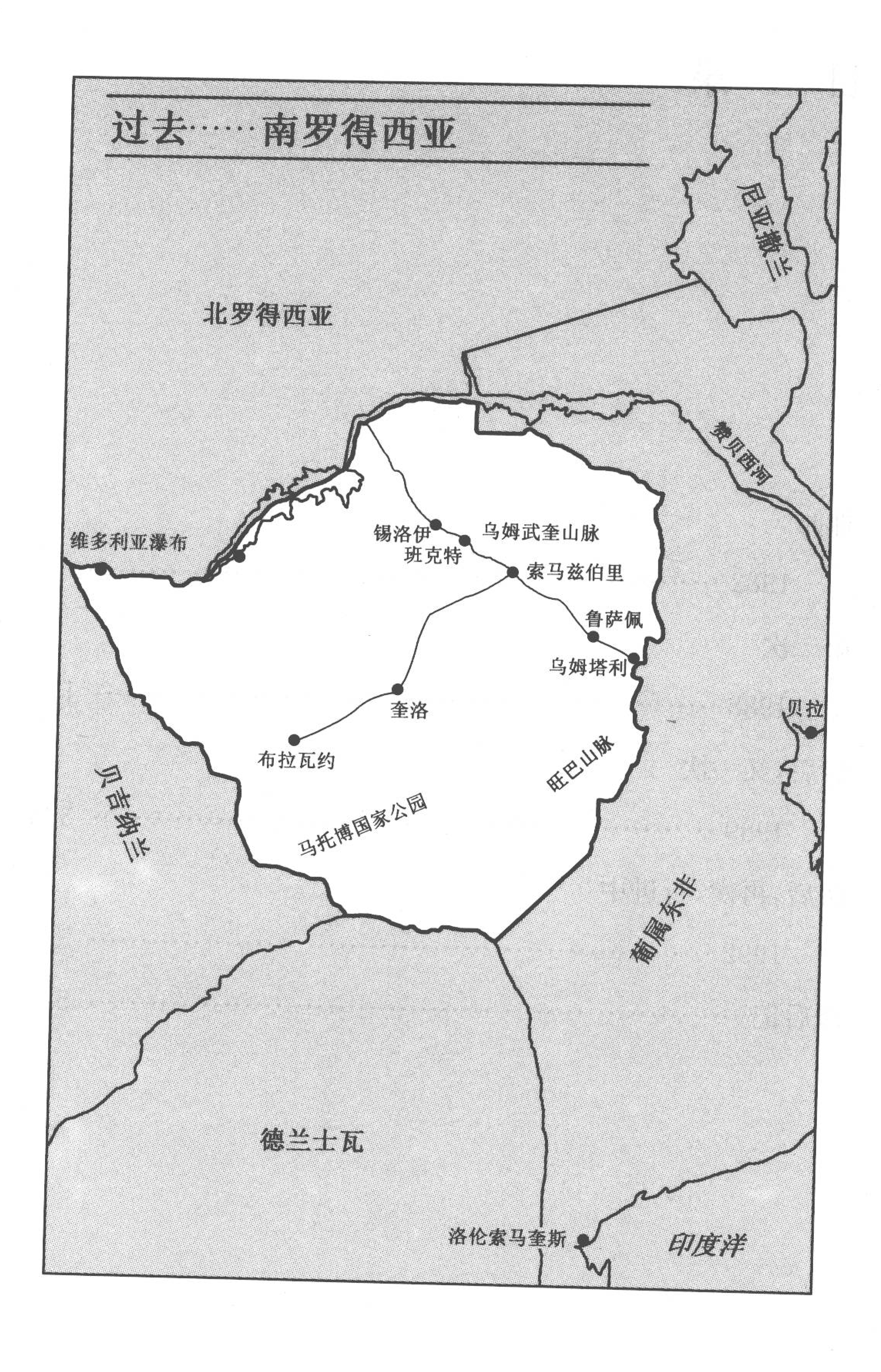
问任何现代讲故事的人，他们会说，他们经常有被篝火触动的一刻，我们称它为灵感，这回溯到我们的民族的起初，回溯到火、冰、狂风，这些形成了我们和我们的世界。

讲故事的人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编故事的人经常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设想我们的世界被我们大家轻易地想象的战争和恐怖袭击。让我们设想洪水淹没我们的城市，海洋上升……但是讲故事的人会在那里，不管好歹，是我们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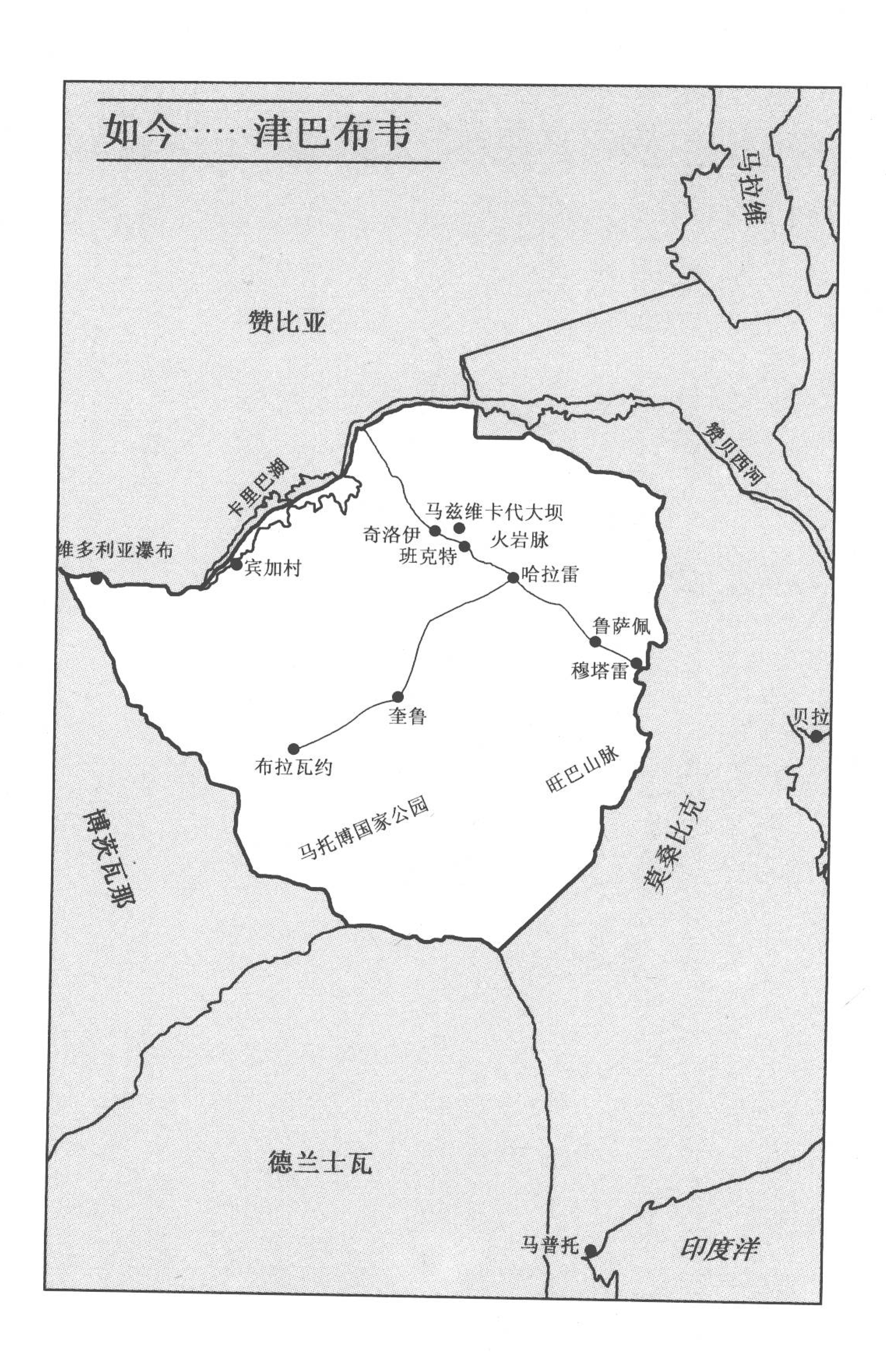
象塑造我们，保持我们，创造我们。当我们被撕碎，被伤害，甚至被毁灭时，我们的故事将重新创造我们。是讲故事的人，梦的制造者，神话的制造者（那是我们的凤凰）代表我们最好的一面，代表我们最富创造性的一面。

那可怜的年轻妇女步履艰难地穿越沙尘，为她的孩子们梦想着教育，我们想到过我们比她好——我们的食物充足，衣橱挂满衣服，物品过剩得透不过气来吗？

那年轻女子和那里的妇女们三天没有饭吃时却在谈论书籍和教育，我想，正是她们可以界定我们。



过去……南罗得西亚
尼亚萨兰
北罗得西亚
赞贝西河
维多利亚瀑布
锡洛伊
班克特
乌姆武奎山脉
索马兹伯里
鲁萨佩
乌姆塔利
贝拉
奎洛
布拉瓦约
旺巴山脉
贝吉纳兰
马托博国家公园
葡属东非
德兰士瓦
洛伦索马奎斯
印度洋


如今……津巴布韦
马拉维
赞比亚
赞贝西河
卡里巴湖
马兹维卡代大坝
奇洛伊
火岩脉
班克特
维多利亚瀑布
宾加村
哈拉雷
鲁萨佩
穆塔雷
贝拉
奎鲁
布拉瓦约
旺巴山脉
莫桑比克
马托博国家公园
博茨瓦那
德兰士瓦
马普托
印度洋

目　录

那　时

1982

第二天清早，我们离开河流，进入一片景色异常优美之地——比我所见过的任何风景都更富画意。小山与宽谷相间，溪流与小河交错，草地成片，绿树成荫，这一切的组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极具魅力的风景图画。

约翰逊上校和我驾着马车远远走在篷车的前面，抵达小山山顶时，我俩停下车等罗德先生和约翰逊医生，眼前的美景令我震撼。维特纳先生和我都准备在马绍纳兰开辟农庄，我决定就在此地为我的农庄选址，就在矮山的脚下。罗德先生很快就道出了我的想法，当他赶上我俩的车时，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对我说：

"什么都别说，德瓦尔，让我来说你为什么把车停在这里等我们。"

"为什么？"

"因为你想告诉我，你已经把维特纳和你自己的农庄就选在此地。"

"完全正确，"我回答，"你猜得很准。"

他说："刚刚我还跟篷车里的朋友们说到这里景色如何壮丽，我还说你绝不会由此经过而不想弄一块儿到手。"

接着，罗德先生请邓肯先生（马绍纳兰的总测量师，他一直跟我们同行）丈量出两块农庄，一块是维特纳的，一块是我自己的。我肯定这片地区的地产用不了多久就会价值不菲，

尤其是在贝拉和索尔兹伯里间开通了火车后，那天不会遥远。

——D. C. 德瓦尔：《与罗德旅行在马绍纳兰》

这段文字描述的地区接近鲁萨佩，位于连接索尔兹伯里和乌姆塔利的道路旁。1890 至 1891 年间，旅行者陆续抵达这片地区，那时这里已被占领，但军事征服行动尚未展开。

一点历史

南罗得西亚的国土在南部非洲的地图上呈盾形，一片鲜艳的粉红色，因为希西尔·罗德曾说过，整个非洲的地图，从开罗到好望角，都应当涂成红色，惟如此才能由外及里地表达这片大陆效忠于大英帝国时的幸福。他的号角声令无数男女的心在理想和激情中怦然加速，不言而喻，无论是非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能成为大英帝国的属地都是一种福分。这会儿，我们不妨想想，今时今日令我们心跳加速的理想有多少在百年之后会被看成精神错乱，或许，这并非浪费时间。

1890 年，就在写作这本书的一百多年前，先遣队伍抵达这片草肥水美的平原，大海已在远方，从平原到海平面的垂直距离有五千英尺。先遣队有一百八十人，其中有些是警察。一路上他们吃尽了苦头，从好望角到这里足足走了好几百英里，穿过遍地是野兽和被视为野蛮人的土著人的地带，走入一片未知之地。他们之前，虽然也有探险者、猎人、传教士走过这条路，可定居者——那些打算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的人——从未来过这里。

他们披荆斩棘，为了帝国，也为了希西尔·罗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伟人。还有个原因，他们都属于那种开启时代先

河的人物，在他们眼中，遥远的地平线总孕育着新的挑战。没过多久，小镇就拔地而起，镇上有银行、教堂、一家医院、学校，当然还有旅馆，不管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旅馆里的酒吧总是和旅馆的客房同样重要。这就是索尔兹伯里，一座白人城镇，其感受、风情和习俗无一不令人想起英国。

先遣队在非洲人的注目下前进。据记载，看到这些白人在厚重的衣服下大汗淋漓，那些非洲人哈哈大笑起来。一年后，帕特里克修女和她领导下的多明我派修女们也穿着厚重肥大、黑白相间的修女长袍来到这里，立刻开始工作：教育儿童，照料病人。不久之后，女人们也来了，个个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就差没被自己的衣服压趴下了。维多利亚时代，任何一个体面的女人外出旅行时都不会拉下一丁点装束，不管是假领、衬裙还是束腰。玛丽·金斯丽更是探险者中的典范，当她在炎热潮湿的非洲大地上旅行时，穿得好像是去赴午后茶会。那一会儿，非洲人还不知道他们就要失去自己的土地，满不在乎地签下放弃土地的文件，只要有人要他们签。土地，所有人的母亲，居然可以为某人独占而不属于其他人，这可不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没太在意眼前这些装束古怪的入侵者，尽管他们的萨满们，有男的也有女的，警告他们，邪恶即将到来。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已一无所有，就算躲进丛林也无济于事，他们被驱赶出来，被迫工作，做仆人，做苦力。一旦他们拒绝工作，一种叫“人头税”的东西就加征到他们身上。如果他们缴不清税款——实际上他们也根本没法缴清，因为他们不使用货币——士兵和警察就上了门，

手里端着枪，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挣钱纳税。这笔税款在白人眼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却是古老的氏族社会发生巨变的最大动因。

没过多久，黑人发生了暴动，但被镇压下去。征服者残酷无情，这一页历史只会让英国蒙羞，可马绍纳兰的暴动和镇压被编成了故事，成了教育白人儿童，宣扬帝国荣耀和业绩的材料。

亘古以来，方域之内，掌握先进技术的入侵者在搜刮土地和财富的征途上都让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于自己脚下，欧洲人，白人，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批。把最沃爽的土地据为己有，再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机器。这之后，南罗得西亚的英国人开始能够说服自己（这在征服者中司空见惯），被征服者是低等民族，白人的监护是他们的福气，面对更优秀的文明，他们必定会心悦诚服，感激涕零。这里的英国人自我感觉太好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从未进行过大规模屠杀，从未干过种族灭绝的丑事，就像新西兰的白人过去所干的那样（今天，这种事情在巴西还在发生，整部落整部落的印第安人被屠杀，可世界只能袖手旁观）。他们也没有存心注入病毒，更没有用毒品和酒精来协助统治。相反，有医院收治黑人，法律禁止向黑人销售酒精饮料，因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那些“火水”给北美印第安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这些人不比我们聪明，也不比我们愚蠢。要是有人问起，他们的脑子里怎么能容下那么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实际上他已触及另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家常常不留意自

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还记得小时候，常听到一些农场主发牢骚时说："他们迟早会把我们赶下海去。"虽然有点愤世嫉俗，却也没什么坏心（这种话通常都标志着某种程度的内疚）。说这话的时候，大脑中起作用的部分与令帝国子民们洋洋自得的部分肯定分属不同的区域。

1900年，南罗得西亚成为国家，举国上下一片明艳的粉红色，沿着顺直的国境线，一边是莫桑比克，当时叫葡属东非，另一边是安哥拉，当时叫葡属西非，上方是北罗得西亚（同样是粉红色）。

往南，是德兰士瓦，波尔战争的战场。

同样平滑顺直的形状在现在的地图上叫做津巴布韦，难题是这种国境划分把许多历史抛在一边，主要和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有关。早在这片土地被英国人涂成粉红色以前，葡萄牙商人、探险者就来到了这里，有些还定居了下来，当时还根本没什么国界。如果所有欧洲国家都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确定领土的归属，这里就应该属于葡萄牙。那段历史被记入葡萄牙的历史档案中，不过在英国的历史档案中找不到多少，学童们也没学到过有关莫诺莫塔帕或洛马冈地王国里的葡萄牙人的事情。虽然如此，英国冒险家们也不能无视葡萄牙人走在了自己前面这一事实，某片土壤极其肥沃的谷地中还长满了葡萄牙人当年种下的柑橘树，除了柑橘外，葡萄牙人还带来了玉米和其他庄稼。

顺直的国境线同样也忽视了欧洲人到来之前绍纳地区的政治状况，比如说，莫塔帕在十六世纪就包括莫桑比克中部的

大部分地区。

马绍纳兰的历史画卷被呈示给先遣队员的后代们,大意如此:我们白人到这里的时候,遇上马塔贝勒人,他们是祖鲁人的一个分支,为逃避嗜杀成性的祖鲁国王,他们向北避居于此。他们来到这里,骚扰劫掠马绍纳人,从马绍纳人手中抢夺土地。马绍纳人是由关系松散的氏族组成的群体,总在不断迁徙,因为他们每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就会耗尽那里的地力,吓走那里的野兽。我们,英国人,给马绍纳人民带来了和平,也带来了欧洲文明。

可实际上,马绍纳人是技艺高超的种植者和采矿者,直至今日研究者们才刚刚开始研究他们的技术。对英国人来说,必须把他们看成一无所知的野蛮人,惟其如此,才能把他们的一切归于他们的征服者。

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人民虽无怨言,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从五十年代早期开始,抵抗运动开始形成。在四十年代末,像我这样的人开始对黑人抵抗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可发现当时这种可能性还很小,虽然也有个叫约书亚·恩科莫的,被认为是个"危险的黑人煽动分子",他在布拉瓦约到处演说,并燃起群众的怒火,还有个叫本雅明·布隆波的。仅仅十年后,民族解放运动已声势浩大,更受激于一个空中楼阁般的想法——中非联邦———目标是把南、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并为一国。建立联邦的理想不可抵挡地吸引着每个富于梦想的心灵,包括几乎所有的白人,可它实际上是在捏一团散沙。北方二国都是英国的保护国,那里的黑人民众全然相信

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作出的承诺：他们的利益永远是最高准则，国家的管理始终以他们的利益为本。忽视这种"本土"情感的爆炸性潜能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而南罗得西亚总是以南非为榜样，只要那里通过了什么法令，它就会立刻效仿，再把它纳入同南非一样无所不及的压迫机器中。那些想把这三个国家并为一国的人根本忽视了黑人的愿望，而实际上，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独立后，分别叫做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民族解放运动立刻令这个愚蠢的方案寿终正寝。

与此同时，两个北方盟友的成功令南罗得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激励，也成功地处处掀起"风波"。1956 年时我就遇上过两个年轻人（我没被告知他们的姓名），他们向我描绘出地下生活的画面：私运政治读物、警察骚扰、任意逮捕、殴打和监禁。在当时，这场地下的战争力量尚微弱，报纸也不会报道，虽然人们已有所耳闻。整个六十年代，刷在墙上的标语越来越刺目，可这里的白人还没有从肯尼亚吸取教训，仍选择视而不见。和许多其他战争一样，南罗得西亚独立战争原本不必爆发。这里的白人至多也就二十五万，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愿意妥协，同黑人分享权力，如果当初有人向他们指明另一条道路的话。可这些白人中的一小部分在依安·史密斯的率领下，铁了心要为白人的特权而战。战争的爆发没有具体日期，战火越燃越大，竟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肮脏的一场战争。敌对双方的部队也并非黑白分明，在白人这边也有黑人士兵和警察。战前，白人远非团结一心，可战争的激情让他们联成一体，少数几个敢说这场战争

是个错误，该早日结束，也不可能打赢（看看莫桑比克吧，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白人还是被赶了出去）的人还要面对歇斯底里的仇恨，面对污蔑和迫害。

黑人同样也分裂成无数小群体，不仅有不同的领导，奉行不同的思想，率领不同的部队，各支部队本身也分裂成小块。罗伯特·穆加贝率领的部队只不过是其中一支，却是最激进的一支，奉行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战争中，大多数白人原以为大多数黑人会选择温和的民主派，如约书亚·恩科莫或穆佐雷瓦主教。

战争中，双方都犯下暴行。住在乡村的人民苦难深重，无论是政府军，还是黑人叛军，都以资助敌方的名义惩罚他们，可不管是哪一方的士兵到了他们那里，只要伸了手，他们都得满足。大量村民被强行从家里带走，被投入其实就是集中营的地方。当然，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们”。年轻男女只要够了岁数就逃离村庄，加入游击队，逃到赞比亚、莫桑比克，甚至南罗得西亚本国的丛林中。在那里，他们至少不会遭到骚扰和折磨，不会在政府军的手中死于非命。整整一代黑人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在游击队接受了教育，有时他们也学几句马克思主义口号，可真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对白人的仇恨。

战争结束，双方的暴行被大度地泯于一笑，当黑人群众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选举时，他们选择了穆加贝。穆加贝立刻宣布，他将建立起一个多种族社会，结束种族仇恨。据说莫桑比克的萨莫拉·马歇尔（还有其他人）对罗伯特·穆加贝说：

“别再犯我们的错误，别把白人赶走，那样他们只会给你留下个经济烂摊子。”毁坏不仅由于战争，也由于葡萄牙人在撤走前把一切付之一炬——当萨达姆·侯塞因被迫撤出科威特时，我们也曾见识过相同的行径。

1980年，年轻的津巴布韦正式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从先遣队员们抵达小山脚下(标志着索尔兹伯里的开端)，直到独立，这个国家走过了九十年。九十年算得了什么？可就在这九十年中，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大致相当于西班牙的国土面积)被彻底摧毁，人民屈服于各种现代武器、警察机构和宣传机器的淫威。最后人民奋起一击，对抗装备了最先进武器的军队，居然打赢了。现在，他们要步入现代世界体系，以平等的身份夺回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困难同大多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一样，缺乏受过足够训练的管理人才，不过在这一方面南罗得西亚的状况已经好过大多数邻国，尤其在农业方面。津巴布韦成立之初，就拥有一支壮大的训练有素的黑人农业生产者队伍。津巴布韦之所以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不像它的那些邻国，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养活自己之余，津巴布韦的粮食还有剩余，可以骄傲地卖给南非，也捐赠给非洲之角上闹饥荒的地区。津巴布韦获得了成功，虽然它也犯过傻，也出过错，还要支撑莫桑比克，那里简直就是灾难。为了帮助莫桑比克维持公共秩序，喂饱难民，维持从贝拉的石油管线畅通，津巴布韦每天就要支出一百万英镑，而它自己仍然是个穷国。全仗津巴布韦之力莫桑比克才能存活至今，南非则不遗余力在那里搅局。就算南非不再去“骚扰”它的黑人

邻国，伤痛也不会在一夜间痊愈，它出钱出枪武装起来的叛党更不会在一夜间都变成良好公民，他们还会四处破坏。好也罢，歹也罢，南非支配着非洲南部，而且仍将支配下去。1991年时，莫桑比克的前共产党政府就被邀请到南非的首都，商讨如何治愈和发展那个破碎的国家。

和其他新独立的黑人国家一样，津巴布韦也有一个腐败的统治精英层，可那里的强盗们可不懂什么叫小心谨慎，更不会心存愧疚。相反，他们为自己的行为骄傲，四处吹嘘，炫耀自己的财富。约书亚·恩科莫和罗伯特·穆加贝都曾努力遏制腐败，可最后恩科莫也不得不向现状屈服，向发生在他身边每一处的事实低头。在1989年的一次演讲上，他说："我觉得我们是得懂得如何致富，可也得懂得其他事情。"

津巴布韦头十年的历史中写满了暴力和混乱，那里的人自相矛盾，情绪高昂，总有出人意料之举。最可怕的一页始于马塔贝勒兰地区"叛乱者"的烧杀抢掠，当时那些人就被看成代表了整个恩德贝勒族，整个省。穆加贝的军队扫荡了那一地区，成批的烧毁村庄，铁手无情，简直就把马塔贝勒兰当成了敌军占领下的省份。可最后，人们发现，原以为是一整支游击队的叛乱者不过是几个亡命之徒，连他们自己所属的村庄都不允许他们进村口，更别说什么代表群众了。下面所说的事情对未来或许不无启发：据说，马绍纳军队在马塔贝勒兰烧杀抢掠时，口中还念念有词："这是为了……"那都是一百年前的烂账了，那时，马塔贝勒人赶走了牛群，烧掉了庄稼和房屋，抢走了女人。

津巴布韦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是这里的人民表现出的旺盛活力，乐观向上的情绪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去津巴布韦几星期，或许，当你回来，又回到令人萎靡不振的欧洲时，你才发觉，在过去的几星期，你身边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开口所言除了令津巴布韦更有效地运转更无他事。那里的人无不把自己认同为政府和管理决策者的一分子，这意味着那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激起最热烈的回应，或支持，或反对。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那里一无是处，愤世嫉俗的情绪令一切变质，到了津巴布韦后，人们会说，他们又找回了对非洲的信心。无论如何，津巴布韦在非洲独树一帜，因为这里的人民拥有创造的力量，更为自己而自豪……或许，你会听到一个黑人如此评论赞比亚，或者莫桑比克："他们不懂得怎么干，咱们得教教他们。"这种有点自以为是，甚至也可以说有点目中无人的态度，却延续了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热爱，虽然如今，这个国家不再属于"他们"，爱仍不改。当谈到南非的某项成功项目，比如说一家新企业，或者一处农庄，你或许会听到某个白人如此说："那是当然，南边的罗得人注定会出人头地，我们晓得该怎么干。"

独立以前，南罗得西亚所有的白人都坚信这里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这里的政府管理也优于任何一个其他的由白人统治的国家。1989 年，我在津巴布韦访问时，还不时听到某某人说(故事中，常常是希萨诺总统对穆加贝总统说)："你们走运，在这儿的是英国人，至少他们给你们留下了像样的基础设施。"

1982

我又回来了，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的二十五年，来的时候还是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个三十岁的年轻女人。从上次离开至今，又一个二十五年又过去了，因为我被禁止入境。或许有人会想，这有什么好含糊的呢？你要么是个好公民，要么是坏公民，前者允许入境，后者禁止入境。可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从 1956 年起，我就被禁止入境，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在我的心头闪过，我居然会被禁止入境。可不可能也只是自己的想法，和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实无关。这是你成长的土地，谁又能禁止你呢？感官之网、记忆之网、经验之网，无不如是说，它们的话把你同这片土地紧紧绑在一起。1956 年，我受邀去罗得西亚首相办公室，现任首相是加菲尔德·托德。首相是位棱角分明的俊朗男性，气度颇有点近似于亚伯拉翰·林肯。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那个办公室显然对他来说太局促了。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张开臂膀保护着你，我的孩子。"其实，他不过比我长十岁，我把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归为他曾做过传教士的事实，也没太留意他说些什么。他的意思是，他欢迎我到南罗得西亚来，原以为我会把邦联政府好好描写一番。

“让你来是要你……”我说自己无法赞同邦联政府的所作所为，然后我们就开始激烈争论，足足有两个小时，不过彼此并无恶意。晚些时候，我要求采访马尔文勋爵，因为他做过家庭医生，大家都叫他哈金斯医生。我告诉他，自己想访问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当时那里已遍地骚乱、暴徒，社会大乱，呈现出种种独立即将来临的迹象。他回答说：“是吗？你想，你想。”同他争论时，他的态度远比加菲尔德·托德恶劣，他说：“我不会让你去骚扰我们的土著。”他说什么我还是一句没听进去，最后，他说，我可以去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两星期。“那点时间你也干不了什么坏事。”不用说，他的话让我受宠若惊：像我这样的人只把自己视为记录者和观察者，在别人眼中居然成了推动者和实践者，能不令自己大吃一惊吗？（这些事已过去许久，如今，唯有当我试图接受当初行为的不理智时，它们才会引起我的兴趣。）回到伦敦后，我就在想，有些地方我原本应该能看出来。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行动遭到限制，可反正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令我无法“接受”的事实是，我居然会在自己长大成人的地方行动遭到限制。最后，我带上一为律师一起去南罗得西亚代表处，那里的一位官员显然觉得自己待错了地方，一脸不高兴，说：“见鬼，可是你逼我说的。”这样，我最终被告知，很久以前，自从我

离开一个家乡回到另一处家乡，哈金斯首相[①]就已经颁布了法令，禁止我入境，谨防我去骚扰他的土著。

按照传统，我为自己遭禁而感到自豪。自打那以后，我开始明白，我们自许为世界公民，可动机之纯洁能配得上我们的理想的国家并不多。

我并不希望留在南罗得西亚长住，尽管那里气候适宜（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景色壮丽，我总觉得那是一隅偏居之地，生活了无趣味。我想居住的地方是伦敦。这纸禁令最多也就是使我无法拜访那里的亲戚朋友，而且他们还能来伦敦。可这些合情合理的想法并未能抵达我心中某片神秘区域，显然，那里是无穷的泪水之源。整夜整夜，我在睡梦中哭泣，醒来后清楚知道，我同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被无情拆散。一夜又一夜，我做同一个梦：我在丛林中，或者索尔兹伯里，可我的存在是非法的，我没有合法证件。"我的"同胞，指那些同我一起长大的白人，要把我押送出他们的国家，而"我的"另一些同胞，那皮肤黝黑、性情和蔼的人，却看不见我。一连好几个月，夜夜如此。大多数人到一定时候终于明白过来，我们的皮肤所包裹的并不是质地均一、分布匀称的物质，像蛋糕馅、土豆泥，而是几种互不相容的实体。我花了更多时间问自己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这些表皮之下的冲突对我们的行为，以及

① 哈金斯医生任南罗得西亚首相多年，在邦联期间，作为马尔文勋爵，他在 1956 年任邦联政府首相。同年，加菲尔德·托德任南罗得西亚首相。——作者原注

我们的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泪水之池，池水在翻腾吗？在渗漏吗？在悄无声息地打湿我原以为保持干燥的土地吗？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的拒绝，我无法接受被拒之门外的事实，都只不过是内心不成熟的症状。这不单单是我的病，也是许多特权国家的居民的病，那些安享安全的人们的病。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被赶出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或许是一处乡村、一条山谷，也可能是一座城市，原因有战争、疫病、地震、饥荒。最后，他们还是回去了，可那些地方已不再是往日的模样，要么被毁，要么荒芜。或许，第一眼望去，一切依旧，就好像孩子在离家许多年后依旧能辨认出母亲的容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看到，一切已不同于往昔，到处都是空洞、断裂、损耗。在那些为人们所珍爱的山谷中、街道上，仿佛昔日绚烂的阳光已被抽干。过不了多久，那种一辈子只识一个城镇、一条山谷的人就将少之又少了。现在居然有人在想人类能不能离开这个星球，隔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好让这个星球休养生息。可隔了遥远的几代人之后，当人类再回来时，他们会发现……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

1982年，我订了张津巴布韦航空公司的机票，为回来做各

种准备,心情复杂异常。上飞机坐好后,不合时宜的情感开始涌上心头,来势汹涌。首先,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是黑人姑娘,在过去这是绝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白人,那些黑人姑娘也没理由期待乘客们会以礼相待,因而她们每人都戒备重重,根本不看飞机上的任何人。机舱里的气氛很不愉快,我原本想坐在一个黑人身边,也好听听他对现实有什么看法,可结果身边坐了位白人赛马主,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性,一路上强迫症患者般嘟囔不停,整整十小时,半句不离新黑人政府。过去,我也听到过类似的刻毒声音:在赞比亚的独立庆典上,那些白人官员昔日没花过半分力气来培训黑人,教他们如何承担责任,那时却历数新政府效率低下的种种事例,脸上泛着恶毒的光芒。这会儿,我又遇上了那样的人。这个男人坚持说,那里还是上帝的家园,他在那儿培育和训练的赛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都便宜,质素还更优异,他和自己的家人过得棒极了,说什么他都不会走,可黑人政府……我给了他一只耳朵,以为等我向白人世界表达了适当的敬意后,就能离开那个话题,听听看新津巴布韦到底如何。我讨厌这个人,感到不耐烦,许多年前,在我成年以前,我也有过相同的感受。幼稚、娇纵、自暴自弃、心肠歹毒……他占全了,他们都和他一样,至少大部分人和他一样。可那又如何?我何必还是如此上心?

就在他抱怨食品短缺的时候,早餐送了上来,有咸肉条、炒鸡蛋、香肠、烤面包。这种东西只能给泥腿子和挖坟的填肚子。

小小的机场没什么变化，我几乎没去看它，牵扯着我的神经的是气味，是土地的颜色，原先的情感平衡荡然无存。入境官是个腼腆的小伙子，没什么经验，说话吞吞吐吐，问我是不是打算回来居住。因为旧政府的缘故，我们有太多的“朋友”都走了。他又问起我的护照，因为我出生在波斯，于是我向他解释，宽松点说，波斯和现在伊朗的关系就像南罗得西亚和津巴布韦。在机场的银行换好钱后，那个入境官又问我，你是不是那个作家，欢迎回到津巴布韦。走出机场大厅，外面的空气干燥，略带气味，我不禁潸然泪下。一个小伙子已经把我租的车开到机场，一路上我太专注于节制泪水，都没怎么看街道。在汽车租赁公司，我让小伙子下了车，自己把车停好，独自一人站在街道上。曾经，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城市。

大城市

不用说，昔日单马道、单层建筑的市镇已经消失了……不过，在新起的高楼大厦间，昔日的遗迹星星点点，无处不在。有什么不对劲？空气？是的，现在是冬季，空气寒冷干燥，天空中闪耀着微薄的日光。街上有些人，行动迟缓，无精打采，一家建在人行道上的咖啡铺里还有几个顾客，虽然也不算多，都是白人，看上去人人戒备重重。我四处闲逛，每分钟都比上

一分钟更泄气，一路上遇到不少乞丐和战争中伤残的人。那些人没礼貌，举止粗鲁，嘴里还不干不净，冷不丁伸出一支胳膊，一条腿，要是给的钱少，就把钱拿在手里使劲晃，仿佛不肯接受，满脸忿忿不平之色。我走进梅克里斯酒吧，当初这里有一座风格独特的旅馆，现在已经拆了，竖立在原址上的建筑同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其他建筑没什么两样。“他们”居然连梅克里斯都拆了，这让我愤怒得难以自制。“他们”在任何地方，拆掉任何一幢建筑，我们都感到愤怒。“哦，那是个错误。”大家都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如此轻飘飘地说。旧旅馆的样子还留存在挂在酒吧四壁的照片中，我觉得自己也属于那些照片，差点就凑上去，不厌其烦地细细查看，找几张自己熟悉的面孔，甚至是年轻时的自己，可我克制住自己。离开梅克里斯，心里默默为它哀悼，走进一家书店，迎面走来的年轻人有点咄咄逼人，我立刻就知道了白人进这里时会是副什么样子。我问了几本黑人作家写的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找出了书，一眼都没瞧过我，更别说给我个笑脸。我说，自己也是位作家，说不定他的店里还在卖我的书，可他没问书是什么名字，最后我自己告诉了他。他显得有点将信将疑，但之后就友好起来，说读过我写的一个短篇。“你回来是想住下来吗？好白人打仗的时候都走光了。”我回来访客。

拜访谁？这是家黑人开的书店，死硬派白人进来的时候永远只有一种举止。我们道了别，小心翼翼地表示友善，仿佛身边就有炸弹，只要说错一句话炸弹就会爆炸。

我决定离开哈拉雷，从早上到这里还不到半天，可这里

的一切都已让我心寒，还不仅仅因为自己感觉像个哀伤的幽灵。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了，虽然诊断明摆在眼前，可当时我就是得不出，就算过几天也不行。这座城市还在舔着战争留下的伤口，这个国家已打了十年仗，战争两年前才刚刚结束。这种战争，内战，一旦开始，就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创伤。我去巴基斯坦采访阿富汗难民和游击队时，也感受过相同的气氛。在人民心里，有些东西要么已灰飞烟灭，要么被扯得粉碎，愤怒变成苦闷和麻木不仁。无言的怨恨，流露于慢吞吞的动作中，写在迟缓的反应里。难以相信，世事居然能如此恐怖。

我去了趟旧日以希西尔家族和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名命名的希西尔广场，去买点花。其实，我是想和卖花的聊聊。这里卖花的都是男人，过去一直如此，可现在也不同于往日了。他们一下围上来，把手中的花一下捅到你鼻子底下，就像街上的乞丐把自己的伤手伤脚伸到你面前。卖花的太多了，现在游客又少，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可花还得卖。够了，够了，两束就够了，那些没得到惠顾的小贩像那些乞丐一样，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意，仿佛这种情绪是得到官方许可的。

把花放在汽车后座上，我沿着老路向东，向乌姆塔利的方向驶去。

丛 林

我们一家经常去马兰德拉斯，现在那里又叫回马隆德拉了，就像乌姆塔利的正式名称应该是穆塔雷，要是白人没有把那里占为己有。我们不去乌姆塔利，那时，那里对我们家来说是个遥远的地方。第一次去乌姆塔利时，我大约已有十五岁，打那以后，马兰德拉斯就只是我外出访问农时一个路边小站了，有时候我一出去就好几个星期。可在我还小的时候，马兰德拉斯对于我们家农场来说就是北极了。我们家的农场在班克特区的洛马冈地，在索尔兹伯里东北七十英里的地方，通向赞贝西河谷的道路向北从那里经过。这条道路上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除了热热闹闹每年如期必至的洪水，一到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得坐着等上四五个小时，等洪水退下去，然后才敢涉水过河，因为洪水中会有漩涡。也有时，我们会深深陷进红土里，要另一个人踏着新砍的树枝走过来，然后再把自己拔出来。那里总能看到野生动物……“看，那有头小羚羊。”或者一头捻角羚羊，一小群大角斑羚。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日常所见，早已习以为常，一直要走到索尔兹伯里的另一边，新感观才引起震动。空气在晃动，仿佛热浪在大脑中的图像，就我所知，只有在通向乌姆塔利的道路上才有这种景象。马兰德拉斯在索尔兹伯里东南大约五十英里的地方，你或许会说，一百二十英里又怎么样？这是出于一种完全实际、与风雅毫不沾边的视角。我们家的车是辆老奥沃兰德，同第

一代福特同龄，现在那些车还从汽车博物馆里被倒腾出来，在反映大萧条的电影中成了明星。再加上我父母的个性，每趟旅行简直就是史诗般的远征，提前好几个星期就要订好计划，做足准备。在我们家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钱”。通常说话的是我父亲，听话的是我母亲，那句话也就是要证明某件事办不到。比如说这次，在马兰德拉斯靠近鲁扎韦的旅馆住上一星期。我弟弟在鲁扎韦上学，上的是一家按英国传统办学的预科学校，我们去那里是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同时也是家长开放日，观看学生的板球比赛，而评判比赛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队员们模仿英国同类学校比赛的逼真程度。办不到！感谢老天！父亲宁愿待在农场里，穿着咔叽布衣服，也不愿穿上体面的衣服，跟别的学生家长东拉西扯。他说没钱并不说明我们家穷，只是出于他自己的需要，那时候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静静待着，好好做白日梦。

可最后获胜的总是我母亲。一个个铺盖卷、一箱箱食品、还有旅行箱，把小车的后排座塞得满满，还要挤进我和我们家的“服务生”，然后我们就上路了。以父亲坚持的行车速度，到索尔兹伯里的七十英里路要开三到四小时（用刹车的男人不知道怎么开车）。一辆辆派克和斯蒂贝克从我们的车旁一溜烟超过去，车后扬起高高的尘土，路上居然还有这种福特，这种奥沃兰德，简直是时光倒错。（车还完全能跑，干吗要丢了？就因为他们想买辆新车？）就算在这种路上，花一天、甚至一个下午的时间从班克特开到马兰德拉斯也不是什么难事，谁都行，除了父亲。中途，我们在梅克里斯旅馆住了一宿，不过住

在旅馆后面的附属建筑里，那儿便宜。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顿野外自助式晚餐，因为我们也承担不起旅馆餐厅的消费。吃完晚饭后，我们到旅馆的大厅里喝喝咖啡，欣赏乐队在棕榈树和镶金的厅柱间的表演。

第二天早上，车上必须装上更多的食物，我们一大早就开上通往马兰德拉斯的公路，这样到那里以后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搭营地。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切都得留心，里程也拉得更长。这是片沙地草原，不像班克特，到处是红色、棕色和明亮的粉红色土壤，一路上的景观微微给人一种干燥和高远之感，公路两边山峦渐行渐多，以至连绵成片。远处，山峦呈青黛色、淡紫色、深紫色，道路两边尽是一堆堆此地特有的巨大岩石，在别处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景观，无论是照片还是实物。巨石从浅薄的土壤中突兀而出，石与石之间的支撑如此纤弱，强风吹来，居然没有倾倒，实在是奇迹。巨大的石面略带明亮的灰色，凑近看上面还有点点闪光，带着规则的节理和纹路。湛蓝的天空下，巨石反射着热力，任何一个由此经过的人都不禁要琢磨，它们如此不可思议地相倚而立，已度过了多少个年头？过去只把玩过小石子的人到了这里终于得以一睹巨人。“那块，那儿，”我默默在心中记下它的确切形状和位置，“下星期我回来经过时它可能已经倒了。”那块巨石足足有一棵猴面包树，或者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和下面石头的接触点只有一两平方英寸，可在与重力的搏斗中，它是最终的胜利者。经过一场又一场暴雨，一阵又一阵狂风，一次又一次电闪雷击，1982 年，当我开车经过这段路时，它依

旧巍然屹立。半个世纪已过去了，一段内战的历史，为解放的战争，丛林中的战争。

路向上，路向下，哪儿的路都有上下坡，可如此夸张的更无别处，只有在那每小时三十英里的旅途中。汽车喘着粗气爬上一段斜坡，奖赏就是从坡顶可以自由滑行到谷底，然后又一次挣扎爬行。上坡时，车挂二档，二档坚定、可靠，最高档则有点冒失不稳。每到一个坡顶，眼前都是一片壮丽的景色，母亲一边赞叹，一边指点给我们看，她的神情中，赞叹和遗憾交织，仿佛如此美景必会遭天嫉而流于哀伤。这时候，我使劲把眼前的景观塞进脑海，就像把一张张相片塞满相册，可脑海里的景观始终在变，在记忆中改变，下一次旅途中所见所闻又会不同。原以为自己永远记住了某处景观，可到头来却发现它不见了，眼前那如带起伏的山峦没过去那么高了，昔日高峰迎面而来，如今却是低矮小山。一条小河改了道，又多了条过去从没见过的支流。难道说记忆中的景观另在别处？不，那座小山一直就在那儿，就在路边，我一直就把它当做路标。在那处景观前我下了多大力气啊！眼睛瞪得溜圆，惟恐一眨眼角度已有改变，精神再难集中。我全心全意去接纳，去记录，知道自己是在跟时间赛跑。我痴迷于时间，一直如此，在最早的记忆中，我就在对自己说，记住……别忘了，仿佛我生来就了解时间的那些花招和骗人的把戏。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两三岁的样子，有人对我说："告诉你是这个样子。"可我知道它曾经是这个样子。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实情如此。"可我知道实情曾经如此。有人劝我忘掉一些曾经真实存在的

东西，肯定是我童年时发生过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因为自己一直抓紧过去不肯松手，一直对自己说："记住，记住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别听他们的话，把那些曾经的真实遗忘。"甚至现在我还能清晰地看到一系列景象，就像照片，就像遗留在视像中的记忆。我挣扎着找回往日的景观，找回往日的视角，这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把所有那些都列出来足足能写满一张清单。时间就像成人一样一直在变，流动不居，可只要你下够功夫，对一件事，一个关口，你就能把它定格下来，就能重返……还在那里吗？还跟过去一样吗？时间也在磨损，在破碎，在模糊，散射出蓝色、紫色、白色的杂光，就像舞台上的干冰。"这儿吗？等等，我没看到……"

时间的脚步慢一慢一吞一吞，简直是在爬，我知道这就叫童年，父母对我说："等你到了我们的年纪，日子简直在飞。"可在那个时候，每天都是永远，我下定决心摆脱童年状态，越快越好，童年意味着无助。不知道那些跟我一样不喜欢童年，催时间快点走的人长大后对时间的感受是否有了变化？不知道对那些没有催时间快点走的人时间是否真就走得慢些？去马兰德拉斯的旅程每两三年就要重复一次，某种意义上标识出已走完的人生里程：又过了四个月，又过了一个雨季，又过了一整年。去年，相同的地点，已遥不可追。每次出门前，母亲都要花大力气把一切准备停当，父亲也要花同样大的力气唤醒自己去面对生活，驾驶好那辆鬼车。（骑马加走路也比这要快得多！）每段旅程都是一小段人生，每次出门都是一次历险，带着自己的味道，写着自己的遭遇。每一次都已遥不可及，却

绝不会同之前任何一次混淆。

“那次C太太来看了看我们的营地，她好像有点好奇。我觉得，在我们住过的所有地方，这里最棒。要是住在马兰德拉斯的旅馆里，哪能看到头顶上的满天星星？”“那次我们家的‘服务生’，什么名字来着，是卢本吗？”（那些可恶的传教士！）“他去喝啤酒就不见了两天，因为碰上个邻村的弟兄。出现的时候，他还跟个没事人一样，说没见自己的弟兄已经五年了。弟兄个鬼！据我所知，他们管碰上的每个人都叫弟兄。”“得了，老家伙，对他们公平点。碰上每个人都叫弟兄，还记得《罗得西亚先驱报》上的那篇文章吗？他们的人际关系体系同我们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没佣人咱们过得也挺不错，不是吗？我觉得下次出门咱们不用带个佣人了。”“这是原则问题，”母亲凶巴巴地回答。有些话她没说出口，也说不出口，可全写在了脸上，就像个受到不公正处罚的小姑娘。“你当然无所谓！每天谁做饭？谁装车卸车？谁找营地？谁收拾铺盖？谁照看孩子？你当然不用管，从来就没管过。难道什么事都得我亲手做吗！”是的，什么事她都亲手做，一向如此。

到达马兰德拉斯后，我们从通向乌姆塔利的大路上拐下来，驶过一座小镇，镇里到处是花园，到处是蓝花楹和凤凰木，沿着通往鲁扎韦的路再开上一英里左右。这里的丛林中到处是石质小山和涓涓溪流，沙质土壤闪闪发光。学校就在前方，已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驶下道路，前面的穆萨萨①树林中

① 穆萨萨树是津巴布韦最常见的本地树种。——译注

有一片空地。“服务生”砍下树枝，按当地的风俗搭个圆形围栏，这些连枝带叶的障碍可以防豹子，那时山上的洞穴中还有豹子，虽然它们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其实，咱们睡在树下没有栅栏也行，再凶猛的豹子也不可能一纵就越过空地，把我们中的一个叼走。那枝叶围墙表达了另外的东西，其作用并不在于把什么挡在外面，而在于把我们这些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圈在里面。父母需要那些枝叶如臂膀般把大家围拢起来。不过我弟弟更大一点时就曾独自一人在丛林中待上好几天，有时也和在我们家厨房里黑人帮工的儿子一起去，睡觉的时候也跟过去的黑人一样，卷在一张毯子里，睡在火堆旁。直到今天，还有黑人那样在野外过夜。

在栅栏里面，我们用新割下的草堆起五座低矮的长方形平台，根据季节不同，或鲜绿松软，或枯黄干燥，我们的铺盖就铺在草上。这时候，弟弟得到允许，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住上一两晚，父母还坚持黑人佣人和我们一起睡在栅栏里，为安全起见。

这带来种种不合理和不方便，不过我也早习惯了，没觉得什么不方便，直到长大。卢本（还有以赛亚、约伯、西门、亚伯拉罕、六便士、提基，没谁待的时间够长）在栅栏外自己点起一小堆篝火，在火上煮自己带的玉米粥，也吃我们带的食品，咸肉、鸡蛋、肉排、蛋糕、面包、果酱。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堆旁，看着火星点点窜向树冠，向星空飞舞，他则背对树而坐，脸背对着我们，看着自己的小火堆。再晚会儿，我们都换上睡衣钻进毯子，他就被叫进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在我们身边躺

下，脸依旧背对我们，朝向连枝带叶的栅栏。第二天清晨，我们醒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生起了火，坐在火边，肩上裹着毯子，身上穿着他带来的所有衣服——破衬衫、短裤、父亲扔的毛衣。那些清晨有时会很冷，树叶的边缘都结上了霜，我们家那边要暖和得多，极少下霜。

后来，我开始对一件事好奇起来：跟我们一起踏上这奇妙的旅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很多他的同胞从来都没见过汽车，这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通常他想都没想过要来。一日又一日上路，那个白人家庭选择在短期内像他的族人一样起居，一路上赞叹之声不绝于口，可又要保持自己的习惯，仿佛还在家里，连睡觉都要换上专门的衣服。他们在树下放上个装肥皂的箱子，箱子上放着瓷脸盆，不停地洗手，不停地吃东西，所有白人都一样。“他们吃个不停，”他肯定会如此对自己的族人说，“刚吃完一顿，又开始做下一顿。”

想起当年对动植物的伤害，想起那些被冒冒失失砍下来的枝干和幼苗，心中不禁既悲哀又无助，和如今的许多人一样。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了这种感觉。

离开营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垃圾仔细掩埋起来，可搭栅栏时造成的破坏还在，有时我们几个月后回来，它们还在那里，接着我们又砍新枝，搭新栅栏。在火焰曾经升腾的地方，上面的树叶灰黄、干硬。那时候，丛林里仿佛有着数不清的鸟兽。离开津巴布韦去伦敦前不久，我在议会一个研究睡眠疾病问题的委员会当过打字员，也报道过灭采采蝇的工作，记录

下在广阔的区域内猎人们如何驱赶、捕杀上十万头的野生动物，有林羚、黑貂、丛林野牛、小羚羊，尤其是小羚羊，那些步伐轻盈、身段优美、大眼流波的动物，它们曾经布满丛林，你走不上几米肯定会遇上一头。

离开津巴布韦多年后我又回到这里，我已料到种种变化，可有一种变化我始料未及：野生动物几乎消失了，丛林变得鸦雀无声。曾经，清晨群鸟的叫声刺得耳膜都疼，不管是在马兰德拉斯的丛林中，裹在毯子里，还是在班克特，在我们家农场的房子里，太阳一露头，群鸟就开始尖声喧闹，吵到耳朵都仿佛卷曲起来以示抗议。于是我们一跃而起，投入到清晨的空气中，投入到一天的吵嚷和劳作中。除此而外，还能如何？可到了八十年代，清晨的鸟鸣已十分微弱。曾经一度，只要在丛林中漫步，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小羚羊、野牛、野猪、野猫、豪猪，食蚁兽站在蚁丘上盯着你看，然后才跳下蚁丘，消失在丛林中。大角斑羚成群结队，像牛群一样。进入丛林就是跟动物在一起，成为它们中的一分子。

夜里，躺在用树的枝叶搭成的栅栏里面，我们听着夜鹰的叫声，还有猿猴的神秘啼鸣。有时，就在我们的正上方，一双小眼睛透过树的枝叶一闪一闪，那是只猴子或野猫在盯着我们看。天刚黑的时候，熊熊的篝火上升起通红的火星，一直能飞到树冠的顶端，晚些时候，火头越来越小，火星还在飞起，可也越来越少，噼噼啪啪地一个个熄灭，像夜空中的流星，真流星也能看得到。也有时睡不着，听到某种大型动物的声响，它肯定惊奇地发现自己平常走的路上多了处障碍，于是扭头走

开，一切归于寂静。先前被熊熊火光掩盖的月亮现在也回到近空自己的位置上，就停在树冠的上面，低目垂视着我们，形状多变，大小不一。

每天晚上，父亲、弟弟和我都强打精神坐在火边，可母亲要我们准时睡觉，为了她的目标养足精神，那才是来学校的真正目的。对我们来说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丛林、鸟兽、星空、篝火——对她来说都只不过是通向那一刻的道路。当那一刻到来时，她和别的父母一起坐在看台上，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孩子一起穿着崭新的白衣白裤出现在球场上，挥拍击球，奔跑跳跃。运动场相当宽敞，上面铺着淡色的土，四周种着桉树。学校的建筑属于一种叫做海角殖民式的风格，也叫做海角荷兰风格，房屋低矮，通体刷得雪白，上面覆盖着红瓦，窗上配有绿色的百叶窗，一切都显得干净、整洁，学校里还有绿油油的英国草坪。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因为同那些如舞台表演般完成仪式的英国中产阶级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已不合时代、可笑，当然，他们的执拗还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代表了母亲渴望成为的“好人”，她觉得自己被流放在红土地上，周围的人，在她眼中，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在这里，我们被请去同学校的校长和男女教师一起吃午饭，喝下午茶，吃晚饭，按照严格的规定，那些仪式要连续上演好几天。可父亲常仰面躺在橡胶树底下，任母亲怎么捅他也不肯起身，母亲感到丢了人，受了伤。一向如此！他竟如此不重视她的目标和抱负，就算我们家穷，就算我们的农庄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就算他丝毫没有兴趣，

我们还是来了，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这里有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儿子被送上一条正轨，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我们大家。“你去吧，老东西，”父亲一面说，一面仰面向上，透过长着稀疏绿叶的白色橡胶树枝干，看着永远湛蓝的天空。“你喜欢，我不喜欢。”他让她伤心失望了，他自己也知道，于是又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拖着笨重的木腿和她去喝茶，去用午餐，去参加家长聚会。也有时候，他就是躺着不肯动。有时候，还有其他的父亲们加入他的行列，看到他自由自在地躺在芬芳干爽的橡胶树下，他们也抵抗不了诱惑。很快树下就有了两个、三个、十个父亲透过树叶仰望着蓝天，直到被妻子们叫起来。孩子们站在一旁看着她们，有的吃惊，也有的开心，就等着她们说出下面的话：“你在这儿干吗？别人会怎么看你！”

那个地方属于弟弟，不属于我。母亲必须把弟弟送到鲁扎韦去，只有那里才深深地表达出她的本性，虽然“英国”和“家乡”都远在天边，这我们都能理解，也能容忍。她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修道院，和鲁扎韦一样，那也是一个市侩的选择。对我来说，那是个黑暗、压抑的地方，到处是拖着黑白厚长袍的女人，一到热天就散发着怪味。我知道那是个糟地方，可到底有多糟，直到我成年后才有所了解。在那里我待了五年，它对我造成的伤害直到今日我仍无法估量。那里有条不成文的训令：当家长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时，孩子只能回答“很好”，别的什么都不能说。五年，五年，五个童年。当你长大成人后，回首看去，那是什么样的五年！你泡在那五年中，

修道院中的五年，跟修女们作伴的五年，当假期到来时，时间仿佛已过了一万年。假期当然不同，同样漫长，无休无止，感谢老天，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丛林中玩耍。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被父母丢弃了，想家想到生病。我一到学校就会生病，他们却不会。我问弟弟在鲁扎韦怎么样，他说很好，可教他的人并不是修女，那些女人大部分都是从德国南部来的农民，一些生活上遭受挫折，又愚蠢无知的女人。教他的人个个说话干脆，讲究实际，可不会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架上还有个被折磨得变了形的男人。他们住的房间的墙壁上也不会画肉乎乎还滴着血的心脏，那可是孩子睡觉的房间，在那里睡觉的孩子们有的梦游，有的做噩梦，有的尿床。在学校的时候，他和我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可在假期，我俩又回到同一个世界中来，那是丛林的世界。

也可以是绿色栅栏中的世界，在那里，他会编些故事，讲在学校里的活动，可我一下就能听出大多数都是编造出来的，就为了逗父母开心。按照他那所学校的传统，在描述业绩和成就时要既夸张又谦虚。那些业绩本身都是夸张的吹嘘，比如说攀上危险的岩石、屋顶、大树，或者跳进满池鳄鱼的水中，可在说的时候要把那些危险一带而过，那就是学校教出来的谦虚。在我们家农场书架上的书中，我也能发现同样的传统，通常是吉卜林的书，还有布肯，萨伯尔的，还有参加过一战的士兵的回忆录。你尽可以拉着一根只有眼睫毛那么粗的线越过深深的峡谷，从这一头飞到那一头，或者跳入火海去救自己的同志，或者踩着离地面有三层楼那么高，却只

有六英寸宽的墙边从一个窗口挪到另一个窗口，你什么都能说，可说的时候语气中必须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幽默，那样就对了。

有时候弟弟编故事的时候，我会注视着他的脸，可以原谅，都是学生的故事，带着学来的幽默和谦虚。可在那后面还有些别的东西，一种固执、隐秘的兴奋。他说那些故事的时候，仿佛他不在火堆旁，也不和我们在一起，而是又回到危险的时刻，感受着它的刺激，还有它的魔力。

我俩订了个协议，虽然已记不起什么时候，如何订的了，可肯定订过。协议的内容是：我俩相互盯着对方，不让对方入睡，联手对抗母亲的固执。这意味着我俩那两堆散发着清香味的草堆必须紧靠在一起，这倒让父母心情不错，说上两句，因为通常我和弟弟并不怎么亲。我俩仰面躺着，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刻去看月亮、星空，还有向上飞的火星，可我俩的头扭向对方。

“千万别睡着，千万，千万”，我挣扎着，看着弟弟长长的睫毛搭在面颊上，我把手轻轻搭在他肩膀上，他小心地晃晃身，让自己清醒。我看着他的身体如何渐渐蜷曲起来，就要睡着了。我可能还有时间捅他一次、两次，可这时他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又会怪我没当好驱赶睡意的卫兵。这时，我硬邦邦地躺着，脸浸在月光和星光中，仿佛展开身体在夜光浴。我知道这是一种恩赐，这样躺着，在自己和天空间没有屋顶的阻隔，这样的时光可不能浪费。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时间如何一手给予一切，一手取回，每当父母谈到自己的一生时，我就能

听到这种哀叹。像这样躺在夜色中的情景可能再也不会重来。也可以躺在檐廊下，对，可总有蚊帐把你和夜空隔开。它真的再也没有重来，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非洲的夜空下露宿过，虽然在欧洲我曾试过。拼命不睡着是对的，不过没过多久我觉得自己也睡意渐浓，于是更下力气，看见母亲穿着睡衣在火堆前弯着腰，把木柴一根根扔进火堆中，她的脸虽然看不清，却写满了那种表情，那种我下定决心不会出现在自己脸上的表情。“不会，不会，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一刻。”看着那个倔强女人被火光照亮的脸，我默默告诫着自己，可有那么一会儿她看上去又像个小姑娘，生活的门砰地在她面前关上。那一刻，还有许多别的时刻都印在我的脑海中，可以列张长长的清单，我时不时就会在那张单上查查，看看，这样它们才不会褪色，弃我而去。

最后，我还是沉入梦乡，醒来的时候照在脸上的已是日光，而不是月光。弟弟蜷曲着身子，像只小猫，母亲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叠起铺盖，“服务生”背对着我们，或许还没醒。也许，醒来时四周一片浓稠的白雾，有时清晨的时候浓雾从树木间升起，把我们罩在其中，雾气就悬挂在我们的睫毛和皮肤上。大家围坐在重新点燃的火堆旁，手里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加糖热茶，还是浑身打颤。这种雾是东部地区所特有的，我们家那个地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它也成了旅途中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另一项奖赏。这时候又湿又冷，我们围坐在火堆旁，等着太阳爬高点，驱散雾气，母亲总叫以赛亚，或者约书亚，或者爱伦，或者马太，或者约翰，或者卢克，从自己那

小堆火移坐到大火堆的热力范围以内,不过或许靠后一尺。“你会着凉的,”母亲总是对他大呼小叫,对我们也一样,压着他多喝几大杯热甜茶。接着,好像突然之间,雾气转薄,消失了,我们坐在晃眼的日光中。

捎 客

从哈拉雷到马隆德拉间短短的距离竟花去我两个小时的时间。车走得并不慢,相反,这是辆动力强劲的车,不喜欢减速。一路上,我不断停车,向眼前的景观致敬:那里的一堆危石,或者这里的一个路口,后面就是我过去常去的农庄。这里的景观丝毫未失其壮丽,亦未显得渺小,尽管我已见过亚利桑那、加利福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大沙漠,曾深入过世界各地的旷野。道路依旧向高处伸展,当你爬上一段斜坡的顶端,蓝色的远景在眼前展开,山峦起伏,重嶂叠翠。可在风景之外又多了些东西。战争刚刚结束两年,在我眼前这片土地上,交战双发的部队悄悄机动,通常在夜间,达十年之久。在远方,看不见任何村庄,显然那里依旧是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不过原因是茅草棚都已融入树林、小山、河谷中。

白人朋友曾告诫我:“绝不要捎任何黑人,很危险。”公共交通状况恶劣,每一个能停车的地方都挤满了大群黑人,只要

有辆车有减速的迹象，他们就蜂拥而上，一面挥手，一面大叫。在一处公交车站我停下车，车立刻被围了起来。在旧南罗得西亚，这一幕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黑人懂规矩。一个上了岁数的黑人男子弯下腰，窥探着我身边的座位，我对他说："上来。"他粗鲁地向人群中两个女人招招手，打开车门让她们坐在后排座位上，自己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人群大声鼓噪起来，他向外面的人做了个威胁的手势，接着对我说："开车。"语气同样生硬无礼。我想同他攀谈几句，可他的回答不是"是"就是"不是"，有时干脆不出声。我又想跟后座上的两个女人谈几句，可他说："她们听不懂你说什么。"从那两个女人脸上的表情，我看得出他没说实话。我对他说："我刚回国，都二十五年了，我在洛马冈地长大的。"他没搭腔，我居然还感到失望，真蠢。还能指望什么？理智指望一样，可情感指望的却是另一样。开了约十英里后，他用命令的语气说："停车。"我停下车，路边看不见任何建筑和道路，甚至连小道也没有，只有丛林。他跳下车，让那两个女人自己跟在后面，她们搞不定门把手，使劲扭，满脸怒火就要爆发出来。我给她们打开门，她们跳下车，跟着那个男人走了。丈夫？父亲？那人下身穿着卡其布长裤，上身穿了件质地不错的厚毛衣，两个女人穿着色彩艳丽的短裙和羊毛衫。就在三十年前，在农村地区，这群人极有可能是这样：男人肩上搭着兽皮——猴皮、豹子皮、野牛皮——下身只缠条遮羞布，手里拿着几根标枪，身后的女人穿着传统的蓝花纹布衣服，头顶上顶着一摞罐子。男人必须走在前头，以保护女人免受敌人或猛兽的伤害。那两个女人倒

也还是走在后头，三人一起消失在丛林中。

路上没几辆车，从贝拉到穆塔雷的输油管又被南非支持的叛军——“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简称)切断了，汽油越来越稀缺，报纸整版都在告诫大家要节约用油。这段路上我再没带客，因为不久就要见到弟弟了，隔了这么多年，我得全神贯注。

去会弟弟可不像家庭关系正常的人想象得那么简单。正常？大英帝国还在的时候(短命帝国，帝国大都如此)，家庭成员分居各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儿子或兄弟在军队服役，女性亲属在传教团服务(母亲最好的朋友的姐姐就在日本)，要么在马来西亚种橡胶(我叔叔)。我在丛林中长大的时候，父母为自己客居他乡而哀伤不已，他们的家在英国：继祖母、叔伯们、姨婶们、表兄弟们都在那里。自从我移居伦敦以来，家庭成员已分居南罗得西亚各地。

可以说我和弟弟一向搞不来，可同样也可以说我俩一向搞得来。在任何事情上，我俩从来意见相左，可等大家真正见面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根本不见面)某种神秘的理解又开始起作用。根据书上说的，那就叫基因。我们有着相同的基因。同样，假如你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就爱上了某个人，实际上你渴求的是自己身上一些退化的基因，它重生，活跃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是深处对深处的呼唤，虽然我们听不到这种对话，这种自恋的终极对话。

他从海军退役后，结婚前，我俩曾经常见面，这也是唯一的一段时间，自打我俩成年以后。有一年吗？长也长不了多

少。不算长。虽然我已算不上什么信仰坚定的人，可我依旧热衷于各种原则，至少我也懂得了跟他争论纯属浪费时间。在他看来，我脑子里的一切都是垃圾，别说讨论，就是日常交谈都困难。战争中，大炮声震聋了他的耳朵，他总是以一副倔强、缓慢、优雅的笑容面对世界，随时准备相信别人的好心肠。那时候，父亲已病得很重，在他缓慢死去的房间里，我俩时常碰头，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仿佛都在慢动作中，我俩分坐在病床的两侧，脸上常常挂着笑容。清醒的时候父亲还在说“他的”战争，语音里满带悲伤和愤怒，弟弟从来不提起他的战争。

上一次简短见面还是在 1956 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三十年了，我俩书信保持联系，信与信间隔很长，只说一些实情。有时候他会给我寄来战书，按照父亲的风格，比如这一封：“要是像麦克尼尔德和你这样的共产分子以为可以逃避惩罚，我得告诉你，我们老非洲都是明白事理的，还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收到这封信后仅仅两个月，战争结束了，罗伯特·穆加贝被选上台(伊安·麦克尼尔德是位托利派部长)。

在他看来我的存在都令他感到尴尬，能提起笔给我写信肯定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他所属的社区对我没什么好话(这还是温和的说法)，要我给他写信同样也不容易。

接着，研究者们冒了出来，请他做访谈，作为一位女作家的弟弟，这样他才晓得也有人对我的看法还不错。后来我得知，作为访谈来说，其效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要是事先问过我，我会说：“别浪费时间。”同时，我也有点生气，这也太没礼貌了。我还坚持旧时的观点，认为作家的人生是他或她自己

的财产，至少在去世前。现在，这种观点显得有点怪，不过还算不上离奇。我甚至还未到中年，一个未来的传记家就在面前冒了出来，信心满满，好像我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一股脑倒出来。他想过我可能根本就不想有本关于自己的传记吗？那些明确如此要求的作家被置之不理，一位英国法官判决，菲利普·拉金拒绝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生活的愿望“令人厌恶”。自己的个人愿望不值一提，除了作家外，也只有疯子才会得到如此对待。这种把作家看成供公众娱乐和消遣的对象的态度会使他们的亲属日子不好过，我弟弟就说过（后来有人告诉了我），去见他的那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不正常，还疑心我跟一帮坏人搞到了一起。

我知道，他压根不可能读过我写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字，至少在那时候还没读过。毕竟，在他眼中，我写的东西都是共产主义宣传品。

我生活中的一切在他眼中都是精神错乱。除了战争年代外（他的战争，二战），还有战争刚刚结束那两年，他的一生都在丛林中度过。他每天五点或五点半起床，然后整天待在屋外，有时一个人在丛林里走上好几个小时。一到九点，他准时上床，从不例外。

跳出个人关系以外看，我也不得不这么看，从文化的角度，弟弟是个有趣的现象。父母自视为现代人，总是紧跟新思想、新作家，虽然我们家农场书架上的书都是经典名著，可那也只是一部分。母亲关于教育的观点走在时代的前列，她钦佩的是罗斯金和蒙特苏里，可农场上的艰苦生活冲刷掉了那

层文化。整个三十年代，都有英国出版的报纸寄到农场来，还有金·霍尔的《新闻简报》，令他们全神贯注的是政治。一战及其余波令他们痛苦和愤怒，在英国，一切都乱七八糟，他们曾信仰的一切都被出卖。书架上的书没人去碰，我除外。他们向图书俱乐部订书，收信日寄来的包裹里装的都是一战历史、一战回忆录。

从小时候起，弟弟就不读书，成年后在同样不读书的人中度过一生。部分原因是，有的书里面有思想，而南罗得西亚大部分的白人只要几杯啤酒下肚，就不会容忍任何思想搅乱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承担不起那样做的后果。在他们心目中，自己始终是文明的维护者，他们品行高尚，但为世人所误解。后来，他喜欢起读暴力和软色情的小说，就是那种在机场常见的书。他对我说，等飞机起飞的时候，看到周围有那么多书，真有点吃惊。他喜欢哈罗德·罗宾斯，尤其喜欢威尔伯·史密斯。他来伦敦看我的时候，我还问他："哈里，你怎么从来就不读点好书？"我实在看不出他是我父母的后代。他扬起一张困惑的脸，真是迷惑不解，说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又问道："好书？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弟弟实际上已抵得上至少两大理论高深的批评流派了，一派认为说一个作家比另一个作家优秀是精英主义立场，另一派则认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区分歌德、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和芭芭拉·卡特兰德有什么区别。

我问他："还记得农场里那些书吗？"

"你一直是个书虫。"

“我说你，你还记得那些书架和书架上的书吗？”

“或许吧。可我只喜欢野外和丛林，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记得母亲过去晚上讲的故事吗？每天晚上，我们还小的时候。”

“讲过吗？不记得了。”

“她总编些小动物和小鸟的故事，还记得那个长篇连载吗，关于耗子在储藏室里的历险的。还记得那一段吗？一只耗子弄翻了一架鸡蛋，滑倒在蛋清里，别的耗子都赶上来，把它舔干净？”

“不记得了，抱歉。”

“过去我俩每晚都求她，再讲点，再讲点。”

他看看我，我看看他。

“不管怎么说，”他说，“哪本书里的东西能比得上丛林里的所见所闻？在丛林里待上一小时，观察身边的一切，超过世上任何一本书。”

还记得吗？

因为战争，所有白人农舍四周都有高大的安全网，许多现在还有。我在一处安全网前停下车，那网让我想起囚禁犯人的集中营的照片，足足有十二英尺高，网上的铁丝密密麻麻。

里面，两头体型庞大的阿尔萨斯犬又跳又叫，尾巴摇个不停，仿佛在欢迎。网内，一百码外，一个体格健壮，头发已染上灰白的男人向我走来，我没认出他是谁。上一次见到弟弟时，他还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停下来看着我，我俩隔着一段距离，相互对望，脸上写着一切。

“天哪，”他开了口。

“哦，”我也开了口。

于是，我又回来了，回到檐廊下的生活中。任你走遍世界，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这更惬意呢？整栋住宅由并排而立的房子组成，后面是厨房和储藏室，房屋的一头搭着棚架，既能挡风，又能长爬藤植物。檐廊就在屋子的正前方，整栋房子都是弟弟亲手建的，他跟个黑人泥水匠肩并肩把房屋建了起来，不断加建，只要还能负担得起。大大的花园，里面长满灌木，微微向护网的方向倾斜。我俩坐在深深的椅子里，浑身轻松，看着眼前的花园，园丁正拖着水喉到处浇水。两只大狗趴在我们脚边。仆人立刻就把茶端了上来，檐廊下的生活仰仗仆人。在我小时候，这么大的房子里应该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仆人，工资都少得可怜，不过工作也少得可怜。现在，所有的工作都由一个仆人完成，通常是男性，既烧水煮饭，也清洁房间，组织一切。现在有了最低工资。

我俩坐着，暴露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下，相互仔细打量着对方，一点也没有掩饰心中的感受。

哈里终于开了口：“大家都毁了，是不是？我是说，生活把我们都毁了。”

“可以这么说，”我的回答谨慎，觉得父亲可能也会说完全相同的话，用完全相同的口吻，带点幽默，老于世故。

“这样还是那样，大家都毁了，不过你看上去老得更快。”

“都上岁数了。”

他点点头。“上岁数是一回事，”他说，注视着我的眼睛，确保我在用心听他的话。“我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他妻子去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得先跟你打个招呼，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觉得自己的一部分被炸飞了。”

“好了，”我说。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一些新东西，哈里不到二十就有点耳背，原本听力已糟糕，地中海的炮火使情况更糟。战后有一段时间他聋得厉害，虽然一位伟大的耳科医生曾给他做过手术。你得对他大叫，话还不能复杂。现在他配了副效果很好的助听器，能按照自己真正的语速和风格说话了：一个言辞谨慎的人，反应缓慢，可就算看到身边的人已不搭腔，还是会把自己的话说完。

“小时候，你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挺过去，”我说。

“你这么想吗？我倒不觉得自己曾经那么想过。有些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一些事情发生了……也不是摆在眼前的事情。我跟你说过吗？我回过老农场。”

明知故问，怎么可能跟我说过。

他提起老农场时，一个沉默的“不”字紧紧抓住我。1956年时，我原本可以去看看老农场，还有农场所在的小山，可那时我开着车，就是没法迫使自己把方向盘向北打，开下大路，

开上通往农场的小道。每个作家心里都有个神话国度，与童年无关。我把那条戒律，那个无声的“不”归结为不希望自己的神话被打破：自己曾经成长于其中的丛林，建在泥巴地和草丛上的房子，小山四周的土地，还有那些野兽和鸟类。神话绝不是什么不真实，而是真实的浓缩。

“不打算回去看看吗？”哈里问。

“过去想过。”

“别去，听我的。现在那里到处都是农场，开始我连那座山头都找不到。”

“找不到山头？”

“我开过了路口，因为没看到那座山头，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原指望还能看到山上的老房子，于是又开了回去。长话短说吧，他们把整座山头削了下来。”

“削下来！”

“是的，现在那上面是块台地，平的。真不知道花了他们多大功夫，把整座山头都削平了。”

我心在痛，哈里小心地看了我一眼，有点犹豫。

“说下去。”

“得了，听了你不会舒服。”

“可那座山很陡，我知道小时候什么东西在眼中都是大的，可那座山却不小，对吧？过去我常常坐在后门看着鹰在下面的田野上盘旋。”

“还有，在山脚下我们得换二档，才能爬上去。”

“还有，车斜得厉害，我们还开玩笑说它会向下滑。”

“还有,我们骑自行车下山简直像飞。”

“还有,我们在上面能看到山下的一切,谷仓、牲口栏、夏尔牛踩出的小路。”

“你还能往山下看,不过,他们到处都种上了果树,难以相信不久前那里还是荒野,到处是丛林。”

震惊中,我俩面面相觑。

“果树? 那些大穆旺加树哪去了? 还有刺槐林? 还记得吗,我们管它们叫蝴蝶树的,哪去了? 毛毛虫树,树上爬满了毛毛虫,看上去树上仿佛盖了一层毛毡,毛毡里都是虫茧……”

“我记不得什么毛毛虫了,不过我告诉你,别回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伤心透了。那趟回来,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挺不过去。野兽也没了,鸟也没了,我连连梦到老房子,接着,莫里卡也去了,我觉得什么都完了。”

“出去走会儿吧,”我说。

于是我们出去散散步,走过丛林,可现如今的丛林也只是填塞农田和房舍间的空间,那是城郊的树林。

“你想过吗,过去我们还真他妈走运。”

“我们住在天堂里,自己却不知道。”

“一去不回头了。”

“去了,”我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仿佛战场上回来的信使,宣布战败的消息。

“去了。可有时候我还能看到我的蟒蛇,就在上面那片岩石里,好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里到处是狗、蛇的日子

不好过。都消失了。可我的蟒蛇还在。还有两头小羚羊，有时太阳下山的时候它们会出来，一大早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们吃草。有一次，我还看到它们在月光下吃草，两头小羚羊！还记得吗？过去走上一英里就能碰上一打。”

我们站在那里，看着蟒蛇栖息的那堆岩石，可它决定躲起来不让我们看见。

在闷闷不乐中，我俩走回家，两条狗围着我俩跑，不时把鼻子伸到我们的手心里。

“该喝上一杯了，”他说，坐回到檐廊里。不过这会儿那里已经太冷了，于是我们进屋坐在火堆旁。他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分量分毫不差，看着自己倒酒的时候，他的嘴绷得紧紧的。他的动作缓慢、小心，就像父亲，做什么都好像是慢动作。

晚餐很丰盛，有汤，有肉、蔬菜、布丁，还有奶酪。现在，我俩一开口就是还记得这吗，还记得那吗，大家都在避开会让好心情到头的话题。

“还记得那次吗，你真可笑，居然想到银行工作。”

“我，到银行工作？”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你简直跟着了魔似的，居然还想过去卖保险。”

“我卖……绝不可能。”

“还记得那次你跑来跟我说，你宁愿死也不会一辈子待在四墙之内？”

“确定？”

“确定。”

“真有意思，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有好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了。前几天，有个人来看我，我没想起他是谁，他气坏了……是杰里米，还记得他吗？他去马达加斯加度了趟假，见我的时候跟我说，他离开宾馆到丛林里转悠，接着不由自主就哭了起来，因为那些鸟声，还有蝴蝶，还有昆虫。他跟我说，‘就跟老南罗得西亚过去一模一样，我们大家还是孩子的时候，到处是动物。’他还没意识到现状有多糟，而且一直还在恶化。突然间，你就意识到，某种鸟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了，于是才意识到它已经没了，可能已经灭绝了。蝴蝶，”弟弟哀伤地说道，“蜜蜂、昆虫、变色龙、蜥蜴。农药把它们都给毁了，瞧，咱们把什么都给毁了。”

“还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怎么打枪来着？用那杆老点二二口径的步枪？他们给了你那把点二二，你出门看见什么都开枪，还记得吗？”

“再也不会那么干了。”

“他们给你第一把气枪的时候，你就跑到河岸上，还是在夏贝尔家的农场里，回家时你带了个笼子，里面全是鸟。”

“怎么可能……你确定吗？”

“我们看见豪猪也射，看见野猫也射，看见什么就射什么。”他看上去痛苦不安。“我们小的时候都这么学开枪，看见什么就射什么。”

“可咱们也到过丛林里除掉土著人下的鸟网，还拆了抓猎物的陷阱。”

"那是后来了，那时候咱们改恶从善了。从那时候起，我们需要什么才去射。"

"他们干吗不阻止我们，我是说父亲和母亲？"

"因为那是那时候，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刚结束的时候。过去上层社会就看见什么射什么，中产阶级也效仿他们。"

"可老非们也捕杀鸟和野兽。"

"他们是为了糊口。"

"看看外面那些黑孩子，个个手里拿着弹弓，还不是看见什么就射什么。"

"跟我们过去一样。"

他盯着我看，仿佛在说，你居然把黑人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混为一谈，就算我没打断你，并不表示我没注意到。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丛林里边漫步边拍照片。"

"那时候你多大？"

"嗯……大概……记不清了，我记东西没你那么好，记的事儿跟你也不一样。你确定吗？"

"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是记不起来，那时候所有的事儿我都能记得。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有好多事儿也记不起来了，也有人对我说，还记得这，还记得那吗，我说记不起来了，他们很生气。"

"对，会生气。"

"可那时候的事儿不会忘记。"

有好一会儿，我俩沉默不语。哈里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每口都差不多量。白兰地。我自己从来都不喜欢那样喝酒。我

有个朋友为一所大学研究人们饮酒的方式，要是她知道有个人喝酒跟喝药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感兴趣。父亲在得糖尿病之前每天喝一杯威士忌，也有时两杯，仿佛有位隐形的导师站在他身边对他说，就这么多，别再喝了。

“要是我俩真像对姐弟，一起长大，就应该能记起相同的景象。你懂，一个说，还记得吗，另一个马上就能记起来，就算一下子想不起来，过一会也能想起来。”

“我觉得，我俩还真不像对姐弟，不很像。”

“还真不像。”

“好了，”他小心翼翼，带点幽默的口吻说，“过去几年我还真不大想见你。”

“我还不是一样，”我幽默地回答。

“其实你也不算太糟，有意思，要是你好长时间不见一个人，你就开始胡思乱想，想关于他的各种事情，等到真见面时又大吃一惊……我估计你脑子里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吧，不管遇到什么事儿。”

“你可以说我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你也可以说那些想法到头来被证明并不那么稀奇古怪。”

听到我的话，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可真生气了，一番口舌之争可能就在此刻爆发，我赶紧说：“今天路过马兰德拉斯的时候，我又想起我们过去在那儿扎营的时候，在学校附近。”

他笑了笑，点点头，意思是说，这就对了，咱们别再……接着说：“扎营，谁？什么时候？”

我真感到既吃惊，又心痛。“不记得咱们过去一路下去，

然后扎营？有时一连一星期，甚至十天？你开运动会的时候？”

“有吗？”

“你怎么连那都想不起来了？那可是咱们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咱家住不起旅馆，一晚上都住不起，更别说一星期了。”

“等一下，对了，想起来了。对，你说得对。”

“学校总会让你跟我们一起住一两晚。”

他用手背使劲搓搓后脑勺，一脸茫然又失望的神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刻：父亲，弟弟。

“咱们砍下树枝和小树，搭个栅栏，在里面睡觉。”

“为什么？”

“防豹子。”

他把头向后一仰，打心眼里笑出声来，那是年轻、新鲜的笑声，来自他的人生中另一个年代层。接着，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该那么干，对丛林没什么好处。”

“过去，在枯死的枝叶里面，地上的草都踩平了，火堆上面的树叶也烤焦了。”

“咱们怎么能那么干？都是为什么？”

“过去我们就那么干。”

“是啊，现在要还债了。”跟弟弟谈话，许多次都这样结束：我、我们、她、他、他们、你们得还债了。罪与罚。弟弟四周总竖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上面挂着牌子：这里是禁区……别进来……待在外面。我自己当然也有不同的墙，不同的

禁区。

“还记得咱俩有多讨厌睡觉，在野外过夜太棒了。”

“不记得了，不过在野外过夜的确很棒，在丛林里打仗的时候，那就是最美的事儿了。当然，那时候我已经太老了，当不了个像样的兵，可我们在野外巡逻的时候，晚上常待在丛林里。”

“还记得那些到过咱家农场的探矿员吗？他们一年到头都在野外。”

“当然记得，那种事儿怎么会忘？或许，我就该干那行。我经常想，自己这辈子是不是走对了路，应该待在丛林里。”

“可你已经待过了。”

“不算，我是说真正待在里面。他们带只淘金的盘子，一只步枪，一条毯子，就靠丛林过日子。”

“多数人不是死于疟疾，就是死于黑水热。”

“那算什么？谁怕死？我才不怕。”

“还记得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普通的探矿员吗？有些人经济萧条的时候丢了饭碗，就把自己的老婆送到城里找份活儿干，同时还要照看孩子，通常只能给别人当女佣、管家之类。他们自己就跑到丛林里，等世道转好再出来。”

“不记得了，不过那么做合理，对他们有好处。”

“我敢肯定，父亲要是能到丛林里过日子肯定很开心。要不是他身体一直那么糟的话。还记得吗，咱们对运动会上那些俗套烦透了，父亲就躺在橡胶树下看天，母亲都要疯了，说他把脸都丢光了，你好像也挺尴尬。”

“怎么会，在丛林里我一向那么做，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天空，过不了几分钟就有野兽、鸟……现在还有什么鸟和野兽，它们都忘了你的存在，你就像块石头，一棵树。一次，一条黄色的眼镜蛇就在我身旁五英尺的地方游过去，一点儿都不在意我。”

“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

“真想不起来了？”

“恐怕，想不起来了。”

九点，哈里说要上床了，他喝的量正好能让他入睡。他说，这些日子睡得不好，他可不想躺着睡不着，满脑子胡思乱想……医生给他开了点药，不过他可不打算吃那些化学废料。白兰地对他正好管用。

我说自己从来不会在十二点前上床，有时甚至到一点，他说：“在这儿你会的，愿意就看看电视，可那些老非，他们什么都搞不好，更别说电视了。”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杯子，他紧紧盯着我看，拇指刚好停在酒杯里留下的印记上，好像在提醒自己。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些话已到了他嘴边，他再也没法把它们咽下去，要我也一样。于是，他开始独白，用猛烈、愤怒、刻薄又沮丧的语气。就在昨天晚上，在飞机上，那个坐在我旁边的养赛马的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话如出一辙。

“你那些非洲宝贝，一上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占了我们的政府大楼，往里面塞了个本那那总统，本那那，

什么鬼名字。这位总统住到里面不到一星期,花园里就满地都是小鸡了,那可是我们的花园。他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搞到那地方,搭起帐篷,把那儿搞得像个牲口栏。接下来呢,那里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隔壁农场的小杰克往里面扔进几只小鸡,还叫,咯咯咯,咯咯咯,臭农民,住在政府大楼里的臭农民。穆加贝,穆加贝同志,他来来往往都有摩托车队开道,要是有谁闪得不够快就得吃枪子儿。咱们的首相出门可不用摩托车队开道,也用不上武装卫兵,他们没什么好怕的。还有,效率低下……什么都做不好……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吧……那还不算完。"他说啊说,最后如此总结:"他们比我们低一等,就这么简单。"

"第一位黑人总统搬进政府大楼,也就是说旧政权的象征,却用自己的行动明确表示不会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很感人的,甚至是很精彩的。农民,他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还在养鸡,谁都可以来串串门儿,非洲作风……"

"现在谁也不会去串门儿了,他被铁丝网围了起来,卫兵手里都端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那些白人无赖总跑到那里又叫又笑,喊些威胁的话,你不觉得竖安全网和这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穆加贝出门要摩托车队开道,你不觉得要是他没有摩托车队就出门,白人无赖一看到他就会割了他的喉咙吗?"

"无赖?"

"无赖!"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瞪了回去。

他上床去了，我走到屋外，走进漆黑寒冷的花园里，在那站了好一会儿，希望在安全网的外面能看到小羚羊暗淡的身影在星光下移动。两只狗静静地站在我身边，直望着外面，那里什么也没有。

早上五点半我们就起床了，一醒来，一杯热茶已端到跟前，真是早已遗忘的惬意。七点，我俩坐下来，吃一顿旧式的英国式早餐。约瑟夫把什么都摆好了，他是个友善的小伙子，总笑眯眯的。之前他已经问过我，能不能到伦敦为我工作，做我的仆人。我说，我们没有仆人，只有一些富人家里才雇仆人，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有点不开心，因为他想到伦敦工作，那里路面都是用金子铺成的。“谁给你们干活儿？谁清洁房间？谁做饭？”我回答说大多数人自己清洁房间，自己做饭，他摇摇头，一脸难以赞同的神情。

早饭的时候哈里又发火了，我又一次聆听了他的独白。到这时候，我也明白了，这趟旅途中会一次又一次听到这种独白。任何时候，所有同类的人都会说同样的话，有时候用的字词都一样。（与之类似，要是你想了解伦敦文学界在思考什么，只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时间去讨教一位代表人物，就能知道哪些作家最近流行，又有哪些出局了，还能通晓作家们用来表达共同思想的确切文辞。）

哈里生气是因为他的生意出了问题，他用鸟的羽毛作画，还用牛角做纽扣和钥匙环等小玩意儿。独立前，生意很火，可

现在那么多顾客都走了——都飞了——生意也艰难起来。邻村的黑人姑娘来他这儿干活，好像其中有个爱惹事儿的，把其他姑娘都煽动起来反对他，其实姑娘们要什么都到手了。她们可以把婴儿和孩子带来上班，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什么都干不了了，哈里也要飞了。

那个词儿是从哪儿开始的？要是白人离开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去南非，就叫"飞了"。

弟弟打算离开这所舒适的宅院，他自己和一个黑人泥水匠一手一脚建起来的；据他说那是个好人，跟他一起干活是种快乐。他要抛下这片大花园，他过世的妻子亲自设计的，离开这个地区，在这里他度过了大半生，而去接受南非更低的生活标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个女儿在南非，更因为活在黑人政府的统治下让他难以接受。

"我还得忍受那个臭劳动关系协调员，听他的支使，他说什么我都得听。"

早餐后，劳动关系协调员到了，骑着自行车。弟弟把他请进屋，态度冷淡，但也不失礼节，请他坐下。当然，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三个坐在檐廊里，约瑟夫端上茶，还和劳动关系协调员按绍纳传统打了个招呼。

"早上好。"

"早上好。"

"睡得好吗？"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我睡得很好。"

“那我睡得也很好。”

劳动关系协调员大约三十五岁，强壮、健康，头脑清醒。因为工作的原因，脸上总挂着一点幽默的表情，他的工作主要就是修理不讲理、不公正，有时还滥用暴力的白人。

弟弟牢骚发个没完，那些姑娘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责任，拿了一天的钱就得干一天的活儿，还有那个刺儿头，让所有人都跟她唱一个调。

劳动关系协调员坐着听，弟弟进屋听电话的时候，我向他问起他的工作。白人统治时期，他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跟他一起受训的还有好几百人。当时有条政策，培训黑人技术专家，以后派他们去土著人交易区和保留地工作；那已是过去的称谓了，现在已经改称别的名字。对目前的政府来说，那是个幸运的决定，因为所有的文化顾问和技术推广人员都忙得脚不沾地，人手严重不足。至少还要过两到三年，他说，津巴布韦才能培养出所需要的人才。“当然，”我说，“就算再长点儿也没人会怪你们。”突然，他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我已被接纳，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了。“我们干什么他们都会找茬，”他说，这才是他给我的真正回答。“觉得这份工作艰苦吗？”“我会全力以赴，女士。”

他骑自行车上了邻村，去和姑娘们谈心。弟弟还在抱怨，这个“劳动关系协调员”，不管他叫自己什么，肯定会站在她们一边。几小时后，劳动关系协调员回来了，茶又端了上来，看他的样子，他已经把一切都理清了。不过首先，他要看看工资记录。弟弟嘴绷得紧紧的，拿出了工资记录本，那人细细查看

了有半个小时,然后啪的一声合上账本,作出判决。“那些姑娘说你没给她们付工资,可看来你已经付了,先生。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开除玛丽(那个刺儿头),不过你应当把萨拉也一起开除了,她才是麻烦的真正所在。你找错了人,玛丽干的一切都是她挑唆的。我警告她俩,就算她俩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我也会盯着她俩。”

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对我们说还要去一家农场,农场上一个女人投诉另一个女人,说她用恶毒的眼光看自己。结果,农场上的工人们打了起来。

“听听!恶毒的眼光!咱们就得同这种人竞争……那两个笨丫头到哪儿都不会找到活儿干,因为根本就没活儿可干。等她俩找不到活儿干,就会为耍了我而万分后悔。那么多人都飞了,活儿越来越少了。”

“事情这样解决,你不感到满意吗?”我问他。

“走,去吃午饭。”

又是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肉、蔬菜、烤土豆、沙拉、布丁、奶酪、饼干。

“看出来了,在这里吃得要多得多,”我说。“在英国,再没人吃这么多了。”我向他介绍起英国正在风行的饮食习惯:外带食品、快餐食品、方便食品、冷冻食品、微波炉加热食品。我说,我们吃印度餐、中餐、比萨饼、意大利面食、还有美国汉堡包。“旧式饮食结构,一日三餐吃得结结实实,外加上午茶和下午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听到这我很遗憾,我觉得生活水准应该向上走。”

午餐后，他睡了会儿，正好三十分钟，然后我俩坐在檐廊里喝茶。两条阿尔萨斯犬躺在我俩脚边，一条在弟弟脚边，那条母的叫士巴，躺在我脚边。自从她的女主人去世后，她就非常伤心，希望我会成为这里的新女主人。在对女性的爱的渴望的驱使下，她会跑上一英里，到邻近的农舍，把鼻子伸到那里的女主人的手心里，低低哀鸣，乞求爱怜。那个女人懂得她的哀伤，就坐在她身边，有时在檐廊里，也有时在草坪上，把她搂在怀里，对她低声爱语，直到士巴舔舔她的脸，然后再跑回家。另一条是公狗，体型更大些，叫斯巴达，士巴一直活在斯巴达的阴影之下，因为斯巴达更强壮，也更聪明。要是我们跟他俩在花园里玩儿，先捡到扔出去的棍子的总是斯巴达，他一口就能叼两根、三根、四根木棍，还会把木棍抛起来，再在空中接住，就像杂耍演员一样，邀我们的喝彩。士巴一次只能叼一根。斯巴达还会听口令，坐，半立，躺下，去拿，叫一声、两声、三声，弟弟亲自训练斯巴达，可士巴没人训练。她想跟斯巴达一样，都要想疯了，斯巴达炫耀的时候就一直在旁边看，看他怎么做。

弟弟对士巴也没辙，不知道如何才能减缓她的痛苦，其实他自己和她一样痛苦。后来，士巴发现不会有女人搬进这所宅院，她又贴上了弟弟，在对主人的感情方面终于把斯巴达给比了下去。她强烈地渴望着被人所拥有，对主人的忠心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在这种渴望面前，斯巴达难以竞争。她跟弟弟睡在一张床上，还总是紧紧靠着他，躺在他身边，脑袋贴在他的手上，或者眼睛注视着他的脸。弟弟“飞”的时候，把两条

狗也带上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邻居打电话来说，他开车去马隆德拉买报纸，可一张都买不到，都卖光了。布拉瓦约去维多利亚瀑布的路上“出了事儿”：恐怖分子劫持了几个旅客。“当然，这里的报纸上也不会说实话，”那个邻居说。“叫你妹妹给伦敦打个电话。”我打了，知道了一群恐怖分子，据称是约书亚·恩科莫的人，抓了六个游客，后来放了三个女的。要是穆加贝不把恩科莫的人从监狱放出来，他们就会把那几个男的杀了。

“瞧，”哈里说，“想知道真相，只能给家里打电话。”

电视新闻里什么都有。

他又开始独白。不过这时候，我也懂了，白人现在有点草木皆兵了，就好像刚刚发生过什么灾害。这种情形在离开伦敦前我就应该能预见到，怎么就没能早点想到呢，我生自个儿的闷气。

晚饭后，我俩又开始争吵，其实不该和他争。他变得有点焦躁，大谈黑人的劣根性。后来我发现，这儿的白人一喝多了就常这样。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有时候，猜猜哪个老罗得人两杯酒下肚就会破口大喷种族主义厥辞也挺有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随后流露出一点罗素式的对原始民族的钦佩：“他们比我们强，你懂。”不过，有些白人只有靠坚信黑人比自己低劣才能找到自我，如此死死认定别人比自己低劣，这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自信和不安定感！（1991 年，我坐在伦敦一家餐厅里，身边的津巴布韦黑人和印度侍者说话的时候，那种冷淡、侮辱、讨厌的腔调和当年最恶劣的白人同黑人讲话时用的

腔调如出一辙。)我说,他的话好像在说南罗得西亚所有的白人都了不起得很,可实际上他们中许多人从任何角度上看都只是可怜的家伙。他们中有优秀的,而且非常优秀,技术精湛,适应能力强,富于专业知识和精神,可剩下的那拨目光短浅,愚蠢无知,身上透露出的那种自大只能叫笨。不管到哪,他们都难找到工作,黑人们能摆脱他们真是太走运了。哈里受了伤,话也尖刻起来,不停数落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出自我的口中,这样的想法居然装在我的脑子里。

第二天早上,朋友们从班克特来串门,有个老妇女我打小就认得。大人们有个传统:彼此是朋友,自己的孩子们也一定得是朋友。父母们相互拜访的时候,总打发这个姑娘和我一起玩儿。我们立刻就开始了"还记得吗"游戏,再没别的话好说时,这个游戏总是很管用。还记得天热的时候,我俩被放在桑树下的铁浴缸里,凉水浇到我俩身上,蛇也喜欢待在桑树上,于是我俩不时抬头看看头上的枝干,提防行动诡秘的绿带子和吞吐闪烁的舌头。我俩都长得圆滚滚的,按当时的习惯,大人们拿我俩逗乐,几乎"不顾及我俩的感受"。我俩也照大人们希望的样子,大声尖叫,使劲拍水。这些她都想不起来了,她还记得的是我俩到庄稼地里去除"女巫草",那些农民讨厌的杂草,能挣点零花钱,每捆几便士。我说自己想不起来了,可她好像生了气,说:"每次想起你,都想到你站在玉米地里,手里捧了一大捆女巫草的样子。"她离开我,坐到摆在檐廊里的桌子边上去了。这段记忆是她记忆的一部分,一段美好的回忆,精心挑选出来,让一位幼时玩伴在自己心中留下美好

的印象,其实那个玩伴并不很称她的心。我把这段回忆给否掉了,更加剧了她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欺骗加背叛,到处横行不公。这个时代,她失去了一切。她和她哥哥,再加上我哥哥和另外几位邻居一起坐在檐廊里,先喝茶,再喝啤酒,一边如背诵般重复那段独白的各种版本。我坐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手里捧一本两天前刚刚买的黑人作家的小说。我坐在那里,同他们保持着距离,自己读书,就跟小时候一样……他们坐成个小圈子,身体略略前倾,肩膀耸起来,对外界戒心很重,有时还从小圈子里向我投来责怪的一瞥。他们的语声哀怨,充满悲伤、背叛感和对世界的不解。

邻居们走后,哈里问我读什么,我就向他介绍了几位优秀的黑人作家。想读读他们的作品吗?从没听说过。要是真读过,或许就能更好地了解黑人的想法。他说自己相当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些想法他可不太喜欢。他的语气里略带幽默,我受到激励,给他递上了两本。随后的几天里,我把那两本书就放在桌上,有时甚至给他读上一两段,他仿佛在听国际新闻。

这趟旅途中,在任何一个我拜访过的白人家庭,运气也都没有再好点,大家对非洲作家的小说毫无兴趣,连翻都不想翻。我在挑战、威胁某种禁令,某种不在视野之中,甚至不在意识之中的禁令。每当我提起,每张脸上都写出同样的表情:不。可这些都是你们的同胞的作品,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第二天,我俩开车去马隆德拉购物,他牢骚个没完没了,

因为货架上有的地方现在空了，过去那些地方总放满了进口食品。我指出，食品供应依旧很充足。我俩一路上拌着嘴，开车去了邮局，邮局门口一小群白人围成了个小圈子在窃窃私语，脸凑得很近，肩膀紧张得像在挡无形的子弹。黑人们开心地在旁边转悠，大声说话，纵声欢笑，大声打招呼，仿佛那些白人根本不存在。

回家的路上，我俩在一处路边摊档停下，想买点蘑菇，摊主问我们能不能把他老婆带到下个路口。虽然满心不情愿，弟弟还是答应了。那女人有了身孕，手里还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坐在我旁边。一路上哈里说了又说："其实也没多远。"他的话里有好几层意思：首先，非洲黑人双腿的功能还没有像我们一样退化，这既值得羡慕，也是一种原始的表征；其次，这帮人刚刚在战争中用不光彩的手段打败了他这边，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免费搭车。

白人不让别人搭车，那时候我还能洋洋得意地抨击他们，可仅仅六年后，我的自得就遭受了打击，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再没人让任何人搭车了，不管开车的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宗教信徒"，是"进步人士"还是"反动人士"，也不管要搭车的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不面熟，想搭车，没门儿。太不安全了，骗子太多了，太多劫持事件，路上各式各样的"事儿"太多了。

我俩开车去另一家的檐廊喝茶，那家养了很多漂亮的狗和名贵的猫，得伸手把它们从椅子上拨下去，自己才能坐下来。我又听到了那种独白，先是那家的太太，接着吃午饭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是那家的先生。端菜送饭的黑姑娘穿

着制服，就像爱德华时代的女佣，制服上绣着雪白的袖口和裙边。接着，所有人开始讥笑本那那总统的怪名字。

我们在花园里逛，又看到了花园里“服务生”（旧称呼还在用，被称呼的人自己也没什么意识）正在浇灌一大片草坪和灌木。趁雇主听不到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为我工作，他得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有O级证书①，可只能干园丁，因为根本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说自己住在伦敦，他问伦敦是不是在美国，要是的话，他就来为我工作。我说就算在美国，黑人也不一定就有好日子。他说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美国的黑人很有钱，他想和他们一样。他的话让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回想起在旧日的索尔兹伯里郊区的几个“有色”居民区派发共产主义传单时遇到的情形。我在那些地方宣传如何明智地对抗白人统治，路过每个街角都会被踌躇满志的年轻黑人拦下来，他们都想去美国，那里人人都是富翁。那时候，我还曾婉言劝说过他们，在改善自己之前，先要想想全体民众的福祉。真是个迂腐的白痴。现在我还能看见自己穿着一尘不染，熨烫得纹丝合缝的棉布裙（对那些住在拥挤破旧的房子中的人来说，我这身打扮就已经够奢侈的了），踩着辆干净的自行车（我碰上的人没几个能买得起），后架上放着一摞报纸和传单，宣扬程度不一的不满社会的言论，而救治一切的万灵药就是革命。

第二天，哈里说带我去几英里外的俱乐部。我知道他自

---

① 在英联邦国家通行的普通教育资格证书，其中还有A级，高级教育资格证书。——译注

己并不想去，不过他说去对自己有好处。自从他妻子过世后，他就没有和人交际的习惯了。我估计在那儿也不好受，那么多人都“飞”了，俱乐部现在也几乎只剩下个空壳。过去，一到周六、周日，那里就聚上两三百人，要想在网球场打打网球，或者到酒吧里喝上一杯，都得排队。对，对，他要去，觉得应该去，大家都一再邀请他出来吃午饭，或晚饭，或上俱乐部去。他知道，大家想对他好。

俱乐部是建在丛林里的一排低矮砖瓦建筑，有几个网球场，一个壁球场，一个保龄温室。好像上个周末，从哈拉雷来了几辆车，车里挤满了年轻人，到这里聚会来的，有些到现在还没走，还在门廊里消磨日子。两个人仰面躺在一棵树底下，胳膊伸得老远，一脸紫红色，一段前臂被阳光灼得通红，上面停了只绿蚂蚱。冬日里，穆萨萨树枝叶稀疏，在他俩身上投下斑斓变幻的阴影，风阴冷多尘。

“喝成这样，真蠢，”哈里说，接着大叫，“托马斯，托马斯。”

一个身着仆人白制服的黑人出现在檐廊里，轻声回答：“下午好，先生。”说完，慢慢走上前来。

“他们不该那样躺在那儿，会得肺炎。”

托马斯看了看那对人事不省的家伙，然后又看了看哈里，他的眼神在说，他的工作可不包括告诉两个白人小伙子该怎么做。

“有毯子吗，找点什么盖在他俩身上，什么都行。”

仆人阔步走开，回来的时候手里抱了一大捧叠起来的桌布，然后和弟弟一起一层层盖到那两人身上。

除了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之外，这里还有些岁数大些的人，他们才是这里的真正顾客，大多数都是农场主，行事风格也和那些年轻人迥然不同。现在没剩下多少了，要打起精神笑迎一切，真可怜。

哈里和我打了会儿保龄球，不管什么，只要和运动有关，他一碰就能上手……第一次骑自行车，第一次拿板球拍……不管什么树，只要看见，他立马就能爬上去。其实我也不算糟，只是跟他比起来我就显得笨拙了，整个童年我就这么过来的。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这就叫家庭生活。

他在保龄球上赢了我后，有人向他挑战，我顺势退回到檐廊里，一个人坐着，看着四周发呆。俱乐部的房间有一半都空着，到处是那些已经“飞了”的白人的鬼影。过不了多久，这里会挤满黑人吗？

邻桌旁坐了一群中年农场主，谈着丛林里的战争，历数着黑人的恶行，一刻不停。都是那种独白的各种改版。不过，他们中有个人一言不发，跟周围的人有段距离，像我一样。不过，他也在丛林里打过仗。周围的人察觉到他的沉默，于是开始奚弄他，其实他们是想搞搞气氛，但话一出口就给人怨恨的感觉，因为那人不打算跟他们一起“飞”。他决定留下来，留在津巴布韦，死撑下去。他已做了些心里调整，不再不分缘由就跟周围的人搅在一起了。看上去，他不太开心：这些就是他的邻居，他的族人。

落日开始点燃天空时，弟弟又接受了一个人的挑战，上一

个已经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邻桌的人散了，那个落单的人还坐在桌边，看了我一会儿，接着就走过来。他认识弟弟，也知道弟弟的这个姐姐脑子里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他对我说："真想知道你到底怎么看。"

他的态度友好，不过有所保留，我决定不精心选择措辞。他在椅子上坐下，听我说，有时还点点头。看得出来，他正在把我的话同他记忆中的一幕幕作对比，而且我的话并不合适。"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他总结说。接着，我说有些事儿想问问弟弟，可没法开口。比如说，丛林里的战阵。要是我问起来，他只会大声吵吵。

"你该记住，在他们那代人和我们之间有隔阂。"

"什么隔阂？"

他耸耸肩。

"你是在这儿长大的吗？"

"加拿大。"

"啊，懂了。"

"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

"比如说，在那场战争里，只要有任何'事件'报道，为什么黑人平民的伤亡人数总那么高？"

他坐着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好吧，跟你说个故事，真实的故事。《罗得西亚先驱者报》上曾有篇报道：'战斗中，十一名恐怖分子，五名平民，以及一名保安部队成员丧生。'"

丛林里的战争

当时，他跟另外五个士兵在丛林里巡逻，每天晚上行动，前进十五到二十英里，白天隐蔽。他是巡逻队的头儿，每个队员都带足了八天的口粮。

“我有一种自制的口粮，包括奶粉、燕麦片、麦芽、葡萄干，还有意大利香肠片，每天吃一磅，外加半个洋葱。要是找不到干净的水源，我们就在早上吸草叶上的露水。口粮都装在塑料袋里，那样很好，不会发出声音，铁皮罐会叮叮当当响，暴露你的位置。每人的口粮都是自己做的，还有自然风干的肉条。在一处村子外面，我们发现有两个人躲在那里，形迹可疑，很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眼线。只要干上一会儿，你就会有一种直觉。我们把那两人捉了起来，于是我们这边就有八个人了。那两人跟我们一起走，一点不反抗，我们甚至连绑都没绑。那种人没主见，可怜的流浪汉，不管谁在他脖子上套根绳儿，他都跟谁走，管他是政府军还是恐怖分子。接着就听见恐怖分子们在村里唱歌，我们原先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村子，纯属碰巧。我们明白，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在外面，恐怖分子的所有组织都用对讲机相互通知自己的外置，或者我们的位置。巡逻时，我们通常都会带上几个老非，他们能告诉我们对讲机里说的是什么，不过这次没带。要是那帮恐怖分子知道我们就在

半英里外，也不会唱歌把自己脑袋给唱没了。我们留下两人看守抓到的那两个，有个看守吓得都尿裤子了。知道什么叫恐怖的气味吗？那就叫恐怖的气味。

“我们四人趁着天黑爬到村子边上，天很冷，那帮恐怖分子就躺在火堆旁的草地上，天上没月亮。跟往常一样，唱一首歌，说会儿话，再唱首歌，再说会儿话。

“有个恐怖分子坐在辆烧焦的大车上，我们四人一伸手就能摸到车轮，大家趴着，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尽量不出声。

“幸运的是车上那家伙醉得不行了。我们看到几个当头儿的进进出出一间小房子，里面肯定有个姑娘，他们正跟她爽呢，能听到姑娘的笑声。那个说话时间最长，语气也最凶的家伙在小屋里待的时间也最长。我早已下了命令，我开枪前，不许开枪。看着那些恐怖分子喝得歪歪倒倒的，我知道他们早等不及了。我一直等下去，直到屋里的姑娘出来小便，然后我们一齐把手榴弹扔到那间小屋里去。屋里传来姑娘的尖叫声，我才明白里面还有别的姑娘。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四下全是枪声，恐怖分子们逃到丛林里去了，他们也搞不清黑暗里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既可能是一整个连，也可能只有四个。我一个战友中了流弹，后来死了。

“我们四个继续趴在草丛里，等待，自己也不知道有个同伴就要死了。

“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血在流，可还以为仅仅是擦破了点皮肉。我们听到伤员的呻吟声，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响起好几声手榴弹爆炸声，老把戏了，把手榴弹放在死尸下面，或者

伤员拿着压在身子下面，想在我们移动他们的时候，把我们给炸了。可有时候，手榴弹在不该响的时候响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好几具尸体躺在小屋前的土地上，其中有平民。屋子里面，我们原以为只有一个姑娘，可后来发现了几具恐怖分子的尸体和三个姑娘的尸体。出来小便的那个姑娘的屁股给炸飞了。我们给她打了针吗啡，叫来直升机，带走了她和我们受伤的战友，送他们去医院，不过那时候她也就比死人多半口气了。后来我还去查过那个姑娘的近况，才知道她已有三个月身孕，医生给她装了个新屁股，孩子也保住了。后来，我去医院看了她，是个漂亮姑娘，那时已经和人订婚了，又一个孩子等着出生。接着，我们回到先前抓的那两个人和看守等我们的地点，把那两个人送去审讯，继续巡逻，后来再没有事儿发生了。隔了一周，我在《先驱者报》上读到两行：'十一名恐怖分子，五名平民和一名保安部队成员丧生。'这能回答你的问题吗？"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语气干脆，不露声色，仿佛在谈事儿。

又有一群人在一张桌边坐下，大约有十五人，开玩笑说，大选临近，那些恐怖分子肯定在违反"兰开斯特大厦协定"，应该派保安部队去搜集证据。澳大利亚人给恐怖分子撑腰，那些澳大利亚佬，"一点不信任英国佬，跟我们一样"。恐怖分子在空地上开会，保安部队能悄悄摸到空地的边上，做记录。"咱们手上有证据，他们正在作弊，可当然那些英国佬什么也不会做。"

"咱们不也在作弊吗？"刚才给我说故事的农场主说。"谁

不知道，咱们也作弊，他们也作弊，大家扯平了。”他笑了一声，过了片刻，别的人也一齐跟他笑起来。

哈里和我到酒吧的时候，夜色中从哈拉雷来的两个年轻人还躺在树下，外面已很冷了，另一个年轻人弯腰蹲在他俩身前，使劲晃他俩，试图把他俩叫醒。那两人又嘟囔，又抱怨，话里带着滑稽。

“过去可没这种人，”哈里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抗议。

“那时候，咱们的水平高。”

“哈里，我也是过去的一部分，别忘了。到了英国以后我才意识到咱们过去喝得太多了。在英国的时候，你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

那种事儿他绝不会承认，过去是天堂，是香格里拉，完美已不再。

在自家的安全网前，他找不到钥匙。我说，干吗不去邻居家借把钢丝剪，就一英里远，可他不愿意去想自己和恐怖分子之间只是把钢丝剪。他要爬过去。一时间，我又成了个小姑娘，看着弟弟完成不可思议的形体动作，自己想，那有什么意义！不单心里想，还想让他看出我在想什么。

要爬过去可不容易，网不但高，在顶部更有向前伸出的三岔尖头，这一关他怎么也过不去。他重重地滑下来，气也短了，火儿也大了。居然被锁在自己家外面，他使劲砸门，冲里面的佣人大叫，可佣人睡着了。这片安全之地的守护者，漂亮的斯巴达和优雅的士巴在门里又跳又叫，后来变成低鸣。最

后实在没辙了，正打算去邻居家借钢丝剪，他又找到了钥匙。弟弟立即又风趣起来，随着大门向内敞开，自我解嘲起来。锁上门后，我们从里面隔着铁丝网向外看。

晚上，他问我是不是跟修说过话，已经有人把我和修的长谈报告给他了。我说，我们谈起了丛林里的战争。

“为什么谈那些？”

“你好像不大愿意谈那些。”

“废话。”接下来，他措辞谨慎，好像在做正式简报。“像我那么大岁数的人也上不了战场了，真倒霉。我们做的是警察的工作，巡访农场，确保一切正常。有时候，我们也上那些被怀疑同情‘恐怖分子’的村子去调查。有时候，我们就是坐在武装卡车里，在路上开来开去，这叫展示我们的力量。常在丛林里过夜，我当然喜欢，你呢？丛林，不管怎么说，你那帮人对丛林一无所知。我们在为你们打仗，在跟共产分子打仗，结果怎么样？”

没一会儿，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接着又一杯，小心翼翼，跟往常一样。然后，他谈起了他的战争，不是丛林里的战争，而是二战，谈起当反击号巡洋舰沉没时，他在舰上的所见所闻，还谈起了在地中海上的战斗。他说话的语气有些不同，我能听出来。他说的一切非常残酷，可他不打算把那些当回事儿。怎么能呢？他受过训练，不能当回事儿。

“我跟你说过反击号的事儿吗？”

“你不愿意提起。”

“不愿意？真有意思。我常常想起那时候。”

现在，我们离开当下的现实，不再去管老非和“恐怖分子”，不再去管丛林里的战争和不光彩的英国佬。他的战争，这才是他想说的。

“当时，我正在军舰的底部，小日本的炸弹击中军舰的时候，我正在那里。海水一下就涌了进来……听说过反击号，还有‘威尔士亲王号’，当时人们以为它们是不可沉没的。”

“听说过，就像泰坦尼克号。”

“嗯，有意思，咱们还信那种话……我正站在升降梯的底部，所有人都在往上爬……舷梯都已经是垂直的了，可我还傻站在那儿。有个人冲我大叫，‘泰勒，你不打算爬上来吗？动作最好快点。’于是我爬上舷梯，快得像只猴子，走下倾斜的甲板，直接跳进海里，能游多快就游多快。好在我游泳还不错，不少家伙游得不够快。我们在海水里泡了好几小时，海面上漂的全是舰上泄露出来的油污和垃圾，还有死人的尸体。我踩着水，尽量保持体力，把嘴和鼻子保持在水面上。然后，有人来把我们从海里捞起来。他们说这里的海里有鲨鱼，可我一条也没看到，可能鲨鱼想避开油污，连它们都不想游到那片脏东西里去。”

“噢，那可不太好受，”我说。长年的实践教会我在这会儿滑入这种态度或语气。

“不好受。”我说话的时候，他仔细盯着我。“好多朋友都淹死了。”

“我知道。”

“我没给淹死纯属走运，要是那个伙计没冲我喊那一

声……”

“然后呢?”

“然后他们把我包扎起来,送去锡兰休养。在锡兰我们日子过得不错,前不久还碰上个家伙,他也说在锡兰我们日子过得不错。我也假装自己还记得,可实际上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锡兰那段日子是个空白。我在那儿待了几星期,彻底空白。真有意思,我们还记得的那些东西……你说……这几天我绞尽脑汁地想……锡兰之后,就去了地中海。”

“在那里你待的时间挺长,是吗?”

“是的,在曙光号上,一艘挺不错的军舰,上面好多水手。”

“有炮战,你的耳朵就给震聋了,是吗?”

“不算什么,我是说耳朵聋了。他们先给我做了手术,后来又给了我这个助听器,还真神,这个助听器。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曾经聋过……”

长长的沉默,火在壁炉里燃烧,两只狗趴在地上,柔软的毛上映着火光,闪烁不定。

哈里又开了口:“那都不是关键,瞧……”停了一下,又接着说,“直到在丛林里打仗的时候,我才对自己有了些了解。突然间,我明白了,过去那么多年自己一直麻木得很。就前两天,我还对自己说,在你生命中最好的岁月,你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冻起来了……”又停了一下。“突然明白了那种东西,可让人不好受。”

“什么让你明白的呢?是丛林里打仗时发生的一些事儿吗?”

"我猜是吧。我看着身边那些年轻人,那些真正参加过残酷战斗的年轻人,能看出来他们在转变,因为我自己也转变了。我想说,别,别,别像我一样过一辈子。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好像住在玻璃罐子里,可他们还得转变。你不可能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被炸成碎片,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现在,看到个人,我就能看出来,哦,你已经变了。许多恐怖分子也变了,不奇怪。"

"哈里,一直到现在你才肯说战争很惨,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我可没说过,"他立即抗议。"好多人的遭遇比我惨得多。"

"要是你偶尔也说下战争很惨,我想没人会怪你夸大其词。"

他沉默不语,看上去既伤心,又不屑一顾。

"你总是这幅死样,咬紧嘴唇,一个字也不说,为此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他看上去真有些吃惊。

"不知道,只是觉得不该大惊小怪。"

"为什么不?知道吗,战后,我问你在'反击'号上是个什么情形,你回答说,不算太糟。"

他又不说话了,再次开口的时候,说起了他儿子。自从侄子七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他曾是塞卢斯侦察队的一员。有些人可能已经不记得那是个什么组织了,这样说吧:黑人还在说塞卢斯侦查队的事儿,英国的报纸也还会提到,可

新津巴布韦的白人再也不会提起了。在一个人眼中，你是恶棍，是杀人犯，可在另一个人眼中，你可能是英雄。

那个年轻人在侦察队中可算出类拔萃，可突然就转了性，转投向基督教原教旨教派，后来去德克萨斯接受培训，成为一名传教士，现在在南非给黑人和白人传教。

“他的传教相当让人激动，”哈里说，用一种目光看着我。

“啊，你的意思是支持他？”

“我去过他们的礼拜，同英格兰的老教会太不同了，真让你感到有点头晕目眩。”

“一点儿不假，我也有耳闻。你有没有加入过道里跳舞的信徒？”

“差一点。”

“真有意思，打了那么多仗，突然就转投别的教门，不觉得他有点……我说他的行为。”

“可以这么说。”他停了一下。“你管那叫归化吗？”他一边不在意地说，一边给自己倒了杯酒，接着给我也倒了杯。

“是的，很突然，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巨大的危险中，你吓得浑身僵硬，那时候上帝就来了。心理学家都知道。”

“那还真有点意思。”

“比如说航天员。”

“有道理。”

“或者，就要从山顶上摔下去，还有驾着条小船，迷失在大海中央。”

“不管怎么说，我不存在归化问题，一直都上教堂。”

他一口接一口地喝酒，不过很小心，好像每口下肚，他都要听见响。刹那间，我懂了些东西，其实还是早该懂的，没什么比这更让人恼怒了。这就好像你在浓雾中没头没脑地乱撞，接着，刹那间，一切清清楚楚。哥哥和父亲的共同点并不在于基因。两人都慢吞吞，犹犹豫豫，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满脑子幻想，好像随时都能听到宿命的声音，也只有他们才能听得到的，虽然他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可主要原因并不是基因。原因是：两人都受到战争的伤害。这个想法让我如此震惊，一下子就照亮了无数谜团和问题，我不得不等会儿再回到这一点上。这会儿，哈里显然想说什么，可不知该怎么说，他的嘴唇在颤动，准备说出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的目光向内凝视着自己，最后，他终于抬起头，逼迫自己看着我。

“你说，我们过去常一起待在丛林里。”

“是的，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有时候一去就一整天。那时候，我们常带瓶凉茶和三文治，太阳一出山就出去，在外面一直待到太阳下山才回家。”

“那时候，那个日本人已经来了吧——挺有意思的那个家伙——我读过你的一个短篇。”

“觉得怎么样？”

“关于你和我在丛林里的，还有狗，可那篇故事真有点让我头晕，没能读完。瞧，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什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自己才意识到，十一二岁以前的事儿，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在学校的时候还能

想起一些，可在农场上时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一点儿都不?”

“可以这么说。”

“不记得咱们藏在库杜山的岩石后面，看野猪，它们离咱们只有几英尺远，想起来了吗？还有在二十亩地的边上，咱们躲在高高的草堆里，看落日时停在地上的小羚羊，不记得了吗？还有，咱们爬到树上躲起来，看丛林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恐怕不记得了。”

“还记得那次吗？有头长着小辫儿的野猪追我们跑，一直把咱们赶到树上，咱们还向它扔树皮和树叶，想把它赶走。那家伙居然想爬上树追咱们……前腿趴在树干上，冲咱们乱叫，咱们笑得太厉害了，差点儿从树上摔了下来，想起来了吗?”

长长的沉默。

“我的脑子都堵住了，是不是?”

“看起来像是。”

“肯定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我的脑子全堵起来了?”

“我想，应该有。”

“你的脑子一点儿都不堵，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或许，咱俩生存方式不同。”

“你的话太重了，”他说的时候眼睛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那是个我喜欢用的字眼儿。”

他坐在椅子上，一边想，一边慢条斯理地喝杯中的酒。最后，他说：“我告诉过你，对脑子为什么会堵住，我还略知一

二……"他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确保我不会踩上这个那个标记。"我跟你说过，要是你脑子好像堵了起来，那肯定有原因。要是还懂点事理，就别把睡觉的狗吵醒。那些琢磨心理的家伙就错在那儿了。在丛林里打仗的时候，另一场战争里发生的事儿不断在我脑子里闪现，可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心神不宁。干吗要把它们给堵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里面肯定有些东西很可怕，要不然怎么会让我心神不宁？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有什么都说出来，也不打算那么做。有些事情就得闭口。别以为我为参加了丛林里的战争而后悔……等时候一到，蹬腿闭眼我也不在乎了。我都经历过了，裹在张毯子里，看着满天星星，听夜鹰的叫声，如今夜鹰也不多了。我就要飞了，真开心。"他背过身去，眼里已泪光一片，给自己又倒了一杯，然后再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去看过要去的地方，在德兰士瓦。咱们还觉得这里够糟了，我是说丛林，可在那边，到处都是大片的牧场，一连好几英里都是过度放牧的草地，几乎被牲口踩平了，脏兮兮的。那里根本没有丛林。"

"既然你关心那里超过其他一切，到那里也算合理。"

"至少我不用看着这里被毁掉，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就是这样吗？"

"真是悲剧，"我说，后面的话脱口而出，自己都没意识到。"你知道吗，在这个国家里谁最了解你？我是说丛林。是那些非洲黑人，可你呢，都不肯跟他们说话。"

"你什么意思？我不肯跟他们说话？小时候我就跟咱家黑厨子的儿子一起到丛林里去，你以为我们在那里都干什么

了？还有学校里那个泥水匠，他的名字叫所罗门，那时候我俩一坐几小时，谈人生，无所不谈。还有那个跟我一起盖起这栋房子的黑人，你忘了吗？”

他停下会儿，等我用自己的某则教条挑战他，接着又说：“再说了，也不光是老非才能理解我，任何一个老罗得都能。”

“废话，半数的老罗得对丛林又知道多少？还不跟布瑞克斯顿的穷黑孩子对英国乡村的了解差不多。”

“当然，我说的是那类罗得人。”

“跟你一样的人？”

“要是你愿意这么想。”

“九点了，该上床了。”他站起身，向门口走去，又突然转过身，正好看到我伸手去取笔记本。“你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作为批驳我的证据吗？要是你肯把你自己说的那些愚蠢的鬼话也一起记下来，我也不介意。”

第二天早上，他开车送我上大路，经过一片橡胶林。有一段时间他回到鲁扎韦的旧学校工作，在那里做经理，因为在那儿工作可以整天待在屋外。那时候，他就要求种树。我们下了车，把车门锁严实，心里却有点不舒服。“现在，你离开车还不到五分钟，就会有无赖来偷车。如今什么都要锁好，什么都要上铁条，简直跟住在牢里一样。”

我们信步走过树林，高耸入云的桉树上飘荡着芬芳的气息。

“我常到这儿来，一有什么事让我心情低落，我就上这儿来。至少，这些树都是我亲手种下的。前不久，突然后悔起

来，当初为什么没有种穆萨萨树，那种土生土长的树。过去，谁又会想到连穆萨萨树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看过那些电视节目吗？关于动物的？每个节目最后都说，这种动物的栖息地正受到威胁，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也不看了。要是当初种的是穆萨萨树，现在差不多也长成了，会起点儿作用……咱们现在就能在穆萨萨树林里散步了。这片树林是受保护的。"他大笑一声，接着又说："当初决定错了。"说话的时候，他一只手搭在橡胶树光滑平整、泛着油脂的树干上，那是只深情的手，他甚至拍了拍树干。斯巴达和士巴一直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跑，鼻尖冲下，搜寻动物的气息。哈里摩挲了下树干，说："还跟过去一样，这是个好地方。"

他把我领到一个告示牌前，牌子夹在岩石缝里，上面写着："请不要忘记掩埋垃圾。"不约而同地，我俩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里是童军的宿营地。瞧，他们就在那儿搭帐篷，生火在那个地方，在那儿坐成排吃东西，那儿是垃圾坑。还有货车送来玉米片、面包片、榨橙汁，车来的时候就停那儿。"

我俩一路大笑，在枯叶和尘土上跌跌撞撞，斯巴达和士巴跃起身来，舔我俩的脸。

捎 客

离开弟弟家，开车走了几英里，我一点儿没嗅到危险的气息。就在那里，几天之后，我和另外四人碰上车祸。车祸非常严重，居然没有人丧生，全因为五个守护天使没打盹儿。

这趟津巴布韦之旅的安排是这样的：先跟家里人待上两星期，然后就深入新津巴布韦，看看身边会发生些什么，只有这样才叫旅行。我迫不及待地想跟非洲人交谈，任何一个非洲人都行，看看在战争辞令后面到底能发现些什么。在哥哥家厨房里干活的那个黑人男人挺友善，不过可别指望他会对自己雇主的姐姐坦诚相待。我只知道，他支持穆左雷瓦主教那边，可那边输了。

我停下车，欣赏路边一片特别优美的风景。小时候，在慢吞吞驶向马兰德拉斯的途中，在每一个拐弯处，我都记下路边的每一处巨石堆。当我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在风风火火地赶往马切凯的途中，车上总是坐满了人，大家的情绪融成一片，谁也没太在意车窗外的风景。眼前的景观不在我的记忆之中。一辆破旧的卡车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嘎吱一声停下来，车上跳下个黑人青年，然后卡车拐上了条小路。那个青年看着卡车消失的背影有好长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见我的车和坐在车里的我，慢慢走过来，满脸哀求的神情。他跟汽车站边那些吵吵嚷嚷的人完全不同，于是我打开车门，他进来坐在我旁边。一进来，他就弯下腰，身体蜷曲成难受的曲线，两手

无力地垂在双膝之间。他的身体微微颤抖，在寒风中待久了，谁都会这样，高地草原上的早晨寒风刺骨。他穿了套西服，白衬衫上打着领带，都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可料子都是便宜货。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在马切凯后面。

原本希望他在马切凯前面下车（在《金色笔记》中那个地方叫马绍比），因为我想停下车，四处走走，理清自己的回忆。

我问他："干吗这么伤心?"他的身体抽动了一下，仿佛想要挣脱一张无形的网，获得自由。他紧闭的双眼间渗出泪水，挂在眼睑下面，闪闪发光。他摇摇头：太痛了，没法说。车向前疾驶而去，一路上我试图回忆起路两边的景物标志，可车开得太快了。走路和骑自行车时看到路两边的景物当然有所不同，不仅如此，以三十英里和六十英里的速度行驶时看到的景物也颇不一样。过去，我们开去马切凯的车都是跑不上几天的老爷车，那时候正是二战期间，我们有什么车就开什么车。

他开始啜泣，单调乏味，好像已绝望。显然，他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了。

"请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没人能帮我，这星期我丢了工作，他们说我能力不够。我有证书，可他们还说我能力不够。"

"谁说的?"

"我部门的人，某某先生。"一个黑人的名字。"史密斯先生喜欢我，说我工作干得不错，可某某先生……"他又哭起来。

到大城市找份儿工作，这是所有津巴布韦年轻人的人生目标，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通常，人们依旧虔诚

地向乡村生活的乐趣和美德致敬,可大家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农村。现在,在我身边坐了个年轻人,受到命运的诅咒,就要回到农村去了。他的大城市还不是哈拉雷,而是马隆德拉。他也曾是城市文明的一员,可现在,他就要带着他的证书和薄得堪称英勇的西服回到农村去了。一回到那里,那身衣服就会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到高高的架子上,以防被狗咬鸡啄。最好的做法是挂在铁钉上,那样连蚂蚁和昆虫都防了。他就要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女人们在他耳边絮絮叨叨,最后没办法也会拿两天锄头。这沉醉于大城市的幻想的一生,以后它的高潮就只能是走到大路边搭辆车(够幸运的话),到那个小城镇待上一个下午,去看看昔日的同事。对那些人来说,现在他是个乡下来的表亲了,他们抓牢了成功的梯子,可他滑了下去。或许,他们会带他去啤酒馆喝上一杯,或者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都是因为白人都走光了,他们把工作也都带走了。”

“这只是暂时的,你们独立才两年。会有各种各样的新工作。”

“新工作在哪儿?我可看不到什么新工作。”

他的话让我觉得难以理喻。过去我常跟弟弟说:“才两年,还能指望什么?”这竟成了这趟旅途中最深刻的印象,虽然这时,也就是在旅途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直到现在,我还始终为之感到吃惊和不解。两年前,1980 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残酷战争刚刚结束,作为在丛林中反抗史密斯和他的同伙的各支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穆加贝同志上了

台。这同时也意味着有好多人为此感到失望和不满，有好多人都想找他的茬，跟他过不去。他安插进政府机关的那些人已经在丛林中证明了自己作为游击战士的能力，可现在他们要做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管理一个现代国家。没接受过任何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没有足够的受教育人才，甚至没有任何现代经验的背景，包括电话、电力、邮箱、诊所、公共交通、航空运输、政府公函、社会保障、地区法院。在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孩子，不管他出身多么贫穷低微，都已对那些习以为常。没有这一类实用性的文化背景，那些人一接到通知，就开始承担起重任，运行一个国土面积和西班牙一样大的国家，一个刚刚被战争所毁坏的国家。你觉得，至少也先给他们几年时间，让他们先学着点儿吧。可实际与此完全相反，所有的报纸、电视节目，还有国际专家在提到津巴布韦的时候都仿佛在谈一个老牌国家，应以最严格的标准对之评判。是否有哪个权威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新政府，面临几乎难以解决的困难，要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找着北，我肯定错过了那番善意的介绍。为什么大家期待穆加贝政府的作为同世界大家庭中一些老牌国家一样成熟？我想，部分原因是穆加贝同志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能为自己挣高分。就在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来自德旺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在旧日的北罗得西亚，管理一片和约克郡差不多大的土地，坐在法庭里断起案子来了。可在那里，人家可没把他看成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而是大英帝国的代表。穆加贝的情况跟他也差不多。再加上打仗那么多年

中的宣传，总是自信满满，声音高亢，充斥着不实之词和空头许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家评判津巴布韦的时候就好像那里从来没有过战争。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战争的现实，所有那些痛苦、残酷和恐怖几乎被立刻压抑下去，因为它们令人感到实在难以忍受，没人能忍受那些。相反，所有的痛苦被冻结在战争回忆录中，封存在爱国的言辞和战争宣传中。

“你多大了？”

“二十二，女士。”

“别叫我女士，拜托。”

要是他今年二十二，那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大概十二三岁。

“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

“在上学，女士。爸爸要我取得证书。”一说到这儿，他哭得更厉害了。“白人都走光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穆加贝什么都不懂，白人比我们聪明。我们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留下来，给我们工作。”

几周以后，就在离开津巴布韦前夕，我把与这个年轻人的遭遇说给一位黑人知识界人士听。他用不安的语气问我：“那些话是谁说的？你确定吗？”我回答说：“有什么好吃惊的？我真不懂你们。干吗对自己期望那么高？为什么好像人人都以为津巴布韦已经存在五十年了？战争刚刚结束，才两年。打仗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还有不少黑人为白人打仗，怎么可能隔了一夜就一切都结束了呢？”可我说的一切同当时的气氛太相左了，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人们麻木了，他们的感受

关闭了,他们把自己的感受给关闭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式:团结一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黑津巴布韦。

车继续向东南行驶,越来越接近马切凯,路边一连几英里都是在冬日寒风中凋零枯黄的野草,风吹过,仿佛留下条条光的溪流。数丛穆萨萨树高高耸立,树叶还有些绿色,更远处,群山如黛。他的小村就在远山中某处,而他也就要受到命运的诅咒,回到村里去了,再也出不来了。在二十二岁这个年龄上,他一定觉得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将持续到永远。

"听我说,"我同他说起道理,"白人也不见得就比你聪明,只不过你听信了白人的话。知道吗?好几个世纪里,欧洲人,也就是白人,在阿拉伯人眼中落后而原始。罗马人入侵不列颠岛时,就像白人后来入侵你们这里一样,把当地人叫做愚蠢落后的野蛮人,那时候也确实如此。"

我一面说,一面越来越觉得滑稽。

"有人想要我的工作,"他说。

我原本可以带着社会学家的口吻对他说:"是这样啊,瞧,这个世界人太多,而职位则太少了。这种状况还会恶化下去,不会改善。"

可实际上,我只问了句:"你觉得那场战争糟吗"

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糟透了,你不明白,没人明白……"他用他那珍贵的西服的袖子抹了抹被泪水打湿的脸。"咱们村里,保安部队先来,他们前脚刚走,同志们后脚就到。咱们要对他们好,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装……咱们没有安全感,不管怎么做都不行。"

我递给他几张纸巾,他把脸擦干净。我说:“我们对那场战争的了解仅仅限于报纸和电视。”我原本以为他会问,你打哪儿来,可结果他却问:“打仗时你在哈拉雷吗?”

“那时我在英国。”

他笑了一声,笑声中还带着哭腔,仿佛在说,还能指望你懂什么?他耸下肩,说:“对,对,当然,从英国来,一个英国来的白人。我懂了。”

“在英国也有失业。”可就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意识到这里可没什么失业救济,他下面的日子就只有靠家里人了。

一位津巴布韦黑人曾对我说:“大家庭是种很好的福利系统,我们既不需要老人院,也不需要精神病院和失业救济。在哈拉雷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我家有块地,大约五十公顷,二三十口人就一直住在那块地上。祖父母,婶婶阿姨,侄子侄女,脑子不好使的,找不到工作的,都住在一起。对此你们不以为然,会说那叫自给自足,小农意识,不值一提。可自给自足意味着人们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那些用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机构。你们眼里只有追逐剩余产品的大农场。”

“干吗到津巴布韦来?打算在这儿长住吗?能给我份儿工作吗?什么工作都行。”

“我只是访客,不打算长住。”我原本可以说自己在这里长大,后来离开了这里,诸如此类,可那一切都在他出生之前,甚至在他父母出生之前。遥远的过去,历史的迷雾中,曾有个白人居住于此。

“干吗不留下来?”他大声说,刚看到的一点儿希望又飞

了。“要不，什么时候我上伦敦找你去，那儿人人都有钱，住大房子。”

车驶上一段长长的上坡，过了坡顶，滑向坡底；再上升，再下滑。有时他悄无声息地流泪，浑身颤抖，擦干脸，接着又颤抖起来，干脆放声大哭。我的心有一半已飞向马切凯，飞回三十五年前的周末了。那时候，我们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那是我们给自己贴的标签。和大多数标签一样，它的作用至多也就是种简便的称号。实际上，我们很少把时间花在为更美好的社会开出当前的药方上，部分原因是南非共产党，也就是莫斯科指定的“路线”是策动黑人无产者夺取政权，在所有的土地上实现正义。可当时，没几个非洲人符合这样的定义。实际上，那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世界其他地方：英国、欧洲被占领土、日本、远东、美国。那场大战教会我们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如果说它是个分水岭，其价值也正在于此。那一进程从一战时就已开始，爸爸说当他在科尔切斯特长大时，没人会为美国或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而费神劳心，甚至连伦敦发生了什么都不关心。那时的新闻就是比尔（爸爸上学时的一个朋友）父亲的母马白色之星在三点三英里赛马中获胜，或者教堂将举行野外餐会。一战使那一切走到尽头，甚至在农场上的他也读起伦敦送来的报纸，听着广播里BBC播音员嘶哑的声音。听说中国或印度发生饥荒时，他觉得自己也有一份义务要承担。每当他见到我们想把吃剩下的东西留在盘子里，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命令：“不管盘子里还剩下什么，吃完。”

马切凯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那么清晰，其原因也是二战。

如今，我觉得那时大家都疯了，全世界都疯了，不管是否卷入战事。或许，要不是因为发了疯，全世界的人又怎么会以那样的规模相互仇杀？这是我的自我安慰吗？真的如此吗？相互仇杀是否是人类的天性？当时，在我们看来，那场大战当然会结束所有的战争，人人都会看到战争有多残酷。（一战时，父母也这么想。我们所有人当时都相信未来将沐浴在和平之光中……）

那时我二十正当中，跟一群人混在一起。那个年代，任何的群体都必定和政治有关。从定义上说，我们关于一切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注定会改变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人。我们的对手要么是被误导，要么天生心地歹毒。那时我们都在恋爱，或渴望恋爱，或渴望她或他会爱上自己。

有的人爱得疯狂，结局是一段带来悔恨的婚姻（好在现如今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许多都是受训的飞行员，他们时时被派往世界上各个危险的地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许多人也确实再没回来。分离接二连三，总是充满痛苦，可还能忍受，因为大家的自我感觉都非常之好。还有个原因，我们喝起酒来一向无度。酒精、性、政治：大家沉迷于此，那种状态像传染病般四处蔓延。对大城市，索尔兹伯里的生活令人感到厌倦，我们周末时常下到马切凯，不是每个周末都去，不过次数也很多，一去就是整帮人马，开着自己的车或借来的车。在马切凯发生过的一切我在《金色笔记》中都已有描述，出于文学原因做了些改动，可到底改动了多少呢？所有的作家都熟悉，要使劲儿才能想起来的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那

些虚构的，或半虚构的情节。不是没可能，只是要把那些事儿想起来，得独处静思，把一件件往事从记忆之库中拽出来，一坐就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那意味着想象着自己又回到旧时，那个地方、那辆车、那间卧室，如此这般才能创造出并行的真实：实际发生过的和没有发生过的。

“还记得吗，多丽丝，那次咱们……”

“一点想不起来了。你还记得吗……”

“想不起来了，你确定吗？”

在《金色笔记》中我就说过，马绍比被刷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当我们作为观察者，从外面去看记忆中的某段景象时，金灿灿的色彩诱惑着我们，使我们多愁善感。我们记得最牢的就是事物的外在表相：月光下、星光下，火星向上升起，窜上树枝，里面透露出红宝石般的色彩；一张前倾凑近火光的脸，全然不觉有一双眼睛正在观察它，一生都记住它。可当时，我的真实感受到底是什么？

对于昔日在马切凯的真实感受，我还记得很清晰。为什么那段时间留下的那些印象会如此深刻？那时候，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我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其实，我自己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第一次婚姻后是个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四十三到四十五岁期间又成了“革命党”，两种角色间似乎毫无联系。到了后来，就更看不出什么发展脉络了，这个中年女性开始养成独处的习惯，有可能就写点儿东西，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想法，越来越用批判的目光审视自己。当然，她的身边依旧总是人群，人群里的人总在变，来自四面八方，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们也都知道这其中确有关联,那就是自我的意识,它始终如一。正是这始终如一的自我意识令我们坚强,给我们安慰,不管你是两岁半,还是二十岁,还是六十九岁,自我的意识,对自己是谁的追问,始终如一。

对马切凯的回忆来自不同的年代层。最下面一层中,我还是个小姑娘,望着车窗外的铁道线和几棵橡胶树,树下坐着两只狒狒,一脸伤情,腰上绑着铁链,铁链上系着绳索,栓在树桩上。为什么那一幕如此令人心酸?因为它让我联想起另外一幕。那时候我五岁,跟父母从波斯回到伦敦,还没来罗得西亚。每次去伦敦动物园,一进门就能看见一只大铁笼,像只巨大的鹦鹉笼,里面关着只大狒狒或黑猩猩,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看到那只动物被关在仅能容身的铁笼里,我的惊恐难以用语言表达。它的双爪紧紧抓住铁栅栏,一对小小的红眼睛里闪耀着光芒,既有愤怒、仇恨,更有哀伤。在橡胶树下的黄土地上,那两只狒狒活的时间很短(希望如此),各种年龄、各式各样的二流子都跑来嘲弄它们,折磨它们。

再靠近一点儿,在大战期间,我们这群从索尔兹伯里下来的年轻人坐在这里的桉树林边,喝着从葡属东非运来的白葡萄酒,铁道线就在我们身边几步远的地方,我们的另一边是索尔兹伯里到乌姆塔利的大路。

快到马切凯的时候,我对那个伤心的黑人小伙子说,自己想在马切凯停一会儿,因为战争中在这里待过。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他会把我的战争当成他的战争,丛林里的战争。历史的迷雾开始翻滚,像煮开的牛奶,我也没多费口舌向他

解释。

“待多久?”他问我,立刻起了疑心,那种口吻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他以为我在找借口把他赶下车。瞧,这儿又是一个无情的白人。

我本想在马切凯旅馆停下来,或许喝上一杯茶,缅怀一下旧时岁月,不过现在知道那已不可能了。时间改变了我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许现在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喝杯茶,不过那并不重要。根本原因是,我想沉浸在昔日的记忆中,可他的悲伤让我感到局促,已不可能了。我说:“就几分钟就走。”

“我可以走回去,”他苦巴巴地说。

“别,别,我也不下车,就把车开慢一两分钟。”

可现在,两种景观浮现在我心中,眼前看到的一切着实让我迷惑。大路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对,那儿是修车厂,那儿是邮局,那儿是库房、酒吧……还有旅馆。旅馆怎么会在那里?我问他:“知不知道,大路在这里有没有改过道?”

他回答:“大路一直都在这儿。”

自打他出生以来,大路就一直都在那儿。

我向左拐过去,铁道肯定在那个方位,于是看到远方的铁轨,还有布满灰尘,无精打采的橡胶树。跟过去一样。停下车,旅馆在哪儿?不可能是……就是那儿,它已完全废弃了,一排低矮的砖瓦建筑,两扇门通向狭小的室内,另外一扇通向酒吧。不错,在马切凯或马绍比之后,我周游了世界,见到各地的奇观,可过去那么多周末我们都来畅饮劲舞的旅馆不可能就是那个地方吧?透过肮脏的玻璃,我看看那些有点儿小

的房间，那时候到底有多少对儿能在里面跳舞？那就是那间餐厅吗？过去我们在里面吃饭，一吃就好长时间，气氛热烈得不行，布思比太太总是有求必应，像个老妈妈一样（我绞尽脑汁，想回忆起她的真实姓名）。那里面能放几张桌子？又曾放过几张桌子？还有酒吧？那里曾挤满了穿空军制服的军人，还有当地的农场主，可它只是间狭小的房间。在这里的时候，我已是成人，不是小孩子，我也不是在重温儿时的景象……屋外的一排檐廊确实能放下几张小餐桌，那更像过道而不是檐廊，可过去我们确实曾坐在那里，喝东西……对了，当时整排矮墙下面都坐满了人，那道矮墙就在索尔兹伯里去乌姆塔利的大路边上，坐在那里，部分乐趣就是看着偶尔经过的车在一阵淡白色的烟尘中呼啸而过（沙地草原上的烟尘，不是洛马冈地那种沉重的红色烟尘）。或许，那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陌生人，或者是哪个我们认识的人，开车从索尔兹伯里赶来加入我们……也有的从乌姆塔利赶来。就算是陌生人，没一会儿也混熟了，融入这里高昂、兴奋的气氛中。我们这帮人都是好伴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帮人也真稀奇少有，是个大杂烩。在英国，因为那里的社会体系，这帮人绝不会聚在一起，可在这儿，伦敦的、伯明翰的、苏格兰的，管他什么地方的，大家搅在一起，拿那个小子开玩笑。那家伙中断了不知是牛津还是剑桥的学业，跑到这儿学开飞机，后来可能在欧洲捐躯了，也可能是在缅甸或印度。女孩子们有当地的，有英国来的，有南非来的，还有鬼知道什么地方来避难的。所有那么多人都待在那条檐廊下吗？当然不，所以我们也常常待在铁道

附近的橡胶林里，那里有足够的空地让大家铺开来坐。

现在去看看卧室……对马切凯的回忆中，最深刻，也最令我不安的部分就是关于旅馆的后部，卧室所在的部分。那里有十到十二间卧室，背对背排成两排，每排前面都有条狭窄的长廊。这会儿，我身边的年轻人蜷曲在座位上，一只胳膊挡住脸，把那残酷狡诈的世界挡在外面，很可能我也包括在内，毫无理由就把车停在这只等拆掉的破烂建筑外面。我向他道了个歉，迅速下了车，绕到旅馆的后面，眼中所见只有残垣断壁和丛生的杂草乱木。我抬头想找出卧室所在的地方，因为卧室所在的位置比旅馆高。那时候，一走出卧室（共用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结了婚）就能看见一段台阶，另一头是厨房和餐厅的窗户。过去，我常会站在最高一级的台阶上，凝视夜空中的月亮，那么大，那么亮，别的地方再没见过，虽然在自己家的农场的时候，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屋外看夜空。马切凯的夜空中仿佛有什么东西，使这里的月亮看起来更大、更美，或许那不过是我自我陶醉的心态。在马切凯，不管我们是哪个周末来，月亮总是十分圆满，或者接近圆满，就算是半月，也是那种果仁的形状，在蓝黑色的夜空中发散着银色的光辉，照亮大地上缓缓升起的薄雾。每次走到卧室外面，我总会停下脚步，对自己说："看，再不会有今晚这么美的月亮了，不可能再有了。"就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朋友和同志们的声音从酒吧餐厅所在的位置传来。确实再也不会有了……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污染也遮蔽了非洲的夜空，你简直想不起来过去的夜空是什么样子了。不久以前，在阿根廷西北部，我走到夜

空下，对自己说："天哪！瞧，那才叫夜空，就像圣诞树一样，也像珠宝店的橱窗。星星那么亮，那么近，你简直可以伸出手，把它们从黑暗中一颗一颗摘下来。"

乘着月色，还有其他无数令人飘然若仙的景物，我小心翼翼地走下石台阶，台阶两旁种满了各种植物，散发着芬芳的气息。布思比太太（真名是什么？）实在太喜欢这些植物了，一丁点儿空地也不会闲着……现在，眼前只有残砖破板、满地垃圾，无人打理的灌木丛生，什么也不可能看到了。不可能，或许这是另一家旅馆……废话，就是这家，那儿是酒吧，那儿是……要理清过去这里是副什么模样，还有我们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需要……多久？几星期够吗？没用，重要的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向前开下去，因为那个坐在身边的黑人青年。这会儿，他把双手紧紧夹在骨瘦如柴的双膝间，泪水又开始不停地往下落，打在已经皱巴巴的西服上。

我想买点儿东西在车上吃，或许该找家店，给他也……我突然意识到，这又一阵眼泪的来袭是因为我们就要离开马切凯了，离开这个到处是欢乐的大城市，他只能再看它最后一眼，然后就要开始流放生涯。

我把车开回大路，从各式各样的漂亮房屋中还能辨认出几幢从殖民地的最早岁月残存下的建筑，试着找到那个岔路口，从那儿，沿着条窄窄的沙地小道就能离开镇子，走进小山和峡谷。那里曾经到处都是蝴蝶、小鸟、蚂蚱，还能记得我们这群人边走边听小鸟尖锐的鸣叫声，鸽子似睡非睡的咕咕声，还有草丛里蚂蚱的叫声。那芬芳，那气息，还有各种草药发出

的温和干燥的味道……够了。

离开马切凯约五英里，身边的年轻人说："到了，就这里。"我停下车，可发现哪儿都没到。我的意思是，我的车停在大路中央，四周是成片的草地，连绵几英里，上面这里那里点缀着几簇乔木，远山如黛。他并没立即下车，而是坐在那里，悲痛地看着前方。

突然，他脱口而出："我再也不要见到朋友们，再也不要见到你，再也不要……"说着，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车，紧紧抓着手中的小箱子，走进路边高高的草地中。开始，还能看到他的头和肩膀在草丛中晃动，然后就什么也见不着了。

今年，1991 年，据估计在津巴布韦有超过一百万失业人口。

我又开始向路两边张望，看有没有人要搭车。这里远离大城市哈拉雷，距另一个大城市（比哈拉雷小点儿）穆塔雷也还有一段距离，在汽车站等车的人也少多了。等车的人就站在路边，或许就是个卖汽水的售货亭，更或许只是路边，什么也没有，甚至不是通向什么地方的岔路口。我的车速一低，人群就拥挤了上来，不过我没停，一直向前开，直到看到路边站着三个男人，看上去还挺舒服，身边也没有别的人，于是我停下车。他们要去穆塔雷，于是在剩下的旅程中就成了我的伴儿。三个人都不年轻了，至少已步入中年，穿得很破，不过态度和蔼。我知道自己已找到了想找的那种人：这个国家的人，黑人，我能与之交谈的人。交谈，也就是说，无拘无束地谈心，不必担心被别人听到，不管是好斗的白人，还是满口意识形态

的新一代黑人。

坐在后排座上的两位能说点儿英语，坐在前排我旁边的那位英语说得相当不错，我立刻就对他说，自己从英国来，没去解释复杂的来龙去脉。他说欢迎，希望我能留下来，因为所有的白人都在离开这个国家。我问他，你喜欢穆加贝吗？喜欢，他非常喜欢穆加贝，可他不喜欢穆加贝的那些同志。要是穆加贝知道他的那些同志的所作所为，他会惩罚他们，可没人会告诉他。这种话我在好多国家都听到过，或读到过，所以再听起来也没感到失望，然后就问起了战争中的事儿。一路上，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打仗时的事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还住在自己的村子里，村子离这里不远（靠近德瓦尔和维特纳决定建立农庄的地方）。在那个地区，政府军和游击队来来回回，双方都把人抓住询问，严刑拷打，甚至连孩子和姑娘都不能幸免。女人们也不下地干活儿了，她们太害怕了，于是谁家都没吃的了。就算屋里还存了点儿粮，任何一方的士兵都会闻风而来，把粮夺走。奶牛和山羊也不见了，士兵们可能把它们赶走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最后他举家迁到穆塔雷，投奔那里的一个亲戚。战争太惨了，要是你没有亲身经历，你根本就不会知道那有多惨。

坐在前排我旁边的人叫高尔，他说话的时候还不停指指后排的两位，那两位说对，对，然后叹气，摇头，发出啧啧声。我们经过小山，浅沟，一片祥和的丛林，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然后所有三个一齐指向窗外，对我说，那儿……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三个人……那个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给烧了……那个山头上

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在那儿，直升机向丛林里扫射，然后林子里到处是死人。

直升机肯定属于史密斯的部队，可在别的地方，谁也说不清“他们”究竟是谁。

我说，在英国我们也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些关于这里的战争的消息，可高尔摇摇头，说，报纸从来不会真实报道，报纸只会说，发生了这个，发生了那个，可报纸从来不会告诉你人们心里的感受。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都担心害怕，怕到不敢睡觉。要是你睡着了，可能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家的屋顶着火了。会是谁干的？可能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邻居。要是什么人突然失踪了，大家就知道那人是个探子，要么为政府卖命，要么属于某支反抗武装。就算是你打小就认识的什么人，只要有人给钱，也会要你的命。孩子接二连三地失踪，然后就听说他们被拐到林子里，加入了游击队，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可以为别人做向导。他们随时都会出现，不过那时候手里端着枪。打仗的时候，十岁以上都参了军，没上过一天学，现在他们能做什么呢？

“游击队里有学校，”后排上的一位还算公平，指出这点。

“有是有，可在那儿能学到什么呢？”

“他们的同志会教他们读书写字。”

“有的能读几页书，写几个字，不错，可他们也学了好多别的东西，会忘记吗？”

一路上，他们叹气，摇头，微笑，这条路对我来说意味着许多年前的回忆，对他们来说则意味着战争。伏击、轰炸、地雷、

装甲车、低空掠过的战机，载着机降部队的直升机，从上面下来的部队如死亡的种子撒进四周的丛林。

高尔问起了英国，他的两个朋友向前探过身子，听我们在谈什么。我嘴上在说，心里却明白我的话所描绘出的景象同英国无关。在搬到穆塔雷之前，高尔一家一直住在村子里，现在他们住在穆塔雷城外一个小镇里，全家人挤在一个只有一间屋的房子里。高尔在修车厂干活，后排两人中有一个是修表的，一辈子从没从穆塔雷走远，甚至连哈拉雷都没去过。还有一个是穆塔雷一家酒店的看更的，那家酒店就在城里主街道的旁边。他说，那是家大酒店，话里充满了自豪，可又大笑起来，好像在嘲讽那家酒店的装腔作势，还有他自己的自豪。住在那里的人世界上什么地方都去过，至于他自己呢，打仗前去过葡属东非，去看亲戚。应该叫莫桑比克，高尔纠正他。他晃晃脑袋，边笑边说："那么多新名字，实在记不住。有时候我还说索尔兹伯里，就有人对我说，小心别人把你报告给同志们。"

"过不了多久就没人记得了，"高尔说。"只有我们这样的老人还知道穆塔雷过去叫乌姆塔利。"他摇摇头，又笑起来。那是妙不可言的非洲笑声，发自五脏六腑，抓住全身的笑声，浸透着开朗、幽默的人生智慧。那是穷人的笑声，只要我们不谈战争，不谈那些令他们不安、阴郁的事儿，他们就总在大笑。

他们想知道我离开这么多年以后，这次回来发现了哪些变化。

我想说丛林空了，树木也稀了，动物都没了，小鸟和昆虫

也没了，这意味着一切都变了。丛林里有着难以计数的生态平衡，一小片林地上就有数百种，都是维持水流、土壤、植被、气候所必须的，现在它们都被破坏了。我开始怀疑，这些变化是否更为紧要，甚至超过战争、白人政府的倒台和黑人政府的上台。现在，多年以后，对此我已深信不疑。可那时候，还没法同那些黑人谈这些听起来好像同现实全不沾边的事儿。至多，那也就是咱们这些白人喜欢钻的牛角尖。

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规律，要是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敢说出来，因为同当前的气氛不合，那么几年以后，那些事儿就会变成最为重要的议题。

于是那些事儿我只字不提，只是说 1949 年我离开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只有二十五万白人加一百五十万黑人。现在，有些专家说，这里的人口已达到八百万，而且这八百万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也就意味着再过一代人，这里的人口会达到两千五百万。

“八百万，”高尔边笑，边摇头。百万这个量词对他的想象力来说是个障碍，对我也一样。他心目中的“大城市”穆塔雷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几千。

他止住笑声，语气沉重地说：“我们都是穷人。”

这是句评论，不仅是对那八百万人的评论，八百万要吃饭要穿衣的人，也是对我所说的英国的评论。

他把我说的话翻译给他的朋友听，我知道自己的话中哪些他会特别感兴趣。当我说到失业福利的时候，他立刻就把它翻译给自己的朋友，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系

的消息。类似的还有伦敦的地铁系统、儿童强制就学到十六岁、商店里货物充足，什么都不缺。当我谈到我们的政府体系、政党制度、大选和市政议会的时候，他就没有翻译。

两小时后，我们抵达穆塔雷。这两小时是在身边这几个人的陪伴下度过的，他们知道别人有什么，从旅行者的交谈中，也从报纸和电视节目中，不过他们很少看电视、电影。他们看到飞机从空中飞过，有时候能搭到车，可他们永远不会乘飞机旅行，或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他们被排除在现代生活之外，可在一场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中，在他们被推上前线的十年中，他们却被拉近现代化。一谈起那些，他们的话中还充满专业知识。简而言之，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没什么区别。

向我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语气平和，略带嘲讽，贫穷在他们的故事中就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样。

在穆塔雷的主街，我让他们下了车。看着他们渐渐走远，还回过头向我挥挥手道别，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然后，我停好车，走进一家新开的酒店。

父与子，母与女

我坐在酒店的休息区，真不知道这里够不够格儿叫大

堂，甚至客厅。回想起就在前不久，自己还住过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汉堡的四季酒店。我在酒店的餐厅里用餐，过去几乎每家酒店都有间那样的餐厅，呈长方形，顶很高，沿墙一溜窗子，上面挂着印度花布窗帘。餐桌上铺着白色的锦缎桌布，摆放在上面的餐具厚实沉重，这把它同其他普通酒店立马区别开。在普通酒店里，桌上放的是果酱瓶，里面竖着根汤勺。有钱人心甘情愿为老派作风的魅力而掏腰包，过不了多久，无数毫无风格特点的现代酒店就会被拆掉，代之以昔日建筑的翻版，这点毫无悬念。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还会加快步伐兴建现代酒店，以证明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价值。

邻桌上坐着两个中年白人农场主，我又听到那种独白——本那那总统和他养的鸡、穆加贝的摩托车队。除此之外，两人还谈到那些黑人占地的和农业部长的无能，你一言我一语，言辞激烈。我的另一边坐着一对瑞典人，一男一女，两人为重新培训和安置自由战士的项目而工作，两人这会儿谈到那些计划安置点附近的白人，那些人用尽一切办法阻挠他们的工作。接着，两人压低声音说，新政府的官僚作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带来的阻力丝毫不亚于那些白人。他们决定去哈拉雷，去见一位部长（黑人），不过首先要确保那位部长的助手（白人）能讲点儿道理。“当然，别指望这么短时间内一切就能正常起来，”这两个通情达理的人说。我一直坐在这些人中间，一边是两个白人农场主，另一边是两个瑞典人，看着人们进进出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的是一群，有的

是全家,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那新的一类——国际援助工作者。侍者都是黑人,精神饱满,轻松自信,看上去给人的感觉不错。

没一会儿,进来一对白人青年男女,和那两个瑞典人坐在一起。两人属于那种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那一代人,六十年代的孩子。如果说他们出生的时候还太年轻,没能赶上那个时代的狂欢,至少那个年代在他们身上也留下了印记。他们态度随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任何人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天真,任何一种流行的思想都想见识见识,从和平主义到素食到 UFO,管它有理没理。他们知道,要是说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事情似乎并非向好的一面发展,可那一天最终会到来,至于究竟以何种方式,难以说清。两人都二十好几了,同瑞典人商量,看看自己能不能在重新安置项目中帮上忙。那位年轻女性是位理疗师,那位年轻男子非常想帮别人,不过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两人都是津巴布韦人,而且就住在这一地区。

现在,我要颠倒一下次序,先说说去拜访早年就认识的一对夫妇时的情形。出于某种原因,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都在叫穷,不管他们真正有多少钱,反正钱好像就是不够。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发现了,可在这趟旅途中,这一发现被赋予令人吃惊的新含义。像我一样,我拜访的那对夫妇都上了岁数了。两人都六十多岁,都从公务员的岗位上退休下来,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满腹牢骚。他们家的房子是一层的平房,占地很大,有许多房间,檐廊把房子的四周围了起来。整座宅院占

地有两公顷，里面种满了果树、蔬菜和各种花卉。屋子里，所有的物件都晶晶亮，一副备受珍爱的样子，在英国已很少能见到这一幕了，因为那儿的女人要么要上班，即便不上班也没那么多时间把家务做到这种水准。只有佣人才能给物件这副模样。这对夫妇请了两个佣人，都是男性。“不过，安妮恐怕得下下厨房了。”“对，这是不小的负担。”两个佣人清洁房间，种植蔬菜，照看花卉，摆放碗碟，端茶上菜。吃完饭后，他俩又清理餐桌，洗刷碗碟，煮好咖啡送上来。我三十年前的朋友一直在抱怨，当然，还是那种独白，不过他们也在抱怨贫穷和短缺，唠唠叨叨，对什么都不满，简直就像两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快到午夜，在说了不知多少次“天哪”之后，我终于打破了闷罐子，问他俩，你们觉得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你俩这样的生活水准？一开始，他俩没明白这个残酷的问题，坐在那里眨眨眼，不相信我会这么狡猾。“在英国，要过成你俩这样，就得非常有钱。就算在美国，只有大富翁才能养得起两个佣人。对这个世界上99%的人来说，你俩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沉默，他俩所不能认可的是我居然会如此背叛白人的事业。忠诚，尤其是经过战争加固的忠诚，从来不需要理智和常识这类令人生厌的东西。

我刚到穆塔雷的那天早上见过的年轻男女进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那是这家人的儿子和女儿。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怎么才能相互交谈？困难重重。两个年轻人已经开始为瑞典人工作了，在回家前给父母打过电话，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俩，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交锋。两个老人坐在椅子里，穿着干净整洁、一丝不苟的衣服，女主人的银发刚刚烫成波浪，男主人穿的衣服上每个纽扣都扣得整整齐齐。两人用受伤的眼神看着眼前自己穿着随意，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后代，他们居然会去帮助自己的敌人，那些恐怖分子。两个年轻人特意很晚才回来，这样就可以在审判的气氛中少待会儿。“我俩该早点儿来，不过实在没有时间，”女儿说。她的父亲立刻回应：“当然没时间，他们会把你俩的汁都榨出来。”

“瞧，”儿子开了口，话音里已经有了几分怒气，“这是个瑞典的援助组织，他们没多少钱给我们。”

“当然没钱给你们，”这回接话的是母亲。“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搞多少就搞多少。”这里他们指的是黑人，不过这种指责也可以理解为针对那些瑞典人，那些帮助“恐怖分子”对付白人的人。

“听着，妈妈，”女儿说，“我一直在跟你解释，我俩想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个国家。现在它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想……”

“不是我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国家。”

听到这里，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年轻姑娘微微摇摇头，可她的动作都在父母眼中，父亲说：“对，对，把我俩当傻瓜了。我俩太蠢了，什么都不懂了。”

母亲接着说：“保罗，别跟他俩吵了，要不他俩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很抱歉，妈妈，”女儿说，“不过工作很辛苦，人人都得

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这可不是八点到四点的固定工作，不过我俩有时间就会来看看你们。”

“对，对，我们懂！我们太老了，改不了了，没用了！”

“我可没说过，”女儿说。“你们当然还没太老，没人会太老。”

“可是，”母亲说，“你的未婚夫喜欢你做那些吗?”她窃笑了一下，脸微微一红，这种事儿可不适合放上台面说。

女儿的脸也红了，不过是因为生气。她说：“不也不错吗?至少能及时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未婚夫不喜欢她去见那些恐怖分子，”父亲得意洋洋地说。

“他到南边去了，”年轻姑娘对我说。“他飞了，好吧，那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对吗?”

“我要是能把退休年金一次取出来，我也要飞，”父亲嘟囔着。

“到了南非，你就不可能过得像现在这样了，”儿子说。“罗布给我写了封信，说他现在挣的钱只有过去一半多，佣人是没可能了。”

争论持续下去，两个年轻人越来越烦躁，可还是耐住了性子。现在，是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眼神在说：“没用的，闭嘴吧。”

子女走后，夫妇说：“现在，你们有了自己的津巴布韦，希望你们会喜欢。”

檐 廊

这里代表着最美好的檐廊生活，因为这里在高高的旺巴山上。我在这里待了几天，天天眺望山下的河谷和小山，森林和湖泊。津巴布韦同莫桑比克的边境线就在距此地四英里的地方，有时在远方能看到一小片烟雾升起，听到遥远的爆炸声。抵运又在炸输油管、铁路和公路了。那些跟“恐怖分子”打了好几年仗的农民们听到爆炸声，再根据升起烟雾的确切尺寸和形状，就能判断出某某型号迫击炮弹，某某型号炸药，某某型号榴弹炮弹。说话的时候，他们满腔怀旧，那些年学了那么多专业知识，以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到处都有人在说塞卢斯侦察队的故事。我早知道一到津巴布韦，我作为一个“激进”英国人的确定立场就会后退，变得没那么黑白分明（黑人，好；白人，坏），不过最难受的还是发现自己深陷如此一种氛围中，这里人人都不假思索地把塞卢斯侦察队的每个成员当成大英雄。我遇上的好多人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塞卢斯侦察队的创始者，要不就是自己的叔叔、哥哥、表兄是创始者，就好像在伦敦总有人说是自己设计了核裁军运动的标志一样。

在塞卢斯侦察队的各项业绩中，其中一项就是训练那些不能当全职士兵的人，比如说农场主，其中一个项目是如何在

丛林中生存。他们给参训者一人发一根绳子，一把刀，教他们识别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植物含有水分，然后就把参训者留在丛林里，过上个把星期。对某些类型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美梦成真，谁又不会全力以赴呢？那些原本就在丛林中或丛林周围长大的人不用参加这类入门培训。因为有笼罩在塞卢斯侦察队头上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光环，许多罗得西亚的白人更容易对身边的残酷无情视而不见。

没过几年，在南非，几乎每个书店的书架上都塞满了关于塞卢斯侦察队的书（大多都是请人捉刀代笔的，那种擅长徒手格斗和特种作战的人很少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一本书）。对白人右翼分子来说，塞卢斯侦察队成为杰出的象征，代表着为罗得西亚白人的生存而战的壮举。塞卢斯侦察队的专业知识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在南非军队的残暴和过度武力中得到延续。

这位大名鼎鼎的塞卢斯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全名叫弗雷德里克·科特聂·塞卢斯，是一位名声赫赫、备受尊敬的猎人。在他丛林中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野生动物倒在他的枪口下？数万？数十万？他生于1851年，卒于1917年，他的一生目睹了黑人屈服在白人的统治之下。他有本书，书名叫《非洲东南部的旅行和历险》，下面摘录其中一段：

> 那天晚上，我们在离洛·马冈地的村子不远的卡菲尔小道宿营。黎明前约两小时，我们来到群山脚下，村子就在山上。突然，一头体型庞大的年老雄性大角斑羚从

对面冲过来，几乎和我们撞上，我们立刻开枪，斑羚倒在枪下。我们同洛·马冈地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上年七月出来巡猎的时候有好几件猎物都存在他那里保管，此外我们还想从他手里买些象牙，这时候能猎到这头斑羚，而且距他的村子这么近，真可谓来得正是时候。我们立刻派去两个卡菲尔人，去告诉那个老家伙我们到了，然后就开始给马卸鞍（就在我们脚下的山谷里有条美丽的小溪），切斑羚肉，搭营地。

下午，送信的回来了，同时来的还有洛·马冈地和大约二十个族人。我们就送给他一条后腿和半个心，他则送给我们一大坛啤酒，一篮子坚果，还有一些肉。那天晚上，大家在营地里大快朵颐，我手下的小伙子好长时间都只有肉吃，早就渴望能吃点蔬菜了。他们用肉从马绍纳人那里换来大批玉米、豆角、啤酒和土豆，那些马绍纳人对肉类的渴望也同样高。洛·马冈地把所有我们存在他那儿的犀牛角都带来了，不过没有象牙。不过他说隔天会派人送来一根大象牙，我则给他看了我拿来交易的存货，有棉布衬衫、玻璃珠、花手绢儿，等等。

看来，洛·马冈地这个地名来源自一个叫洛·马冈地的酋长。这其中有点混乱，洛·马冈地地区从莫桑比克北部一

直延伸到马拉维境内，靠近这一地区有个叫马冈地的部族①，以木雕和石雕手艺精湛而闻名，许多收藏家都到他们那里买雕像。精美、神秘、美丽的雕像，不过那时候还没什么白人看到非洲艺术品的价值。那个部族的人都擅长讲故事，另外，那里的女人以床上功夫高超而声名远扬。要是你碰巧听过这种事儿，再去问非洲中部和东部任何一个黑人男子，那些马冈地女人怎么样？他马上就会换上副肃然起敬的神情，知道该赞上几句。可再问他们那些功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毕竟这还是能为人类的性福和福祉做出一些贡献，却没人能答上来。曾有个人说那些女人肚皮上有割痕，对，粗糙的表皮，好，那又有什么作用？够了，就只有那些了。

政　治

从你一抵达津巴布韦起，西方世界渐渐远去，先是伦敦，接着是英国、欧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大、危险、不择手段的南方邻国——南非，那个“南部非洲白人特权的最后堡垒”。

---

① 有人对我说不能用“部族”这个词，正确的称谓是“民族团体”。不过人人都知道“部族”是什么意思，而大多数人却会对“民族团体”这个词感到迷惑不解，至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情况如此。——作者原注

在1982年，没几句话不围着南非转，要么视其为威胁，要么视其为希望。每天到那个堡垒里去的不光是平民，还有那些被解除武装的白人军人。他们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于是他们也"飞"了，在南非组织起游击队，然后再回来对抗黑人政府。实际上，莫桑比克的抵运就是白人统治期间诞生在罗得西亚的一个此类组织。南非人不仅雇佣"罗得人"训练抵运的成员，还派他们直接从事各种颠覆津巴布韦政府的活动，他们挑起事端，虽然英国报纸对这些也有所报道，但仅仅把它们视为孤立事件。可在津巴布韦，大家确信那是南非伸长的胳膊。(想要对英国下个有用的诊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个远离欧洲式思维的国家，看看那里有哪些事儿在英国得不到报道，或者虽有报道却很不充分。)人人都确信(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反穆加贝的恐怖分子受到南非的挑唆，那些恐怖分子大多是约书亚·恩科莫的支持者，当然，恩科莫本人欢不欢迎他们的支持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在布拉瓦约附近，有大片的丛林政府军根本进不去。"人人都知道南非派遣特工去讨论投资和发展的国际会议，在会上散步谣言，说津巴布韦时局多变难料，竭尽其能事诋毁一切取得的成就，夸大任何遇到的挫折。在1982年，新闻记者还遇上一些满肚子怨气，像吃了炸药的年轻人，有黑人，也有白人。这些人信誓旦旦说要反对现政府。我自己就在哈拉雷和穆塔雷遇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听过他们充满火药味的言辞。他们大多数都是退伍士兵，大谈如何让穆加贝下台，这些人全疯了，可他们自己看不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史密斯，几乎人人的话中都能听到史密斯，老史密斯，

说话的时候，他们像是被独自留在黑暗和恐惧中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大人们对这些孩子说，你们会拥有一切，什么也不会失去，史密斯保证人人都会安全。可现在，他们什么都没了，他们失去了白人特权，自己还不肯接受事实。他们那些阴谋诡计也不能叫做叛国，他们不过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叛国呢？听着那些幼稚的话，我不由想起伦敦的一位黑人（解放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在新津巴布韦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正是战事最残酷的时候，人们的情绪也最激烈，他却冷静地说："咱们别指望那种白人会变，他们永远不会变。他们就像孩子，对待他们也只能像对待孩子，或者说病人。"

到津巴布韦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懂得，这些人确实是病了。在那些无与伦比的大山的山坡上，我从一家的檐廊移到另一家的檐廊，早茶、午饭、下午茶、喝酒、吃饭，一次又一次听到那种独白。我提醒自己，通常这些都是冷静、自立、足智多谋、富于幽默感的人。那些独白言语刻毒又自艾自怨，从早上六点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床睡觉的时候。现在不光是本那那总统和他的鸡了，也不光是穆加贝和他的摩托车队了，还有那些新官僚的效率低下和独断专行，还有他们对白人的压榨。对于瑞典人和他们的援助项目，大家投去冷淡、愤怒、仇恨的目光，那种态度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真的曾一连坐几个小时，听着那些针对瑞典人的恶毒言语吗？的确有：我有记录。其实，瑞典人只是新出现的国际捐助者大军中的一支，不过他们来得最早，最慷慨，最显眼，也招来最多的怨

恨，其实任何支持“恐怖分子”或者对新津巴布韦的诞生帮过一把的人都受到相同的对待。曾有个叫科德·康福特农场的示范性居民点，好多年以来在白人农场主的管理下，白人和黑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也招惹了许多议论。现在，它所代表的事业胜利了，各种小道消息却在白人间流传开，有些实在是太愚蠢，太卑鄙，连我都不停提醒自己：不能如此丑化自己在政治上的对手。政治对手同你意见相左，不过他的动机同你自己的一样充满理想色彩，政治对手并不是邪恶、堕落、无能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那些占地的来了……大可以把白人对黑人的所有怨恨用一句话说出来：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土地。

土地、土壤、大地，这些本就是从黑人那里得来的。在整个解放战争，也就是丛林战争期间，穆加贝作出许诺：有朝一日打败了白人，所有的黑人都会拥有自己的土地。穆加贝同志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参加到公共土地使用和安置项目中，可每一个黑人都想像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真正拥有，还能传给下一代。穆加贝的仗打得很苦，而他的部队也不过是众多抵抗武装中的一支，都不知道自己后来会赢。或许，就算身处不确定因素的迷雾中，一支游击队的领袖最好也不要作出鲁莽的许诺，说每一个黑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根本不可能，甚至让所有黑人都以土地为生计也纯属虚无缥缈之辞。土地永远不会够，更加之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再翻番。可当战争结束之时，所有曾因为穆加贝同志的许诺而支持了他的黑人（还有不少并没有支持他的黑人）都等着分到自

己的土地。自此以后就是天堂了。

所谓天堂更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开车再也不用驾照了,也不用上什么学,考什么试了,人人都有资格,人人都有证书,想得到什么工作马上就能遂愿。坐车也不用买票了,水和电就像管道里的空气一样自己就流淌出来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相信这一切,但每一个黑人都相信了某种类似的东西,至少说那些更天真些的黑人对这种幻想信以为真。当天真的幻想破灭,你不得不从一个孩子长大为人的时候,天知道你会有多沮丧,上当受骗感会有多强烈。

津巴布韦诞生之时,它可从三个国家吸取教训。莫桑比克的经济已彻底瘫痪了,部分原因是白人都给赶了出去,白人也带走了所有的专业知识。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受到苏联经验的鼓舞,在国内强制实行土地集体化,而农民则消极对抗政府的政策,结果在那个土地肥沃的国家,商店里食品竟然少得可怜,或者干脆什么也没有。从长远来看,笑到最后的总是农民。在赞比亚,由于管理不善,该国的农业面临巨大灾难,结果大部分粮食都是留下来的少数白人种出来的(到 1992 年,这种状况依旧没有改变)。

穆加贝同志从这些前车之鉴中吸取了教训,解放两年以后,政府开始了一个周密谨慎的计划,从欲出售土地的白人农场主手中购买土地,然后选择适当的农民在购来的土地上定居,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基础设施的运行能够得到保障。对这项政策的宣传来势汹汹,毫无理性可言,好在实际发生的一切和用来描绘的言辞之间有时候并不需要什么必然联系。

多年的宣传点燃了黑人的情绪，让他们感到自己做的一切都有理，他们涌入新农场的土地，根本不想等待适当的定居准备。可他们又被赶了出来，一旦政府认为他们不适合在此定居。谁合适？谁不合适？好了，是这样的，在丛林里打仗时作出的许诺可没提合适不合适这个问题。

“白人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我们要要回来。”

“可以，不过得慢慢来。你想津巴布韦天下大乱吗？就像莫桑比克、赞比亚，还有坦桑尼亚？”

“我们才不管那些国家大事和长期规划。给我们分地，你保证过的。”

“可地根本就不够分。”

“那就把白人从农场上赶走，把他们的地给我们。”

“就算那样还是不够分。”

“你带我们在丛林里打仗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当时也没法作深入分析。现在，我们从各个角度对形势作了评估，考虑了所有的参数和相关指标，很明显……”

“给我们土地！”

新农场都是白人统治期间已经设立的安置点和土著人交易区的扩大，同颁发给技术农民的熟练农业工人证书一样，是白人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政策的延伸。不过在1982年的时候，还不可能承认白人政府做过的任何事，因此这些政策被宣传为是新政府自己想出来的。

在白人家的檐廊里，那种独白中最要紧的部分就是那些

占地的黑人。不坐在檐廊里的时候，我就坐在车里，在司机的带领下经过一片又一片土地，到处都挤满了茅草棚和木板房，每处住宅的周围都长着东倒西歪的玉米和一小块南瓜。水土在流失，地表已出现一些沟壑，树都砍了烧柴了。我的司机都是些什么人？脾气火爆，张口就火药味呛人的白人。

"瞧，瞧！土一点儿都不剩了。"

"求求你，安静点儿行不！"

"好像他们根本就不住在这儿……男人们在城里有工作，单把老婆孩子送到自己占的地上，光靠他们自己种的那点儿东西，根本养不活自个儿。"

"再不小心你就要中风了。"

"部长什么都不干……在那些信徒的集会上就会保证给他们土地……他不敢不这么做。跟我们这些白人农场主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对，对，你们是对的，我们当然不想让水土流失。'可他什么也没做。"

土壤在流失，沟壑在加深，变宽，在种玉米的土地上就已经够糟了。可在旺巴山脉陡峭的山坡上现在也挤满了板房，周围一小片玉米地，养上几只鸡。林区浅薄的土壤根本就不适合种玉米，于是整座山坡上沟壑纵横交错。"瞧，瞧！"那些白人农场主叫嚷着，最近以来他们都变成环境保育分子了，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这一地区的高地山谷里种着咖啡树、弥猴桃、南美软果、情人果，由此行车半小时，你就已下降了两千多英尺，进入热带区：菠萝、香蕉、芒果，任何一种热带水果这里都能见到。两

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把两地联系起来的是无处不在的占地的。在每一处农场附近,从城里来的人悄悄潜行,希望成为真正的农场主,在每一处都遇到抵抗,真是一场新的游击战争。

有时候,结果出人意料。某位自由主义白人农场主(在这里,"自由主义"实在有点儿辞不达意)一解放就把所有人手都招到跟前,对他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都平等了,这里再没有打短工的了。我给每人两公顷地,让他在此建立永久的家庭。那块地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了,上面长出的一切都归你们。"

"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向我说这则故事的白人妇女问我,脸上布满仇恨。"那些人所有的亲戚一下子都搬来了,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那个白痴去找他的永久雇工,对他们说:'这样不行,用不了五年这里的土壤就流失光了,这里会变成沙漠。你们的朋友把树都砍光了,得把他们送走。'请神容易送神难。等他们吃到苦果,就会吸取教训了。"

"后来怎么样?"

"那人去了澳大利亚,在珀斯附近开垦农场。不管怎么说,那些占地的也捞到了,最后那片地给政府收购去了。"

檐廊上的谈话中不仅有那些占地的,当穆加贝在丛林里拼死奋战的时候,还说过其他一些不那么聪明的话,其中之一是:给耕牛做强制消毒浴是个阴险的阴谋,其目的是要毁掉耕牛。不管怎么说,战争期间对耕牛的强制消毒措施也难以维持,可解放后黑人政府立即停止了强制消毒措施,结果各种病菌开始肆虐。现在,就算政府想重新开始推行强制消毒措施

也很困难了。“你不是说过吗……”

同志们在丛林里打仗的时候还说，修建田梗，防止水土流失又是一项针对黑人的阴谋，到1982年时这种宣传的负面效应已经十分明显。在黑人的农场上，农民们破开田埂，犁地开垦，于是沟壑开始形成，浅沟变成深沟，雨水冲刷，带走宝贵的土壤。“过几年再回来看看吧，”一个幸灾乐祸的白人说，“他们那儿什么都剩不下。不过，他们又会怪我们，老一套了。”

对土地的关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长大成人之前，白人就像土地上的盗贼，他们对土地的掠夺绝不仅仅限于把土地据为己有。当政府强制设立田界，派出测绘员给土地绘图，他们满腹牢骚。如今，那一切都被忘记了。那种独白的各种版本可以说单调枯燥，令人厌倦，当它在一个地方响起时，你只希望赶快逃走，换一个地方。可到了另一个地方，它又再次响起，一而再，再而三。不过，当这些人谈起农业技术的时候，可就全然不同了。这些先进的盗贼熟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发明创造，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己动手试验和改良。从苏格兰的植树技术到以色列人上千年来沿袭的从沙漠中夺水的技术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看能不能应用到津巴布韦。在他们的讨论中还有中东和埃及地区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新的水坝建造技术，半沙漠地区的抗旱植物种植技术，以一种生物对付另一种生物的生态灭虫技术，还有以大角斑羚替代牛的养殖技术。

在别人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一家示范性农场，大多数农场可达不到那里的水准。

那对夫妇原本在北罗得西亚开垦农场，当那里变成赞比亚时，他们和其他数百名白人农场主一起离开那个国家。他们先去了德兰士瓦，在那里经营农场，很成功，然而“不知道怎么和那里的老非相处。那里的老非不友好，心地坏，不像我们这里的老非。人人都拉长了脸，在那儿那么长时间我就没有看过一张笑脸。最后我们决定来南罗得西亚试试看吧。”

历史又一次戏弄了他们，又把一个黑人政府加在他们头上。

男主人是个了不起的农场主，整座农场更像中世纪的庄园，也有点儿像昔日的白人农场，与当下那些农场截然不同，农场里有许多工棚和作坊，如加工奶制品的，打铁的，还有加工皮革的。那位农场主身材高大，面貌粗犷，说话缓慢，就像电视节目中的标准德克萨斯人。他生来似乎就比别人多了一只向前看的眼睛，战争期间，农业机械和配件都供应困难，于是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待售农场，买下那里的机械，再在自己的农场里把它们重新装配起来。他的农场简直就是一所农业机械博物馆，我居然认出了几架二三十年代的耕种和播种机械，所有的机械足足占了两公顷的地方，而且所有的机械都状态良好，拉出去就能用。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农场上的几个工人，那些工人照看机械简直像照看自己的耕牛。这个笑话原本是农场主说给那几个工人听的，那几个工人后来又转述给我们。说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接着又加上一句：“跟牛一样有用。”一面说，他们一面向我们展示那些车辆、播种机、收割机。那个农场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粮仓里堆满了

储备粮，还有果酱、蜂蜜、奶酪、泡菜，大大小小的瓶子里装满了葡萄干。晚餐简直是盛宴，早餐又是一次，而桌上的一切居然没有一样是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女主人像她的丈夫一样了不起。那一次她丈夫出门打仗，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全靠她一个人支撑着整个农场。男人上前线时，女人就在家里执掌管理大权，通常男人们回来的时候，那些女人们相互交换下眼色，就退回到自己过去的位置上。可这个女人有点儿不甘心，仗打完了，和平重新到来，她丈夫又是个老派农场主，为点儿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也会抬手揍人，于是她开始经营一家培训家政服务人员的机构，现在已经发展成一家学校。所有学员都是女性，没有男性，可最后那些女学员能不能找到雇主，她说了也不算。她说："来看看我们的小公主，我厨房里有个小公主正干活呢。"要在过去，说这话她肯定有点儿不开心，可现在她丝毫没有那种情绪，她正在努力适应新津巴布韦。厨房里，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正学着做精美的糕点和布丁。"每天都有人从村里来找我，求我教她们，要是我不答应，她们就哭，天天来，直到我让步为止。教教我吧，求您了，瞧，现在厨房里已经有五个姑娘了，谁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到。我丈夫说我傻，我的回答是，我在为津巴布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瞧，现如今这些姑娘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她们清楚在我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培训，这样以后就能在城里的宾馆，或者哪家使馆找份活儿干。她们都想到宾馆里干，我什么都教给她们了，怎么做菜做饭，怎么端茶上菜，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打理檐廊前的花草植物。还教她们怎么听电话，怎么记留言。"我上床

之前,他们提醒我,早餐前要是我想出去溜达会儿,可得小心。因为战争刚刚结束,这附近还有各式各样的流氓恶棍。要是听到卡车声,立马躲到丛林里去,要是这里的兵还好说,要是那些朝鲜人就……

北朝鲜主动提出派遣军人到津巴布韦,为穆加贝训练一支部队,专门负责他的安全,也向国民展示军威。穆加贝同志接受了朝鲜人的好意,这些朝鲜军人恃强凌弱,恶迹斑斑,杀人越货的事儿干了也不是一桩两桩了。最近在农场附近两个旅游者被杀的案件就是他们干的好事儿。人人都怕他们,在1982年,黑人和白人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对那支北朝鲜军队,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的憎恨。主人说:“那帮家伙一看见人就开枪。”他还说厨房里那五个姑娘回村时要穿过幽暗的丛林,每次回去都得结伴而行,农场上还要派个男人护送。清晨六点左右,我到外面散步,走过种满咖啡树的农田,由于缺雨,树上积满了尘土,枝叶都耷拉着。我在听鸟叫,甚至还希望能看到一两只动物。这里还算有点儿鸟,不过也不多了,没有发现动物的踪迹。突然,前方出现一辆卡车,车上装满身穿制服的军人,一溜烟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是当地部队,不是朝鲜人。我站在路边的尘土中,随时准备跑。看上去,车上那些军人不太友好,不过又有什么必要对我友好呢?

回到伦敦后不久我收到消息,那对夫妇决定不再生活在黑人政府的统治下,因为官僚作风、能力低下、占地者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他们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他们又回到了德兰士瓦,也不管那里的黑人是不是心

存怨恨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因为资金带不出津巴布韦。农场怎么样了呢?那到处是工棚、机械和牲口的农场,还有那栋有好多房间的大屋,还有那些一门心思想做厨师、女仆、女招待的黑人姑娘们,她们的结局如何?

吃晚饭的时候桌上有十五个人,有这家人的朋友,还有来此造访的人,一派富足安宁的景象。饭桌上,所有的谈话都不离一个主题:战争。再一次,我留意到那种渴望和遗憾交织的腔调,听起来略带苦涩。他们回忆起那时候大家躺在丛林里,头上顶着星空,人人都尽力不闭眼睡着,夜空实在太壮丽了。大家听着丛林的寂静之声,里面到处是危险,或许那也是大家不敢睡着的部分原因。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父亲谈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时,指的也是跟战友们在前线的时候,不过他们可是趴在战壕里,眼前这帮人比父亲更多千万个理由。渴望、遗憾、怀旧——为什么?对这个现象我思考的越多,就越觉得人类的两种最强烈的情感——渴望和遗憾——另有原因。有一种伙伴我们没几人有缘结识,可大家偏又都梦想结识。战争中,那个伙伴终于走近我们,可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死亡。战争结束了,隔夜间,周围的一切都在向这些人说:你们不再年轻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的到来是一种缓慢的磨损,可这些人不同。战争中,他们的价值全在于身上所具有的年轻人的素质,他们也以此评价自己。那些素质包括体力、坚忍和英勇。好多年里,他们都处在文明的初级状态,人与人相互猎捕,自相残杀。难怪战争的记忆就如一剂猛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黑人遍布津巴布韦各地,有的打了六

年，有的七年，甚至八年。在丛林里，在山岗上，他们中有的人从十到十一岁起就卷入了那场战争，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活了下来，其惨烈程度超过任何报纸的报道。他们缺枪少弹，缺医少药，有的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就上了战场。多年里，他们待在丛林里，靠丛林活命，就算丛林不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至少也是父辈的遗产。身边都是与自己平等的人，都是朋友，白人和白人的冷酷行径是大家的共同焦点，所有人同仇敌忾。他们永远沉醉于最容易令人获得满足感的宣传中，那些宣传比酒精更猛烈，也更危险。如今，他们又重归平民的生活，大多数人干着收入微薄的工作，有的根本就没有工作，居住在罪犯丛生的城郊结合地带。也有的人打仗时落下了残疾，得到“重新安置”，读几本书写几个字。或许，在津巴布韦，在 1982 年，最能相互理解的人就是那些黑人和白人退伍老兵，然而他们彼此仇视，相互诅咒。

动 物

“拿枪小子”其实是个五十上下的人，他每晚都出来猎捕狒狒和野猪。沿着大山的坡面行驶，穿过丛林，在这一带更像雨林。突然，一群狒狒正带着幼崽穿过没有遮蔽的公路，那可是危险丛生之地。

"啊!"欧洲来的游客小声惊呼。

"祸害!"那个农夫咬牙切齿地说。

又出现了一群野猪,小野猪紧跟母野猪的身后。"看,看野猪!"

"祸害,垃圾,"农夫压低声音说。

狒狒常来袭扰咖啡地,一夜就能毁掉一大片,居然还知道了吃咖啡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它们经常吃到飘飘然。野猪把地里的蔬菜拱出来,还追家养的狗,追上就把它杀死。

对山区的每一个农夫来说,猎人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狒狒、野猪和人不可能和平共处。

在莫桑比克的森林中再也没有任何野生动物了,打仗的时候都被赶尽杀绝了。

在这里,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左右就起来,好赶上看日出。每当我在檐廊里坐好,总能看到约一百码外的山脚下,一只猴子坐在一棵大树顶上,跟我一样看着日出的方向,让清晨的阳光烤暖寒夜冻僵的身子。通常,它在树顶上待半小时左右,这位哲人的家人或朋友看来更喜欢嬉戏,在低一点的树枝上翻着筋斗,相互追逐,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宾 馆

去旺巴山的路上有两家宾馆，占地广阔，风格独特，有檐廊、草坪，还有小鸟。阳光灿烂的时候，坐在草坪上，喝着茶和啤酒，俯瞰群山森林，还有在林木间倏忽飞起的小鸟。这一地区的护林员同宾馆也有关系，他伤心透了，六位旅客在附近遭遇绑架，别的游客都不敢来了。大家四下坐着，喝这喝那，玩着“假如我是”的游戏。这会儿，大家扮演的角色是旅游部长。我们会大做广告，向观鸟者推销一整套旅游项目，包括下榻在旧式酒店中，肯定魅力十足。

新阶层

在其中一家宾馆，我和朋友坐在酒吧的一角。酒吧里有四个很年轻的黑人，穿着很光鲜，两个姑娘穿着晚礼服，后背全裸露出来，肩部就用几根布带子扎在一起，两个男青年身着礼服。他们谈笑风生，言谈举止颇具风范，有点像电影明星。我的朋友是一位老一代白人，看到眼前的景象，他和我的感受却颇不一样。那两个姑娘就是三十五年前的我，我了解她们的感受，因为我自已也曾像她们一样。正二十上下，和当年的

我一样，穿着舞会礼服，其精巧复杂从无止境。我的同伴说：“他们是穆塔雷的公务员，到这儿来过一个晚上。祝他们好运。”他其实想说，要是他们想得到的就是这些，只能说明他们的愚蠢。

人类学

这种衣服当然不能穿到檐廊上去，外面太冷了。可在屋子里面，靠着大火炉，周围坐着十来个人，有的还是从哈拉雷远道而来的游客。大家在谈新闻：去维多利亚瀑布的路上被劫持的六名旅客中已有三名被释放，劫持者说到某个时间就会处死剩下的三名旅客。有几个人说那只是恐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丧生，也不会有人丧生。这时一个布拉瓦约来的人说：“马塔贝勒人说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做到，那是他们的文化。”他说打仗的时候他跟马塔贝勒人在一起待过几个月，同吃同睡，等他从丛林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两天他连英语都不会说了。寒冬夜里，他们每人就盖一条薄毯子，他夹在两个马塔贝勒人当中，像三明治一样。对那些马塔贝勒人，除了钦佩他再无话说。后来，传来消息，剩下那几个旅客真被处死了，他说：“我说什么来着？”在座的这群人中颇有几个喜欢马塔贝勒人，同时也喜欢祖鲁人，程度甚至更超过前者（马塔贝

勒人其实就是祖鲁人的一个分支)。在座有一位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他如此逗旁边的一个南非来的姑娘:“为什么喜欢祖鲁人?因为他们天性好战,生来就是当兵的料,可以说是非洲的普鲁士人。只要告诉我你喜欢马塔贝勒人还是马绍纳人,我就能说出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马绍纳人聪明、随和,富于创造力和艺术感,就像意大利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战后定居于此地的意大利人和当地人关系那么融洽,他们都很会生活。不过,南非的白人钦佩祖鲁人,而在津巴布韦某些白人钦佩马塔贝勒人。可以说是同声相应吧。”

他们谈来谈去,话题总不离开新上台的黑人领导人。他们又怎么可能不谈呢?不过,前几天我听到的那种刻毒愤怒的语气已有所改变,穆加贝也有这项那项优点,恩科莫其实也不差。这完全不同于肯尼亚白人上演的惊天大逆转:一个星期前,约莫·肯亚塔还是恶魔,一个星期后他就成了位年长的伟人。在此面前,世界也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了。

也有位领导全无可取之处:埃德加·泰克雷,那家伙醉酒后闯进一家白人农场主的屋子,杀害了主人。泰克雷是个疯子,那家伙没救了,穆加贝应该把他搞掉。泰克雷是从这一带出去的,在当地人眼中还是个英雄。马里卡兰人民真太背运了。

他们谈来谈去……还谈到距此几英里外驻扎的一支部队。不,不,不是那些朝鲜人,不是第五纵队。不过,与着装整洁、彬彬有礼的欧洲军人相比,这里的军人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在欧洲,军人如果没有任务就消失于公众视线之外,可这

里的军人举止恶劣，看见什么没人看护就偷走，看见女人没人陪护就吓唬，不该喝酒的时候也喝酒，一喝就喝到烂醉，真没救了。

他们为什么在这儿?

当葡属东非和南罗得西亚划定边界的时候，两位官员就坐下来喝几杯酒，然后把事情解决，方法是：掷骰子……真的还是假的? 在南部非洲各地的边界上，类似的故事传来传去，你也不得不怀疑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了。说故事的白人说得津津有味，都是性格温驯的白人，却崇拜自己的强盗先祖。我也听过黑人传这些故事，说得同样津津有味，言下之意是：瞧，还能指望什么！

索尔兹伯里勋爵说："我们划分山川、河流、湖泊，却不知道它们在哪儿。"

按理，他不会赞同那两个官员的冒失做法，怎么能一起喝喝酒，掷掷骰子，就定下一段足足有四英里长的边界线呢?

它带来的麻烦在于某个非洲部落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在莫桑比克，而另一部分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时局糟糕，又遇上了饥荒，那边的非洲人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去热爱、尊敬那段边界，他们就到津巴布韦这边来，到日子好过些的津巴布韦亲戚家里找点吃的。这触犯了新津巴布韦的法律，穆加贝同志的士兵要执行国家的法律，当地人都把他们叫同志。这个营是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白人憎恨他们，因为不管他们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有混乱。黑人也憎恨他们，因为他们总搞"突然袭击"，挨家挨户搜查，看谁家里窝藏了边界那边过来的

“邻居”。

白人说：“看他们那样，倒好像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似的。”

“你觉得他们刚刚打赢了战争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不吃这套！家里的女人们今早又发牢骚了，我给那帮家伙的头儿送了信，可他又能做什么？那帮家伙根本没有军纪可言。”

不过，那营士兵也有它的用处。

“最近有些动静，”坐在檐廊上的人说，“结束的时候会告诉你。”

我们站在山坡上，俯瞰着脚下那些占地的搭建的窝棚。那些窝棚设施简陋，只能算临时遮风避雨之所，根本不适合长期居住。传统村庄里，房屋都聚拢在一起，可这些窝棚东一间，西一簇，分散在林间空地上。它们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树林就消失了，土壤也正在从坡地上流失。

以下的事儿正在进行……那营士兵接到政府的命令，把一部分占地的从农场上清除出去。负责的是个苏格兰来的年轻人，他讨厌自己这项差事。他说，自己已经整整两夜没合眼了。行动结束后，他上这儿来喝上一杯。士兵已经坐上卡车走了，把窝棚里的一切都搬走了，然后一把火烧了那些窝棚。七十多个妇女就站在那里，看着自家的窝棚燃烧。一个据称重要的发现是找到了两台缝纫机，二十袋玉米，还有一套藏起来的家具。据称，这些东西都是留给抵运恐怖分子的，这里的人确信他们最终一定会赢得胜利。我问他：“这些人总不会支持南非吧？这不就等于支持南非吗？”“瞧，他们都是农民，和

所有村里的人一样，可怜的家伙。打仗的时候，他们得夹起尾巴，谋条活路。人总得吃饭，可在萨莫拉·马歇尔的领导下没饭吃。他们觉得要是换别人领导，或许能吃得好点儿。一切就是如此。”

我听说，卡车把那些占地的运到穆塔雷，然后重新安置，可最后的结果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分到土地。“她们大多数人要么在穆塔雷都有工作，要么丈夫或者兄弟在那儿工作，都是已经有家的人了。”

“她们要回了自己的缝纫机了吗？”

“充公了。”

“那些玉米呢？”

没人感到自在，行动对白人来说是个胜利，让他们相信，黑人政府至少有时候也会执行法律。

后来听说那些占地的被押到地方法官那里，法官警告她们，永远别再犯。听到这个消息，大伙儿又火冒三丈，居然一分钱都没罚她们，也没有搞保释。只是警告：别再犯。

“她们当然会再犯，就这会儿她们就已经在丛林里的路上向这儿来了。农业部长不停地向我们保证，当然，当然，不能允许那些占地的侵蚀你们的农场，可一扭头又去见那些家伙，对他们说，就该去抢白人，向他们许诺，给他们土地。他明明知道根本没那么多地，可就是不告诉他们，还把那些家伙挑动起来，又叫又跳。改天，他又来跟我们说，什么都别担心，安心种好庄稼，津巴布韦离不开你们。”

这些天我一直驱车奔波在面向印度洋的方向，从哈拉雷

到穆塔雷，然后再马不停蹄地折返回来，从穆塔雷到哈拉雷。到加油站加油得讨价还价，没有许可证是加不到油的，除非你能参与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易货贸易中，向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给他们点小恩小惠，送点儿农产品，换上一桶汽油。抵运又切断了输油管，有时公路上一连好几英里空空荡荡，一辆车都没有。有时候忍不住觉得这会儿可真好，通常当我独自开车穿过一片荒野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悄悄爬上心头。今天身边倒是有个伴儿。如此这般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岂止得到默许，简直就是得到许可。不过，这样的光景可不会长，有一天就用好一天吧！那天我行驶在东津巴布韦，风景从窗外掠过，头上是寒冷高远的蓝天，我一再提醒自己，所有人仍把此地视为战区，每一棵树，每一个山头，每一处拐弯还会令人想起杀戮和死亡。可提醒也没用。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丽的国家吗？它融壮丽与变化于一身，它色彩明艳，轻轻在你耳边低语，向你讲述我们这个种族的故事（他们说，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此）。而你，某一历史时刻的产物，这时仿佛也真成了人类所有成就的继承者。这里的危险和壮丽使你想起——生存。既然我们已经生存了这么久，我们当然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就要到哈拉雷了，公路上也不再空旷，我身边的路伴一会儿指指这辆小车，一会儿指指那辆卡车，或是公共汽车，以表明当下的生活水准。解放以来，数以千计的既没牌照，也不可能上到牌照的车辆涌上公路。“这个政府才不会为这点小事去操心，它怕自己的老百姓，从来不会起诉自己的老百姓。可要是咱们犯了点儿事儿，

那可就……警察可有的是闲工夫。”不过，虽然许多黑人司机开车横冲直撞，那些开大客车和公交车的正常黑人司机都是奉公守法的。“我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随时随地。”当然，这会儿我也从丛林、远山、蓝天那里收回了自己的注意力，把一切纷纭繁杂的想法抛在脑后。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多破烂汽车聚在一起，真是有趣的一幕。简直就是用铁丝绑在一起的罐头盒，这些锈迹斑斑的古董使人想起“人人”都有辆车的年代。简而言之，眼前这些车和昔日家境贫穷的白人农场主开的车没什么两样，每辆车都在喷出黑烟，上坡的时候老远就看见树冠上漂浮着油腻的烟雾，污染着冬日的蓝天，过好久才看到车子气喘吁吁地爬上坡。

展销节

哈拉雷展销节开幕了。昔日，索尔兹伯里展销节上展销的一半是农产品，一半是工业产品，期间还有赛马、各类歌舞、盛装游行、时装表演，更不用说展销节舞会了。展销节场地占地有好几公顷，来参加展销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远至南非和北罗得西亚。可今年，人们的期待之上投下忧虑的阴影：上一年，也就是 1981 年，解放后的第一个展销节，一群喝得醉醺醺，手里拿着武器的自由战士扫荡了展销节，他们一边唱着革

命歌曲，一边掀翻展台，还威胁要揍人。战争结束才刚刚一年，大家都知道，到处都是这样的家伙，其中还有不少女性。他们都曾为解放而战，其中许多人，就算不是所有人，还在为没能把所有白人立马赶出津巴布韦而忿忿不平。“咱们打仗可不是为这个，”看到展台后那么多张白人面孔，他们大吵大嚷。而且，被他们威胁和羞辱的也不光是白人，他们就是需要动武，需要伤害别人……要是今年这一幕又重演，该怎么办？本来，弟弟已经决定不去展销会上卖他的羽毛画、骨质纽扣和钥匙环，可后来又说，他可不会被那帮“恐怖分子”吓住。

我刚刚经过的地方，几头获奖奶牛正被牵到评委面前，它们的额头上装饰着大朵的蔷薇，这是季军，这是亚军，啊，这是冠军，看上去就像头上带着花冠，参加传统舞蹈的姑娘。

轻工业品展区聚了一群人，一群白人，他们的肩膀紧张地弓着，戒备着周围的一切。过去，展会上人山人海，其实所谓“过去”也不过是三四年前，可一道无形的线已经把它同当下隔开，恍若隔世。那时候，展会上挤得都找不到地方落脚。艺术工艺品展区在一大片圆形空地上，弟弟就在那里等着顾客光临。

“一个顾客也没有，”哈里说。他的语气还算平和，可还是能听出怒气。“还真不如不来。”展台后的人们卖各种各样的小珠子、带子、花卉、服装，都是些普通玩意儿，任何一个白人集市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展台前稀稀落落的顾客大多数也都是白人。

我在弟弟的展台外面找了张折叠凳坐下，日头正在头顶上。人们一拨接一拨从展台前经过，步伐缓慢，时不时这瞅瞅，那看看，像水箱里游动的鱼。这个展台前驻足一会儿，下一个展台前又闻上一闻，在这个庞大的黄土圈子里走来走去。那些面孔……许多张面孔上都写着迷梦，带着梦中的扭曲，那正是我熟悉的面孔。我曾和这些人一起上学，一起在索尔兹伯里的俱乐部跳舞，坐在他们的车里，和他们一起飞驰，知道有人觉得汽车是种带来危险的东西。我熟悉他们，却不了解他们。自己老是梦到旧日的罗得西亚，或许在梦中也常见到他们，都带着面具。

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走了过来，她穿着赴午茶会的套装，帽子上别着花，手上戴着手套，在我面前停了一下，接着小心翼翼地向哈里走去。

“是你吗，哈里？我想是。好久没见了。我去过南非了，去转了转，不过现在拿定了主意，要在这里撑下去。还是喜欢咱们这里的老非，跟那边的相比，他们都是好人。跟咱们这里的老非在一起，大家还能开心乐上一乐。”

他没说他也要飞了，只是说展销会已今非昔比了。“我来完全是为了露点儿胆色。”

一阵停顿。她使劲儿瞅了瞅我，然后靠近弟弟，压低了嗓音，说：“哈里，那儿凳子上的女士是谁？”

“我姐姐，”哈里也压低了自己的嗓音。

“你说她是……”

两张脸一起扭了过来，看着我。

“不是说……”

“是，不过现在的政府，她跟他们站在一边，现在不受限制了。”

她脸上露出一种难受的神情，仿佛在说，真让人受不了。要是一个家庭主妇看到孩子把芥末瓶打翻在刚擦干净的地板上，另一头炉子上的水壶又响了起来，她脸上肯定就是这种神情。她神经质地干笑了两声，哈里悄声对她说：“她还有那些怪念头，你懂。”

走的时候，她庄重地向我微微点了下头，帽子上的花也微微一颤。我则扬了下手，等于在说，嗨。

哈里走过来，对我说：“那是乔安妮。”

“是吗，好啊，见到老熟人了。”

终于有顾客上门了，一个黑人妇女，带着三个女儿。她要买些纽扣，配她织的羊毛衫，然后通过邮购销售。我溜达到非洲农产品展区去，那里人才真叫多，不过虽然大家兴头很高，还是很谨慎。跟白人一样，他们也担心什么时候又闯进一帮醉酒闹事的士兵。那些蔬菜和农作物让他们着迷，这里很少有哪个黑人真正脱离了村庄、土地和丛林。这让我想起芬兰，据说那里没有谁不跟农村沾亲带故，父母、兄弟、嫁给农民的姐妹。这些聚在一起的人对自己正在细看的作物了如指掌：各种玉米、小米，高粱，这些我还能认出来，可还有好多就叫不上名字了。各种出自丛林的叶子和根茎，这些可都是熬香甜味美的粥的好材料。光豆荚就有十好几种，土豆、甜土豆、南瓜，还有各种各样的葫芦。这些植物当地人既会认，也会种，

也一直在种。话又说回来，在津巴布韦这个天堂般的国度里，有什么种不出来？东部有南美软果，李子、桃子、苹果，布尔玛峡谷出热带水果，马佐峡谷出橘子、柠檬、葡萄，还有梨子、芒果、荔枝……在这片日照充裕、星光璀璨的土地上，还有什么种不出来？

人群脚步缓慢，一路观看着那些篮子里、坛子里，还有摆在布上的东西。鼓声加快了大家的步伐，大家的节奏渐趋一致，有些女人已经聚成一圈，翩翩起舞。男人们则站在一旁，拍手击节。这里已经很挤了，多一只脚也进不来了，可人们还是不断涌进来，这儿找个位子，那儿挤出个缺口，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旁边站了几群白人，其中一群是国际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随和友善，在哪儿都不会感到不自在。今年他们在这里，下一年可能就去了埃塞俄比亚、雅加达、白沙瓦。另一堆人是南非士兵，这些人身上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就像你看见一个越战老兵，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就在上一年，我还认识了个南非士兵，那家伙在纳米比亚干了两年，他的容貌全给毁了。眼前这些南非年轻白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的，他们看着周围的津巴布韦人，看着这些在自己的国家里自己受命以暴力阻止的活动。没人直视他们，只是以余光瞄上他们几眼，包括我在内。非洲人从他们身前经过时都不由自主压低了嗓门，同他们拉开距离。

总得说来，这里的黑人对白人视而不见，他们不想看见我们，或许，也真没看见我们。

那群南非士兵站在原地没动，看着那些跳舞的人。那并不是表演给游客看的舞蹈。他们看上去有些兴奋，却与酒精无干。

我向别处走去，却被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性拦了下来，她穿着大红色的套装，黑色的高跟鞋足有一码高，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能接受我的采访吗，我是报社记者。”在记者工作亭里，我们面对面坐下，先随便扯上两句。接着，她问我：“你对津巴布韦有什么看法？”我俩聊得挺投机，于是我冒冒失失地说：“到目前为止，她让我伤心。”

她脸上的职业笑容立刻消失了，对我说：“对，我同意，能给点儿正面评价吗？”

“万岁，津巴布韦，”我说。完全没有理由地，泪水涌入我的眼眶，她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俩都意识到，搞不好大家都会哭出声来。

“还得花点时间，”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还四周瞟了一圈，看有没有人在偷听。

“还得花点时间，不过津巴布韦已经走上了正途。”

“你的话我爱听。”

酒吧里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站在一家郊区宾馆的酒吧里，酒吧里挤满了人。一个黑人对看门的人说，现在谁要是再拦住黑人，不让他进“白人”酒吧或俱乐部，那他就犯了法。那家伙在白人酒客中冒来冒去，傻乎乎地笑，可能有点儿喝多了，也可能当时的气氛有点儿上了他的头。白人们也喝多了，看到他也没立马给他让个位子，一个还说：“这是谁啊？小心杯子。”“吧……吧……”那个大胆的家伙满脸笑容，踮着脚，点着头，转了个身，看看自己是不是真在这儿，这个白人的地盘。“想来一杯吗？”另一个白人问他，然后对吧台里的服务员说：“给这伙计来一杯，想喝点儿什么？”“啤酒，吧……”“不，来杯威士忌，继续，当好笨蛋。”“好，吧，威士忌，吧……”

第二天早上，等他清醒过来，他会气得发疯，会喊：“我要宰了他，宰了他。”肯定会如此，还会用拳头砸墙，眼里含着泪水。

我们一帮人走到一张桌子边坐下，津巴布韦的夜晚跟南罗得西亚时代的夜晚没什么两样。我坐在桌边，女人们坐在桌边，男人们越喝越多，越来越醉。酒精下肚后，也有那么一会儿能让人机智、幽默、富于创造力，可这些男人早已过了那一短暂的阶段，接下来就只会越喝越蠢。当我还是个年轻女人的时候，好几百个晚上，我就像现在这样坐在桌边，毫不夸张地说，无聊到手脚麻木，发誓要离开这个

国家。“无论如何要离开这里，要不我就毁了……”无聊，让人空虚的无聊……

餐 厅

詹姆逊酒店早在解放前几年就已经实现多种族和平共处了，这里的气氛总是很融洽。餐厅里，一个男人正在劝自己的老婆叫点儿没尝过的菜。“你总不能光吃玉米粥吧！”他说，语气像个小学校长。那是个胖女人，用手指了指菜单，忍不住笑出声来，干净的双手掩住口，椅子里的身躯上下颤动。侍应站在一边，面带微笑，其他侍应也停下手中的活儿，朝这边看，连餐厅经理都跑来了。那一刻，所有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卷入到交往中。

她浅浅尝了点儿加了奶酪的菜，眉头皱了起来，摇摇头，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连系在脖子后面的餐巾领结都扬起了一角。看出来了，她原则上只中意玉米粥。一位侍应相当老成地耸了下肩，端走那盘东西，又在她面前放下另一个盘子。她用手指拨了拨盘子里的菜，眼睛骨碌碌地转。“别，别，用叉子，”她丈夫说，语气中带着适度的严厉。她妥协了，拿起一只调羹，舀起一点点，管它是什么东西，送到嘴边，却又做出吃惊的神态，嘴绷得紧紧的，还直摇头，然后身子朝后靠在椅背上，

发出一串笑声，用餐巾把整张脸都使劲地抹了一下。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那个侍应又放下一盘布丁，然后手在空中一挥，做出个“请”的姿势，吸引了餐厅里所有人的目光。她双眼睁得浑圆，仿佛义无反顾地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探进勺子，舀起一勺东西，缓缓递向嘴边，递一点儿停一下，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哀鸣。勺子进了嘴，嘴唇也合上了，她把头微微后仰，一种大喜过望的神色在全身弥散开。勺子出了口，片刻间就扫光了盘子中的东西。旁边的侍应已笑得站不稳脚。“亲爱的，”她丈夫说，“你真是个蠢女人。”

“对，没错，我是很蠢，不过我还想来点儿这个。这是什么来着？我喜欢。”

在一位诗人家

诗人的家在哈拉雷，他娶了位白人太太，法国人。她在大学里工作，工作时间很长；他没有工作。这会儿，她正在忙八个人的饭菜，还有更多的人要来。我问诗人，要不要去帮帮她，诗人回答：“不，那是她的活儿，她必须做。”

一位肯尼亚的流亡作家也到了津巴布韦，他身上那股躁动不安、富于挑衅性的气质正适合他当下的处境。一谈到肯

尼亚的种种不正常和不公正，他的神情总逗人乐。

就在这会儿，一位前自由战士也到了。他三十左右，传说不久将接任文化部长。这家伙也挺会逗乐，跟主人开玩笑说，要是津巴布韦也变得跟肯尼亚一样，那么他接任部长不久就会下令逮捕他。诗人正在给一家新闻期刊干活，煽动性思想已经在那份期刊上显露出痕迹。

他说："我们可不会容忍煽风点火的言论，对那些言论要小心，要不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

就在不久前，两位白人记者遭到逮捕，没有理由。他们为《先驱报》工作。记者遇到麻烦，这也不是头一遭了。整个晚上，大家隔一会儿就拿那两位记者开涮，笑谈他俩的言论能点起多大的火。

饭菜端了上来，女主人还要招待大家，为客人们服务。她看上去很疲惫，还憋了一肚子气，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想说上两句，诗人回答："非洲的风俗就是如此。"

"我可觉得这风俗不怎么样，"我说。

"煽风点火，"他说，大家都笑成一团。

这可不是什么健康的笑声。

我又想到，这么多人处于休克中，一种战后休克症。过了没多久，在白沙瓦，在穆斯林战士和难民中，我再次见到相同的休克症。还在什么地方见过？对了，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柏林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等车，突然间发现身边全是男人，在战争中落下残疾的男人。所有人都醉醺醺，那种一言不发，病态的醉。他们有满腔怒火，却发不出来，好像

结了一层冷火山灰，挡住火山的喷口。朋友和我边说边笑，接着就听见自己的笑声回荡在冬日的站台上。你怎么能自在起来？我们看看身边那些一肚子怒火的男人，其中一个用英语对我们说："笑吧，要没什么好做的就笑吧，有你们吃苦头的日子。"

很晚的时候又来了两位自由战士一游击战士一丛林小子一恐怖分子一英雄。他俩跟在座的一位客人有点亲戚关系，现在住在哈拉雷市外的安置营。他俩穿着崭新的平民服装，适合办公室工作的那种，两人正在为此接受训练。来的时候两人就喝醉了，不久大家都醉了，不开心地醉了。

车　祸

我们又上了哈拉雷到穆塔雷的公路，这次车里塞满了乘客和箱子。在路边一个熟食品摊停了一会儿后，车里就更挤了，又塞进火腿、熏肉、香肠、咸肉。在伦敦，要想买到如此品质的食品，得上专卖店才行。司机是个咖啡农，一路无事，知道在我们车的前方，一辆巴士，也可能是辆大客车，出现在空旷的公路上。那辆车上挤满了年轻黑人，真担心有人会从车窗被挤出来。那车上都是下班的警察，赶着去看足球赛。在津巴布韦，任何一个司机都知道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前方有

右转路口就不能超车，因为司机常常忘记观察倒后镜，也不打信号。不过，要每时每刻都记住这条规矩着实也不容易。我们的车迅速赶上前面的车，前方是个右转路口，再远点儿是个涵洞口。我们加速，超车，突然，前面的司机没给任何信号就转入右转路口。我们的车想绕过去，可那个涵洞口正挡在路上。巴士司机肯定看见了我们的车，照理该猛打方向盘，把车转个U形，在我们后面停下，可他直挺挺就冲了上来，重重地撞上了我们车的屁股。我们的车向右侧翻过去，被巴士向前推出好几码，接着又一翻，底朝天躺在路上。车里，一切都变成慢动作，我还记得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座位上滑到车底，仿佛理智还在支配自己的行动，可还是撞了头。车门被砰地推开，碎玻璃撒了一地。我爬出车，想着断了几根骨头，然后大声问："大家没事吧？"

我站在侧翻的车旁，听见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在喊："妈妈，妈妈，你没事吧？"也不知道是两个小姑娘中的哪一个。

不一会儿，大家都坐在车旁的柏油路面上，路上只能看到我们侧翻的车和那辆运警察的巴士，一群群警察四下晃来晃去，受惊吓的程度不亚于我们。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做出各种出于本能的举动。司机站在那里，仿佛在向那辆巴士立正，问到他时说自己还好。他咬紧牙关不吭声的本事可是出了名的，也曾多次从各种事故和危险中幸运脱逃。可实际上，他是车上所人中伤得最重的一个，一边的肩骨撞碎了。两个小姑娘的妈妈一直忙个不停，既要缓解女儿幼小心灵在事故中的创伤，还要照看别人，一会儿敏捷地把旅行

箱提到路边，一会儿又收拾起掉到路上的东西。两个小姑娘哇哇大哭："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当我们初次遭遇到意外，还不知道生活中的灾祸有多少次会由统计数字——也就是说别人头上——转移到自个儿头上时，我们的反应大都如此。至于我自己，我扶着车身站在路上，攥着自己的挎包，脑子在晃，还在暗自庆幸："至少免去了填护照号码、驾驶证号码、支票卡号码之类的麻烦，地址本和电话簿也还都在。"

一辆小车从穆塔雷方向飞速驶来，在我们旁边停下，跳出一位妇女，碰巧她是位医生。她高声感叹道："真幸运，大家都还活着。""你们连安全带都没系！"她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愚蠢。她把大家领到对面路旁，以防哪辆少见的汽车又冲上来，再把哪个撞到。大家顺从地跟着她走到路边，她手脚麻利地给大家检查了一下。这时，那辆欢快的巴士上的三十多个警察也围到我们身边，确定了自己车上没有人受伤后，他们开始关心起我们来。他们倒没喝酒，虽然日后每当我向人提起那次车祸时，人人都说他们肯定喝多了。倒也可以说他们醉了，不过是醉于亢奋的情绪，而非酒精。这会儿，他们同情地问道："没受伤吧？""真他妈的蠢问题！"咖啡农脱口而出。这时，血开始从大家的伤口处流出来。"你还好吗？"他们问我，一边饱含同情地把手放到我的肩上、膀子上、背上，拍拍这儿，拍拍那儿，仿佛要把错位的部件送回原处。我额头上起了个大包，足有火山锥那么高，就像漫画书上画的那种，眼里金星乱窜。一只眼青紫了，不过过两天还会更紫，一只脚痛得不行。至于

肋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感觉。“当然不好,”我气冲冲地回答,准备接下来就跟他们好好干一架。几个人围在两个小姑娘身边,两人大声尖叫:“别碰我,别碰我。”这倒不是因为她俩来自南非,毕竟两人都生活在讲自由的良好家庭,而是因为她俩身上到处都是擦伤。不过那几个年轻人的情感已经受到伤害。至于两个小姑娘的母亲,这会儿几乎站都站不住了,可还在跟他们理论。

那位路过的医生说会把大家带到最近的医院,然后向当地警察局写份报告。听到这里,那些年轻人有些迷茫,当地警察局的警察全在这儿了。最后,大家达成协议,把这场车祸隐瞒起来,忘了什么报告吧。还真巧,这位医生,一位为教会工作的医生,最近为那名被北朝鲜士兵枪杀的旅游者做过尸检。她人善良极了,可看到有人如此愚蠢地对待伤痛,她很生气。我们的司机虽然伤得不轻,可还是坚持留在车祸现场,记下细节,以便向保险公司索赔。去医院的一路已全然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剧痛开始袭上全身。

接下来,在乡村医院发生的一切正浓缩了当时津巴布韦的各种趋向,在那一年,那一时刻。

乡村医院

那天是周六，医院里只有个骨科大夫。那是家乡村医院，很普通的那种，人人都爱去。在英国，那种医院已经被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陪我们来的医生说，她和我们一起等到应召医生来再走，她自己不能给我们治疗。两个态度友好的黑人女护士接待了我们，为我们量体温，止血，还帮我们填表格。

我们脚步踉跄，跌跌撞撞，居然还笑了起来，大伙儿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尤其是我。我还没看见自己的脸，还没看见那个有维苏威火山那么高的包，和那只青紫的眼睛。两个小姑娘这会儿也不尖声哭叫了，身上每寸都继承了她们父亲咬紧牙不吭声的传统。接着，咖啡农也从车祸现场到了医院，看得出他痛得厉害，不过他宁死也不会承认。黑人医生到了，车开得飞快，驶过医院外开花的林荫小道，溅起的石子四处乱飞。他猛踩下刹车，车子优雅地转了个弧线，停了下来。我们身边那位医生叹了口气，说："瞧，大家都疯了吗？"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空气中弥漫着艰难和悬疑。两位黑人护士担心我们会拒绝一位黑人医生为我们做检查；这一下子道出了这间小医院每天都面临的问题。两位护士很懂得策略，看到两个小姑娘被母亲送进了检查室，她俩也长出了一口气。与此同时，陪我们来的白人医生告诉刚赶来的黑人医生，她认为只有那个男伤者伤势比较重，而那个伤者，她压低了嗓音，不容易对付。两位专业人士交换了下眼神，都笑了起来，

眉毛向上一挑。她过来对我们说，她要去打个电话到穆塔雷，安排人来接我们，说完就走了。我们看着她的背影，满怀感激。接下来，我被带去打破伤风针和青霉素，刚好看到一位黑人女护士正努力让那位“难对付”的伤者安静下来。“我好得很，”他一面大声说，一面在屋里走来走去。

我在旁边一间屋，给我检查的是个胖黑人女护士，一位老护士，业务精湛，让人感到安心。我俩立刻就建立起一种女人间的和睦关系，我脱下衣服，她四处摸摸，查看有没有骨折。我们两人扯了起来，话题立马就转入政治。在那个年代，政治是所有人的话题。进来一位年轻女护士，老护士叫她去照看别的伤者，年轻护士一出门，她就把门紧紧关上，等了一会，又开门看看，然后再把门关上，压低声音说:“在那些年轻人面前聊天太危险了，她们会向党汇报。”然后，她开始一通快速的独白，我一下就听了出来，那是她这一代人大都会发的牢骚。她熟练地给我扎好绷带，打了针，一边说，穆加贝不是好东西，他想把所有人都变成共产主义者。她自己信教，穆左雷瓦主教是好人，恩科莫也是，他们不会吓走白人。她说，“咱们”(意思是说我们两人)还能记得过去的好日子，那时候可真美，现在什么都糟糕透了，战争可真可怕。白人喜欢打仗，那是他们的战争，打仗时黑人可吃苦了。可白人不管这套，同志们也不管。

我说，为什么人们期望改变如此迅速地出现，类似的话好像我一天要说上好几回。我们俩，她和我，在我们的岁数上，都清楚改变不会来得那么快……至少，我没提罗马人。上这里来，要说有什么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好像没人记得战争两

年前才刚刚结束。他们会说战争有多可怕,可不会说战争带来了多大的损失,那些损失可都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听到这儿,老护士沉默片刻,摆弄着手上的几码绷带,接着又问我:“打仗的时候你不在这儿吧?”“不在,我刚从伦敦来。”她点了下头,否决掉我能理解的可能。再接下来,我俩扯了会儿家常,丈夫、孩子。听说我离婚了,她显得很吃惊,听说医生这会儿正在检查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打南非来,那个难对付的家伙是个种咖啡的农场主,显得更吃惊。在她听来,我好像是穆加贝的支持者。她满腹狐疑地看了我两眼,接下来就管我叫夫人了。

我被送进 X 光室时,先为打搅了他的周六下午而向年轻的医师道了个歉,他说:“我正值班应召,也喜欢帮助人。”我发觉这个年轻人很迷人,那个黑人医生也很迷人。咖啡农太有礼貌了,一点也不自然。医生说他的肩膀跟我的脚一样,伤得还不太重。

这时,来了一名当地的警察,一个年轻黑人。一记下我的姓名,他就说曾读过我的这篇那篇短篇小说,还说他自己也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有趣的经历。我能不能跟他说说该怎么做?

我俩就坐在那里,我身上还缠着绷带,手里攥着 X 光片,等着朋友从穆塔雷开车来接我们。那个朋友肯定在开车风驰电掣地赶来,一边在肚子里把我们骂了个遍,为了自己的汽油。年轻警察看上去很敏感,跟人们一般印象中的警察不大一样。我向他说起该如何写作。他把询问问题、填写表格的正活儿放在一边,仔细听我说,还不时记下一些重要的话。这

种情景对每个小说家来说实在太平常了，要摆出一副首次登台演讲的样子还真不容易。“瞧，问题在于，年轻作家们似乎认为有才华就够了，可很多人都有才华。除了有才华，还得埋头苦干。或许，因为只需要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就能写出短篇小说，甚至一整部长篇，人们就下意识地认为写作是件容易的事儿。可你要想成为名家，就得写了撕，再写再撕。你总觉得自己的东西不错，可还不够，每个作家都会经历那个阶段，从那个阶段到写出真正够分量的东西，要做的就是写了撕，撕了再写。当然，还要阅读。对每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没人能告诉他该怎么写，只能说，写，写，再写。”就在我悉心教诲的时候，两个小姑娘拼命忍住痛，不叫出来。她俩躺在两张长木椅上，母亲和叔叔坐得笔直，规规矩矩，脸色和身上的绷带一样苍白，血也正从我打了绷带的脚上往外渗。这会儿，我的肋骨也开始疼痛难忍。年轻警员说，他会把我看做母亲，会记住我的话。

不用说，这一幕惹恼了咖啡农，这可不是这会儿该干的正事儿。他大声说这会儿该干的是把车祸的所有细节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好把那车警察绳之以法。他总是正确的，一千次都不止。三位黑人女护士这会儿也没什么可干了，一溜坐在长椅上，双手叠抱在胸前，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想自己的事儿。黑人医生也发动汽车走了，开出一英里外还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

神 经

朋友从穆塔雷赶来了，接下来的事儿大家都意想不到：大家心存余悸，不情愿地上了朋友的车。路上每一个转弯、每一次颠簸都让大家的神经剧跳不已，仿佛又有车祸临头。驶过出事车的残骸，跟上百宗车祸现场没什么两样，可不久前我们就坐在那辆车里。这时，大家的恐惧更盛。大家把心里的恐惧说出来后，心里感觉好了点儿，不过咱们那位咬紧牙的英雄可不会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这会儿更不会，因为他坐在前排，而他身边的司机也是位内战中的好汉。他可不会承认自己的恐惧，现在不会，接下来的几星期也不会，那几星期可够他受的。

到穆塔雷的漫漫长路笼罩在一片痛楚的愁云惨雾中，那也是一趟心理之途的起点。现在回想起来，那趟心理之途同那次车祸一样有趣。我的心智如往常一样愉快地运转，时不时对这对那说道上一两句，可“神经”在跳动，在受罪，它跟心智处在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上。无论我说什么都不管用，这已不是恐惧，而是过度惊吓留下的神经官能症。天黑下来，已看不见路面，而症状也因此更加剧烈了。老妇女出名的胆小怕事，因为她们知道后果，年轻人不知道，所以半醉半醒还开着车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时速飞驰在路况恶劣的道路上。他们能“无所畏惧”地干些事儿，因为他们的神经还没有从经验那里学到东西，一旦学到以后无论如何也再不会允许他们那

么干了。

我的神经症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情感和理智有时在不相交的平行线上跑，谁又不知道呢？情感热望的理智禁止，理智命令的情感又抵制。可直到那次车祸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肉体多少听命于自己的意志。现在，我开始恐高，到了害怕站在小山坡上的地步，其实所谓的危险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滚下绿草铺垫的山坡，滚到一片平缓的凹地上。那是个梦，醒来时一身大汗，手脚麻木。那不叫恐惧，而是一律禁止。现在，我开车绝不超过每小时五十英里，内心里有个统治者禁止我那么做，对那个统治者我一无所知。要是还有什么事儿让我羡慕，那就是能乘飞机飞上天空。我坐过一次，飞过旺巴山区，感到恶心难受。现在，每次过马路我都大汗淋漓，下楼一定要抓紧扶手。自己的心智目睹这一切，可爱莫能助，就算自嘲一下也于事无补。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从马路一边穿越到另一边，跟大家一样避开路上的车辆。那一刻，我知道，我痊愈了，神秘的痛楚终于拔除了，不是一点一点，而是一下子。突然间，我自由了。

白人农庄

朋友在穆塔雷的家是幢大宅院，许多房间四下铺开，外面

有檐廊，还有一座大花园。女主人很热情，孩子、年轻人、许多年轻人，我们立刻就融入到友好、高效的气氛之中。朋友请了位“像样的”医生，再一次为大家做了检查。在乡村医院，有些诊断不准确，看来有些人经验还是不足。更多X光片，肩部的伤势严重了，肋骨裂了……我本想说，就算在英国先进的大医院，误诊也不是没听说过，可空气中回响着一种“那你想怎么样”的声音，一种自鸣得意的正确感。在这幢宅子里，任何证明黑人的错误的机会都不容错过。内战那些年，这幢宅子成了个中心，一旦有报道说附近有恐怖活动，或激烈战事，从自己农场上被赶出来的人都到这里住上一晚，或几晚。家里的男人在保安部队服役一段时间时，女人们也会带上孩子搬到这里来住。休假时，服役的军人也上这儿来，吃点儿好的，洗个澡，美美睡上一觉。

我打小就身处其中的那种气氛在这幢宅子里依旧浓厚，农舍里，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一清二楚：这是女人的活儿，那是男人的活儿。在伦敦，每幢房子里的生活模式、平衡关系与这里大异其趣，从伦敦来到这个依旧停留在殖民地时代的社会，委实让人吃惊。要说它还有什么有价值的地方，那就是：它让我们记住，这就是我和我的同类所反抗的。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的时候，家里一个男人正大吼着冲自己的女人发号施令。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就因为别的男人在看着，他就是要证明在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该怎么管好自己的女人。

这里每个成年男子都参加过内战，人们不时向你低语，那个人，在那儿，打仗时是最棒的直升机飞行员，或者“那个人从

恐怖分子眼皮底下救出了谁谁谁一家”，或者“她狠狠揍了个闯进安全网的恐怖分子，那家伙落下个疤，拼命逃走了。”这里所有女人打仗时都做饭做菜，包扎、照料伤员，还照顾其他人。有些女人还拿起武器，日夜守卫，整整有好几年。那场战争还在人们心里，挥之不去。回忆起那段日子，仿佛人人都发挥出极限，展现出自己身上最好的品质，这幢宅院也完成了避难所和堡垒的功能。

这家人有个出嫁的女儿已经永久移居南非了，这次正好回家来看看，她丈夫曾是个警长。她说，有一次，一个因为被怀疑同情恐怖分子而被她丈夫抓过几次的黑人男人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用手搂住她的肩膀，说：“打现在起我们该互称同志了，让我们一起为津巴布韦而奋斗。”打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里。

“我对我丈夫说，我受够了，到走的时候了。”

说这段经历时，那人的表情仿佛在说，除了下决心远走高飞，还能怎么办？还是这个年轻女性向我们描述起一幕典型的传统殖民地场景，虽然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离开这里去南非的时候，我一边哭一边和这里的人道别，厨子、佣人、园丁，还有咱家的保姆。他们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他们也哭了，说：你们就是我们的父母。”现在，显然她在考虑要不要回来，在南非她一家过得可不如这边这么滋润，房也小了，收入也少了，家里连一个佣人也没请。她说，许多之前离开的人都在努力回来。

那天晚上，屋里有个男人在战争期间曾效力于情报机构。

他问了我一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设计的问题，他的问题暴露出许多——那种令人飘飘欲仙的幻觉，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要是当年我跟同志们在丛林中苦战，而不是舒舒服服地生活在自由的伦敦，他的问题倒也还算合适。所有这些在安全部门干活儿的人都在心里把对手想象成魔鬼，对之深信不疑。看看中情局的安格尔顿……他们都快变成妄想狂了。然而，要是你跟间谍在同一个部门，那你肯定会为间谍的无能而忧心忡忡，那些间谍搞到的都是些几年前的过时情报，如果不是假情报的话。

那晚，我和咖啡农睡在同一处檐廊上。醒着的时候，他宁死也不会叫苦喊痛，可睡意蒙眬时，还是难受得呻吟起来。整夜我就一个姿势躺着，一动就痛，痛得不行就放声喊出来。第二天清晨，他从睡梦中醒来，甚至还未完全清醒，就对着虚空大叫："端茶来！"茶就立马端了上来，是厨子端来的，我俩一人一杯。

大宅子里，到处有人在洗澡、冲凉、刮面、穿衣、为孩子们穿衣、闲聊、喝茶。有几个男人开车出去了，在早饭前先打上一局高尔夫，女人们帮佣人们准备早餐。医生到了，只有肩部的骨折还算严重。现在，我的黑眼圈成了件稀罕物，孩子们从屋里跑来欣赏它。早餐好了，英式早餐中应有的这里都全了，都是最好的，还有新鲜水果、新鲜沙拉、罐装水果、罐装奶油，一起吃的人足足有三十多个。很容易想象战争中的这样一幕，农庄氛围，无限的好客之道。

回到檐廊上

早饭后，我们挤进两辆旅行车，开进旺巴山区。道路弯弯绕绕，千兜百转，我的“神经”也狂跳不已，越来越恼火，对他们，也对自己。所有人，我指受伤的人，都比昨天糟多了，昨天还麻木的擦伤今天开始痛起来。在那家人的檐廊上，大家数了数身上的伤处，然后僵硬地躺下，忠心的米诺斯，还有那些佣人在我们身边服侍，无比温柔体贴。后来大家移到屋内烧得通红的火堆边，邻居们都来了，帮这帮那，手法无比精湛。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比南部非洲的白人心地更善良，更热情好客，更能帮上忙，只要你是他们的同类……再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痊愈缓缓到来，两个小姑娘好得最快，又到一英里外的俱乐部去打乒乓球和网球去了。她们的母亲和我恢复得慢些，咖啡农的情况不好，伤肩要做一次复杂的手术，这已经是那边肩膀第二次受伤了。

檐廊上，人来，人往。

那是一个冬日夜晚，屋里挤满了人和动物，围坐在火堆前。邻居家农场上年轻腼腆的助手也在（他可是津巴布韦的跳伞冠军），身边坐着条新近出生的小狗，怀里还抱着只大白

波斯猫。他正在照看这只猫，不想把它独自留在家中。小狗叫维齐，一条聪明，甚至可以说有些狡诈的母狗，旁边坐着条叫约什的半大罗得西亚猎犬，温柔，却呆头呆脑。安妮是庄园上凶猛的看门犬，它是一条布尔犬，身上伤痕累累。这会儿，它正把头靠在主人的膝上，发出深情的低鸣。客人中有个男人的工作是安顿新农场上的黑人，他把自己的狗也带来了，一条赛特犬。一只体型小巧，生性胆怯的黑猫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在人腿和狗腿间穿来穿去，最后在房椽上找到了个安全的位置，从那儿可以观察到屋里的一切。一对夫妇从山下的农场来，带来了三只刚出生不久的拉布拉多犬，其实是他们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带来的，为了逗主人家的小姑娘开心。我们这几个受伤的静静地坐在屋子的一角，时不时挡开友好的动物，对我们的伤口来说，它们可算是威胁。谁在为我们服务？米洛斯。啤酒、茶、咖啡、糕点，整晚如流水般不停地上，屋里吵吵嚷嚷，洋溢着活力。大家看着那些动物，谈论它们的举止，仿佛它们跟我们是同类。

关饷之夜

这是昔日南罗得西亚农庄檐廊上的一幕。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代，这一幕每个月就上演一次。

落日已消失在余晖中，星星已露出了头。一张桌子上堆满了小镇银行的棉布袋子，里面装满了硬币。农场主坐在桌子旁边，工头站在桌子后面。如果这是座加高的檐廊，桌子就把在几级台阶的尽头，上了红漆的水泥台阶擦得锃亮，每级台阶的两端都长满了茂盛的植物。如果没有电灯，矮墙上就挂盏灯笼，或者，像在我家，屋前的桌上摆盏防风灯，另一盏挂在树枝上。一群黑人站着等待。工头叫一个名字，走出一个下身穿条旧短裤，上身穿件破V领衫的黑人，光着脚。饷钱袋里有几枚硬币。工头一个月挣一镑，普通工人十到十二先令。这点儿钱能买什么？一条短裤两先令，一件V领衫便宜点，没人穿鞋。一辆自行车要五镑，得存上几年才能买上一辆。吃饭免费。

女人们也到院子里来了，虽然她们并不做农活儿。关饷之夜是个重要时刻，是大场面，能让生活多点色彩。女人们聚集在一边，都是漂亮女人，身上裹着蓝白相间的花布，也有的做成短裙的样式，还有的穿带下摆的长裙。她们头上扎着头巾，手腕上、脚脖上有手镯、脚镯，耳朵上带着耳环，这些可能就是她们拥有的一切了。

有时候，也会有些争执，关于袋里硬币的数量。那时，代表农场主的工头就会大声说："你缺了三天工，去琼斯的农场上喝啤酒去了。"那个人耐心地站在原地，双唇痛苦地抖动，其根源既与他的生活有关，也与这桩小小的事件有关，就是说，他少挣了一先令工钱。或许，他会争辩说："我可没去喝酒，我是看我兄弟去了。""可你总不能每有个兄弟来都去看他吧。"

那人摇摇头，拿上工钱，回到队伍中，队伍中其他人也像他一样摇摇头，叹口气，以同情迎接他的归队。接着，队伍发出大笑，笑声一发不可收，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听到这样的笑声，坐着的农场主会把眼前的工人们扫视一遍，那张脸上写满种种矛盾的情感。比如说我父亲，对这个体系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就以他的招牌方式把一肚子火发到宇宙万物上。“真他娘的滑稽，我说这可真滑稽。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说?”

这一刻，回想起过去，那些我见怪不怪的东西现在显出了原形。比如说，妇女们身上穿的衣物。几十年来，南、北罗得西亚，还有尼亚撒兰的妇女总穿蓝白相间，或者靛青和白相间的花布。这是谁的主意？在某个时刻，肯定有什么人说：“让我们为南部非洲的妇女生产这种蓝白花布吧。”花布的图案看上去带点儿印度尼西亚风格，产自曼彻斯特，一起生产的还有卖给北非人和卖给肯尼亚人的布料。大捆大捆的布料装船运到这里的港口，再装上火车，分成小捆，还带着染料的味道，出现在成百上千家商店的货架上。这种布料漂亮、耐磨、质量好，女人穿上它显得漂亮。现在，穷人家的女人再没这种布料可穿了，因为它同这里屈辱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在南非，这种布料被列入奢侈品的行列。大城市里的时髦女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爱穿。当然，她们对它的历史可能一无所知。在津巴布韦，我看到一些农庄用它们来做沙发套和椅子套，在哈拉雷还用它来做窗帘。这就是不见于文字的社会历史，这一次，或许也见于英国中部地区大棉商的生产、销售记录中。

薄暮中，农场上的工人们等着领钱，背后是落日的余晖。来领钱的人每年都不同，他们从一家农场流动到另一家农场，只要月底他们的钱袋里能多上一先令半先令，或者农场主好点儿，或者水供应好点儿，因为农场旁有条清洁的小河。打固定工的只有工头、工头的助手、赶牛的熟手、木工，还有懂点儿机械的。

如今，1982 年，又一个关饷之夜，我又坐在檐廊上，看着眼前的一幕。这是个封闭的檐廊，不算大，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浴室，檐廊的门开向屋子的主房。檐廊上，有三条汽车轮胎，里面垫了几条麻袋，是狗晚上睡觉的地方。这会儿，那三条狗蹲坐在我们旁边，兴致盎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檐廊上的一张小桌上放着钱，农场经理（现在不叫工头了）现在坐在小姑娘的母亲的旁边，以显示地位平等。小姑娘的母亲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算清每人该得多少钱，咖啡农自己痛得实在太厉害了，一条狗跳到他身上，又碰到了他的伤肩。“恐怕这是个小小的挫折，”他说。大家笑他逞英雄，可他还是硬顶着不笑出来。

檐廊外站着一群工人，有男有女。这会儿是下午五点，太阳正滑到高大黝黑的山的背面。

这儿的工人分两种，一种是固定工，能拿到最低工资，每月三十镑或更多点儿；另一种是零时工，收获的时候才来。他们的工钱很少，不过工作的时间也短。每天都有男男女女来向农场主讨工作，说自己愿意拿比最低工资更低的工钱。“我不能付比那低的工钱，”农场主说，“那是犯法。别怪我，要怪

就怪你们的政府。现在，那是你们的政府了，不是吗?”

简而言之，这就是打破理论图谱的灰色地带。不存在打零工的……不应该存在……几乎不存在……就要不存在了……差不多等于违法……可是缺了这一环，一系列经济活动都将陷入停顿。

跟往昔一样，关饷之夜依旧是个丰富多彩的时刻。女人们都穿上商店里买的色彩艳丽的长裙，头上包着头巾，身上的手镯、脚镯和珠子闪闪发光，现场那种欢快的气氛也主要来自于她们。固定工的穿着和农场主差不多，不更差，也不更好。可以说他们穿着随意，也可以说邋遢。这些季节性男性工人可没法跟自己的女人相比。现在，人人都有鞋穿了，几乎每人都有件不错的羊毛衫或毛衣。

现场吵吵闹闹，我坐在那里，黑眼圈和擦伤的额头成了那些女人们取笑的靶子。不必听懂当地的方言，全世界女人开起玩笑来都一样。

发工钱的过程大致如此：叫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走到檐廊上。小姑娘的母亲用绍纳语和那人打个招呼，她待人很随和，然后简单聊上一两句，开几句玩笑，打个哈哈。经理打开钱袋，把钱摊在桌上，让那人数一数——几张纸币外加几枚硬币，少得可怜，不过没人抱怨。

这一过程中两个小姑娘站在一旁观看，她俩一个十二，一个十岁。两人都穿着很短的短裤和又长又厚的毛衣，毛衣遮盖住短裤，倒好像里面什么也没穿。她俩还什么都不懂，还没意识到自己这副打扮多让那些黑人吃惊，他们睁大双眼看着

她们。自从两个小姑娘出生以来，她们就在黑人圈中长大，她们喜欢怎么穿是她们自己的权利，就算几乎赤身裸体跑来跑去也没人管得着。还记得三十年代时，我们家隔壁农场上有个姑娘，当时刚刚十四岁，恰好到开始开窍的年龄。有一天，她从车里出来，穿着很短的短裤，上身穿了件吊带，就是一根带子系在领子上，整个背都暴露在外的那种，脚上蹬着高跟鞋，出现在我们家旁边一座小山上的一块大石头顶上。看到这一幕，妈妈都惊呆了，爸爸痛心疾首地说："黑人会怎么看？他们的女人可绝不会穿得这么暴露。""那她们的乳房呢？"妈妈反问，"有时候她们的乳房都露在外面。""对，可那是他们的风俗，你什么时候见过黑人妇女只穿束胸和短裤就出来晃荡？那么小，连只芒果都包不住。""这也是我们的风俗，"妈妈说，虽然她自己也讨厌那种穿着，可还是要为之辩解。"我们该树个好榜样，"爸爸说。接着，又开始："他们会怎么看我们？"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如今哈拉雷附近的小山上新建了所大学，有天报纸上登了封读者来信："大学舞会后，你就会看见黑人学生们成双成对猫在草坪的阴暗角落里，又搂又亲，干的还不止那些。当你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干，这可不是你们的传统时，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都是跟你们学的。"

与之类似，一个津巴布韦妇女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她们举止傲慢，言谈粗鲁，把人使唤来使唤去。问她们怎么能对主人如此无礼，她们的回答是："白人太太们就那样，我们以为那就是得体的行为。"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安妮沿着屋子上方的山间小路散步，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手里拿着根粗粗的木棍，仿佛圣经中的族长。一看见安妮，他就停下脚步，把口袋平挡在胸前，紧紧攥着口袋的双手不停颤抖，愤怒地喊着："把狗牵开，把狗牵开！"安妮并没有做出任何威胁性的举动，但挡住了他的去路，显然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双眼中充满一种邪恶的满足感。"蹲下，"我冲它叫，可它究竟会不会服从我的命令，我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会儿我想到这可是条布尔犬，同那白天开启，晚上关闭的安全网一样，是这幢宅子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对面老人的恐惧说明了一切，安妮没按我的命令蹲下来，对面的老人说不定会把我和安妮都杀了，如果他有那样的能力。他的双眼中充满了丛林战争中的愤怒与恐惧。"蹲下，"我使劲向下按，安妮缓缓落下伤痕累累的后腿，可双眼一刻也没有偏离老人的脸。老人还是不敢从它面前走过去。"不会咬你的，"我说。"你拉紧！"我紧紧抓住安妮脖子上的一圈死肉，老人侧身慢慢移过去，举起手里的木棍到与安妮的头平齐的位置。"就是条老笨狗，"我说，可话一出口就觉得尴尬起来。老人直走出二十码开外才敢转过身，嘴里还叫着："拉紧狗！"我紧紧拉住安妮，怕它会去追那个老人。

一群小姑娘向我们飘来，约摸有十来人，刚在俱乐部打完网球，在回家的路上。她们蹦蹦跳跳，有时还跑上一小段，真是精力过剩。一群人嘻嘻哈哈，尖锐的声音穿过陡峭的山坡，在山谷间回荡。她们大都穿着紧身衫和短裤，只有一个穿着牛仔裤，还特意把裤子给扯破了以赶时髦，看上去到处是苍白的细胳膊细腿，漂亮的眼睛和红红的嘴唇轻盈地点画在圆润

的脸庞上，就像印象派油画中的小姑娘，正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

老人从小姑娘们身边阔步走过，现在他的木棍就横在胸前，随时准备派上用场。

一个人并不常常有机会像别人那样看到自己。

那天晚上，所有的小姑娘都聚在熊熊的火堆旁，占了沙发、椅子，还有的在地板上跟安妮打滚。两个小姑娘用俱乐部聚会时用剩下的绿色彩带纸把安妮包裹起来。安妮蹲在那里，头微微下垂，看着她们的目光中充满节制和耐心。

“安妮，又笨又老的安妮……”姑娘们一边拍着手一边笑着，在地板上打滚，端盘子上晚饭的佣人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加倍小心。安妮站起身，挣脱了绳索，走到火堆边，鼻子冲着火趴下来，身上还拖着绿色的彩带纸，像海带，又像莴苣。

大 雨

有天晚上，大家没待在檐廊下，而是待在屋内，火光熊熊。突然，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在铁皮屋顶上，所有人一起拍起手来。漫长的干旱……干涸的塘坝……咖啡树的枝叶已开始微微枯黄，家里的狗整天冲盛水的碗喘气。现在大雨不期而至，所有人一下子又恢复了精神头儿。欢乐，癫狂。

助　手

天空中出现一个精灵，津巴布韦的跳伞冠军从邻居开的一架小型飞机上一纵而下，飘过天空。他降落得很慢，新降落伞可以让他调整各种姿态，一次降落可能要五分钟。有人喊："他可别飘到东葡去。"邻家农场有个从瑞士来玩儿的姑娘，她也在场，气呼呼地说："真的吗？那儿现在可叫莫桑比克。"那个姑娘一直话不多，但观察细致，也因此不断感到震惊。她原以为革命后，所有人，所有事都将不同。"我想，你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一位从茶叶种植场来的老派白人对她说。她毫不客气地回答："你们确实很怪。""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们，那需要时间。"有时，她会大哭起来，接着大家又都对她很好。"他们是在哄我，他们怎么能这样？"

英俊潇洒的英雄从天空中飘然而落，飘过群山和丛林，下面那些小姑娘，还有那些半大不小的姑娘个个长叹一声……他消失到丛林中，一小时后才拖着他的降落伞爬上山来。跟以往一样，皱着眉头，满脸谦和，语不成句，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抓起一瓶啤酒，脸上泛起红晕。他的仰慕者实在太多了。

农场助手……文学作品中常出现女家庭教师的倩影，可哪里能看到农场助手？这位助手很年轻，是人们同情的对象，

因为他没钱,在这幢住满了一大家人和他们的朋友的大宅子里显得形单影只。他像头牛般每天苦干,因为他的未来系于此。主人的妻子肯定会爱上他,以慈母的方式。家里的丫头们为他失眠,邻家的姑娘们随时会来造访。农场主本人过去肯定也做过助手,同现在的助手话不多,有时会拿他开上几句涮,时刻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眼下这位助手有些腼腆,他有着英俊的外表,对世界一无所知,却又渴望了解一切。有时他会急切地问你:"告诉我该读什么书。"你给他递上一本,于是他用修长的手指把那书翻一翻,说:"好,我读读看。"

他常常溜达过来。溜达是檐廊上的生活方式,不仅人这样,动物也如此。隔壁农场上有条大阿尔萨斯犬,那家主人常到穆塔雷去,每到那时他就十分孤单,于是就跑到这家来找伴儿。夜里我常常惊醒——我睡在檐廊上——感到脸上和手臂上一阵阵暖暖的气息。一阵低声哀求后,他就跳上床来。"塔卡,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该在家!"有时塔卡白天也来,一个电话:"你们家的塔卡又来了。"于是一个佣人来带塔卡回家。"来,塔卡,来。"塔卡一百个不情愿,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看着这幢到处是人的房子,还有屋里的三条狗,都是他的朋友。

分　手

小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去开普敦了，我也很快要回伦敦了。又一次，我们之间将隔上千山万水。这会儿，我本该出门去见识见识新津巴布韦，可擦伤的肋骨和腿还是不允许我走动。我躺在一张长椅上，在檐廊上，眺望远处的群山、河流、湖泊，一丁点儿也不感到厌倦。谁又会呢？有时候，在边界那边，一小团烟尘升起，意味着抵运又在搞破坏了，不知又把什么给炸了。

咖啡农只要不在地里干活儿，就跟我一起坐坐，他的伤痛也还没有退。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几个星期，我俩都厌倦了，告诉对方自己感到厌倦了。山下一小片草地上有一小群羊，一位邻居把它们放养在那里。羊群把苍蝇也带来了，我俩坐在檐廊上，手里拿着卷成筒的报纸，拍苍蝇。九、十二、十五、二十九……“我拍死了三十只，”我炫耀道。“不错，可我拍死了三十五只。”

“你作弊！”

“你才作弊！那只是我拍死的，不是你的。”

人来人往，檐廊有时就像海岸，潮水涌上来，扔下漂浮物，又退下去。有时，一整车人从哈拉雷赶来，在这里吃吃喝喝，在客厅地板上睡觉。“米诺斯，端茶……拿啤酒……做十个人的晚饭……做十六个人的早饭。”

躺在檐廊上，我在想，总体而言，白人和黑人在生活节奏和作风上多么近似，热情好客，慷慨大度。（过去还可以说，白

人有钱，黑人穷，可现在这种话也不能说了。）既然他们如此近似，又为何……实际上，我的想法还跟1949年我离开南罗得西亚时一样，不过当时自己还作不出什么比较。我的想法倾向于一种模模糊糊的难以置信：那些行为显然很愚蠢，可为什么人们还一直那么干？如今，我已走遍世界各地，知道人们在哪里都一样。

我曾一度好奇，为什么欧洲人如此痴迷于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这是否是一种心理补偿，因为他们曾经落后闭塞，而中东、东方的文明却璀璨辉煌，从不用正眼看他们。欧洲人的傲慢仅仅是暴发户的自我感觉良好吗？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因为除此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是吗？那么想的时候，我还没见过印度姑娘整个下午都在折腾自己黝黑的脸蛋儿，想把它整白点儿，好去见未来的新郎。那时候，自己还没读过一位阿拉伯诗人的诗，赞美自己爱人的皮肤如珍珠、牛奶般洁白。诗人还说，欧洲人居然会以为自己的皮肤白皙而为之骄傲，真是不知所谓。要得到真正诗歌中的白皙，你得把个姑娘一辈子关在阴暗的房间里，决不能让她暴露在烈日下。

这种对白色的执著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很幼稚可笑……可我还是有些好奇，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念头呢？黑人右翼派别明明已经目睹了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的一切，可还是不惜一切去争夺种族特权？

我对咖啡农说："你们这种人的问题是一点儿历史感都没有。"

"那些东西咱可不懂，"咖啡农回答。"不管怎么说，咱们

把他们揍得不轻。”

“天哪，那根本就是多余，根本就不需要有一场战争。战争带来那么多毁坏、死亡、苦难，就算不打仗，很多事情原本也能处理好。”

“是啊，就算不打仗，事情总能处理好，只要人们愿意。那为什么总还要打仗呢?”

我俩又争了起来。

清晨，我被一阵如锦缎般轻柔的沙沙声惊醒，仿佛是风穿过树叶的声音。窗外，一个男人正蹲在地上，把咖啡豆摊开晒干，晚上的露水使咖啡豆受了潮，现在要把它们翻一翻。沙沙沙……那人蹲在那里，用手翻动咖啡豆，动作倒有点儿像搅动做奶酪的炼乳。有时候，有两三个人同时干这活儿，我倾听着他们用非洲话交谈，大笑时发出低沉的笑声。“他们在谈什么?”我问米诺斯。通常的回答是:“他们在谈同志们。”指的是两英里外的一处军营。“他们希望那些同志们赶快撤走。”

不光有同志们。我和咖啡农并排而立，看着一群群妇女，还有半大的孩子，把装好包的咖啡搬上汽车。她们是打零工的，劳动大军中的灰色成分。“她们在唱什么?”我问。“你会喜欢这歌儿的，她们在唱:我们干活白人看，没关系，星期六就要到了，到时候我们不醉不归。”

客厅里升起熊熊的炉火，仿佛夜夜都有聚会。“米诺斯，啤酒。米诺斯，咖啡……”

“他是个好人，等你们走了以后，我要给他放两星期假，让他回自己的村子，日日夜夜喝个痛快，只要他愿意。得躲开他

老婆，那婆娘可够他受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他干得多辛苦？”

“他当然干得辛苦，我也一样。不管怎么说，在他自己家里他有一大帮亲戚朋友。”

“家，你把那也叫家吗？”

“对。他自己，他老婆，再加上孩子，完全足够了。要是再多开点儿薪水，我就要破产了。或许，那正是政府想看到的。”

“一点儿都没有变，农场主总是说自己要破产了。政府当然不希望你们破产，还指望你们挣外汇呢。”

“那他们干吗不把欠我们的都给我们呢？要钱的时候他们一拖再拖，要想拿到钱得跪下来求他们。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一秒才肯给钱，好给自己挣利息。不管怎么说，他们不称职。”

“他们当然称职，你们从没教过他们如何承担责任，如今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阵沉默，因为我俩不想又为此争吵，一吵起来就不可开交。我稍做迂回，说：“你们的问题是太没心肝，太冷酷。真不知道生活在这种冷酷和苛责下是什么滋味。”

“他们干得不好我才会责备他们，他们要干得好我一样尊敬他们。”

“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在他们身上看到与白人一样的品质时，你才会尊敬他们？”

“随你怎么想吧。”

于是我俩又吵了起来。

几年前，有本书叫《犀牛行动》，讲述如何用汽车、飞机把受威胁的犀牛运送到新栖居地。写到那些动物时，作者满怀柔情、忧虑和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协助作者完成那项任务的是几十个非洲人，他们贫穷，什么都要。可舍此以外，他们还能如何？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相当欣赏作者对犀牛生活习性的专业知识。后来我又读了一遍，想看看对那些黑人帮工有什么样的描述，毕竟那是危险性极高的工作。我什么也没有找到，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每头犀牛都有独特的描写，你简直觉得只要一见面，就能把它辨认出来，就像在动物园里。

爬山的女人

有一次坐车穿过一片地势特别跌宕起伏的山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车上有咖啡农，他的助手，还有我自己，我们的车正在爬上一处陡峭的山坡，车前走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怀了孕，肚子已经很大，背上背个婴儿，手里还拖着个孩子。她走得很迟缓，可以理解。我知道身边两个男人一点也没看到这个女人，她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有如空气。

“捎她一段吧！”因为气极了，我的语音僵硬。几星期，几年来，怒火一直在我心底燃烧，这会儿终于爆发出来。我们不会捎上她，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结果。

"你明知道她不能上我们的车。"

"就不能破个例吗?"

助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我的怪念头他也已有所耳闻,就像那些从瑞典来的坏家伙的想法。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可从没听说过那些想法。

我们三人在车里差点没打起来。最后,我们的车在那个怀孕女人身边缓缓驶过,开上陡峭的山坡。

还是助手让我最终安静下来,要是他不得不坐在那个黑人妇女和她的孩子身边,他很可能会精神病发作,我太清楚了。然而,他又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我会记住他,为了他幼稚、还未成形的体面。

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一群客人,我们的主人说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火腿、香肠,诸如此类,都在那次车祸中没了影儿。

"什么意思?没了影儿?"助手问。

"都被拿得一干二净。"

助手想了想,问:"你是说老非拿了你的东西吗?那样做可不好,不该拿别人的东西。"

"他们当然该拿,"我说。"或许他们谁都没见过那么丰盛的东西,咱们的车简直就是流动熟食铺。"

他想了又想,一脸茫然。原因之一,他不知道熟食铺是什么地方。

"想想看,"我说,"那么多的火腿肉、咸肉、香肠,撒得满地都是,真是奇迹。"

“可拿别人的东西总是不对，”他说。

我们三人在汽车中的谈话如此结束：“不管怎么说，她肯定是个占地的，我可不会捎一个占地的。”

自打那以后，我原来可能就有的想法中又多了些东西。没人会捎上这个女人一段。谁会？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那些开着大马力的汽车和摩托车四处炫耀的人？他们当然不会。或许某个在当地传教的人，或者某个医生……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农家妇女，肚子里怀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拖着一两个，艰难地爬山。没几个人会看见她，肯定如此。

天 真

农场助手的天真使我想到某个电视节目，那是在丛林战争接近尾声之时，“老非”显然就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了。电视里，六个青年在聊天。他们是新一代白人青年。那种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会碰到的白人青年，既不同于他们的长辈，也不同于那些虽然和他们同龄，却投票选择维持现状的人。他们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整天笑容满面，一眼就能把他们认出来，迷人的一代，友好的一代。他们在聊那场战争，向观众由衷倾诉自己的经历，他们正走向成熟，这也是观众与他们分享的经历。“现在，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动

情地大声疾呼。“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作为白人，要改变自己，在多种族社会中做个好公民。他们需要帮助，向全世界求助，而且有信心一定会得到。那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的人生中，他们已得到一切，可他们还在期盼一切。那个电视节目一点也没让我吃惊，我了解自己的同胞。电话响了，可能是我的黑人朋友要与我分享某个时刻。“看到了吗？”“当然。”“相信吗？”“恐怕，信。”“天哪，”他喘着粗气说，“怎么可能！受剥削压迫的是我们，我们的祖国被抢走了，可要以爱心和体贴温情照料的却是他们！”

传教者

来了两个白人传教者，一对夫妇，他们在津巴布韦已经待了六个月了。整个下午，他俩和主人交换关于黑人和黑人政府的种种轶事，看看和自己的期待还有多大的距离。他们身上散发着某类基督教徒的自满，这一幕真让我感到异常压抑。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目睹过类似的一幕。在英国自诩为“自由派”的人一到这里也会作出调整，甚至变得比他们的主人更加仇视黑人。他们总在谴责，声音总是僵硬、高傲、冷淡。我耳中又响起独白。

离　别

到时间登机回家了，我没回老农场，虽然这趟旅行的六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提起那里。是啊，当然该走了，孩子才会赖着不走，可我真不愿走。1956 年时，相同的心情使我没法把车开上农场的路。今天，那种心情再一次揪住了我。送我上路的是弟弟，他也正打点行装，准备“飞”往南非了。他砰地关上车门，也把过去关在门外，我太了解他了。“好了，不要磨蹭了，再见！”此外，汽油也短缺；此外，这是一年中最糟的季节，雨云尚未飘到东北部农场的上空，丛林干枯，空气中尘土飞扬。

我向所有人道了别，又向所有的动物道了别，小黑猫，狡诈的维奇，温柔、笨头笨脑的罗得西亚猎犬，还有凶猛的布尔犬。跟人道别是一回事，大家肯定还会见面；可跟动物道别就不同了，真可能是永别了。

占地者

我开车拐出农场，驶上大道，所谓的大道其实也不过是一

条土路。一营士兵正穿过橡胶林，从营房方向往这里开来。这是支刚取得胜利的军队，充满了自信、野性和力量。

从农场开出两英里，我停下车捎上两个妇人，她们拖着大大小小的篮子、铺盖，上了后排座。她们要去穆塔雷，长途车晚点了，两人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两人看上去五十上下，也可能实际没那么老。和世界各地的穷苦女人一样，她属于那种你可能根本不会留意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实在太多了，穿着破旧，营养不良，未老先衰，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疑心大，精算计，拼生存。两人都不大爱说话，虽然其中一人英语说得不错，两人都是占地的，当我最后离开农场时，还是跟农场上的人成了仇敌。五英里后，我再次停下车，捎上一个爬山的老者，老人拄着根木柱，仿佛靠它才能把身子站直。车上两个女人见我又带上一个，一肚子不情愿，挪东西腾位子时发出各种声音。可老人一上车，她们又彬彬有礼地和老人打招呼，聊天，那亲密劲儿就像隔壁邻居。车开出五英里，老人用手拍了我肩膀，叫我停车。他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挥手向车上的两个妇人道别，然后，又向我挥挥手，却颇正式。他拄着木棍，慢慢走进树林。我继续开车，向穆塔雷方向驶去，一路上两个女人在聊天，要是我能听懂她们的语言，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就能更多了解津巴布韦，可我不单听不懂当地方言，连绍纳语都听不懂。我小时候那会儿，没有哪个白人家的孩子会去学绍纳语。

在穆塔雷，因为汽油问题的磋商相当复杂。两个女人问我去不去哈拉雷，我说去，她们就说跟我一起走。两人的语气不是暗示，简直是命令。她们指派我把车开到一处旅馆，两人

对一位亲戚说这说那，再由那位亲戚向另外一个人传话。接下来，两人还要为哈拉雷的几个亲戚买点礼物。我把车停在一棵凤凰树下，坐在车里，看着这座一切都显得慢吞吞的城市里的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走来走去。我想，是否这趟旅途结束之后，我就不会再准时在梦中见到那几英里长的主街。

两个女人回来了，手里拿着大小箱子，上了后座。我们出发了。路途将会相当漫长，因为我体内的主宰还不允许把时速超过五十英里，只要一超过那个限度，我就会流冷汗，手发抖。后座上的两个女人在对我的车速说三道四，可我不想吓到她俩，说自己刚出过车祸。凭语调，我知道两人在说什么。她俩已断定我是“好白人”之一，因为我让她俩搭车。两人问我是不是住在哪家咖啡农场上，我回答不是，我从英国来。这说明了一切，真正的交谈由此才开始。两人的生活很艰难，主要因为两人家里共有十七名子女。两人是姐妹，其中一人的丈夫死了。打仗时，他正在睡觉，史密斯手下的士兵点着了他的房子。另一人的丈夫在穆塔雷的一家超市有份儿工作，两人家里岁数小点儿的孩子住在穆塔雷，而两位母亲则住在山上，也就是说，住在占地者的木棚里。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饭店里有份儿不错的工作，可两姐妹之一的大儿子从不工作，还酗酒。两个女人都忧心忡忡，因为有两个孩子今年就要毕业了，可到哪儿去找工作呢？

一路上我们断断续续地聊，有件事挺有趣，值得一提。我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黑人男青年使劲挥手，示意我停车，捎上他一段。我已经开始减速了，后座的两个女人突然一起探起

身,使劲晃我的肩膀,两只有力的手命令我继续开。开始我以为这跟在山路上遇到的老人一样,她们不想跟别人一起挤后排座位,可接下来两人说:“那是个坏家伙,痞子,千万别让这样的人搭车。”“可咱们应该相信别人。”这句话出口时,连我自己都听出它有多孱弱无力。自己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不信那一套,可她们给我的印象却出于某种原因诱使我说出那种蠢话。不止一次,我吃惊地发现,别人对我的期待竟会让我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一些与自己的个性并不吻合的话和事。

两个女人相互盯着对方,一脸嘲弄。岁数大点儿的探过身,给我上了一课:“一定要盯着一个人的脸看,你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好人。刚才那家伙不是好人。战争中出了好多坏人,他会偷你的钱包,还会抢我俩的箱子。”

两人已经把我当成傻瓜了,对我的态度也由此为之改观。没一会儿她俩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路边一座售货亭进入视线。我停下车,两人下车向售货亭走去,站在亭边和卖东西的老妇人说了一会儿话。像这样匆匆忙忙地讨价还价可不是乡下人的惯常所为。两人捧回一堆罐装汽水,为我也开了一罐。接着,也没问我要不要,就为我剥了个桔子,不停从我肩膀上递过一两瓣。看着我把桔子塞进嘴里,两人点头以示嘉许,好像我是她俩的孩子。

在哈拉雷,两人还问我能不能再搭我的车回穆塔雷,我说自己明天就要回英国了。我能听出自己语音中的哀伤与遗憾,她们也听出来了。“那大家下次再见吧。”我走进旅馆,身后响着两人的声音:“再见,一定再来!”

第二次
1988

生命之流涌起，沿着人工渠道，却不是自然河道流动；生命成长，依靠个别人的理论与任意行为，却不是自然经济条件。这时，它也不得不接纳这些状况，把它们视为至关紧要，无可避免，这些作用于非自然生活的状况也具备了自然法则的面孔。

安东·契诃夫：《小岛》，《萨哈林之旅》

两次旅行之间

又过了六年，到 1988 年，我才又回来。这段期间，整个南部非洲乱成了一锅粥，其根本原因是南非政府决心把整个南部非洲大陆控制在白人的支配下。那些年里，南非共和国对自己诸多邻邦的颠覆活动达到了肮脏和无耻的巅峰，南非的军队使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深陷于战乱之中，那只军队的残酷如何形容都不为过。在桑比克，抵运开始了最卑鄙的破坏活动。在和平的博茨瓦纳，南非特工也忙个不停，刺杀逃亡到那里的南非公民，这差不多已是公开的了。津巴布韦巍然而立，对抗南非的"破坏稳定"阴谋。

在南非国内，镇压也达到高峰，全世界都有对此的报道，可时有时无，毫无用处。聚光灯蜻蜓点水般停一下，又移开。在南非，有条法律，禁止任何记者，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看见任何政府不想被人看见的事。要是所有事都公诸于世，那故事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残忍上百倍，我是这么想的。

那里的恐怖被掩盖了起来，一直被掩盖了起来，因为大多数到访者看到的只是白人的舒适生活，也因为种族隔离手段也改进了。商店里，银行里，白人和黑人不再排成两列；餐厅里，宾馆里，各种肤色的人随意混杂在一起。可我这一辈子，

不停听到有人对我说:“别管城里,看看乡下。看看那些农场,那些记者们从来不去的地方。大家要是知道那里的情况……”

如牵线木偶般被南非操纵的国家把津巴布韦团团围住,内战和失败把津巴布韦团团围住。津巴布韦受到一种围城心理折磨,它的领导人也确实要疯了,至少在有些事情上。他们自以为,还向世界宣称,游击队潜伏在马塔贝勒兰的丛林中,游击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无依无靠的白人农庄发生了一些凶杀案,有些农庄还被纵火焚毁。要相信幕后黑手是南非简直太容易了,穆加贝作出的反应是派去主要由马绍纳人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在马塔贝勒兰上上下下挨村逐户实施恐怖暴力,铁手无情。自始至终,他们的政策就是刻意制造恐怖:掠夺、杀戮、奸淫、纵火。有的村子里,一半的人口被杀。一谈到这些,有人开始哭泣,有人开始咒骂,还有人一边哭泣一边咒骂。那些野蛮行径大大伤害了津巴布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形象。

接下来,穆加贝又要展现他政治家的风度,大赦全国,那就是 1987 年 12 月颁布的著名的“团结法案”。法案颁布之后,约书亚·恩科莫终于走出阴冷的囚室,先当上了总统办公室的首席部长,后来又成了政府两位高级部长中的一位。政府原以为会发现游击武装,可后来只有几十个武装分子缴了械。那些人过去都曾是自由战士,后来躲进了丛林,以表达对马绍纳人统治的不满。原因吗,因为恩科莫被排挤在政府之外,或许,真正的原因是要让那些拥有战斗技能的人改变成无

足轻重的平民可不是件容易事。

在那决定性的六年中，还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情。腐败席卷每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也不例外，尽管穆加贝本人规劝、恳请，甚至威胁，也通过了各项立意良好的法令。出现了一个被平民百姓嘲讽地称为“头儿”的新阶层。

一位联合国官员说：“战争中胜利的一方会往自己的口袋里装点儿东西，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不过津巴布韦确实与众不同，它不到十年就创生出一个特权阶级，还满口马克思主义高调。”这番话没有出现在官方正式报告中，而是在非官方的场合说的，或许也正因如此而更具影响。

然而，读津巴布韦的报纸，从津巴布韦的来信，听旅行者带回的故事，看到、听到的不是赞比亚式的彻底绝望，也不是桑比克式的苦难，而是活力、乐观、欢愉。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

1988年11月的一夜，在津巴布韦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听到这样的广播：“部长同志们，女士们，请系好安全带，禁止吸烟灯已灭……”部长同志，仿佛那位部长是盒巧克力，可以让所有乘客分享。飞机上有许多身材魁梧，穿戴得严严实实的黑人男子，他们刚刚开完各种国际会议，正在回家的路上。相

比之下，机上白人的穿着就太随意了。不过，机上有个黑人在衣着方面和我们一路，他是个流行歌手，身上闪闪发光，身子摇来晃去，看上去活像个斗牛士，或者一个珍珠钮王①。六年前，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像观察期中的领养父母一样紧张，可现在，她们坚定、自信，散发着女性的魅力。机舱灯灭了以后，那个流浪歌手还在弹吉他唱歌，于是服务员立即干预，劝他睡觉。“部长同志，女士们，先生们，机长和全体乘务员祝大家晚安。”

入境官是个自信的年轻人，海关官员岁数也不大。终于又看到了哈拉雷的天空，深邃高远，阳光灿烂，一片蔚蓝。上星期刚下了点儿雨，树叶依旧绿意盎然。我驾车驶过一片郊区，这次各种不合时宜的情感已烟消云散，我也开始实实在在地用眼睛去看。旧日的建筑正在消失，街道正日益摆脱昔日的格局，眼前的街道使我记忆中的街道布局和业已消失的建筑模糊起来。城市里今天这儿拆了，明天那儿又化为一片尘土瓦砾，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等着看旧日的废墟如何幻化出高塔、花园、新的街道。可我并没有目睹索尔兹伯里的日新月异，这就像和人在一起，我们很少会去留意岁月的时时侵蚀，也很少会去留意容貌的日日改变。1949 年，当我离开这座城市时，1956 年，当我重游此地时，这座城市还只是建在沙地高原上的小镇，街巷稀疏，到处是树木和花园。如今，你驾车穿过哈拉雷中心行政和金融区，眼前一派流光溢彩的富足景

① 在伦敦街头贩卖钮扣的小贩。——译注

象，这里的花园之精美，若放在英国肯定要买门票才能进去。我说："意识到了吗？你们住在天堂里。"说完才想起类似的话自己过去也说过，虽然我自己住在这里时并没那样想过。

这幢房子的四周树木深深，遮天蔽日，我们待的屋子两面都是花园。不一会儿，大家就站到了花园里。这处花园占地足足有两公顷，很快大家就得出相同的结论：花园里至少有数百种各式植物。鸟儿从低空掠过，尤其惹眼的紫冠鹦鹉，不时发出尖利悲哀的鸣叫声。

在往日，去农场拜访，主人就领你去"四下转转"。对拓荒者来说，那几乎是种直觉，让同在这片狂野大地上的文明人看看自己的成就。"看看我把树木剪成什么形状，把草地修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家的房子、牲口、庄稼、看看我们家的屋顶多牢，能遮挡上一阵子了……"一条狗于是另外找了处墙角，躺了下来，背蜷成一条曲线，伸出腿，鼻子轻轻地放在爪子上。"瞧，我们家的房子就这么大，就这样，这就是我的地盘儿。"

埃尔顿带我四下看了看"他的地盘"，就像他小时候看见大人们做的那样。和我一样，他生于斯，长于斯。

我俩站在花园的中央，呼吸着花园里的空气。对面的房子在空中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花园里一堵墙把佣人住的地方同主人的房子分隔开。

"他们过得好点儿了吗？"我指的是佣人的住宿条件，过去，一间，最多两间砖瓦房里要住一至三个佣人，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

"住房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不过，那还得看里面到底住了

多少人。”

“你这儿住了多少人?”

“园工有十一个孩子,有时候,他,他老婆,还有所有的孩子都住在这儿。厨子家有三个小孩,有时候他们也都住在这里,有时候还要加上她的男人。”

“那不是不合法吗?”

“如今不算不合法了,不过我不想让你留意那些。住在这里,我学到的就是——空间。”

“你的空间够大了。”

“不错,可看看那边。”

花园的尽头有两大片玉米地,长得又高又密,还有一块地上种芸苔。

“两块地一块是我的,收点儿甜玉米,另一块是他们的。非洲人无论在哪儿买处房子,第一件事就是种块玉米地,就算它不够大,只能偶尔收点玉米棒子,也一定要种。肯定是玉米,那是种象征。我的房子刚盖好时,那片地就在那儿了。问我没用,那是他们的权利。”

“芸苔好吃,那块地能给他俩提供些绿色蔬菜,他俩有一次摘些了叶子,那东西维他命十分丰富。有一次,我觉得一棵番石榴树长得不是地方,就把它挖了出来。突然,园工和厨子就出现在我面前,两人都满眼泪水,控诉我心肠太狠。原来,那棵番石榴树是他俩种的,明白吗?于是我赶紧补种上一棵。这园子的一部分属于他们,是他们的权利。”

“这可新鲜。”

"确实新鲜，再抬头看那里。"

那儿，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中，露出一片屋脊，那儿有片大宅。

"那儿住的是新的'头儿'，他们的房子有我这幢房子的四倍大。他们根本不愿意同我这样的大学普通知识分子说话。"说完这话的时候，他看上去似乎津津有味。之后我才发觉，这种津津有味于意料不到的事物的神情，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新津巴布韦的表情。

房里，早餐已摆在桌上，做饭的是家里的厨子，她叫多萝茜，身材丰满，满脸笑容。我和埃尔顿坐了一上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津巴布韦。到这时，我已感到，上次在这里时感受到的那种灰色的哀叹与沉闷已烟消云散。来之前，我还为之担心过，看来多虑了。

我们谈起家里的佣人，白人总是这样谈起，能这样谈的不光是一小群人，一小群把自己视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一部分的人。他们身边是无数黑人，两类人的生活与思想有天壤之别，也很难彼此了解。可这里，在这幢房子里，这些人就在身边，我们谈起他们，思考他们，仿佛从他们身上就能了解到所有人的生活。

多萝茜十四岁就怀了孕，被踢出了学校，她的父母也不觉得该照顾她。"非洲女人，可怕的虚耗，自我毁灭。"埃尔顿哀叹道，从多萝茜身上他看到了数百万非洲妇女的人生，早早怀孕，之后一生都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多萝茜有四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不同。要养活孩子，常常还要养活男人，她开了家

地下酒馆。埃尔顿生病住院的时候，多萝茜来找他，说："我想来照顾你。"她听说埃尔顿是个好雇主，此外，两人还是老乡，都来自马塔贝勒兰。那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埃尔顿说。她的生活却远非顺利，她的房子里不仅住着她和她的孩子，还有那个经常偷她钱的男人，虽然他挣得比她还多。"要是甩了那个男人，她不是能过得好些吗?"我忿忿不平地问。"当然会，可女人身后必须有个男人，去探亲访友，也为了在别的女人面前炫耀。你真该看看多萝茜上街游行前的装扮，真像个女王。"

家里另一个佣人是园工乔治，一个英俊的男人，整天乐呵呵的，在埃尔顿的指导下，他造出了这座花园。乔治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大女儿，那姑娘能招灵上身，在她身上的表现是一挨批就浑身僵硬，接下来就要打人。那姑娘又笨又蠢，在一家新成立的保安公司上班时(那家公司为商店住家提供保安，所有人差不多都是前自由战士)她跟所有八名保安都搞过了。家里人从一个巫医到另一家，想要别人接受她做神媒，可所有人都说她是个疯女人。如果有哪个巫医能接受她，家里就发达了。这家人穷得叮当响，虽然乔治的工资比最低工资要高出好多倍。"十一个孩子!"

"那只是我们的看法，"阿尔顿说。"他说再多都不算多，最主要就是把孩子喂饱，要做到那并不困难。他老婆想怀第十二个，可没怀上，正为此而郁闷呢，觉得自己不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

"教育呢? 健康呢?"

"面对现实吧。现在像他那样的人还很多，或许还多过多

萝茜那种类型的人。多萝茜是个现代女性，脑瓜灵得能进内阁，而且肯定比大多数阁员都能干。她去做了节育手术，把那个男人没能偷走的钱省下来，送她的大儿子上学。不过，虽然她比园工要能干上好多倍，我却不能给两人同样的工资，那会让他的男性尊严受挫。她自己也认可我的做法，她十分清楚什么是应当的。我试图让建设委员会批准为佣人再盖两间房子，可他们说不行，所以，那些孩子们都到这里的时候，后面就人满为患了。我叫多萝茜和她的男人睡我那儿的空房间，可她被我的话吓坏了。我想，她应该是个十分讲究权威的女士。艾滋病在这里传开后，我也跟她说了，希望她认真对待，因为政府不会认真对待。可她回答什么？所有染上艾滋病的人都该去死！我对她说，你的话让我震惊，她又说，那就把他们都关到集中营去，还要派卫兵看守。

檐廊上的谈话

第一天一整天大家坐着聊天，不停有人来访，我放松身心，沉浸于津巴布韦，这一次冷静、客观，像个法官，事实和数字在心中堆积，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和新闻报道。大家谈到新津巴布韦时，都带有自己的偏向。接下来第二天，第三天大家解释、抱怨、规劝、人人不仅关心，而且认为自己可以

对时事的发展有直接有效的影响，这种氛围给人的感觉真好。这里完全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欧洲任何一个地方，在那里，决策早已脱离市民存在的层次，屈从于高高在上的、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权力。这一次，我还想听听有没有那种“独白”，可它已消失了，就像他们所说的，消失于历史的迷雾中。现在有个词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话中，最常听到的就是“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不……”也就是说，穆加贝，做了这，做了那。如今，在英国，我们问，为什么她做了这，做了那？区别在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新津巴布韦这样有一个如此惹人注目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当然我们谈的不是挂着各种委员会之名的高层。

每段谈话立刻就会转向团结法案，转向津巴布韦国民联盟和津巴布韦人民联盟之间的关系，转向马塔贝勒兰和马绍那兰，转向穆加贝和恩科莫。法案转变了社会氛围，人人都乐观起来，人人都说：“津巴布韦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接着人们又问，之前他为什么没这么做？要是在 1987 年这项法案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它在更早的时候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穆加贝怎么会不知道真正的叛乱者其实少之又少？为什么全国人都相信有一支恩德贝勒人的武装？所谓敌人不过是十来个人，现在人人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当时穆加贝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又为什么没能看出来？他不是有间谍、线人吗？

为什么穆加贝总统不节制自己的部长们、官员们，让他们别那么贪婪？对此的回答是支撑着他权力大厦的正是那些腐败者，可没人愿意相信这点，这会儿所有同穆加贝相关的交谈

中都充满理想主义，有些人还记得，过去，当谈到暴君时，也听过类似的话，这使他们不无忧虑。穆加贝可不是暴君……可他也可能成为暴君……但现在恩科莫跟他在一起，他不会允许穆加贝成为暴君。

本那那总统到哪里去了？他不再是总统了，现在当了大学教授，很受欢迎。

任何时候都能听到关于大学的谈论，因为学生又罢课抗议腐败了，每天都有关于部长高官的丑闻，牵涉到各种贿赂、诈骗、贪污、侵吞。学生们打着革命和理想的旗号聚众闹事，向穆加贝请愿，希望穆加贝会支持他们。可穆加贝没那么做。警察冲进校园，做出愚蠢行径，向躲了学生的教室里发射催泪弹，许多学生受了伤。可最大的伤害还是希望的破灭与随之而来的愤世嫉俗。要是有谁觉得穆加贝犯了错，那么听听他的话是有趣味的，那腔调中充满悲伤与困惑，一句话能翻过来倒过去说上一整晚。为什么要让他们失望？怎么能这样干？他自己也是干革命的，年轻人一旦愤世会很危险，他再清楚不过了。他该像对待自己的坚定支持者一样对待学生……只能认为有人在出馊主意……谁？为什么他把自己同所有人隔绝开来，那么遥不可及？他不该让大家失望，可为什么？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除了"他为什么这样那样"外，同样常常听到的就是"穆加贝说……"没有什么比这些传闻中的领导人或大权独揽者语录更有意思了，从这里听到的是流行神话，其中既有批评，也有希望。领导人有没有真说过那些话无关紧要，因为效果是

一样的。

真是太迷人了，这种街谈巷议，如此强烈地感到个人的命运同津巴布韦息息相关，愤世情绪隔段时间就发作一次，不仅因为时下盛传的腐败丑闻，它实际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今天屋里的人在丛林战争时既有穆加贝的支持者，也有恩科莫、穆左雷瓦主教的支持者，可现在他们说起话来，都是一个腔调，什么腔调？我敢发誓，跟恋爱中的人相差不多。你可以爱上一个人，也可以爱上一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令人浑身发颤，叫人不敢相信的希望……不确定……爱人的完美与成就令自己惊讶不已。可一旦遭遇挫折，失望感也大得不成比例。这会儿，身边一个人正在大谈腐败丑闻，捶胸顿足，那表情分明就是个发现自己是被玩弄了的恋中人。

举个例子，汽车丑闻。穆加贝禁止进口小汽车到津巴布韦（其实，什么也都不让进口，从汽车零部件到农业机械，什么都在禁止之列，无论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当地有家工厂获许生产丰田车，那里出的车贵得离谱，每辆车的价格都是欧洲市场的三倍。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可就算有钱也未必就能搞到一辆，因为车都是为"头儿们"造的。某位部长，或类似有特权的人从车厂得到通知，车好了，于是，他或她（政府里也有几位身居高位的女性）就给某个名字并不在名单上的朋友打个电话，车交货之前就已被转手倒卖了，而售价是出厂价的好几倍。据说"所有人"都卷入这桩丑闻中，你根本想不到的人手也不干净。穆加贝干吗不……

被出卖的爱情

“我早就预料到会度过一个无能的阶段，预料到各种混乱，一切都会停下来，一段时间内。他们那些根本就没有任何受过训的人员，怎么可能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呢？可我还是没料到，这帮杂种一上了台就什么也不管了，就知道造自己的小安乐窝。有好几十个这种混蛋，手伸得可长了，一夜暴富。你还以为他们会在意保留地上的穷光蛋吗？对，那儿还是保留地，换个名字，随便，反正他们一毛不拔。你以为上学期的学生暴动是因为腐败吗？别信那种鬼话。那些口号听起来既崇高又纯洁，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各级政府公务员岗位上工作的本该是他们，可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沾不上边儿，所有岗位都被丛林中走出来的同志们占了，都还二十多岁，等他们让位还得等上个几十年。学生们无处可去，他们自己最清楚了。他们也要分到自己的一块……”说话者已勃然大怒。

革命的审美观

“他们那么有钱，看看他们盖的房子，那品味，就算撒切尔的新富人来看了也会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盖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根本不符合这里的地形与气候，窗子开得那么小，多蠢！郊区到处是些花哨玩意儿，摆阔、炫耀。再看看他们塞到屋子里的那些家具，没哪个英国来的见了不被吓个半死，那些房子里没一样东西不是丑陋无比。看到那些房子真想哭。”

“可事情总是如此不对吗？开始是一代发了横财的，庸俗，却精力旺盛，什么都不顾。接下来，他们的儿子不会赚钱，只会花钱，还嘲笑上一辈满身铜臭；再接下来，第三代人开始搞起艺术，讲起自由，崇尚细致入微的情感。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称作衰退的一代。津巴布韦也不过在重复这一无可避免的程序，你又何必那么着急上火？”

真正的回答是——*这里是津巴布韦*。说话的这个人出生在一个白人家庭，在这里长大成人，热爱着津巴布韦的梦想，支持这个梦想，即使这意味着叛离自己的同族。他无法容忍任何对他的爱的亵渎。

爱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权，实在是一桩危险的事儿，你的心几乎肯定会因爱而破碎，甚至会丢了性命。过去，我认识一位女性政治活动者，那是在五十年代。她日以继夜地奋战，为了消除南非的白人统治。为了修整一下，她去了尼日利

亚，去拥抱自己的梦想，可发现那里还是在白人的统治下。后来，她自杀了。任何一个曾献身于理想和政治的人都听说过上千个类似的故事，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必须得说，多萝茜欣赏半英里外的房子。你会觉得那房子真恐怖，设计出那种房子简直就是为了让你看看一幢房子上可以犯多少错。可她爱那房子，爱到了一见到它，甚至一想起它，双眼就湿润起来的程度。

“津巴布韦到处可见这种建筑。知道吗？咱们这儿的建筑师是最棒的，他们赢了许多奖，在别的国家。现在他们都到懂得欣赏他们的国家工作去了。这些机灵鬼从东欧请来设计师，那些人满脑子斯大林式的雄伟。跟你说，足够让人心碎。”

如果问起“为什么穆加贝……？”最常见的回答是：“在这个国家，妇女干所有的活儿。男人坐在一边看，维持一切的是妇女。只要你想做点什么，必须发动妇女。”

造访锡穆凯

朱迪·托德领着我去访问锡穆凯，一座由前自由战士创立经营的农场。战争结束时，自由战士们在集结地点等着解除武装，那时他们设想了这么所农场，下定决心把它办起来。

离开哈拉雷几英里，在一间小商店旁边，一个路牌上写着

“锡穆凯集体农场欢迎您”。那家商店其实就是间棚子，里面货架上放满了营养学家们瞧不入眼的软饮料。那是个大中午，酷热，人们懒洋洋地躲在檐廊下，大多是女人，有的在织东西。男人们都在午睡。那天农场主席安德鲁正好出去了。安德鲁很有名望，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使他在农场上拒绝男女之分。“在这里，我们都是同志。”首先是他，接着是所有人，都下了这样的决心。有次来了个女权主义者，想讨论妇女压迫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在这里不分男女，所有人平等劳动，不过你想采访的人是位女拖拉机手。

那则故事有点像神话，其含义比简单的事实丰富得多。和其他许多关于这所农场的传闻一样，它象征着新津巴布韦。

过去，这里是座白人农场，平铺开的旧式房舍、板房都还在，我很容易就联想到一个白人家庭，还有家里养的动物。不过现在，这里住着好几户黑人家庭。

这里的贫困程度难以言表，已到了任何一个欧洲人都难以想象的程度，更不用说富足的美国人了。

一间小砖瓦房就是新建的学校，那里承载着太多的希望、努力、牺牲——来自所有人。

在这里，在我到这儿几天后，我就感受到那种情绪，也很快意识到那正是津巴布韦在那一时代的主导情绪。那就是：微不足道之物，比如说一间房子、一只动物、一处小花园、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如何能改变整个地区。

在这间设施简陋的学校里，许多不同凡响的人物都曾来此上过课，它将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会有多少孩子记住这

间学校?

附近新建起了大坝,他们计划在水库中养鱼。树也种上了。

在已熟悉了欧洲农庄的富足的眼睛看来,这里的一切还很原始,微不足道,仿佛迈出步伐的双脚上还套着沉重的锁链。

我们被带去参观工作棚,过去那里是烟草库的一部分,现在年轻的妇女们在那儿做外套。接着我们又参观了间照顾孩子和婴儿的托幼所。一个很小的孩子还不适应白人的面孔,看到我们吓得放声大哭起来,旁边一个大些的孩子哄住他的哭声,接着向我们投来腼腆的笑容。另一间旧烟草仓现在是食堂,大家在里面共餐。

我问他们,要是每人可以许一个愿,你们会选择什么?回答常常出人意料。

来的时候,我们的车经过一些富裕的农场,那里一连几英里,田地里的喷淋设施喷洒出炫目的水珠。现在,那叫商业农场,意思就是私人拥有的高科技农场,农场主有白人也有黑人。我期待的回答是:喷淋设备、地窖、新的耕地机器、冷藏车。

两个年轻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彬彬有礼,也有点昏昏欲睡。毕竟,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午饭后可不是接受采访的最好时机。带着一种操练纯熟的语气,他们的回答是:"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生活"。此类交谈常常陷入误解的迷雾中,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接着就是笑容,充满善意,但有些

尴尬。

“不，不，”我说，“什么技术、机器，或者设备对农场最有用，就现在？”长长的沉默。“这家农场的原主人很有钱，”一个年轻人说。看得出，他这是在岔开话题。

想想这里的贫困程度，我想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准？昔日住在这里的白人家庭吗？要让这么多家庭达到与那相当的水平，需要的钱农场想都不敢想。我想说，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里面摆满了玩具，还有辆自行车吗？我想说，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每年到欧洲旅行一次吗？

看得出，这样的问题也不是没人问过，可我想到的并不是昔日白人的富足。

接着，一个年轻人终于给我们的交谈下了精确的定义，他问我在援助资金方面有没有门路？我是不是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两人都兴奋起来，农场上的一些设施就是用援助的钱买的，我能给他们多少钱？

我回答，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门路。

看得出他们在想什么，又一个过路的，这帮家伙就是喜欢看我们吃苦受累。

我有种感觉，这就像在巴基斯坦，整天遇上的都是从阿富汗逃出来的难民，除了背在背上的他们一无所有。我们的小组曾一天几次陷入绝望：就算我们手上有一百万英镑，不到一个上午也能派发干净，可还是于事无补。

战 士

朱迪·托德也加入了安置自由战士的工作,有些困难之前并未预料到。比如说,一个小伙子抱怨说,他申请了数个职位,也得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可面试的时候,他刚刚把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完,那个职位就神秘地飞了。听听他报上的大号吧:热血四溅同志。其他让雇主觉得刺耳的名字还有:立刻去死、前进新津巴布韦、雷电、停火、饮血。

叛乱者

大赦令下,马塔贝勒族的叛乱者终于缴械投降,一位瑞典记者见证了那一时刻。

投降点设在警察局一间破旧的小屋中,屋子中央站着十来个亡命之徒,身上挂满了武器,其中有个叫加亚古梭的,最近用斧子砍死十六个人,一下子恶名远扬。受降的警察都没带武器。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围四壁而坐,之前都已被告知,不要问挑衅性的问题,因为那会破坏“团结法案”创造的和解气氛。可实在想不出其他什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记者小心

翼翼地问,你们现在有什么感受?或许那个记者想听到的是几句反思,为什么为数不多的人,甚至只有十几个人,就能把整个地区搅得一团糟,带入内战的边缘,摧毁文明脆弱的组织。回答的是无所畏惧的加亚古梭,话语中充满自信。他说,我们想吃顿好的,有张舒服的床,美美睡上一觉。毕竟,他们已经在丛林里待了十多年,天天睡在洞穴里,或者住住可能找到的地方,从村庄和田地上劫掠口粮,就算不去杀人放火,那种日子肯定也不好受。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经历的艰辛值得人们同情。那个瑞典的记者后来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帮人像他们那么野。”

这帮叛乱者返回自己的村子时,他们的家人却不让他们进门。

支持过这些叛乱者的人形形色色,过去大家都以为这是一支武装。可现在,所有人都同他们划清界限,包括那些曾为他们游行请愿的学生。

现在,该拿他们怎么办?他们被送到一座农场上,生活在富于同情的监管下,不久就会成为良好公民,乐于教导年轻人,要尊重法律和政府。

改过自新的恐怖分子常常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意大利,许多前红色旅成员经历了一种逆向的自新,他们把牢房变成了大学,展示出他们融入公民大集体的能力。在狱室中,他们写回忆录,学外语,拿学位,出狱后又四处奔走,向那些原本就是完美纳税人和有家室的人发出自己的忠告,在暴力、违法面前要三思慎行。有位意大利的朋友曾告诉我,他见过一位曾

杀害了好几位手无寸铁之人的前女恐怖分子教训自己十五岁的女儿要遵纪守法，那种场面已经一点儿也不算离奇了。

小　说

某人想到要研究研究那些黑人作家创作的、永远也不会译成英语的小说，足足有一百多本，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白人，就算有，也常常是奥林匹亚式能施以援手的人物，比如说送孩子上医院，或者让你搭车。有时你一连读上几十本小说，一个白人人物也没碰到。“他们对我们没兴趣，”做这项研究的人说。“我们自以为他们会为我们着迷，就像我们也为他们着迷一样。可实际上，我们仅仅是渐渐逝去的噪音，对下面村里人而言。”

“下面”这个词有时也带上了讽刺色彩，指贫穷的乡村和富裕的城市间迅速扩大的差距。倒不是说乡村越来越穷，而是城市越来越富了。

阿尔顿和我一样成长于这片土地，他在马塔贝勒兰，我在马绍纳兰。我俩还记得往日白人们坐到一处，谈论黑人的行为处事。这会儿，我俩又坐到一处，谈论那百来本小说，和小说带来的启示。

“那也就意味着就算所有白人都离开这个国家，这里的黑

人也不会在意。或许，这里会像北边的国家那样，迅速退回到老非洲，好像白人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过，一切都在崩溃。交通、运输、电话、道路、铁路、公务部门、旅馆，一切都失效了。”

“不会，”阿尔顿说，“这里的基础设施太完善了。”他的话既是争辩，也充满自豪。

在我嘴里“基础设施”可不是一个常冒出来的词，可如今我好像一天要听到它好几次，不仅从别人的口中，也从自己口中。

狂热支持者

白人说……黑人说……我遇上个热爱新津巴布韦的人，她眼里容不下一丁点儿污点。污点当然存在，因此她更注重政治定义，这种反应也不为奇。“我们现在都是津巴布韦人，”她大声说，“还分什么黑与白？我们是一家人。”我说你这是感情用事，不面对现实；她则说我的观点毫无益处。究竟何谓白，何又谓黑？

我说没什么比这更分明的了，白就意味着由那种从未接触过日光的象牙般的肤色以降的各种色调，直到混血儿那种淡淡的咖啡色皮肤。后者常常也叫有色人种，不过如今是个

危险的词，因为政治底线如今变动得太快。黑呢，那意味着由这种咖啡的颜色到非洲赤道附近那种天鹅绒般的黑色间的色阶渐变。

确实，有些政治人物已断言，“黑”是个反动的字眼（在美国尤其如此），可这种感情用事宣称要捍卫的人，也就是那些黑人，却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它。

耶稣会封地

西里尔·约翰·罗德亲自把大片肥沃的土地赠给罗马天主教徒，一直以来，那些教徒在那些土地上开办学校、修道院、培训中心、传教点。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耶稣会多明我教派。似乎没人因为教会拥有的土地而心存嫉恨。

如果有谁说教会的记录并不配得到大家异口同声的称赞，那又有谁配得上呢？

比如说，我有位黑人朋友，他祖母是部族中说故事的，一位相当出名的老太太。有次我问他：“还记得你奶奶说的那些故事吗？要是记得就把它们记录下来，要不它们就失传了。”他回答道：“小时候还记得，咱们非洲人传授人生经验靠的就是说故事。可自打我进了多姆巴沙瓦学校后，一切都忘了。

他们说我们的文化落后，现在一个故事也想不起来了。在学校里不知挨了多少顿打，不管做什么都要挨打。你们不是有句老话吗？不打不成材。"他笑了起来。

在别人的带领下，我去访问了一间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西尔维拉学校。校长多米尼加是位修女，可她拒绝穿修女袍，也拒绝遵守任何她觉得武断、愚蠢的教规。她负责招募大批年轻人，送他们去津巴布韦偏远地区的穷困学校从教，还要为他们的福利操心。她会穿长裙、短裙、灯笼裙，可胸前总挂一个大大的银十字。她的一个同事穿着裙裤，戴头带，同样是个满脑子独立念头的人。两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不时批评教会的男性权威，甚至教皇。

不知道帕特里克修女要是遇上她俩会作何感想？我觉得她们是同路人。

多米尼加曾在一家修道院当修女，而我也曾在那家修道院度过五年的艰难岁月，从七岁到十二岁。我俩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比了对那家修道院的感受，从那里的管理层，谈到负责教学的修女，来自爱尔兰和德国受过教育的女性，再谈到那里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无知农妇，都是从德国来的。这么多年来，一想到贝特兰达修女，我心中就充满感激之情。一次，一个想家想到生病的孩子悄悄地向威严的办公楼潜行，四周是灰色花岗岩石子的海洋，虽然蹑手蹑脚，可脚下还是发出吱吱声。孩子大胆望去，眼前是一座黑白相间的立柱，那是多明我派修女的制服，她一下扑到对面的双膝上，在一双臂弯中放声大哭。开始有点僵硬，惊奇，慢慢，那双臂膀变得温暖，柔

软。修女用德语对孩子说各种安慰的话，身子使劲摇来摇去，像摇晃的木马。

“或许，可你要是个小学徒，又年轻又害怕，离家万里，你的感受或许又不同。她让我们感到恐怖。”

西尔维拉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有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声誉，受到家长的青睐。一个人满怀自豪地告诉我，穆加贝同志曾在此讲授工联主义的课程。校舍是许多间单层砖房，散落在树木、灌木和花草间，遮阴处小猫懒懒地躺着，等着来往行人投来喜爱的目光。学校里空荡荡的，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领我们参观的是学校校长，他一家人来自德国。小时候，他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留置营中过了四年，那是在二战期间。我的第二任丈夫，歌特弗雷德·莱辛也是德裔，可他那时只在留置营中待了六星期，然后被放出去过正常生活，只要每星期向某个部门报告一次。这条规定执行得也不严，有时候他根本不去报告，好像也没人在意。他是反纳粹者，校长一家人也一样。我听着校长向我描述他在留置营中的经历，想着到底是什么使人与人的命运如此不同。偶然、机遇、小事情，时常如此。谈起津巴布韦时，他的语音中充满这一时代的色彩：自豪而焦虑，热切地解释、找借口，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为应做到而还未做到的焦虑。

一排树下摆着几张长凳和桌子，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石雕和木雕，它们的创造者正在注视着它们。一群年轻人，无业，希望以此来改善生活。他们的部分作品会在哈拉雷的艺术工艺品商店出售。

学校里也有家工艺品店，经营者是个那种在哪儿都能遇上的女强人。从多米尼加修女口中我又听到这样的话：女人在维持着这个国家，她们做了所有的工作。到处都能看到女人在干活儿，而男人则打流混世。

汇编作者

西尔维拉学校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替代专家的基地。他叫布莱恩·麦克加里，一眼就能看出他属于那种热切地关注着如何才能免世界于愚蠢行径的人，他的工作目标之一是发明和改造节约能源的设施，以保存下津巴布韦正日渐消失的丛林。有些地区一棵树也不剩了，人们于是刨出树根，或者烧干草，同以草为食物的动物争夺，甚至烧牛粪。在这个国家，这是反常的做法，动物粪便本应拿去做肥料。

那里有架太阳炉，一部精巧的小玩意儿，可这里它并不受欢迎，不合当地人的情感。你总不能围太阳炉一圈聊天吧，就像围火炉而坐那样。要是人人都用太阳炉，那津巴布韦的森林就有救了。类似的还有一种有用的装置叫沼气池，安装使用也廉价而便利。在房子附近挖个坑，往里面倒动物的粪便和植物。旁边挖个坑，装用过的原料，还可以搬到地里去做肥料。主坑上有个出气口，从那引根管子出来，把沼气连到厨

房。可在村里，我们看到的还是一根燃烧的木头，上面放个平底锅，沼气炉没人用。木头做燃料已经有多久了，在各种地方，岩洞里、草屋里、豪宅里。几千年？上百年？在世界各地，它总是家庭生活、集体生活的中心。

公共领地

这次领我们参观的是位农业技术和公共知识专家，一位中年专家，名叫彼得·希姆比萨，一个精力充沛的家伙，时刻充满自豪感，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同胞取得的成就。首先，我们参观了一处传统居民区。“这儿，”他说，“住着一位老人，他的几个儿子，和所有的家人，他们都跟他住在一起。”他的目光没停留在我身上，向我的身后望去，因为他不赞同我们的家庭文化。“我们跟你们不同。你们的孩子到了十八岁就要离家独立，或许到南美那么远的地方，你们也不在乎。我们希望家里人总在一起。”

从外面看，这种小房子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可在里面你就能感到它的高大、凉爽、通风透气。里面，一张长凳占了不少空间，四分之一的墙面上挂满了各种炊事用具，木架上摆放着衣服和陶器。

家里人正在谈起一个新旅游合作项目，旅行团队将在带

领下步行穿过丛林，然后在村里过夜，也就是与此类似的民居群落过夜。当问到村民，你们希不希望旅行路线穿过你们的村落，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们驾车穿过马绍纳兰的丛林，这片丛林还算年轻，未经过砍伐。这里的丛林里树种极其丰富，同欧洲不同，这里并未经历过冰川期。在欧洲，植物种类有限，因为冰川期摧毁了旧森林，现在看到的都是冰川消退后重新长起来的。

彼得想带我们看个地方，他说那很重要。很快，他驾车穿过一片公共领地，过去这里叫保留地。我清楚过去的保留地是什么样子。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住上殖民者后，黑人被陆续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重新安置在保留地上。那里土壤贫瘠，常常不通道路，也没有学校和诊所，甚至连供水都没有。穆加贝掌权后，他做出决定，当务之急是投入资金，改善农村。要是你并不熟悉那些保留地过去的状况，现在带你去参观公共领地，你也不会留下深刻印象。那里依旧贫困，一眼望去，第一印象就是树稀了，到处是树桩，剩下的树几乎都被砍去一两根枝干，以满足人们对柴木的需求。现在，这些树木已得到良好的照料，因为人们清楚这些剩下的树木对他们有多宝贵。草层稀薄，上面有水土流失留下的浅沟，有时坡地上的土壤被雨水冲去，露出这一块那一块碎石地。两群民居间可能间隔半英里，这里给人们的总体印象就是空旷，可实际上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人和牲口已达到极限。如果哪个旅游者开车飞速穿过这里新修的大路，他或许不知道，就在不久前这条路还仅仅是条狭窄的小道，晴天满天灰，雨天一地泥；他或许也不知道，

时时出现在大路两边的砖瓦建筑也是新修的，在这里，这些建筑叫发展点，从构思到命名也来自白人。发展点包括了医务所、行政办公室、学校，希望将来它们能扩大成小镇，向四周区域辐射服务。这里的一小片一小片玉米和向日葵同商业农场的大片大片红土地比起来可能显得不值一提，可每年它们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只有了解这里的过去，才能了解这里的变化，给予它应有的评价。

棚 屋

彼得·希姆比萨希望去看一间棚屋，那是间简朴的棚屋，占地颇广，所属权是公有。刚开始，许多家庭都想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刚解放后不久，在那段迫不及待的日子里，一切都似乎是可能的，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各式各样的人都希望参加到各式各样的集体项目中，听起来那不过举手之劳。毕竟，一起劳作原本就是此地传统的一部分。可每户家庭不单要投钱买建材，还要帮忙建房，之后还要把房子照管好。今天下午轮值的是位年轻妇女，她说大部分家庭现在已经离开这个项目，只剩下当初建棚屋的核心家庭。现在，又有人想加入进来，因为这个项目正在改变整个地区的生活。

棚屋里有台秤用来称整麻包的产品，医生和护士来时也

用它给人测体重。屋里有堆玉米,是种子,染成蓝绿色,警告人们不要误食,或者拿去喂了牲口。种子的编号是R-201和R-52,都是旧罗得西亚时代培育出来的,现在很宝贵。主人似乎早有预料,参观者会流露出讽刺的表情,这珍贵的种子居然是糟糕的旧时代的遗产。棚屋也用来开政治性会议,办各种培训班,还用来举办聚会。这里的设施属于所有人,不管是不是项目成员,棚屋的主人们为此自豪。这里已成为整个地区的一个中心,它的成功引起相邻地区人的议论,说也要建类似的设施。“最终,这里会发展成一个发展点,”一位年轻妇女说。不过她,还有其他人都建议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自己经历过艰难。只能请那些有恒心和毅力的人加入到项目中来。

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庄稼种出来后装包,称重,储存在这里坚固的水泥地面上,动物吃不到,白蚁也不会从地下挖洞上来。那之后,要做的就是,运出去。

卡车运输

在津巴布韦的任何地方,无论谁手上有了点钱,就会买辆卡车,开家货运公司,这是发家致富最简便快捷的途径。农民住的地方离市场都很远,常常远离发展点,自然成了易于捕获

的猎物。为了把产品运出去，他们不得不承受超出合理的运价，除非他们能出得起钱，自己买辆卡车，他们就必须忍受那一切，感到那些黑心运输公司在喝他们的血，有时开公司的跟他们还同属一个家族，没有法律规管运输价格。“为什么穆加贝不做点儿什么保护我们？他说我们黑人农民是国家的希望。”“我们在一砖一瓦地建设国家的基础……”“政府该言出必行……”

商　店

这间不起眼的棚屋正在改变一大片人民的生活，下面我们要参观的地方同样重要。有一次，我们驾车穿过稀疏的林地，里面到处是膘肥体壮的牛。天刚下过雨，那些牛也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们要去访问的村里有一间集体商店，跟通常一样由几个家庭组成的集体拥有。为了建这间商店，这些家庭已倾其所有。村里原有家普通商店，经营很好，这家新开张的集体商店现在要与之竞争，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是资金短缺，店里崭新的货架虽然擦得一尘不染，上面的商品却没有它的竞争对手丰富。彼得为这家店的开张帮过忙，为此而自豪。我们被介绍给店主们，他们都为这间店自豪，也替它着急。大家四下站着，喝可口可乐，也或许是百事可乐，我想到

这场可乐革命，现在好像人人都在喝这玩意儿。这里的人没钱让孩子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却花钱买这种东西。在最偏远地区的商店的货架上都能看到一排又一排这种既伤牙又伤胃的东西。我站在那儿跟人闲扯的时候，来了个小伙子，一脸笑容，一眼看去就像孩子般可爱，这也证明了他不是自然的成功产品。他想知道，我能不能开车把他送到一个许多英里外的地方。跟我聊天的人一齐看着我，按照这个国家的惯例，我回答："等下，"他们也赞同地点了点头。小伙子心满意足地走了，身边一个男人对我说，不是"他真可怜"或"他真逗"，而是"真是个缺心眼儿的"。这句话足以总结在这个社会，在过去一百年中，都发生了什么。

肉和玉米粥

我们在格林戴尔购物中心吃午饭，这些中心就相当于公共领地的发展点。午饭吃的是肉。这里的饮食文化一向偏向食肉，刚来此访问那会你或许会提醒自己，要坚持多吃素，那更适合自己，可没多久就坚持不下来了，实在太难了。我们吃的是牛肉，津巴布韦牛肉没得说，是这个国家成功的出口商品。这里的全部文化如此强烈地偏向肉食，难以相信他们居然也同意把谷物做饲料，而不是做粮食直接吃掉。他们要能

做到后者,那可真是场革命。自从白人在这里维持住自己的生计后,他们就开始吃肉。白人来的时候,这里的黑人有的是猎人,也有的是农民。现在,他们的主食可能是玉米粥,可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要吃肉。

午饭的时候,大家又谈起政治,不过政治在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闲聊的谈资。部长做了这,部长做了那。从来没有哪个统治集团在老百姓眼中如此瞩目,也从来没有哪群追随者如此热烈,如此个人地与自己的领导人纠缠在一起。谈到穆加贝时是一种语调,可一谈到那群新当权的硕鼠,谈到他们又会干出什么荒唐滑稽的事时,语调立马变为讽刺。这里的政治是不是就像出戏?是的。在津巴布韦这种地方,政治同普通人的生活如此贴近,自然产生一种戏剧效果。剧中人物虽然只有真人大小,却出现在一个硕大无比的舞台上,注定要显得夸张、可笑。可也不是没有爱心,让我们看看这种感情如何现身。

好儿天以来,不止一人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开车送我跑这儿跑那儿。路上休息时,我们总会把车停在某个“头儿”的农场或家宅外面,然后津津有味地闲扯上一通。

谁谁谁买了幢房子,谁谁谁又买了座农场。某位部长,或某个商人。

“他们一搬进去,第一件事儿就是开块玉米地。只要看到玉米地,就知道那是哪个‘头儿’的房子。”

“这有什么稀奇?咱们这儿的人都种玉米。”

“见鬼去吧,它们原本并不产于非洲,是葡萄牙人带

来的。”

“似乎玫瑰也是由中东传入欧洲的吧。”他开心地笑着，因为占了上风。

“可能吧。”

“那凭什么咱们就不能爱咱们的玉米?”

“没道理可言。”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的车停在某位“头儿”的房子外面，解放前那家伙就已经声名赫赫了。许久以前，我见过他两次，一个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的家伙，耐性好，一切与消极抵抗能扯得上的优点都体现在他身上。白人讨厌他，诽谤他，黑人景仰他。

现在他更出名了，都是因为另一些品质。他虐待仆人，女友一个接一个，酗酒，痴迷于出国。他削尖了脑袋挤进各种名目的委员会，就这样就有机会到美国、欧洲去了。他还是卷入最近汽车丑闻的部长之一，这已经尽人皆知了。

大家谈了约莫半小时后，司机叫车上所有人坐好。“一分钟，就一小分钟，我听到了什么? 我想大家已经证明了穷比富好。瞧这个‘头儿’，他的人格被毁，被成功毁了。真可惜，要是他当初没变之前就死了就好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是不是就这么定了?”

“你要是那么定了，”他妻子说，“那我还要推翻它。做条好狗也不比做个坏‘头儿’强。我可不会变。”

“行了，”她丈夫一边开车一边说，“你很安全，就我那点薪水，你还腐败不了。”

"真遗憾,亲爱的。"

商业农场

黑人商业农场主的日子好过吗?回答是:许多破了产。"他们好像觉得只要买块地,庄稼自己就长出来了。"说话的是位勤劳的白人农场主。"他们还买商店、旅馆、运输公司,什么都经营。最先遭殃的还是农场,可他们根本还没意识到。放几头毛姆贝到地里,那就叫耕种。"(毛姆贝是当地人对牛的叫法,听起来像牛的哞哞叫声,柔软、知足,仿佛在跟你谈心,真是个用起来和听起来都让人舒畅的字眼。)

"那么说他们算不上好农民?"

"做得好就好,不过真正的黑人好农民都是小耕农,做那个他们在行。"

小耕农

他们完全依赖传统耕地技术,有时一小块地上也用一台

小拖拉机，但大多数黑人农民使用的技术水平还停留在我父亲那个年代。耕地还用牛，铧、犁也属于那种农业博物馆中的古董，装一袋袋谷物或者有机肥的车子也用牛拉。

对耕牛的需要是永恒的辩论主题，辩论双方是黑人和白人、农民和保育分子，双方言辞激烈，常常尖刻。

“你们的问题就是地上的毛姆贝太多了，土地不堪重负。”

“我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土地，我需要更多的毛姆贝来干活儿。”

所有我访问过的公共领地都位于荒野，景致优美。那儿的人都很贫穷，要是雨水不足，就得饿肚子了。可就算做穷人，在那儿也比其他地方好，比如说，里兹或布拉德福特，这里景色优美，阳光明媚。该有两个不同的词形容两种截然不同的贫穷，一种属于在那种湿滑、阴冷、阴暗的地方，另一种则属于海拔高、景色壮丽的地方。

海拔高度

我都把这儿的海拔高度给忘记了。今天，什么也不想干，只想坐在露台上看看鸟，我听见有人对我说：“你还能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在我长大的地方，大多数疾病都是由高海拔引起的。“往下面送”，又一个不大容易界定的状况，意味着你

还不适应这样的高海拔，要到低的地方调整一段时间。高海拔引起的危险同当代许多危险，比如说辐射、紫外线一类有雷同之处，看不见，摸不着，可照样能把你揍趴下。

大岩脉

津巴布韦地图显示，除了几条河流流经之处，它的全部国土都处于高处。在东部，沿着一条稍稍倾斜的脊线，海拔高度达到五千到七千英尺，这条脊线上有班克特，还有两条公路，锡洛伊到哈拉雷，哈拉雷到穆塔雷。乌姆武奎山脉的一部分也在这条脊线上（那个名字实际上源于误读，当地人把它叫穆瑞岭），现在那些山通常被叫做大岩脉。在许多人的交谈中，我常常听到大岩脉，一直都没意识到指的就是那片山，那片我童年时代时常远眺的山。人们已发现，那条山脉（或其中一部分）属于大裂谷的尾端。大家都知道，数十亿年前，那条断裂带差点把非洲大陆一分为二。要是那样的话，今日在大岩脉一侧闪烁着矿石光泽的达文代尔铬矿就会在印度洋海水的拍打之下，而这个身处内陆高地，空气干燥的内陆国家就会处在潮湿的海风的滋润中。大岩脉中的矿藏占了非洲大陆的一半，它像舌头一样向南边伸出，穿过其他的地质构造带，整条山脉上布满各种小矿，有新开掘的，也有已经废弃的，有的在

白人到来之前许久已经在开采。大岩脉中的山都是光秃秃的，矿物含量之高以致寸草不生。对于热衷于神话的心灵来说，还有什么地方能拥有更大的魔力呢？包括现代顶级的神话制造者——地质学家。

ITCZ

类似，这里还有 ITCZ 这个缩略语，意思是间热带辐合区。它也似乎出现在每个人的谈话中。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降水难以捉摸。今年，雨水总算如期而至了，可之前几季雨水偏少。马塔贝勒兰的干旱已持续好几个年头了，旱情之重使它成了海外媒体的固定新闻。已有一百万牲畜死于干旱，而那之前的战争和叛乱已经使那里的牲畜数量减少了八百万。一连几个糟糕的年份后，会来个风调雨顺的年份，或者还算凑合，可接下来，雨又不来了。今年开头不错，可那并不意味着好势头一定会持续下去。现在整个津巴布韦包括马塔贝勒兰在内，都得到了雨水，一片绿色。现在又到要下雨的时候了，可一日复一日天空湛蓝，空气燥热。我们这些躲避欧洲潮湿的十月的游客倒是开心了，可当地人的心绷得越来越紧，“为什么还不下雨？天上怎么一丝雨云也没有？”在屋里，在电视里气象节目的卫星图上，我们看着 ITCZ 来回游荡。

我还记得当年如何注视北方的天空，雨云该从那个地方飘过来。热量在积聚，凭借训练有素的感觉，随着云层越积越厚，由银白转黑，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重量和密度。我们大喊："雨云来了，从俄罗斯来，从土耳其来，从东欧来，从德国和丹麦的烟囱上飘过来，就要下雨了。"今年，雨云密集，哈拉雷四周的田野上到处是它们投下的沉重黑影，可雨就是下不来。似乎如今的雨季普遍推迟了。过去，十月就到了雨季，十月的某一天，雨必须下下来。可现在，似乎十一月才开始。问题是，全球气候都不大正常，短期的气候失常马上被人抓住，当作证据，表明一切都最糟不过。"如今的雨季再也不从十月开始了，季节全乱套了。"

电　视

大多数晚上，我们看电视。大家坐在电视机前，仿佛电视节目是个孩子，大家希望它努力表现得更好些。实际上，如今的电视节目已经够好了。1982 年时，那时的电视节目只会让人感到难堪，节目制作人粗俗，播音员没有任何训练，节目中充斥着粗制滥造的革命宣传。现在，大多数节目的水平虽然也不怎么样，可它们出自专业人士之手，而他们拜师学艺的对象可都是最棒的。新闻播音员姑娘漂亮炫目，小伙子足以去

做电影明星，所有新闻都是本地事件，告诉观众 ITCZ 的进展。广告也有了娱乐性，虽然还没有英国的电视广告那么精巧。英国的电视节目这里也有播放，都是些旧经典，比如说狄更斯，可没人喜欢英国节目，仅有的一个例外是《早安，部长》。老百姓喜欢看"头儿"们出丑时的样子。人人都喜欢看美国节目，《达拉斯》、《浮华世家》、《王朝》等。

"在英国，我们没的选，我们已成了美国文化的殖民地……"

"岂止英国，整个欧洲都是。"

"对，可这个国家似乎没有理由也步其后尘。没钱为中小学和大学提供课本，图书馆越来越萧条，因为没有外汇购买新书，也不能从国外直接寄书来，海关肯定要收税。"(图书价值的 30%，而图书到底值多少钱全由那些愚蠢的海关官员说了算。)"可有足够的外汇去买《达拉斯》，还有从美国南部贩来的垃圾杂志，上面满纸色情图片。那些当官的，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穆加贝为什么……"

跟在英国一样，大家为一些不可理喻之事而瞠目结舌。她为什么做这？她为什么做那？减少对大学的投入，还有科学，还有研究、图书馆、艺术……她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对此一贯有两种解释：浆糊论："政策就是一团糟"，和阴谋论："他们就想往农民脑袋里塞垃圾，这样他们就安静了。"

在这里浆糊论显然占了上风，一天之中有好几次谈话都会转向新官僚的普遍无能。

"你说他们无能，那告诉我，最近你去过英国吗？"

“去过，可无能也分好几等。你不是在说是他允许这些垃圾进入津巴布韦的吧？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书籍对他很重要，他自己说的。他怎么会对图书、文化、严肃杂志、图书馆那么苛刻呢？肯定是搞错了。”

他当然是穆加贝。在人们眼中，他总是站在天使一边，也就是站在说话人所支持的政策一边。

一位援助人员如是说

你要是真想知道在这些人心里我们代表着什么，那就去公共领地，去个边远村落。在那里，坐在树木间，每棵树都被砍下根枝干当柴火烧了，身边聚了五百来人，都是赶了好几英里的路来的，这对他们可是个大场面。他们也不是不知电视为何物，他们知道，那就是《达拉斯》，是《王朝》。头顶上是弯明亮的新月，草丛里蛐蛐在高唱。这里，一百英里范围内只有一台电视，而美国就通过这小小的屏幕接受全世界的仰慕。我们自己对此有防护，只有看到那些没有防护的人，才能理解我们的自我防护有多好。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观看，我们会思考，这真是垃圾，可又有何妨？可村里那些坐在星空下看电视的人，他们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谋杀接着谋杀、盗窃、红十字、诈骗、谎言，更不用说五十七种做爱的花式，他们的眼睛

越来越亮,真是心悦诚服了。这就是现代世界的一切。节目播完时,你会听到有人喃喃低语:“我真想到美国去。”他们穿过丛林,回到自己的小屋,可他们知道自己要是足够奸诈、足够寡廉鲜耻、足够心狠手辣,他们也能享受到世界的财富。

“在印度,在南美,都一样。我去过十几个国家,无论到哪儿,我都看到相同的一幕:穷人注视着美国梦。”

“可问题是,美国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

花岗岩

昨天,一个人带我四下转转。那人十分仰慕津巴布韦,其原因,据他说,主要因为这里的花岗岩。从他的嘴里我才听说,这里的花岗岩带有放射性。可津巴布韦到处是花岗岩,整条山脉都是。有的地方,一座山就是一整块拔地而起的大岩石,已被风雨打磨光滑;也有的地方,巨大的花岗岩相互支撑,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如果这里的花岗岩有放射性,那一半的人口在黑暗中就应会发光,要么进化出独特的结构,这仅是从积极一面去看。问题并不在于岩石的放射性有多强,危险还是适度,在测量上的读数是多少,而在于放射性这种概念正适合花岗岩。这种观念从来不会在照片上显示出来。花岗岩里仿佛有一团火,有一种活力。在热天,把手放在上面,你仿佛

能感到它的脉搏。

这个人说，当他离开津巴布韦时，他感到仿佛在和花岗岩告别。他说，花岗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它从地球最隐秘的核心沸腾而出，慢慢上升，越过一层又一层别的岩石，最后到达地球表面。缺了花岗岩，他不知该怎么活……我曾经认识一个诗人，一个约克郡人，也以类似的方式谈到岩石，具体哪种岩石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岩石的手感、分量才是关键。岩石使他的人生充实。

我该打个电话去某个相关部门咨询吗？因为在咨询一项科学事实而打起一副严肃的腔调："花岗岩的放射性到底有多高?"当然不会。这个国家就是哺育神话的温床，一直如此。革命也是一个神话之源，可它也不过使人更易染上那种腔调：无所谓，如梦中呓语，充满自豪。那个声音说："瞧那座花岗岩山峰，真不懂人们怎么会为埃尔斯岩大惊小怪。想想看，一只巨大的蜥蜴正在上面爬，足有火车那么长，还长了对翅膀……那是恐龙躺下来晒太阳的地方……"

野　餐

今天，我被带到哈拉雷以外几英里的一个地方，去参观布须曼人的岩画作品。又一次，我们的车先驶过哈拉雷富有的

郊区，接着驶过肥沃的红土地，再接下来就是公共领地了。这处公共领地还算富足，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哈拉雷工作，从那儿寄钱回来。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种着经济作物，收了就能卖钱。这里的住宅各式各样，从旧式的茅草屋群落到新式的独居砖瓦平房，旁边还有花园，屋外停着汽车。

要看到岩画，我们必须拐上一条泥路。路两边巨石林立，有危崖，有小山，还有成堆的砾石。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热浪从天空，从巨石滚滚而来。这条泥路途经几个部落，要是你看到村外停了辆车，那就可能是来看画的。现在，一般是有计划地带少量精心挑选的，也就是支付能力强的旅行者来参观。一如既往，在保护这些易于损坏的岩画和挣外汇之间存在着冲突。

泥路已变成压过草丛的车印，路上看见几个人散坐在树下，还向我们打招呼。我们也向他们打招呼，感到有点儿尴尬。车又前进半英里，路到了头。我们停下车，爬上破碎的斜坡，坡上到处是岩石。那些花岗岩巨石仿佛随时会滚落下来，可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大家爬到一处小断崖前，爬上崖，然后再侧身挪移到一段突出的岩壁上。昔日，布须曼人就站在这里，在头顶上的岩石上作画。来到这里，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画在岩石上的画留存下来的那么少。过去，如果你深入山区，几乎处处可见岩画。我们家农场里，就有几处，在巨石的底部画着鲜艳的图形，半已磨灭。它们都被卖了，被刻意摧毁了，还记得有白人学童向岩画扔石头，一下又一下，直到画面开裂，崩落。为什么那么做？就因为它们在那里吗？这种毁

坏有什么必要?

这里也有涂鸦,线条笨拙,像是小孩子初次学画之作。这次,是当地人试图湮灭这生动丰富的艺术长廊。画的颜料是有色土和植物汁,已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画面中,大象、各种野牛,手持标枪的成群猎人,一切如此逼真、鲜活,你仿佛在欣赏一位日本绘画大师的草图,一朵花、一张脸,只要五六笔就已成形。

关于岩壁上一些场景和图形的意义,专家们争论不休。可问题是,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些画,我要说,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当时的人如何看待当时的世界。我身边有位专家,他对布须曼人岩画的了解不比普通人多,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从他们的画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宇宙观。

有时候,跟专家在一起,随口说了什么,才发现自己的话已涉足专业领域,人们为之而思考、争论已有许多年。

确实如此,那些人当年曾经辉煌,可对于我们所谓的现实,他们有什么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一想到此,一种宁静的感觉就袭上心头。

转过身背对着岩画,你发现自己正站在高处,风光尽收眼底,延绵向远方,小山、高山,湛蓝的天际线。脚下是一块块农田,那些把农田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色线条,是田埂还是篱笆?篱笆不是非洲人固有的东西,不过田埂也不是。在岩石上作画的人身材矮小,粗壮,适应艰苦的环境。早在如今的黑人出现在这里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此处,眺望着这里的大地。他们看到什么?或许,当他们远眺群山、河谷、树林,他们就把

眼前的一切拥入自己的怀中，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就像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那样，通过唱歌就能与景观融为一体。或许，当他们背对着自己画的岩画，远眺风景，自己也成了景物的一部分，他们看到了自己。现在，有时人们脑子里还会灵光一现，觉得自己和一切融为一体，成为天地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知道，这种短暂、偶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状态，在他们身上不是一种常态呢?

一边愉快地讨论着那些可能，我们攀着岩石回到停车的地方，准备吃午饭。这里有一片猴面包树，黄色的果实已落满地，两个黑人青年正在捡地上的果子。其实，那只是出于礼貌的伪装，他们实际在观察我们。我俩摆上瓷碟子、刀叉、玻璃杯、凉鸡肉、沙拉、橙汁。要不要叫他俩过来一起吃? 不过他俩同我俩正好保持足够的距离，再说，吃的东西也不够四个人的分量。我俩吃起来，他俩则在远处闲逛，看着我俩，一会儿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个果子，放到嘴里，直起身，伸个腰，打个哈欠，背过身，假装对我们的存在毫不在意。一会儿，又开始一边捡果子，一边注视我俩。

我俩都忘了，如今，偏远地区的贫困黑人依然很少有机会看到富裕的白人，还有黑人。“他们看的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我的同伴说，指了指他那辆庞大的美国车，为适应崎岖的道路而设计，又指了指面前的食篮、碟子、杯子、刀具。“他们该有二十五了，已过了年龄，无法参加穆加贝的教育革命了。穆加贝说，每个孩子都该完成中学教育。他们可能上过四五年的学，现在无业，做梦都想到城里过上好日子。他们永远不

会拥有一辆车,一间带窗和窗帘的砖瓦房,也不会有一套三件套的西服。”

吃完后,我俩把剩下的东西装进食篮,在一块岩石下面挖了一个洞,把垃圾掩埋好,但把那只鸡留在这块岩石上,下面垫张纸。这么做似乎有点瞧不起人,可不这么做又太残忍。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听说了个故事,在一个饱受干旱之苦的村子里,村民们杀了只鸡,保证村里每个人都能吃上一丝鸡肉,喝上一小口鸡汤。

上车的时候,一群狒狒跳上我俩刚才看岩画的岩壁,大呼小叫。它们早就在安全范围以外观察我俩了,现在要去看看我俩刚才在上面究竟做了些什么。过了不久,等那两个年轻人回村后,那些狒狒就会下来捡果子。果子今天正好熟透,这种果子的成熟期很短,就几个小时。之前,酸,舌头发麻;之后,就跟烂泥一样,让人恶心。

一座商业农场

我们驾车驶在金色阶梯大道上,经过马左埃大坝。这一地区的农业多种多样,最出名的是桔子。农场靠近乌姆武奎山脉,也就是穆瑞岭。穆瑞本是个柔和、连续的音,可在听者耳中怎么会多出个爆破的[k]音?不一会,我们的车已接近大

岩脉，有着数十亿年历史的大岩脉，我的披风里装了一小块岩石，石头里有块鱼化石。不知何时，鱼儿正在水中悠然，突然降临的灾难把它埋进淤泥。标签注明，这种小鱼距今已有三千万年历史。真是个让人敬畏的数字，那么掩埋它的淤泥，该也有三千万年的历史了吧。可从来不会有哪个化石标本的标签会注明，这块石头有三千万年，或者三亿年历史。显然，敬畏感需要一种形式，比如说精巧如叶脉的鱼化石，或者大岩脉，我们能看到它如何分割景观，它就是极远古时代活的证明。我们需要一块拔地而起的花岗岩，看着它，会想到，在这里我触摸到远古，这是真正的古董。可岩石下的土壤虽然比岩石本身只不过年轻上数百万年，却似乎不那么值得人类尊重。

农场很古老，也就是说，从这里成为殖民地后不久就"开垦"出来了。房舍很老，但舒适，带着那个时代的深檐廊，仿佛遮阴的房间。不过一开始我们坐在树荫下，头顶上是一层层枝叶，听着树上鸽子的叫声，有环纹鸽、肉桂鸽、绿斑鸽，还有各种其他种类的鸟。天很热，这些鸟叫声，联想得远一点，就像热浪的叫声。气温已上升到华氏九十多度，不过沙地高原上热浪也脆崩崩的，不像海边那种潮湿的热蒸汽，让人萎靡不振。我们喝茶，喝各种果汁，我们讨论。话题还能有什么？当然是政治。六年前从白人口中听过的那种幼稚、饶舌的牢骚怪话至今仍让我心有余悸，可这次它全没了踪影。那也是我在整个童年时代在檐廊上所听到的：农民说政府的牢骚怪话，不管到哪儿，政府一贯跟农民作对。政府和气候，农民永远在

这两个暴君面前俯首帖耳，无论他们开的卡车有多大的马力，也无论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好。

商业农场主们有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跟政府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以至于其他组织抱怨政府太偏心了。商业农场主们总知道自己的价值，总为自己而自豪，因为他们能种出贵重农作物，换来国家急需的外汇。

我在哈拉雷住的房间里现在到处是各种新闻报道、分析资料、文章摘要，都是关于商业农场(大多数仍由白人经营)。有趣的地方是，所有这些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商业农场主无所畏惧，其真正的原因是大量的黑人无地者都盯上了商业农场上大片肥沃的土地，抱怨说大量的土地并未得到利用。不过，联合国最近一份报告说，总体上，商业农场的土地使用是适当的。这其中还隐藏了些别的，一个很少公开谈及的灰色地带。人人都知道津巴布韦的丛林正在消失，水土流失带来威胁，土地过度使用。从商业农场去公共领地，你就深有体会，不仅因为土壤由红色转变为咖啡色和更淡的颜色，还因为丛林只剩下了影儿。商业农场上的丛林相对而言未受损，它们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可一些极端杂志还叫嚷着要消失商业农场，政府也说如果商业农场土地使用率过低会被强制收购。使用不善的农场通常属于富有的黑人，他们都是穆加贝的支持者。

近来，采采蝇在这个国家的大片地域上已绝迹，这就意味着那些地方也能饲养牲畜，相应地就可以把那里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了。自然保育者说：这意味着津巴布韦更多的

地区将半荒漠化。

农场办公室墙上挂了两张航空照片，一张拍摄于五十年代，在农场刚刚购买时，另一张拍摄于去年。早期那张照片上还有大片未开垦土地，新的那张上已经没多少剩下了。只要有什么委员会，或者哪位官员来检查工作，他们立刻被领到这两张照片前。

农场主说："我带你四下转转。"他的语音中带着当下特有的自豪与焦虑。我们先去看了看烟草仓，新设计已克服了旧技术的缺陷，不再需要年轻的农场助手或农场主本人半夜挣扎着爬起来检查库里的温度。烟叶摊在可移动的架子上，烤炉用最少的燃料，一切几乎不需要人手照看。同时改变的还有在烟草仓工作的人数，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丢了饭碗。农场主很为自己的谷仓自豪。"我们发明出了这项技术。"在这里，"我们"的含义是"南罗得西亚的白人"，而不是这个词当下通行的含义，"新津巴布韦"。这种仓库设计已被别的国家引进，此外还有一些该农场主设计出的设备也被别国引进。

我们坐在车上在地里转，正是大中午，热极了。农场还有玉米，不过这种作物的种植正越来越转向黑人的小型农场。农场还种烟草，以及一种新玩意——情人果。好几块地都种这种果子，藤蔓挂在铁丝上。近来，这种植物受到一种新病害的袭扰，不过农场主并不担心，坚信自然界长出的一切在科学的指引下都会欣欣向荣。一块地的中间，几头小羚羊和两头捻角羚羊正在吃草。这些动物不是白天躲在阴凉的地方睡

觉,晚上才出来吃草的吗?看着这些动物在大中午的阳光下吃草搅乱了我对自然秩序的看法,就像看到雨季在十一月而不是十月到来。“我禁止手下人在这座农场上猎杀动物,”农场主说。“当然,我看不见的时候他们还会猎杀,现在没剩下多少了。还记得吗……”

谈起自己的农场来,他一刻也不停。大家坐在阴凉的客厅里,等着吃午饭,他还是停不下来,谈他的成就,谈新技术、新作物、新点子,一股永不停息的力量推动他不断前进。刚坐下来,他又站起身,伸手去取小册子、文章、杂志。

黑人仆人把午饭端上来,也只有在这种孤悬海外的殖民地这种饮食才能留存下来,在英国本土人们早忘了。午饭包括烤牛肉、烤土豆,蔬菜做得很差,布丁过于粘稠。要知道,室外温度已接近华氏一百度,从这种吃法中,这里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

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谈起住在农场上的无业青年。当然,大家都在谈这个,这个农场住的人比合理水平要高出几倍。于是,大家又谈起此时、此地“合理”的确切含义。长期雇工,也就是说能挣到合理薪酬的工人只占一小部分。季节工来来去去,每间小屋都挤满了人,亲戚、亲戚的亲戚,大家庭有大家庭的权利。

“我的心都要碎了,”农场主的妻子说。“他们该怎么办啊?”

她说,工人的孩子们到她这儿来,问能不能借她的书看,她借给他们一些侦探和犯罪小说。来借书的人越来越多,她

的书都不够借了。阿尔顿抗议说，他们也不是不能读些更高雅的。比如说，他就听说过一个农村地区的孩子读托马斯·哈代，还向那所偏远的农村学校的教师建议，给学生们讲讲哈代。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农场主的妻子有点儿不敢相信，不过还是说下次给他们读点儿难的。闲聊间不觉又滑入一个常谈到的领域。“那些援助组织该建些流动图书馆，提供各种图书，从伊尼德·布莱顿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真不懂那些搞援助的家伙，真想自己能支配一笔援助资金。”大家想象自己设立援助项目，花的钱仅是现有援助项目的一小部分，而现有援助资金的相当一部分都被浪费了。

接下来，闲聊又回到政府层面，我耳边响起的这一时代的独白，也可能是其中一种。

穆加贝的经济政策正在毁掉津巴布韦，因为他正造成经济停滞。津巴布韦迫切需要投资，可要是投资人只能把百分之五带到国外，谁又会来投资？当然人家会选择太平洋经济圈，那里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教条是个杀手，无论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就算雇工效率低下，也不能解雇他，这就意味着你不会雇佣他们，因为只要雇了就要养着他们。这还仅仅是能想得出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之一。另一项政策就是禁止进口农业机械，甚至连配件也不行，要想买到新机械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大致如此：首先，国外某人发出一封有银行背书的信函，大意是他或她愿意出资购买一台拖拉机，或一辆汽车，或其他什么。然后，这些文件再由津巴布韦银行发给国外的供应商。可你要是在津巴布韦国外没

有亲戚或朋友愿意为你付账，那又该怎么办？至于配件，政府可不会为此而分给你外汇，机器只能闲置。要不，你就得往南边走，到南非去，才能搞到配件。要不，你就得发挥南罗得西亚人（也就是津巴布韦人）深深引以为自豪的聪明才智，靠“信心、链条、橡皮带子”就让机器转起来，可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唯一从中获利的就是那些贪官，他们开了各种皮包公司倒卖各种进口配件。没人指望那条政策会改变，那也是原因之一。太多人靠它发了横财。就算穆加贝真批准建家工厂造点儿机器，他也会说，只能有一家厂。没有竞争，价格也比合理价高出好几倍。

这是一种独白。

另一种与上一种有重叠之处。“八年了，这帮人还在台上！革命英雄！看看他们，都是帮什么样的东西！上个月一个家伙来我们学校视察……”说话的是位教师，一个富于理想的黑人青年。“那些头儿，他们从哪儿搞到的那么多的肥油？戳戳他们的大肚子白花花的肥油就流了出来。他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学生，他关心的一切就是完成视察，可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视察，甚至连教室都没进，就想赶快回到哈拉雷，安顿好他的大屁股和肥肚子。”

回哈拉雷的路上有一处检查站，检查驾驶证和轮胎状况。六年前那种叮当作响的马路杀手现在已从路面上清除了出去。六年前，公路检查站是个可怕的地方，负责检查的往往是军人。那时的时局使检查的气氛紧张，车子里面、靴子，甚至连发动机都要查，看有没有私藏武器。如今，一个笑盈盈的年

轻人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又看了几眼车胎。

“您有活儿给我干吗？”

“哪种活儿？”

“什么活儿都行，园工、家务——我还能学做饭做菜。”

“抱歉，不过恐怕我这儿没活儿给你。”

“再见，一路走好。”

“再见。”

我们的车继续前行，好像在乡村公路上，只要警察拦住你的车，就会问你有没有工作。“他们想进城，这就是农村的基本事实。每个人都想进城，只要是城里，哪儿都行。津巴布韦干吗要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别人还没解决的问题，干吗指望我们能解决？穆加贝会通过法律，禁止人们到城里来吗？他要真那么做就会激起又一场革命，他再清楚不过了。”

午茶会

屋里坐满了上岁数的白人中产者，都是前政府公职人员或是前政府公职人员的遗孀，气氛清淡、轻松。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之前遇见过的人都言辞激烈，观点偏激，有的为了理想，也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常常说，这些人可能还从未真正离开英国，那样说并不完全对。原因之一，他们这边在战

争中输掉了，他们必须学会接受失败。

新津巴布韦，混乱、暴力、精力无限，自信十足，这些可不大合他们的脾气，他们往往倾向于讽刺和世故。他们没法离开这里，否则就没退休金可领了。可要是能在津巴布韦以外的地方领到退休金，他们会离开吗？很可能仍然不会。那些贸然去南非的人现在又回来了。“过去，我们住在一个美妙的国度，叫南罗得西亚；现在，我们依旧住在一个美妙的国度，叫津巴布韦。”在一处郊区，一幢宅院的大门上写着“上了‘飞’的当。”这家主人曾“飞”到南非，现在又回来了。对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来说，到什么地方还能像在这儿，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又出得起钱请佣人？不过许多人也没请佣人，为能自力更生而自豪。最糟的是，他们现在不能去英国了，出国旅行申请到的外汇少得可怜，要是你没有亲戚帮你付钱，那就哪儿也甭去了。“有的地方比这儿更糟，可那儿的人也只能待着。”他们回答说：“你就好了，飞进飞出，可你不了解那种文化隔绝感。报纸上只有本地新闻，所有外国新闻都是共产主义宣传。感谢老天，还有 BBC，凭我们那点退休金可订不起国外报纸。”

这些人不谈政治，也不会说穆加贝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他们摆弄摆弄花草，参加些慈善活动，要在英国也一样。

不过，他们并不是昔日剩下的唯一难民。今天，乘车穿过这里最显赫的郊区，我听说这里住满了穿着讲究的白人，而且都是迷途知返的基督徒。“输掉了战争后他们就这样。要不扯上上帝之手，他们就无法面对人生。”

加菲尔德·托德

前首相加菲尔德·拉德现在成了革命英雄。他年已八十，满头银发，举止稳重，浑身洋溢着活力与乐观向上的精神。他坐在女儿房子的檐廊下，其实那算不上是檐廊，听说他女儿还要自建一幢房子，他说："可别再盖成这样，一长溜房子加上一排檐廊。我来给你设计。"那将是一幢带有地中海风格的西班牙式住宅，中庭里种满花草，四周是房屋，客厅只有三面墙。

他挥手驱走了人人都在谈的话题——腐败丑闻，只说狗："那些小事儿……"

他说："八年，这一切只用了八年，真是奇迹，他们行，可谁又能料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办公室、去银行，看看他们充满自信，再想想过去，那时他们的自信全被打没了。现在的年轻人差不多都不记得过去的苦日子了。"

战争期间，他曾度过一段悲伤的岁月，被白人政权视为仇敌，被限制居住在自己的农场，也不得发表自己的言论。对自由战士，他能帮得上忙时就帮，现在还常有人来给他带上礼物。"还记得吗？您帮过我的孩子。""我生病的时候给过我药。""我哥哥被当兵的追的时候您把他藏了起来。"

这个津巴布韦是他的津巴布韦，他热烈地爱着这个津巴布韦。团结法案令他的祖国完整、完美。

津巴布韦

这是肯定会引起政治嘲讽家兴趣的一幕……几个月后，托德在修理旧车时严重烧伤(修旧车是他的一项嗜好)。住院时，罗伯特·穆加贝和约书亚·恩科莫，两个昔日的政治仇敌，一起去看望了他。托德当时还伤重在身，正在慢慢洗浴，于是安全警卫要护士赶快给他洗完，然后把他弄回病床上。“没看见谁来了吗?”护士的回答是:“你做你的工作，我干我的。”

“那一天，那两个人，穆加贝和恩科莫，站在托德的床边，一边站一个，那是津巴布韦最美好的一幕，那就是津巴布韦。”

学　校

当穆加贝和他的军队还只是权力角逐者之一时，他许诺要是他获胜，他会让这个国家所有的孩子都完成基础教育。解放时，他说:“当一个非洲国家独立时，援助资金就涌进来

了。可过了不了多久，援助就会干涸，我们这些津巴布韦人必须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公共领地，也就是昔日的保留地，那里一直资金匮乏，那是首要重点。接下来，中学。确实，我们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同时把一切都做好，然而失业无论如何也会持续上一段时间，就算找不到工作，有点教育总好过一点儿没有。”

他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吗？没人在乎。

基础教育立即就建立了起来。1982 年时，我就遇见过一些教师，既疲惫不堪又充满理想，他们说他们工作的学校有的是谷仓改建的，有的是板房、商店改建的，什么都有，一天内可能有两到三拨学生来上课。“板凳从来没时间凉下来。”家长们也帮助建校，献上时间、技术、金钱，常常是自愿的。基础教育是孩子前途的关键，再大的奉献也不为过。

如今解放已八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八年不算什么；可对一个孩子来说，八年就是一切。津巴布韦国土上已遍布学校，却没有足够的教师、课本，更不用说那些在欧洲看来理所当然的设施。一所学校里可能只有一名真正合格的教师，剩下的只不过是手上有几张 O 级证书。许多教师一边教学，一边努力拿更多的 O 级证书，或者珍贵的 A 级证书。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留在农村学校里教书，而是进城去，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哈拉雷。这些学校里，教学人员从来不会待太久，总在流动，奔更好的前程而去，而许多校长如今也开始腐败起来。

这些学校的学生相信，他们会有前途，可实际上只有 5% 的学生能通过 O 级证书考试（1988 年数据）。他们根本无法

作出比较，根本不知道一所设施完备的学校是什么样子，常常考试失败后就回到自己的村里，还梦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的半调子教育能给他们带来好前程。有数十万青年相信他们会得到真正的教育，这个数字如今可能已经上百万了。

这种状况很危险，是革命之后的典型。大批青年得到许诺，将拥有一切。为了那些许诺，他们做出牺牲，可到头来发现原来是一场空。对此，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很清楚。据说穆加贝说过："我们犯了个错误，从现在开始基础教育要把重点放到质量上。"可那些只接受过半调子教育的人该怎么办？他们并不适应于现代世界的工作条件，可又受过点教育，对农村生活感到不满。据说，穆加贝之所以对不满闹事的学生手段那么狠，主要是害怕这群年轻人。他的镇压是个信号：我不会容忍年轻人大放厥词。

还听说，在议会里，官员饱含感情地宣布，我国的教育预算首次超过了国防，于是人人起立鼓掌，热泪盈眶。

我们的车出了哈拉雷向西行。对于已习惯于欧洲道路的眼睛来说，这里的道路依旧空旷，整条路上就我们一辆车，然后前方出现一辆笼罩在黑烟中的公共汽车。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买不到配件的后果，再说，他们也不会给车辆做定期保养。接着一辆硕大崭新的小车从车边嗖一声超了过去，是辆丰田，车里坐了哪个头儿。这种车可不会拖上长长的黑油烟，毒害路两边的动植物，只有公共交通工具才会那样，还经常趴窝，停在路边，四周围满了不知所措的乘客。也有车祸。倒不是因为司机蹩脚，蹩脚的是车。上星期我遇到个女人，她哥哥

就死于车祸，刹车突然失灵，整辆车冲到山沟里去了。你时常会遇到要么本人出过车祸，要么亲戚朋友出过车祸，其频繁程度令人吃惊。“乘公共交通工具，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当然，非洲人也没有别的选择。”

天气糟透了，十一月寒冷，到处灰蒙蒙一片。我敢发誓，在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十一月会这么冷。ITCZ还没到位，还太高，不能和印度洋上飘来的气团相汇。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里的十一月会需要一件又长又厚的毛衣。

在低沉、寒冷、铅灰色的天空下，我们的车一路西行，隔好一段时间路边才会出现一个市镇。在一家宾馆门口，我们停下车，准备吃午饭。这家宾馆也是一大片地区的社会中心。对于宾馆的客人，餐厅和酒吧太大了，里面的位子也太多了。菜单上还是那些老式的英国菜，烤这烤那。肉很棒，蔬菜差点儿，沙拉和水果简直没话说。一切还跟过去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每种套餐中都加上了玉米粥，普通午餐就是牛排配玉米粥，或者烤鱼配玉米粥。附近几英里内学校的老师都到这里吃饭，享受下这里的电灯，再打个电话。在偏远集镇，像这样的宾馆对村里人来时简直就是奇迹，他们从来没进去过。

1956年时，我驾车从这路过，去当时还未完工的卡里巴大坝，那时穿过的丛林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丛林就该那样。树木高耸、挺拔，种类繁多。在丛林里我开了好几个小时，四处搜寻大象的踪迹，一路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也不止一次停下来聆听鸟儿的歌唱。这一次，我想重温当年那一幕，可没能做到。要说树还没被砍光，至少也有十分之

三四被破砍了，留下的树桩有新有旧，有的地方就剩下一大片树桩。每棵树都失去一两根枝干。阿尔顿说："人要吃饭，要取暖。"他心里其实跟我一样不安。

我们的车行驶在大路上，穿过这片稀疏的丛林，接着路就窄了些，然后拐弯，再拐弯，每一拐之后，前面的路就愈发坑洼些。路边牌子上写着"幸福中学欢迎您的到来"，"新曙光中学欢迎您"。接下来，我们的车上了通向公共领地的崎岖小道，路两边已没几棵树了。车一路向前几英里，经过一家小桥边的商店，一个女人正在一湾漂满洗衣粉的水池中洗衣服。前面就是学校了，实际是两所，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农村里所有学校都一样，千篇一律的一溜低矮建筑，有的会带窄窄的檐廊。这批建筑的占地面积很大，足有几公顷，学校里有树木，大多数还完整无缺，还有灌木，甚至还有人试着想建个花园。要是之前你并不熟悉这种"学校"建筑格局，你会以为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呢？或许像兵营，甚至像宿留营，总之是那种廉价快速建起来的地方。

我们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到这儿来，一位英国来的年轻人，他签约到这里教书一年，然后又志愿再待一年，还有可能待上第三年。朋友叫杰克，站在一间小板房门口向我们挥手。我们的大沃尔沃车使房子看起来更小。房子有两间屋，一间屋里有张床，屋角的架子可以挂件夹克或衬衫什么的，一个书架。另一间屋里有张饭桌，一架煤气炉，然后就到处是瓶瓶罐罐、盛水的缸、防风灯用的煤油、蔬菜、几袋玉米面、西红柿、几棵洋葱。我们到的时候正值课间，杰克打上领带，拉下衬衫袖

子，给学生上课去了。根据校规，老师要给学生树立个好榜样。阿尔顿和我坐在拥挤的小屋中，不时有人找各种借口来瞧上一眼，大家都已知道，杰克正等两位“从哈拉雷的大学来的重要客人”。一个接一个，都是活泼的年轻人，大多数是男孩子。有些是老师，不过这里老师和学生通常分不出来。

杰克再次出现时，立刻用绍纳语和那些人攀谈起来。不过几个月前，杰克对绍纳语也一无所知。绍纳语中打招呼的方式立即就把你融入愉悦之中，根本不像我们那样见面只说“你好”。

“下午好。”

“下午好。”

“昨晚睡得好吗?”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我睡得很好。”

“我也睡得很好。”

杰克的绍纳语会话水平，据他自己估计，还不能谈哲学和政治问题，尚停留在“你妹妹好吗?”“你身体好吗?”“功课做得怎么样?”的水平上。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步行约一英里，到了来时路过的那家小店。透过林木，能看见那个女人还蹲在小木桥上洗衣服。在一棵大树下，我们坐在石头上，一边喝可乐，一边看进进出出小店的人，最主要的是看日落，看着天边浓厚的黑云反射着紫色和金色的光芒。鸟儿在鸣叫，路过的人的说话声给人一种轻柔、遥远的感觉，正合夜幕的降临。黑暗中，我们小心翼

翼地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向杰克的小房子走去。路上，有人向我们卖青玉米，玉米太老太硬，我本不想买，可杰克说，买点回去做晚饭吧。“食品短缺的时候，玉米棒不长到最大是不会摘下来的。”我们点起石蜡灯，在昏暗的灯光中一边啃着老玉米，一边谈学校的情况。这所学校的校长，跟附近其他三所学校的校长一样，被怀疑挪用学校的钱，还有人看见他跟学生发生性关系。“这家伙无耻透顶，”杰克说。杰克的断言引起我们的兴趣，大家开始长时间讨论这个人是否仅仅是达不到有悠久公立学校传统的欧洲国家对教职人员的要求。“可这所学校是按照欧洲要求建立起来的，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那些要求学校就运转不起来。”

“可它正在运转，也许未达到那些要求，”我说。“那些跟我们说过话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样?”

“不，不，这里完全没有运转起来，它完全被遗忘了，这里肮脏，没有道德可言。”杰克已陷入绝望。

类似的交谈之前我也参加过几次，不过还从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坐在狭小的砖屋中，昏暗的灯光下，满屋的昆虫嗡嗡飞。在这里又谈起腐败，却和在哈拉雷谈起时那么不同，因为腐败的规模和无耻已令所有人感到担心，人们甚至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里的贪污行为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贪污者都自以为不会被捉到。买张新报纸(布拉瓦约的《时讯报》，而不是哈拉雷的《先驱报》，后者只会跟风传话)，就会看到这样的标题:某某部长，贪污可能性——99%。这所学校的校长贪污学校的钱，

跟学生睡觉，都几个月了，人人都看在眼里。

“仿佛他们心里有片区域，把通常犯罪感带来的担惊受怕全屏蔽了。”杰克说。

这又是个灰色地带吗？旧传统和旧思维方式同新思想搅和在一起，会产生新的法则吗？可在过去的社会里，小偷就是小偷，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可这些头脑清醒、心智健全的人，怎么就会一面大肆盗窃，还相信自己不会被发现呢？或者因为法律没长眼睛？

至于学校里那些女生，可以理解。十四五岁的姑娘已经成熟了，实际上已到了可婚的年龄。年轻的教师们也常常跟女生们睡觉，然后再跟她们结婚。

“可校长不该树个榜样吗？”杰克问，接着又再次说那人无耻之尤。在这里，交谈通常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现在已经七点半，到上床睡觉的时间了。杰克说他一天下来累得要命，不到八点就睡着了。

到时间赶快去趟厕所了。

津巴布韦刚刚组织一次庆祝活动，庆祝第十万间布莱尔式厕所的建成。这种厕所的发展见证了与蚊蝇传染疾病的战争，敌人还包括血吸虫、钩虫、痢疾。

血吸虫的生存周期如此：寄生血吸虫幼虫的钉螺把血吸虫幼虫排到河流中，幼虫趁人在水里洗澡或洗衣服时进入人体，然后运动到肝、肾、膀胱或其他适合其生存的脏器中，造成巨大破坏。血吸虫病在非洲折磨着数百万人口，在其他大洲也有病人，不过最严重的还是非洲。它导致病人死亡，引发各

种病症，其中之一是营养不良，这也是人们说非洲人“骨瘦如柴”的原因之一(这是昔日白人对非洲的成见)。我父母当年有个朋友，脾气暴躁，身体状况极好，突然就去世了。死后，人们发现他身体里全是血吸虫。血吸虫通过排便排到体外，含血吸虫的粪便就被扔到丛林里，至少直到最近都这么处理。雨水把粪便冲到河中，血吸虫幼虫又寄居到钉螺中。

可以在河水里投放杀虫剂杀死血吸虫幼虫，不过杀虫剂也会杀死河中许多其他生物，况且，一场大雨过后，杀虫剂被稀释，也难以再起作用。投放杀虫剂要花钱，可比起治理人来花费要少许多。血吸虫的治理曾经复杂、漫长、痛苦，现在则便捷多了。最好就是别染上幼虫，然后就是村里人人都养成去厕所大小便的习惯，而不是到林子里就地解决。布莱尔式厕所的发明者真是人类的造福者，这种厕所被安装到津巴布韦农村，同时配上宣传活动，宣传血吸虫病，以及其他由肮脏环境所滋生病菌的生活习性。于是，当你和某个偏远地区的学童交谈时，你会觉得仿佛在同一位初级医生交谈。她会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看不见它，可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说完后，她跑回同学行列中，大家齐声朗诵“勤洗手，用肥皂，饭前洗手别忘掉”。

布莱尔式厕所的设计基于传播病菌的蝇类的已知习性，蝇类喜光厌暗。厕所的水泥地面上有一个小洞，约七英寸长，三到四英寸宽，厕所外有一个大得多，光照也好得多的坑。蝇类觅气味而来，但又觅光向出口处飞去，出口上有一张铁丝网，那就是苍蝇葬身之处。死的苍蝇成千上万。就因为有了

这个简单的设计，在安装了布莱尔式厕所的村庄里，苍蝇传播的疾病越来越少。

要用好这种厕所也并不容易，它包括两间混凝土小屋，一间给男人用，一间给女人用。一手提着防风灯，一手拿着一卷纸，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坑洼不平的路面，向厕所走去。厕所门口台阶上站着几头山羊，要进厕所先得把它们轰走。得尽快，因为灯光吸引飞蛾、昆虫，还有蝙蝠。粪孔太小，得瞄准才行，据说对男人来说有点困难。要不是憋急了，还真不愿去那儿。

室外，我站在小径上看着杰克的小屋，看它在黑夜中溢出灯光。我把防风灯放在脚边，抬头仰望夜空，在哈拉雷很难这么做，背景灯光太强，空气污染也太厉害。外面很冷，很湿，突然，脚边的防风灯发出一声响声，原来是几只青蛙被灯光所吸引，扑到灯罩上，更多的青蛙正沿着小径疯狂地向灯光扑来。它们好像都疯了，是出于好奇吗？提起灯，我小心翼翼地走回屋内，生怕踩到青蛙。阿尔顿当晚睡在另一人家里，我睡杰克的床，杰克则睡在地板上，身边尽是杂物。一只蚊子飞来飞去撞运气，吵死了，可真正危险的是那些母蚊子，悄无声息。我的血液里充满了防疟疾药物，所以我倒不大在乎。之所以不在乎是因为还没有人说疟疾病毒已狡猾到发展出对抗人类毒药的能力。后来，我也遇到过准时准点吃两种防疟疾药物，可还是染上疟疾的人。夜里我和杰克两次爬起来赶蝙蝠，它们肯定把屋顶和墙壁的形状当成可以做安乐窝的山洞。我俩堵上了蝙蝠飞进来的洞，我想读点儿带来的东西，可书上的一切

显得太遥远。此外，我的烛光不一会儿又会吸引更多的造访者。雨点敲打起头顶上的铁皮屋顶，屋外蛙声一片。我也睡了，还不到九点。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们就醒来，外面灰暗湿冷。茶在火上煮的时候，我打了罐水，来到屋外洗漱的地方。房子后面有条弧形围墙，里面圈起一小块水泥地面，就在这儿，脱衣，把衣服搭在墙头上，往身上涂肥皂，在寒风中战栗，想着要是热天该多好啊。往身上冲一桶凉水，水顺着墙根一个小洞流出去。在一个水资源短缺的文化中，自己不禁为那些白白淌入泥土的水担忧。不知把水接住，拿来浇什么呢？回到屋里，我喝上了茶，听说水不是从那湾洗衣服的水池引来的，心情还不错。那湾水池里肯定到处是血吸虫。这里的水源是一英里外的一口井，理应清洁，不过杰克咧开的嘴表示，对那里的清洁度，他并没有信心。小河和水井是学校的两处水源，要供应这里上百人，还要供应附近村民。一处有树林遮阴的高地上建了座水塔，井里的水本该抽到塔里，可好像哪儿坏了，可能是阀门，总之水塔现在不能正常工作，里面没水已经有几个月了。

阿尔顿出现了，从他落脚的地方到这里要走半英里。他说要是那些援助组织还有点脑子，就该组织起一支工程队到学校、发展点、诊疗所之类的地方巡回检修，修好像阀门那样的小部件，那些东西一旦坏了就没人理了。他们修的时候还能带上当地的年轻人，教会他们该如何安装阀门、龙头，如何修补破裂的水管。

“可问题是津巴布韦所有学校的小淘气鬼都认为只有文

学才值得学。向人文致敬的最后堡垒在何方？绝不在撒切尔当政的英国，而是在丛林里，那里一代又一代黑人孩子认为他们太优秀了，机械或电气工程师根本配不上他们的才华，可他们中的大多数照样通不过O级考试。”

“确实如此，这就是英国贵族对凭劳动挣口饭吃的人（工程人员、技工）的轻视。居然出现在这种学校里，你会相信吗，那些弱不禁风，操一口英语说：‘我不能请他来吃饭，他是个卖手艺的’，或者‘我不能把安吉拉嫁给那个人，他不过是名工程师’的家伙，在隔了半个世纪后，居然在远离哈拉雷几百英里外的丛林里，又有一批孩子不愿脏了自己的手去干体力活。他们自己敢相信吗？会把这些孩子认作自己的衣钵传人吗？”

“我去过哈拉雷的一处办公点，那里一个美国援助人员争辩说这里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并不合适。使用英国教学课程有什么意义，课本都是为欧洲设计的。真正需要的是良好的基础技术教育。旁边一位妇女立即就愤怒起来，对那个美国援助人员说：“我看你们白人都一样，就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得到真正的教育。我们就是要给我们的孩子优秀的教育，跟你们一样的优秀。”

“瞧见了吧，一个贵族。你觉得她会认出自己的前辈吗？”

早餐时一边吃着粗小麦粉，喝着茶，一边谈这样的话题，大家感到很愉快。

杰克又去教室了，七点半前就要到那里。他说，他的大多数学生四点半，最迟五点就起床了。女孩子去打水、劈柴、煮粥，服侍家里的男孩子，还有长辈。有的孩子来上学要走四五

英里的路，还要穿过丛林。大多数孩子来学校都不带饭，课上有学生晕倒是很常有的事儿。旁边小学里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一直到下午四点都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粒粮。

杰克临走时还提醒我们别忘了什么什么时间要去给他的学生做个讲座。他走后，阿尔顿向我描述了他昨晚过夜的屋子。屋主是一位海外志愿教师，那屋子就像部时间机器，里面贴满了各种宣传画，反核武器组织的，还有如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画像。这是五年前激进分子的典型。大批青年教师在津巴布韦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下来到乡村执教，却发现自己的理想破灭。要保住饭碗就得忘掉来时的理想。可笑的是，在英国，就算最贫困的市镇上最贫困的街道，那里的财富和机遇也多于津巴布韦任何一个地方。

“你意识到了吗，”阿尔顿问我，“这有多疯狂。在英国，任何一所学校里都有电视、电脑、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图书馆，或大或小，没哪个孩子没看过电视，没看过电影，或者没去过博物馆，很可能都去过法国或意大利。可这儿的学校只有教室，没有经过培训的教师，没有数量足够的课本。”

一些海外教师合同一到期就回国，也有人以患病为借口，合同不到期就回了国。各种组织，宗教的，非宗教的，先让年轻教师在哈拉雷待上几个月，适应一下环境，可哈拉雷根本无法让你适应像这样一所学校的现实，杰克是这样说的。到津巴布韦四个月后，杰克也无缘无故就病倒，卧床不起。全凭毅力，他又爬了起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杰克出身于英国一个温文尔雅的家庭，曾在伦敦数所学校教学，可受不了那里的

粗鲁。

杰克嘱咐我们锁好门，虽然我们自己可能觉得屋里没有什么好偷的。我们穿过丛林，向学校走去，经过那座失效的水塔，又经过一所小学，低矮的长形校舍里挤满了学童，有的仿佛要从窗户里被挤出来。山羊跑来看我们，路上到处是水洼，铅灰色的天空低沉压抑。小学已在身后，又穿过一片稀疏带刺的灌木林，每看到一株兰花，一只蝴蝶，大家就指给其他人看，如今只要它们出现，就一定不会被忽视。又越过一条小溪，沿着条小径向上走去，前面一堵新修的坚固栏栅，栅栏边有一头奶牛正气呼呼地叫着。她早已习惯了沿这条小路散步，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道栅栏，把她和她的同类分隔开。有时她会在那附近转上好几个小时，希望能找到扇没有锁好的栅栏门。我们到的时候，杰克正在一间军队营房般的砖房里，他班上的学生刚刚参加过 O 级考试，有的学生都已经二十了。那些学生给人的印象是活泼跳脱，浑身精力、活力和自信。津巴布韦的年轻人都像他们，高大、健壮、健康的皮肤泛着油亮的光彩。

阿尔顿和我坐在一张课桌后面，看着杰克上完课。教室的窗户上有两扇玻璃已碎了，其余的污浊肮脏，地面上的尘土和垃圾足足有半英寸厚。要不是里面坐了这么多大活人，你会以为这儿是处弃屋。

我注意到，首先在自己身上，那种被不友好地称为"非洲化"的转变。我觉得在这种气候中，他们没必要把窗户关得牢牢的。至于那些屋檐，在上面绑些线不是举手之劳吗？地面，

上课何必一定要清洁的地面！窗户脏，那算什么？

阿尔顿感到悲哀，说："看到了吗，这里的校长形同虚设。校长的优劣一眼就能从学校看出来，我已看够了。"

杰克叫两名学生领我俩去看隔壁的图书室，那是他的骄傲与欢乐。他来之前，这里根本没有图书室，没钱买书，因为钱都被校长贪了。他来以后，独立创办了这间图书室。

图书室是间狭窄的屋子，倒有点像走廊，里面有大约三百本书，包括过时的教材，好心人，或那些"飞了"的人捐赠的图书，因此大多数图书都散发着浓重的怀旧气息，对象是亲爱的老英格兰：

> 艾迪站在窗边，目光穿过窗台上的醉鱼草，凝视着乔弗里来时要经过的街道。她已经摆好了雪梨酒，或许他更喜欢威士忌？那瓶威士忌给搁到那儿了？去年圣诞节，她哥哥从印度回国度假，到她这儿小坐了片刻，自打那以后那瓶威士忌就再没派上过用场。最后，她终于找到了那瓶威士忌，原来她堆在橱柜里的园艺工具已经把那瓶酒给挤到背后去了，恐怕杀虫剂也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实在应该小心点儿！回到窗边，晚饭吃什么又让她犯上了愁。这个下午相当和暖，至少有华氏 65 度，这种天气吃牛排和夹肾饼是不是有点儿太油腻了？最后，她决定开罐鲑鱼，就在这时，乔弗里骑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街上。真可怜！他肯定又热又乏……

图书室里有几部大部头，重得几乎拿不动，都是美国基金会捐赠的，文学概略、历史之类。那些书的样子就是想叫人永远别碰它们。这里真正有人读的书都是非洲黑人作家写的，再加上几位美国作家。调查一下教师们都读什么书，你就会发现这里真正受欢迎的就是齐努亚·阿切贝和弗雷德里克·富萨斯。在一个主要问题还停留在培养阅读能力的地方，好文学和糟文学的区别不值一提。在这间小屋里，我了解到，这里真正需要是一些简单的故事，介绍世界各地，解释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差异，这些孩子们（其实好多已经长大成人了）拼命去读的书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对大多数来说太难了。当然，总有出类拔萃的，在偏僻山村里一头扎入托尔斯泰、哈代、斯坦贝克。托尔斯泰自己也有所很出色的小学，也强调过故事性、知识性、简易读物的重要性，俄罗斯的经历居然与非洲如此接近，真让人惊讶不已。

所有学生都喜欢伊尼德·布莱顿。

杰克教会孩子们如何利用有限的图书资源把图书室办起来。一本作业本上记下所有借出的图书，学生们轮流做图书室管理员。图书不能拿回家，为什么？家庭作业都在学校完成，回家要走很长的路，到家里天就黑了。学生还要帮忙干家务，尤其是女孩。屋里至多点根蜡烛，或一盏油灯，不过大多数时候屋里人就着屋子中央柴火的火光，是很难做作业或读书的。大人多数是文盲，至多在丛林学校读过四五年，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女得到教育，可他们自己的经历根本就帮不上忙。

这些乡村里的家长们还接近于自给自足的农民，不过要凑出三十镑供孩子上学，用来买校服和作业本。要是同时有好几个孩子上学，重担常常使他们自个儿缺衣少食。

我们问杰克，这批热情洋溢的学生中有多少能过O级考试。“这批学生没多少能过。”他有点尴尬，为他们找借口。“你不了解……有份试卷是在英国出的，上面出现有个词shutter——百叶窗，可这里根本就不用百叶窗。那个词还有个意思是照相机快门，可这些学生连照相机什么样都没见过。”

阿尔顿和我应邀给今年备考O级的学生做讲座。很少有客人到这里来，我俩的到访也成了件大事。不过，倒并不是因为从天边来了某位作家，真正的明星是阿尔顿，他可是来自财富的摇篮，津巴布韦大学。这里的教师，大多数只通过一两门O级考试，还有一个拿到A级证书的，无不朝思暮想能到那儿去。更进一步说，愿望越是难以实现，就越是能勾起偶然和机遇的想象。就是想想自己突然被送到一百英里外的师范学院也不容易，那得要许多证书。可津巴布韦大学？天晓得，说不定什么时候……

至于那些孩子们，他们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津巴布韦大学依旧是他们梦想的一部分。

阿尔顿先讲。静静地听着他的演讲，我晓得这将是一次艰难的演讲。阿尔顿的演讲有激情，有说服力，况且他经验丰富，之前已许多次给不同层次的学生演讲。他提出一种观点，台下一片茫然的沉寂，意味着他的话还未被理解，于是他换种

表达方式，再试一次。可问题是，他用的语言、词句在听众心里根本无法产生映射，换句话说，他就是文化差异的活生生的例子。最后，为了给学生们打气，他说就算过不了O级考试也不用气。不要放弃，还有各种技术学校，这个国家同样需要技工。听众一声不出，场面还算礼貌，可伤心失望显而易见。

到我了。我曾在许多国家，给各种各样的听众做过讲座，其中一些，就像人们常说的，属弱势群体。这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一群不大有希望上大学的年轻人，告诉他们知识之门永远向他们敞开，只要用心，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只要有图书馆，再加上几个热心的成年人时时给他们一些意见，这世上没什么学不到。我总习惯于说，一所好的图书馆是了不起的遗产，是所宝库，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常常，当你小的时候，你随手翻开一本书，却在里面发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个精彩世界，于是你可能一头扎进历史，也可能极目远眺。或许，一种兴趣耗尽了它的魅力，另一种兴趣又接续上来；也可能，你偶尔遭遇了一个过去从来未想过居然存在的主题，于是便一路寻觅下去，却不知何时始，又于何处终。在图书馆里你获得了自由，不再受限于某种短暂的政治环境，图书馆是最体现民主精神的设施，因为根本没什么会规定你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

可问题是，方圆三百英里没一家像样的图书馆，所以我空有一肚子鼓励年轻人发奋的话，却实在说不上几句，台下的听众寻思，咱们也有图书馆，有吗？

接着，我又谈起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我知道，任何地方的

听众中都会有人正在写作，或立志写作。谈这个话题好多了，实际上，下面听众中就有一人正在写作，一位从几英里外的学校来的教师。

杰克后来说："你俩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值得来，跟他们谈谈，这里没人在意他们。"接着，他又提到那个从哈拉雷来的督学。

当时杰克满心欢喜，满以为终于有机会可以指出校长工作上的缺失了。为了那位哈拉雷来的客人，学生们已经期盼了好几天。"可他就绕学校走了一圈，要多快有多快，每间教室停留不到一分钟。走的时候，就说了句'晾衣绳要从原来的地方挪开'，教师们听话地挪了，可他一走，就又把它挪回原处。就这样，他上车走了，三件套的西服里外都是汗。"

"要从保留地上飞走，有三个阶段，"阿尔顿说。"好吧，应该说公共领地。首先，一条领带；接着，一件夹克；最后，一套三件套的西服。那时，你就成功了，就永远从丛林中解放了出来。"

我们步行回杰克的住处，路过那道栅栏时，那头母牛还没走。这会，她正站在一间库房的窗边，里面另一头奶牛正一边晃角，一边朝她喷气。外面的奶牛寻思要不要一犄角捅到窗户里去。旁边几个孩子一边瞧一边乐。杰克叫上几个孩子一起把外面那头牛从对手面前轰开，把它引回到水塔附近，那里有片草。那头奶牛一路走，一路回头看那扇窗户和窗户里的另一头牛。她肯定在想，那家伙可能会追过来。

路过初中的操场时，一些孩子正蹲在操场上玩一种类似

于弹子的游戏，把圆滑的石子弹到地上的小洞里去。许多学生挤在操场旁的铁丝网前看我们，有的大笑，有的向我们招手。现在正是中午，还要过四五个小时他们才能吃上东西。

在杰克的板房里我们就着罐装鲱鱼吃面包，感觉自己已经是奢侈淫逸了。不断有教师和学生来串门儿，他们真正想见的是阿尔顿，同他坐在一起，呼吸同一处的空气，那个虚幻缥缈的天堂——津巴布韦大学，似乎离他们近了些许。

那天下午，我们又去了丛林，走了很长时间。这是片正在消失的丛林，到处可见为农耕做的准备，有的地方空地上就只剩下树桩，有的树桩上还留下火烧的痕迹。一些地块已清理出来，但还未犁过。在丛林剩余的部分，所有树木都有一两根树枝被砍了下来。

到 2010 年，津巴布韦的人口将翻三番。那就是，再过二十年。这个数字使许多事情都显得遥遥无期。

“种树，全民都要种树。”穆加贝如是说，打住那些徒劳的抗议声。他们确实种了，种了连绵不绝的橡胶树，一种快生树种。可这里谁也不喜欢这种树，就像在英国，人人讨厌针叶林，认为它大煞风景。可问题是，美丽的本地树种生长太慢了。

路边长出数以千计的蘑菇，当地人说蘑菇有毒，还跑来提醒杰克别吃。杰克说在这个国家别的地方，人人都吃蘑菇，可当地人还是不信，等着看在他们眼中死定的杰克中毒倒地。

太阳落山时，我们吃了晚饭，有面包和蘑菇，想听听收音机，可收音机偏偏坏了。学校里没别的收音机了吗？还有个

教师有一台，可他不在。最大的问题是电池很难搞到，对大多数非洲人而言，电池贵得超出想象。

在这所学校，还有离它二十英里远的另一所学校，不通电，没电话，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也用不上了。同现代文明最近的接触在五十英里以外——来的路上我们吃午饭的那家宾馆。杰克想给英国家里打个电话时他就乘公共汽车到那家宾馆，在那儿过一夜，享受享受电力、干净的水和一顿像样的晚餐。可电话线路常常中断，要么信号太差，根本接不通英国。

杰克的邮件都送到那家宾馆。他请朋友们为学校的图书室寄些书来，我和阿尔顿都寄了。津巴布韦邮局也不鼓励文学，任何超过十磅的包裹要交钱才能取到。可要是英国的朋友要点小聪明，寄来两个包裹，每个都不到十磅，海关官员就会把两个包裹扎起来，然后按一个包裹收钱。永远都那么富有同情心的杰克说可能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养活自己和家人也有困难，就像这儿的教师。杰克身上没什么钱，所有钱都“借”给这儿的教师了，甚至还“借”了不少给那个无耻的校长。

第二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天，没课，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种玉米。农业是这所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都光着脚，几十人同时在一块地里干，把玉米种子丢进排成一行的小洞。他们喜欢干这活儿，一边干一边唱，甚至有人在田边翩翩起舞。杰克跟他们一起干，别的老师呢？他们太优秀了，怎么能干这种活儿？他自己是白人，行为古怪点儿没人在意。那个农业技术教员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种玉米，跑来问杰克。杰克也不知道，但找到了相关信息。上年打下来的玉米储存不

善——因为那个无能的校长。

这样的玉米种下去长势如何，可想而知。学校正准备两台学期末晚会。一年级会餐时会有焖羊肉和玉米粥。那头山羊已宰了，分成好多块，血淋淋地晾在操场上，好的部位已经下锅焖了。四年级的食品要高档点儿，白面包，真是难得的美味。杰克之前订了二十条，当然既无黄油，也无果酱。一次一位学生家长请他吃饭，招待他的就是白面包和茶。那位家长还说："咱们家穷，买不起人造黄油。"

走之前，我们想去看看此地的诊所，可那里的门关着。一位教师恨恨地说，除了阿司匹林和防疟疾药丸，里面什么都没有。另一位抱歉地笑了笑，说也别把刚才那人的话太当回事儿，他有点言过其辞了。要理解他，现在到了学期末，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医生一个月到学校来一次，要是出了事故或有人病重，他们就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别忘了，不久之前，这里人根本不知道诊所长什么样儿。

同杰克说再见是艰难的时刻，那时我们已明白真正在维持这所学校的是杰克，至少他还在努力，他是这里真正的权威。真是个奇特的位置，因为这里没人会承认他的这一位置，包括他本人。

在寒冷的天空下，我俩驾车离开，一直开到来时我们吃午饭的那家宾馆。刚离开杰克那狭窄的小屋，我俩觉得这里的餐厅漫无目的的宽敞，简直是种浪费。我俩点了冷肉、沙拉、苹果馅饼和冰激凌，身边都是黑人，大都是当地的商人、店主和大大小小的"头儿"。他们都走好运，不用陷在一所丛林学

校中，难有脱逃的机会。当然，我俩还想到，在有些地方，有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电灯、洁净饮水、干净的卫生间、电话。从极度贫穷回到这家地方小镇宾馆的舒适环境中，过快的转变让我俩感到不适应，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仿佛自己的一部分还留在丛林中。这个小镇之所以重要，全因为它处在通向津巴布韦北部的公路边。

接着我们拜访了一位妇女，她参加招募和培训从美国和欧洲来的教师。她说："那么多校长变了质，你都不敢相信。"我们向她说了一则时下津巴布韦流行的笑话：当前津巴布韦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答案：校长。要是你五年不出事儿就算走运了。（听说我们要去参观一所学校，哈拉雷一位教师在我们走之前向我们说了那则笑话。）那位妇女说："校长变质后，维持学校的通常是英国、瑞典、德国来的年轻人，可她对他们说，别那么做，干你们该干的，别越界。帮他们担起责任对他们并没有好处。最后，那地方垮了，总要有人承担责任。"她说那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很难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地方垮下去，她则说："必须记住，从你出生那一刻起，你就在吸收现代技术，甚至连你自己都没觉察到。可他们不一样，要是你什么都帮他们做，他们怎么才能学到东西？"

某位"头儿"刚刚发表了一通讲话，说该把所有外援教师都送回家，津巴布韦不需要这些人。我俩问她有何感想？

"要是那种事也让你烦心，那你真不该来津巴布韦。他们说出的话有一半是快速消费品。"

走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几份学校的校刊，是杰克一手办起

来的。在他来之前根本没什么校刊。他教高年级学生的基础新闻写作和版式编排，还自费带他们到哈拉雷参观报社和印刷厂。全靠他，现在有五十多个年轻人可以说，他们对如何办报至少有了点儿基础认识。

校刊上有一首诗，作者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女生之一。尽管家里空间紧张，缺乏照明，她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习，阅读。她父亲有三个妻子，她母亲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家里共有二十个子女，她母亲生了八个，她是老七。她的家对她的期望很高，她有个三十岁的哥哥做小学教师。

下一站在哪里，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
来卡普方代的那天。
看着漂亮的校园，
我心中充满爱和喜悦。
幸福的同学们
欢呼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们立刻感受到热情。
我无法相信
自己真的成了卡普方代的一员。
一想到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和睦相处的师生，
气力从我身上流逝。

我难以想象将如何离开，
可又有什么办法？
……

这个姑娘参加了六门O级考试，通过了两门，在全校女生中成绩是第二好的。她的绍纳语得了A，还通过了最困难的那门——数学。英语没过。后来她又重新参加了考试，现在一所师范学院学习。

今年有八十多人参加了英语考试，有六人通过，去年则无一人通过。

如今在津巴布韦，要找工作需要通过五门考试。如果你通过了三门，就可以参加护士培训课程。

下面是校刊上刊登的一封来信：

亲爱的编辑，关于课本我有一个问题。每位在校生都交了一百二十元，可我发现上课的时候，大家通常还是要共用一本课本。那么我们的钱去了哪儿呢？是不是说我们交的钱不够买课本？我注意到，四年级的同学七人共用一本课本，实在不便。我们付了钱，就应该给大家每人一本课本，以便大家阅读。

接下来是另一封：

气候的变化造成一些极端的时期，有时食物充足，有时短缺，有时甚至根本没吃的。在菜方面尤其如此。夏

天能吃的野菜很多。那也是个夏天，雨还在下，大家已经开始担心雨总下个不停。终于，雨停了，地里的野菜又脆又湿，不能吃了。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吃玉米粥，要么找点儿别的。显而易见，我们得找点儿别的。我们去采蘑菇，跟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同学，他们是哥俩儿。看到我们去采蘑菇，我妈妈挺开心。

我们去了钱比拉山，那里是古图的最高点。我们发现了许多种蘑菇，有很多我都不认识。我告诉两位同学，只摘一种，但他们没听我的忠告。摘完蘑菇，我们回了家，美美吃了一顿。

第二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邻居家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牛在叫，因为没人放它们出栏，鸡也在吵，要从鸡舍里冲出来。一位村民壮了壮胆，打开了房门，呆立在当场，动弹不得。屋里，全家人都死了。

尸体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检查。刚看到尸体时，大家立刻想到的是去找巫医，大家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去请教一位巫医。有人问，找出那个人，拿他怎么办？一个男人站了出来，说："咱们别像胆小鬼。要是有个孩子跑到我家里来拉屎撒尿，我会只瞪他几眼吗？不，我会拿跟棍子敲破他的脑袋。"男人激励大家，严厉处理行凶的人。

遭到怀疑的是一个哆哆嗦嗦的老太太，差不多九十岁了。她的速度是一小时五十——米。她叫大家去瞧瞧前一天晚上那家人都吃了什么——蘑菇。真相开始浮出

水面。不过，对巫术的戒心还是很大，倒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残忍，他们只不过想查明死亡的原因。

尸检证明，那家人吃了有毒的蘑菇。

巫　术

所有的交谈中这一话题都会出现，或早或迟。同情者坚持说在欧洲“人人”都读星位图，到处都是算命的，就算在美国，占星家主掌某位总统的竞选日程，可人们也没太当一回事。该怎么看欧洲各地巫术的复燃？又该怎么看撒旦信仰？对那些摆弄牧师魔术，信心十足地替人驱邪除魔的人，我们又该说什么？我们（欧洲人）还会见到把巫师送上火刑架，对撒旦信仰施以群氓暴力吗？是不是那已不再可能？

（要是我们没有见识过群氓暴力，可我们见识过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工作者用来做问询的方法，同当年威逼利诱青年人承认参与了巫术行为和撒旦信仰时的方法如出一辙。）

换句话说，非洲以外的批评家们，你们到底在向谁说话？先把自己家管管好吧！

堡垒般的房子

我们数小时就穿越了津巴布韦，由西向东。到哈拉雷后，先要去几个人的家，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那几处住宅屋外的檐廊，原本享受阳光和空气的地方，装上铁栅栏后，看上去就像个大笼子。在那些黑人新贵的房子四周，围墙越来越高，看不到里面的状况。每天晚上，在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受训。找不到工作的前自由战士成立了组织，为那些贵人提供护卫。他们在下午后半段开始训练，操练他们的作战技能，一上灯就要到负责保护的住宅报告，主人睡觉，他们就巡逻。我们开车向阿尔顿家所在的郊区驶去，路上经过了总统的住宅，围墙高大，里面更架起了铁丝卷网，里面有卫兵站岗。总统的车是辆深色玻璃的高级轿车，路人看不到车内的情况。当他的车出现在街道时，四周围护着摩托车队，开摩托车的士兵都挎着枪。要是你正在街上开着车，突然听到总统车队的警笛声，你要立即把车停到路边，要不就准备挨枪子儿吧！这可不光是吓唬人的，真有人因为没有及时靠边停车而挨了枪子儿。我自己就知道有个迷糊的年轻人正在街上骑车，并不知道那警笛声意味着总统车队就要到了。路边的人拼命地喊他，差一点儿他就横尸街头了。还有个医生一边开车一边听收音机里一位叫什么“尖叫”的流行歌手，可他没留意到更紧迫的尖叫声，没停车靠边。于是他的车立即布满

了弹孔，好在他本人没受伤。

到家的时候，多萝茜从里面给我们开了门。大门的锁还是顶用的。到了晚上，屋子的一部分卧室门还要加把锁，因为窃贼可能从露台的窗户爬进来。我的房间在房子的尽头，我在屋内的时候不锁门，可我离开屋子去花园的时候都要锁门，取下钥匙，再往锁眼里塞个塞子似的东西，这样门从外面就打不开了。窗上都有铁栏杆，到了晚上，汽车的方向盘上还要锁上一条粗铁链。阿尔顿已经丢过一辆车了，你遇上的任何人都丢过车。

哈拉雷正在变成又一座约翰内斯堡。在那座城市，有好长一段时间，屋主到了晚上就要安排看更的守门狗，并给所有的窗户装上铁护栏。在城里，有件事大家早早习以为常，那就是——迟早，能偷的都会被偷。

黑人商业农场

我遇见了一位农业拓展人员，要是你还会对官僚制造的深奥术语感到好奇，你或许会问，什么叫农业拓展人员？所谓的农业拓展人员就是农业技术专家。可为什么叫农业拓展人员？别问了，在世界任何地方，那些熟悉庄稼、土壤、牲畜的人就叫拓展人员。还看不出来吗？那是知识的拓展。

这个人参观过一家原先由白人经营的农场，农场过去主要是种植烟草。

"跟我说说那里的情况。"

农场的房舍和所有外围建筑中挤满了亲戚朋友。农场主人是个"头儿"——哈拉雷的某位部长，经理是那位部长的兄弟。所有住在农场上的人种自家一小块玉米地，许多家都有一两头奶牛，混在一起养，那些牛倒也心满意足。农场里还有山羊，在津巴布韦，到处都能见到山羊。

"不种烟草了？"

"不种了。"

"只有玉米和牛？"

"还有几块蔬菜地，种得不错。"

我小心地问："你是不是觉得，那是一种自给自足农业？"

他看上去有点警觉，不过还是保持了幽默。"对，我会这么说。"

"我觉得那也没什么问题。"

"我也是。"

檐廊上的谈话

许多白人早上一起床就抹上防晒油，现在患皮肤癌的人

越来越多。

在津巴布韦,死于雷击的人多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闪电从茅屋的门口打进来,杀死正在睡觉的人。为什么会那样?或许闪电喜欢屋内的金属,如斧头、锄头,还有女人戴的手镯、项圈。

我说:小时候每一次开车都要经过离我们家农场不远处的一小片树林,那里没哪棵树没遭过雷击。这里的土壤里肯定有某种矿物质,引来雷电。

某位白人学者关心的问题是,许多怀孕的津巴布韦未婚女青年想留住孩子,可没处可去。她们被赶出家门,成了现代盲流。他想利用自己和朋友的资源给她们安排个安身之处,这引起一些人(黑人)的愤怒与不满。他们的那种自以为是被我们称为"维多利亚式"。"她们这是自找的。""她们自己干了傻事儿,还能指望别人向她们伸出援手吗?"

其实又岂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会如此,最近一个朋友告诉我,在伦敦一处繁华街区一对年轻男女(撒切尔政府的标准产品)傲气十足地开着保时捷兜来兜去,车上贴着一行字:去死,穷鬼!还有一个朋友也提起过,一次在伦敦西区一家漂亮酒馆门外,一群雅皮士坐着喝酒。一个乞丐向他们走去,他们中一个年轻女性取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当着那乞丐的面点火把它烧了,纵声狂笑。真希望这帮讨人厌的家伙丢了工作,一路滑到底。

这里有一则关于萨莫拉·马歇尔之死的故事，据说他被南非人谋杀了。说故事的是个年轻白人女性。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津巴布韦感到害怕，黑人青年沿街搞破坏，追打白人，有些上了岁数的白人妇女挨了打。我丈夫看见了全过程，当时他正站在一处高楼上的窗边，开始还想，多壮观的游行，到处是绿飘带，接着就看见有人挨了打。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追悼萨莫拉·马歇尔的集会现场，讲话的是个出了名的煽风点火的家伙，你知道那种人，一张大嘴，满口高调。他又说到了中央情报局。这年头，不管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账都算到中央情报局头上。他说：'中央情报局有种著名的思维控制手段，能封堵人的发言。有一次我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突然就说不出话了，我知道肯定是他们干的。'那家伙简直是白痴，可听众就爱听他的疯话。他说得越来越离谱，我感到无聊透了，一直在打瞌睡。可又一想，那太危险了，他们要发现我睡着了肯定会打我。只要那疯子说句话，他们什么都干得出。那天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煽风点火。"

另一个角度

这家商业农场离我们家的老农场相隔仅五英里，那个地

方直到现在我还无法面对。阿尔顿和我自己都认为，这种神经性病理行为不能持续下去了，这趟访问算是一种过渡，一个小小的突破。

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小山还都在，更别说大岩脉了，不过换了个角度。

这座农场所在的地方过去都是“未开发土地”，当我还是小姑娘时，我时常光顾旁边另一处农场，有时候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两所农场现在就隔一座桥。那座农场的吸引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因为那里到处是书，大都是现代小说，不同于我们家书架上的那些。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那里的树林中走，那里的树林同我们家农场上的树林既相似，又不同，因为那里到处是堆满巨大花岗岩的小山包。农场的房子也建在突兀而起的石山上，建房的材料也是以花岗岩为主。我琢磨着这些大石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在那儿的时候，我不停查看四下的“景致”，眼前的山还是很熟悉，可换了个角度后，从我们家檐廊下看到的山谷就历历尽收眼底。年复一年，日出日落，云卷云飞，那景致岿然不动，仅有些微变化，可这里你感到一种震动，感到一种内心平衡，一种一直以来都依赖的内心平衡被打破了。

近傍晚时分，我们抵达那座新农场，浮云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投下黑色的阴影，农场的女主人正带着十几匹马向田野走去。她从不给马喂饲料，她说，它们自个儿在树林里找吃的，不觉得它们长得很好吗？它们从不生病，她从不给它们打针，也从没叫过兽医。都是漂亮的马，毛色在阳光下闪闪发

亮，在树林里自由自在一天后，它们自个儿也很快活。

屋前的檐廊很深，放的家具正适合在上面消磨时光。农场主是个中年人，一头棕发，身形瘦削，紧绷的皮肤下满是活力和点子。我们还没有坐稳，他就说开了，政府、穆加贝昏了头，没有农业机械和配件怎么办农场？可他的心并不是真正放在牢骚怪话上，接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农耕，简直是一种哲学。

一下子，我仿佛又回到那时，因为那时，在我们那个区，至少会有一个农场主总痴迷于从各种研究机构和大学传出的消息——美国、新西兰、南美、南非。在那些新农业思想面前，现代的农耕思想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没必要除草，应该在杂草中耕种；没有必要用化肥，土壤自己会调整，从空气中获取养料；在林木间耕种效果会好许多。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那样一个农场主。更确切地说，这样一个人物狂放不羁，满脑子创新，总要标新立异，不像是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潜藏在每个农场主个性之下的某个永不磨灭的层面，不知哪儿句就会把它点燃起来。“顺便提一句，看过最近一期《农业周刊》上登的那封来信吗？信里介绍了一种驱赶珍珠鸡，不让它们吃种子的新方法，就是在种子落地之前往上面喷大蒜汁。或者，最好就是在种玉米的时候在每粒种子旁边也种上一棵大蒜。”太贵了？对，不过别太较真儿，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身，脑筋一转，问题迎刃而解，不很神吗？

我们五人在农场四下里转转。下午已近黄昏，过了不久，太阳就要落山了。鸟儿还在用日间的调子交谈，可用不了多

久就会转成哀婉的小调，仿佛为一天的结束而抱憾。我们身后的房子里有一群孩子，一个订了婚的姑娘，那姑娘的兄弟，各式各样的访客和朋友，好像俄国小说里写的那样。

我们听着农场主发言，他正在哀悼人类对地球的虐耗。

“不，你不了解。如果你想了解农业，就得换个角度看问题。所有农耕都是非自然，是对自然的侵袭。自打第一个农夫挖出第一锹土，我们就向自然宣战了，而现在，已到了同自然竞赛的地步。谁会赢？告诉你，是自然。”我们站在烟草田间一条泥泞的小径上，刚下过雨，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草气味。“我们在地里只种一种作物，这就违反了自然，于是自然以虫害反击，我们又用农药还击。自然让它的植物演化，让它的昆虫变异，以抵抗农药，于是我们又发明另一种农药。如今，这些地都泡在农药里了。去年我们正给烟草喷药时，突然一阵大雨，雨水把农药都冲进了土壤里，根本没时间在阳光和空气中慢慢消散。”在田边有块二十码的空地，上面正在晒烟草。“都中毒了，有时候你亲眼就能看到那些毒药都干了些什么。想看看蚯蚓吗？”

我们在收割下来的作物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鼻中闻到浓烈的香味。晒干的烟草还是一片诱人的绿色，下一步就要送去烘烤了。农场主抽出一片变形的烟草，双手把它捧在胸前，低目凝视，一脸敬佩。那片烟草上有个小小的敌人——蚯蚓。“自然生出蚯蚓，我们向它下毒。刚砍伐出来的地里没有害虫，不过那好日子没几年，之后害虫就出来了。咱们笑话非洲人的办法太陈旧，砍一小块地，种上一段时间，再换一块地，

可他们不用为病虫瞎操心。当然，现在世界上也没什么地可以像那样耕种了，要像津巴布韦那种种法，人人都得饿肚子。”

我们一路向前走，避开路上的水洼。“这就叫平衡，我们堆上我们的筹码，用非自然的手段在几百公顷的土地上种单一的作物，可自然喜欢混合。她向前走一步，我们也跟一步，这就叫竞争。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抢在自然前头一步，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呢？告诉你，我们聪明过头了，笑到最后的肯定是自然。”

这会儿，路一边就是丛林，真正的丛林，农场主的妻子指向几株兰花让我们看。大家都步入林子，欣赏那几株植物。农场主站到我身边，说：“瞧，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长在这儿，为什么他们就喜欢这里的土壤，不过，瞧……”他双腿分叉而立，弯下腰捧起一把泥土，泥土里混合了腐叶、鸟粪，还有从岩石上冲刷下来的矿物质。“瞧，这才叫真正的泥土，我那块地里的根本就是垃圾，充满化肥农药，那不叫土壤。要是你见过没长东西时地里的样子……像砖块，那儿已经死了。那不叫土壤，这才叫。”他轻轻地捧着那把树林里的泥土，一脸敬畏。我们站了一会儿，相顾无言。太阳已落到林子后面，丛林被染成金黄，鸟儿的叫声令白天向夜晚过渡充满忧伤。“瞧，瞧，”他让手中的泥土自由飘撒回长满青草和花朵的地面上。“瞧见了吗，我那么做也扰乱了这里的平衡。我们站在这里，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双脚已经给这里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什么样的有机生命被我们踩死，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害虫。我们回到路上，可自然要忙上好一阵子才能弥合我们所造成的伤

害。白人到这里之前，黑人在丛林中游荡，可在他们翻土种下庄稼前，他们从不伤害丛林。什么叫庄稼？大部分都是外来物种。就以玉米为例，我们怎么知道葡萄牙人把什么害虫和玉米一起带了进来？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到头来又不得不搞明白……真正的土壤应该能轻松地把手指插进去。”他弯下腰，做了个示范。“瞧见了吗？好好瞧瞧，因为除了这里，世界上已经没什么地方能这么做了，用不了多久。”

农场主的妻子默默地指了指一堆蚁丘上的几株圣诞百合，也叫蜘蛛百合，每朵花都精巧别致，像红黄相间的小爪子。过去，快到圣诞节时，我们常采来一捧点缀室内。现在，再没人会冒冒失失地去采摘它们了。她又指给我们看另一种植物。“马喜欢这种植物，不知为什么。它们从丛林里回来时，总能在它们的鼻头上闻到这种植物的气味。”

农场主大步走进一块地里，他妻子和我看着落日金里泛红的余晖，染上树冠上的白花。沙地高原上开的花从来不像赤道附近的花那样，又大水分又多，像果肉。这里的花精巧、轻盈，香味淡雅，若有若无。

落日余晖越来越红，涌上天空。林木里无声，鸟儿也安静下来，只是还没入睡。走在农场的小径上，我们无语，远远的身后还能听见农场主的哀怨，不过这会也很难同桥那头小镇上的人声分清了。那儿，就在农场主的身边，住着许多农场工人，许多官方记录中并不应该在这里的人。

黑暗中，我们结伴向房子走去。一声夜枭叫……又一声，鼻端传来马的气味。马儿们低声嘶鸣，向女主人打招呼，女主

人也温柔地轻唤它们。圈栏后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黑暗中，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娇小，伸长手去轻拍马头，能看到的只是马头上镶白边的耳朵和闪亮的前额。

我们赶上走在前面的男人们，农场主还在说："黑人们对我们讲效率的那套根本不感兴趣，瞧……"黑暗中，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冲过来。农场主发出命令："停车。"那人停下车，身影在黑暗中清晰起来，一只脚撑在地上，满脸笑容。"自行车没刹吗？"农场主问。"没有。""也没车灯，看得出来。"没有回答。"好了，"农场主说，"你走吧。"那人说了声晚安，然后蹬车子消失在夜色中。

"农场上有十几辆自行车，没一辆有灯，也没一辆的刹皮还管用。他们骑自行车哪儿都去，穿丛林，上小山，慢慢什么都掉了，刹皮、挡泥板、把手套、脚踏板，能掉的都掉了。就算不掉也被偷了，没人会更换。"

我们站在黑暗中，看出那些房屋低矮宽广的轮廓，流溢出昏黄的灯光。我们在思考，或者说，是非洲在借助我们思考："既然路这么熟，还要灯做什么？刹车也没必要，可以用脚代替，把手用不着抓得那么牢，脚踏吗，只要有根杠子能搁上脚就行了。有必要把生活搞得那么复杂吗？自行车不也在走吗？不也一样载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吗？那还吵什么？"

我们回到屋里吃晚饭，饭菜都是自家种的，也没有佣人，他回家去了。这家人自己动手摆好桌椅，端上饭菜，然后再收拾碗碟，刷洗干净。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起一些过去在这附近的农场主。有些名字他一下子就回忆起来："当然，那谁谁谁，他们家的农场就在河对岸。对，一直到打仗前，他们家的农场还在那儿。我当然能记得。"也有些名字没有引起反应，虽然他们的农场就在那些他还能记得的人的农场隔壁。"谁？从没听说过那个名字。你说的是莱特指挥官吗？"

"对，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人人都认识他，算是个有怪癖的人，你懂，那年头那种超乎现实的人物。"家里人有的向他使眼色，有的冲着他笑，他也瞧见了。"他的农场就在四英里外，他试过驯服豹子。"

"从没听说过那人。"

晚饭后，大家分坐在沙发和硕大的靠背椅上，有的抱着狗，有的抱着猫，无所事事。屋里有部老式留声机，哈拉雷有一个人把它当古董给修好了，留声机旁有一架唱片，就等着谁摇动留声机把手，把它们播放出来。屋里回响起老歌的曲调，我对身边一脸难以置信的年轻人说，昔日檐廊上的舞会能一直开到黎明，没别的，就这种老式留声机，要轮流派人看着。他们喃喃地说，要学过跳舞就好了，那语调就跟过去人们说这会儿不能跳一支太遗憾时一样。我说，如今在英国，这种舞又流行起来了。他们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听听远方国度的风俗真有趣。

农场主在描绘他的梦想：他想把这里变成一种公社，虽然他并没用这个词。他已经为新加入的那对夫妇在距主屋一百码的地方盖了套房子，又建了另一间小房，让那对夫妇的父母

住。某人的儿子想买下这里靠近大路边的田,他有资格从事这种高技术农业。“一家人该在一起,”农场主说,他的话同哈拉雷附近农场上那个黑人的话一模一样。两个人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铸就的,不仅在他们掌握的农业知识上。俩人一个生长在男性家长制的传统中,另一个则是性格使然。这位家长的孩子们怎么看待这些计划?他们笑笑,不置可否。他有个女儿,嫁到了南非,丈夫只懂城市街道和办公室,对农作物一无所知。她又会怎么看。“很简单,”农场主说,眉头微皱。他已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女儿可以回来,她本来就是津巴布韦人,可以把丈夫一起带回来。夫妇俩可以组织水上观光,在即将到位的湖畔开一间给游人住的小屋旅馆,那湖的位置离农场只有三四英里。农场主同意为湖区让出四十公顷的土地,不过他打算把损失收回来。

“湖边小屋和水上观光!”我发出抗议的声音,山下那一段的景观可是特别狂野而壮丽。

阿尔顿也抗议道:“那不是又搞成个卡里吧?”

“完全不会,可以搞得带点品味。”

我的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巨大。橱柜背后塞了些玩具。窗户上有防蚊纱窗,还装有粗粗的铁栅栏。丛林战争年代,这一带的战事很惨烈,这里的每一个小山包,每一堆巨石,每一条深谷,每一片茂密的丛林,仿佛都是为了游击战而设计的。浴室里满是蜘蛛、飞蚁、飞蛾,有的往灯光上撞,有的掉进了浴缸的水里。要是在伦敦,就算一只蜘蛛我也会采取必要措施,在浴缸壁上挂条毛巾,好让小东西爬出去,或者在铁皮瓶盖中

装上水，放在低的地方。蜘蛛渴得要死，所以才会爬到水龙头下找水喝。可在这里，你根本不会为它们操心，这里是非洲，太多了。有一次我造访内罗毕附近一家农场，印象最深的就是农场上的一队阿拉伯马。主人像待宠物一样把那些马牵到屋里，还给它们喂糖块。除此以外，我还记得那里的毛毛虫。有时几千条毛毛虫一起爬到屋里来，只能等它们再爬走，把爬到椅子上、床上、餐桌上的掸到地上。据说，过不多久你就不会把它们当回事儿了。

早晨，大家在不同的时间醒来，坐在檐廊上喝咖啡。农场主的妻子出去骑马了，农场主自然已经下过地回来了，又在给我们逗乐，今天早晨是医药。“有种病要治疗，可医生对这种病一无所知。白人和黑人都常得这种病，发病时感到手脚像绑了铅块，脖子和肩膀痛得动不了，浑身都痛，真想不如死了算了。接着，莫名其妙就好了。我估计是被某种昆虫咬了，就像采采蝇或虐原蚊。有时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那是流感，可那不是流感。非洲人都知道那不是流感，我们也知道。”

农场主的妻子回来了，于是大家一起去散步。农场上的猪，不用说，也都自由放养，自个儿找食吃，这里没有圈养的猪。那是一小群满身活力的家伙，跑到我们的跟前，向我们打招呼，等着我们也向它们打招呼。

农场主说，人们低估了动物的智力，要是我们知道了动物是怎么看我们的，可不会高兴。还有，动物也懂得幽默，猪彼此间常搞恶作剧，小牛也一样。动物幼崽喜欢游戏，跟孩子一

样。有时候，他独身一人到小牛吃草的地里，默不作声地坐在树阴下，最后那些牛都忘了他的存在，他看着它们玩叠罗汉游戏，相互把对方从一座蚁山上推下去，直到一头牛最后获胜。获胜者下来，游戏重新开始，可最后赢的几乎总是同一头。你得明白，那头牛就是天生的贵族，自然可不讲什么民主。一群动物幼崽中，总有一个称头儿的，也总有一个爱胡闹的，逗大家笑的。你觉得动物不会笑吗？千万可别那么想，一窝里面总有个小丑，一肚子坏水，总爱搞恶作剧，别的动物都笑它。

我们去看了看蔬菜园。“要是我们只管自家，那只需有十公顷地就能过得像个国王。这里什么都长，我只用了半公顷地种蔬菜，可自己家已经吃不完了。大多数都给非洲人吃了，这里种的大多数蔬菜都是他们喜欢吃的，我们倒不喜欢，我们有牛奶和猪肉。我们已经自给自足了，可还要过度生产。我干吗要种烟草？为穆加贝挣外汇，可他又不让我买配件和新机械。他们管我们叫商业农场、富有农场，他们眼中只看到这里大片的土地，却没看到我们承担的风险。一场冰雹，十分钟就能把这里全毁了。雨季的时候，我成天望着天空，看着雨云堆积，天哪，这次雨水会准时落下来吗？数十万英镑的资产悬于此，简直是赌博。还有蝗虫，农场地里有蚂蚱，我喷农药，可还是可能有一支蝗虫大军躲在丛林中某处数平方英尺的地方，只要一片没喷到，就前功尽弃。咱们自以为杀虫剂对土地没有伤害，可它确实造成了伤害。鸡得圈养，猪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到处跑了，只能在猪圈里熬。谁在惩罚我们，上帝，别以为上帝什么都瞧不着。”

谈起他的手下人时，他像个宠孩子的父亲。他和他妻子都喜欢非洲人，他的话语中丝毫没有我已习以为常的冷漠。他自己说，他们也喜欢他。“他们管我叫疯老头，那也没什么。我古怪，因为我做事的方式新颖独特。他们上我这儿来，要我帮他们做这做那——借钱，帮他们疏通官僚。他们有问题，我帮他们解决，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我听他们的，他们也听我的。不过必须记住，他们按我们的方式办事，就因为这是个现代世界，他们陷进去了，可咱们的方式毕竟不是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也不喜欢，还是喜欢自己的方式。咱们那套办事方式有违他们的天性。到最后，他们选的不会是我们那套。毕竟，这是他们的大陆，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允许我在这片大陆上用上几公顷地，我想他们会的。你理解他们身上重要的一点吗？打仗时，那些宣传让大家都看错了对方，其实他们不是喜欢记仇的人，不热衷于仇恨。跟他们聊天时你会发现什么？他们其实是很睿智的民族，诸事都从长计议，跟我有点像，所以大家合得来。”

餐桌上摆上了早餐，我所熟悉的玉米粥已不见了。过去玉米粥里都是一粒粒玉米，味道好极了，可现在，玉米都改良了，像果冻一样，一点味儿也没有。那些男人就吃几盘这种粥，接下来干一天重活。炒的蛋是农场上的鸡下的，这里的鸡也自己找食，从树林里找虫子和植物，也吃人撒的谷物。还有一种用阿拉伯木熏的鱼，这里的果酱、奶酪、麦片、酸乳都是农场自制的。

男人们谈的都是一天的活儿，仿佛桌上没别人似的，还跟

我那时一样。女人们谈的则是去哈拉雷，这就和那时不大一样了，那时女人们在农场上，能去趟邻家农场就算件大事了。它袭扰着我的记忆，我不得不先去想它，过会儿再想吧。再说，农场主又谈起了艾滋病毒。对这种病毒他相当佩服："这是最狡猾的病毒，前两天读了篇文章，说这种病毒的设计者是魔鬼，不，是上帝设计了它，给人类一个警告。人类在性上太疯狂了，全世界都如此。于是上帝说，小心，我再次警告你们。要是你们不听，下次比艾滋更可怕。"

这又径直让我想起自己那一脑袋旧约的父亲，在他看来，即将到来的二战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丘吉尔和他知道什么在等着人类：愤怒之火焰。这儿，我坐在餐桌旁，看着窗外相同的风景（虽然角度有所改变），听着这个人说话，仿佛父亲重生，怒吼出上帝对人类的新惩罚。五十年已过去了，二战、丛林战，还有其他的一切战争和灾难。过去在现在得到延续，我这么想。

彩虹之上

在哈拉雷，人人都在谈新纳米比亚协议，没完没了，就像我们在两伊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结束时一样。每场战争都会触发一种情绪：那怎么可能？那些人全疯了，毫无道理，怎

么会发生那种事？完全可以避免吗？可它就是发生了，好像没什么能让它停止，接着又停下来。可既然现在能停下来，当初又为什么要发动它？这种想法一路追溯到我们的原始恐惧和信仰：是否上帝、权利就要用鲜血来祭拜？不管怎么说，那种信仰已存在了数千年。或许这种古老的信仰对人类的无助感也要负上一定责任。每当战火熊熊，仿佛没什么能熄灭它时，那种无助感便溢于言表。

现在气氛是乐观的。既然纳米比亚的战争能结束，那莫桑比克的屠杀也能结束，显然那只是时间问题。

甚至有点乐过了头："热爱第三世界的人现在已经在收拾行装，准备去纳米比亚了。"

"也许，纳米比亚会成为他们的乐园。"

"某个地方，彩虹之上……"

办公楼

在哈拉雷的各种办公楼，我待了一、二、三天时间，不容易，保安是个问题。政府办公楼门口可能有卫兵，而援助组织门口，里面的人匆匆打开门上的锁，把你放进去，再匆匆锁上门。各式各样的无赖满城游走，有无业青年，有的还是孩子，还有前自由战士，他们蛰伏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的角落和

地洞里，干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罪恶勾当。“我们当政时，我们白人当政时，可没这种事，”讨厌黑人的人对此嗤之以鼻。“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上街溜达溜达就什么时候上街，大家见面，聊聊家常。”谁上街溜达？白人。黑人都被看成潜在的贼。

无论在政府办公楼，还是在援助组织，最常听到的词就是基础设施、拓展人员、援助资金，当然还有穆加贝同志。

我坐着倾听，不仅听事实和数字（那些事实和数字也写入各种小册子和报告中，现如今我的屋里已经铺满了），还听说话人的语气和口吻。有的热情激昂，有的则悲观失望，如同孩子生了病的父母，还有的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玩世不恭。问题之症结：新贵族，堕落的精英。

“下到农村去，看他们如何劳作，那么乐观向上，虽然贫穷得可怕。回到哈拉雷，再看那些硕鼠在你身边招摇过市，真想……”

在一处政府办公楼的墙上，我看到这样一副宣传海报：

老板驱赶人
领导激励人
老板依赖权势
领导依靠良心
老板让人害怕
领导播撒爱意
老板总说“我”
领导总说“我们”

老板说，你做错了
领导说，你该这样做
老板知道怎么让别人去做
领导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老板索求尊敬
领导值得尊敬
做领导，别做老板

他们说这样的训词出现在这个国家所有政府办公室的墙上。

硕鼠挨训

在某个援助组织办公室，我听说了下面这则故事，说故事的人想告诉我，或许更想告诉他自己，事情还没那么糟。

某位政府中位置很高的官员，一个女性“好官中的一员”，一直跟自己远离哈拉雷的偏远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她坚持要自己一个男同事跟她一起去村里看看。“你多长时间没回自己家的村子看看了？好吧，去我的家乡看看吧，一定要去！”虽然一肚子不情愿，他还是同意去了。第一晚住得还不错，落脚地是家像样的酒店。第二晚就不行了。她说：“老百姓都住这

种地方,你怎么就不能住呢?"一路上他抱怨个不停,受够了罪。过了最后一处市镇后,他们步行好几英里,穿过丛林,才到她老家的村子。她把他介绍给地里干活儿的妇女,她们立刻大叫起来,他是个"头儿"吧,跟着又七嘴八舌地说政府都在做什么。他不高兴地说,"她们得尊重我!"一个孩子被打发去叫来村里的老人,一下子来了十到二十个。年纪最长的那位说:"坐下,我的孩子,现在你得听我们说。"那位高官顺从地坐下来。"我的孩子,"那位发言人说,"你干得太糟了,你的心跟我们已经不在一起,我们听到的一切都在说你不像话。那场残酷的战争后,怎么我们看到的人都像你一样?你们在哈拉雷发了财,把我们都给忘了。"

那位大官就那么坐着,听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数落自己,接着是妇女。回去的路上,他说,这趟旅游实在不一般,那些村里人让他想起他的责任之所在。

说故事的人轻叹了一口气,说:"瞧,事情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个大官后来痛改前非了吗?"

"那,恐怕我就不得而知了。"

政治部门

一位中级政府人员，一位年轻女性（黑人）向我痛陈公务员体制的弊端。“我们必须确保公务员手中没有实权，”她说，“要不咱们做出决定时，他们就会百般阻挠。看过《早安，部长》吗？”

我回应：“也有人争论，负责的公务员体制可以限制糟糕政府的过度行为。”

“可我国政府不糟，它很好，它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民的最大利益。”

这个部门里的男男女女都是些有魅力的青年，都三十上下，无论穆加贝定下什么路线，他们都会积极响应。这意味这他们说起话来要像个马克思主义者，就算他们心里其实并不信奉那一套，意味着他们必须支持一党制国家，重要的是，必须支持执政党对政府各个部门越来越紧的控制。每年，新官僚成倍增加，有人宣称，就像真菌，吞噬一切。这些头脑灵活的人不可能不晓得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关起门后他们彼此间会说些什么？猜都能猜出来。可对任何一个可能会提出批评的人，他们换上笑脸，摆出一副统一战线的架势。

我说：“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犹豫一下，然后笑着说：“他是中国人吗？”

我的同伴是位在农村待了很长时间的女性，她提起了南

斯拉夫在此处建的谢拉顿酒店，有人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建筑。它被称为人民酒店，可没哪个老百姓敢走近，因为他会立刻被赶走。这些政府人员迅速交换一下眼神，看来他们也不是没听过那些批评。

“我听中央省一名农村妇女说过，他们建谢拉顿酒店的钱足以为我们全省提供洁净的供水。”

那些政府人员没看我们，也没有相互对视，由此我推断，他们可能也同意那位中央省妇女的观点。

和一些平民百姓聊天时，我发现，那些高大的新建筑不单单是他们眼中之痛，就算在政府热烈支持者的眼中，它们也是一切不满与怨恨的象征。不单有这座奢华的人民酒店，还有新的党总部，为了建它，甚至最穷的人都捐了钱。还有英雄广场，也花了不少钱。现在，又有人说要在小山顶上建新的议会大厦。“旧的有什么不好？”人们问道，其实那是座相当迷人的建筑。

“我估计那些头儿从家里到议会大厦要乘直升机了，他们从来不会踩脚下的土地，那以后他们跟我们的接触就更少了。”

老百姓对那些“头儿”一天到晚出国也有看法。有一则关于穆加贝的新笑话：

“穆加贝和哥伦布有何相似之处？”

“他不断发现新大陆。”

艾滋病

如今所有的交谈迟早都会触到一个话题——艾滋病。在政府办公楼里当然不会。按照官方的说法，艾滋病在津巴布韦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卫生部长刚刚发表公开讲话，说那些关于艾滋病的传言都是包藏祸心的白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摧毁这个国家刚刚起步的旅游业。这番话让医生们，还有所有知道真相的人既愤怒又绝望。医生们说送到门诊的孩子有一半是 HIV 阳性，军人和警察也有一半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处有人死于艾滋病，可医生不说艾滋病，他们有别的不大会引起恐慌的叫法。有时死者也没被诊断出有艾滋病，被当成肺结核、疟疾、流感。

之后不久，政府改变了政策，津巴布韦开始发起有效地艾滋病宣传。

一位官员如是说：记住，津巴布韦是成功的非洲国家之一，十分之一的人口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86％的儿童接种了麻疹、脑灰质炎和破伤风疫苗，婴儿死亡率 61‰，平均寿命男性五十七，女性六十一，识字率达到 75％。全国范围有诊所网络。虽然还相当原始，可基础设施已经建起来了。负面呢？降水不均引起的周期性营养不良，出生率和肯尼亚在一起排世界最高，其原因部分要归于政府。当津巴布韦刚建立时，政府称黑人妇女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任何反对都是白人反黑人的阴谋。要是没有艾滋病，津巴布韦人口在二十年时间里会

翻三番。就像每盒牌中有都有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艾滋病。

据说，回古巴的士兵的血液里也满是艾滋病毒。

佣 人

我问起多萝茜，哪种雇主最好？她回答说，海外雇主最好，其次是老罗得人，“至少他知道自己是谁，该怎么办事。总体而言，他们还算公正。”她最厌恶新冒出来的黑人权贵，那些人虐待家里的佣人，付的薪水低，还不会给你应有的休息时间。关于他们的恶行，她说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之一，他们连自家亲戚都剥削。后来我又向一个“头儿”问起这些事，他说她有偏见。“当然，有时我们也会犯错。”可她也必须明白，每个成功黑人身边都围了一圈没工作的倒霉亲戚，他有义务帮助他们。每个“头儿”的家里都挤满了穷亲戚，他管他们吃喝，作为回报，他们帮他做做家务，干点零活。“头儿”还要为家族里的孩子们付学费，给他们买衣服。有的“头儿”一下子要承担三十个孩子的学习费用。我回头又问多萝茜，她说：“有时候，确实如此。我又没说他们全不是好人。可如今，好多富人干起事来就像白人一样，不会帮家里人。”

援助人员间的交谈

“我也不清楚这个国家有什么，它就是抓住了你的心。我去过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可这个国家……你真心在乎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许因为它有机会，可我觉得还是这里的人，我不想离开他们。我被派到别的什么地方时，会为这里发生的一切而牵肠挂肚，我清楚。”

“为什么会为这个地方着迷？答案太简单了。”

图书小组

这会儿，每个旅行者都梦寐以求的好运来了，这种好运既没法计划、期待，也没法预订、预见。有一队人要到乡下去，制作农村用的指导材料，我获邀与她们同行。这群人，她们的想法与工作可称得上地地道道的革命性，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发起人凯西是个南非人，曾在南非农村工作过，津巴布韦农村里的人对现代生活的一无所知让她震惊，甚至那些欧洲人早已习以为常的家庭用品他们也没听说过。再者，这

是对才能、潜能多大的浪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被闲置不用，那可是农村地区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创造精神，却既没有人承认这种资源，更没人花工夫去开发。”这里存在这一个巨大的断裂与不足，有些事儿值得去做，于是她决心去做。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支队伍（并不是一次成形），成员包括她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塔伦特，前自由战士，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西尔维娅，一位漂亮的女士，八个孩子的母亲；克里斯，一位腼腆、敏感的年轻人，艺术家总是带有这种气质，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她们邀我同行时，那支队伍已经完成了两种书。她们把书译成了六种语言，所以每种书都包括好几本。第一种书名叫《让我们一起动手建设津巴布韦》（这个书名还是津巴布韦村民们自己定的），指导人们如何克服种种民事纠纷，如何真抓实干，别去理会那些政治宣传和口号。某些政治活动分子以为只要你把一串字符喊得够响，时间够长，现实就会改变。

第二种书还在编纂过程中，它详细解释了种种经济问题，如何获得银行贷款，如何开立银行户口，如何记账，如何评估建一座大坝的成功机率……打口新机井……建座蔬菜园……开家乡村商店，甚至路边摊档。每种书都是由文字和卡通画构成，好像漫画书。

现在小组正在计划第三种图书，一本专为妇女设计的书，也将是最有争议性的一本。虽然在农村，妇女作为改变现实最积极动力的事实已被广泛认可，可每日每时她们还要顺从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界上许多新成立的政府都宣告对

妇女的传统看法既落伍又低能，津巴布韦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要给予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工作机会。”可话说完还是顺从于传统。另外的例子还有利比亚和伊拉克。在那里，同妇女谈上几句，你就知道说是说，做是做。津巴布韦也不例外。

“我们都知道，法律可以改变，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头脑。”（这句话是谁说的？列宁？斯大林？罗莎·卢森堡？撒切尔夫人？）

编写这样的图书可完全不同于坐在哈拉雷的办公室里，灵感涌现时写下几章。编写第一种书时，凯西和克里斯把津巴布韦上上下下跑了个遍，找出在各地地方事务中作用突出的人，或者有潜力发挥突出作用的人。有时，她们还得跟地方官员的阻挠抗争。她们资金少得可怜，常常一天只吃面包加橙汁，激励她们坚持下去的是理想与村民的反响。这些村民还未完全从内战中恢复过来，有的只接受过半吊子教育，有的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大家都期望他们像现代人一样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专业知识和信息正是他们所渴望的。“我知道有这方面的需要，”凯西说，“可直到我真正走进村子里，才意识到这种需要有多大。每次我们下到村里，那种欢迎，好像我们立马就把好处带来了，那都是因为政府过热的宣传。不过我们却说，你们该这么做。我们的话一被听懂，立马就被村民的请求包围，要我们去他们家里走访。于是，小组由二人扩大到四人。”不久，政府官员也留意到这个小组，留意到她们的作用，也开始支持她们。

和以往一样，为妇女编的这本书也分几阶段完成。首先，

小组成员全国巡回，找出具有代表性的妇女，还要劝说每位做更多的工作，她们都说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现阶段，她们的任务是下到各地的农村，访问妇女个人和团体，劝说她们参加到这本书的编写中来。图书的编写工作启动后，小组成员回到哈拉雷完成第二本书的扫尾，完成翻译。然后，她们再次为那本妇女图书到全国各地走访，我加入她们的时候，她们在外面已待了五个星期，十分疲惫。外出的时候，她们乘地方上的长途车（这可不是玩笑，长途车都严重超载，常会出故障），乘火车，可能的话搭小车，偶尔也会坐上政府官员舒服的小车。最后一种情况越来越多，地方上的官员们正逐渐意识到她们工作的巨大价值。不同地区的官员的态度各不相同，官员要是作起对来，能把一切都毁了，大量的时间花在地方党政领导的办公室中，花在礼节，甚至拍马屁上。

“不过，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越来越多，甚至传来消息，邀请我们上他们那个地区去。”说起话来，凯西总是一口气把什么都说完，其中既有热情，也有对自己工作的意义的认识。

这天早上，已经近中午了，我们五人一起乘车沿着穆塔雷的公路向下驶去，我也不再想去观察道路两边的地标了，什么摇而不坠的巨石、河流、峭壁之类的。开车的是西尔维娅，我坐在她的旁边，这样从后座凯西那里，如潮涌来的信息和数据能流进我的右耳，要走运的话，还能用我已经涨满各种事实的大脑把它们理出个头绪。

会面在当地一个政府部门中举行。政府就是政府，我们从哈拉雷一路奔来，却好像只过了几分钟。参加会谈的妇女

代表共二十人，有些花了好多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时间才到这里。我们到时，她们已等在那里，严肃、认真，全神贯注。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竖着耳朵听”，她们的的确确是竖起了耳朵，这会在听凯西用英语的发言，每一个音节，每一处停顿，每一点细微的变化，都要在她们脑子里转个圈儿，评估一下。这些妇女代表都很贫穷，每人都要用很少的钱让一家人吃饱穿暖，有的人每月的收入仅有二十到三十镑。（不过小组成员说，这还算是相对富裕的，等下星期到了马塔贝勒兰，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贫穷。）看着面前这些智慧、幽默的面孔真让人舒心，她们时不时扭头和自己身边的人说个笑话，或者发表一下自己的评论，接着笑起来，再接下来笑声在整个屋中传开。一名妇女说：“这几个星期她都在自己那一地区收集资料，工作量要比组织者的预计繁重许多。”接着，又有一名妇女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感到，她们好像在说：“你们多好，坐在小车里在这个国家跑来跑去，我们可都靠自己的两条腿，最多有辆自行车。”她们的言下之意中，“你们”不仅指凯西，一名白人妇女，也指克里斯，一名黑人男性，差不多跟她们一样贫穷；还指塔伦特，她住在锡穆凯一座远不能称作富足的农场上；还指西尔维娅，一名孩子不见得比她们少的女性。

凯西曾说过，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革命性，超越了传统。现在，我开始体会到她话中的含义。

她在对妇女代表们说，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很热烈，各地都有妇女为此而工作。现在，她希望在座各位代表与身边的代表讨论，讨论她们希望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像这样主持会议

是革命性的，实际上，让我想起关于俄国革命早期的一些故事，那时理想主导实务，年轻的革命者深入乡村，要村民掌握自己的生活。没有口号，也没有华丽的辞藻。

面前这些妇女，她们听到的要求不仅是掌握自己的人生，不向男性屈服，还要克服自己不愿同陌生女人交谈的心理——那个女人可能来自距自己的村落一百英里远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在推翻部落、氏族传统。这片地区统称马绍纳兰，可这个统称下面又有无数分支。从在座代表的反应上看，这本书所具有的颠覆性已一览无遗。当地政府官员坐在会议室的后排，一切看在眼中。

很快，代表们热烈讨论起来，接着每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所有的意见被记录下来，之后主动权再次还给妇女们自己。凯西说:“现在，我们希望你们，妇女自己，来完成这本书。如果你不识字，那就把你想说的说给一个识字的邻居听，请他把你的话记录下来。你们送来的可以是故事、诗歌、笑话、文章，什么都行。当来自津巴布韦全国各地的资料收集完毕，我们会把资料再发给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决定，哪些将收入我们的书中。”

这出乎代表们意料之外，开始他们显得有点疑惑不解，接下来就十分开心了。她们对我们，也相互间讲起自己想写什么，许多都是对地方党政官员的批评。之前，小组成员就告诉过我，农村群众什么都敢说，不管什么人，什么事。

德兰士瓦的废屋

这次会见的地点是马隆德拉，在我弟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是距他的农场最近的市镇。许久年以前，他一家人在这里躺在树下，和夜晚的丛林融为一体。根本没法把过去同眼下在地方政府举行的会议作比较，二者根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就像根本无法想象如何向弟弟提起这种妇女会议一样。无论如何，那也不可能了，因为他去世了。他死在了德兰士瓦，死在奔向医院的车上。要是那辆救护车达到欧洲人早已习以为常的标准，他可能就不会死于突发的心脏病。

弟弟去伦敦看过我两次，我俩花了许多小时，许多天的时间相互提问：还记得吗？他也说起了他的新生活，可他并不喜欢德兰士瓦，当然，弟弟不是那种牢骚满腹的人。有个故事他说了好几次。每天晚上，他都要到沙地高原上散步，开始时身边跟着两条狗，后来就只有一条跟着他了。每次他都经过一片因过度放牧而肮脏的草地，草地中央有幢已损毁的房屋。

“跟英国不一样。在英国，你要是碰上幢废弃的房子，总有人知道房子的主人。可在那边，它实在让我觉得古怪，那老房子肯定也有人住过，我好奇那家人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在房子四周转转，看到一株土豆，已经开过花了，于是我就把它拔了出来。在水泥地面的一条裂缝下面长了不少土豆，那地方空着肯定有好多年了，真是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继续

在房子里这敲敲，那看看，越来越多的土豆。所有东西的下面，砖块、水泥板，都长满了植物的根，不知哪儿是个头儿。那房子肯定有什么招土豆的喜欢。”

“不过我觉得土豆不大喜欢石灰。”

“经过这么多年，还能有多少石灰剩下？我不断把砖撬开，直到所有的土豆都露出来，足足有两大袋，我也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过去还有鸟，还有狒狒，可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带了点儿土豆回家。后来我每晚都去，那些土豆一直都在，可有一晚突然全没了，或许哪个放牧的拿走了，至少还能对谁有点儿用。我可不愿那些土豆堆在那里一季又一季，白白烂掉。”

夜总会

会见的下一站在牙买加旅店，过去这里是白人夜总会，现在是农村妇女培训中心。会议室里坐了三十名妇女，我们一见到她们就知道，她们已经等了好久了。凯西幽默地向她们表示歉意，她们则幽默地接受了道歉。我过去就听说，离哈拉雷越近，妇女们的穿着就越好，也越有自信。眼前这群妇女就聪明伶俐，镇定自若。

小组向在场的三位官员打了招呼，他们被视为小组的同

盟。同样，他们坐在会场的后排。这里的工作用语是绍纳语，克里斯坐在我的旁边，既为现场画速写，又为我做翻译。每次会议克里斯都从头坐到尾，一边听，一边选择或紧张，或幽默，或有戏剧性的场面画下来。会场上的男性有时会插进话来，评论或批评。凯西传给我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些男人正在做反面教材，教会妇女们如何应对对手。有个男人坐在我正后方，一个体形庞大的中年男人，穿着三件套，是社会的支柱。说话时，他表情镇定、自信。

会场上的三位男性礼貌、正式，而与会的妇女代表们则提出各种我们在别的地方已听过的观点。小组成员说，在津巴布韦，从一头到另一头，妇女们提的问题都一样。当妇女们质问政府的代表时，要求他们下到农村，向村民解释他们的新政权时，那些男性也没多大的反应。男性官员常常利用女性的无知。当会上的妇女们谈到卖淫问题时，会场上的男人才真正骚动不安起来，小组成员说过，她们发现在津巴布韦农村的各个地区都有卖淫的现象存在。在她们走访各地之前，她们和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卖淫主要是城市问题。我身后的那个男人说，如今农村妇女也贪心起来，不满足于自己丈夫挣的钱。妇女再不像过去那样了。她们要职业，忽视了自己的家庭。比如说，你们在这儿快活的时候，谁在照看你们的孩子？会场上的妇女们大笑起来，说邻居会把自己的孩子照看好。那你们的丈夫呢？谁为她们做饭？没一个妇女说男人该自己动手，只是说有人会做。

我身后的那位大义凛然的异见者又说，女人把钱都花到

化妆品和新衣服上，她们关心的就是在男人眼中扮得漂亮，讨男人的欢心。

完全不是这样，一位女代表回击说，那只是尊严问题，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体面。其他的代表们轻轻鼓掌为她喝彩。

我听见后座的那个仿佛怀中抱了个女人的男人压低声音，对女人贴着耳朵说："你明白，我说的那是事实。"

我觉得，让这些妇女的声音在世界各个地方都能被听见，是件有意义的事，可又觉得在这间会议室里，"世界"仿佛与这里毫不相干。

妇女们继续提出要求。男人们骚动不安，气氛还算和谐，大家说说笑话，然后一阵哄堂大笑。

接下来，妇女们唱起歌来，一面鼓掌击节，那是一首她们为这次会议专门编的歌。会议已到尾声，就在妇女们一个个收拾东西，站起身准备退场的时候，我身后那个男人轻声说："男人赶走老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是个巫婆。"

一阵寂静，会场上的气氛骤然一变，令人感到背上凉飕飕的。再没有笑声，那种寂静让人难受。在那之前，会场中的一切，风格、语调都显得理性、现代，可巫术来自过去，人人清楚它的威力。妇女们不去看那个男人，也不再发出笑声。要我说，她们害怕了。我扭头看身后那几个男人，他们显得很得意。毕竟，最后的话语权在他们手中。

和以往一样，小组成员对妇女代表们说，等到讨论提交上来的材料时，她们会再回来。

火　车

好多人打电话对我说，真羡慕我，能跟这么个小组跑这儿跑那儿。"在哈拉雷，放眼皆是腐败和官僚，人也越来越玩世不恭。可下到村里去，跟那里的人，尤其是妇女会面，绝不会那样。"

这次我们要乘火车。

1982年时，他们说铁路系统完蛋了，因为缺乏投资，也因为白人技术工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没人知道怎么才能把火车开起来。我曾和一位穆塔雷来的农场主一起站在铁路边，听着他哀叹："在咱们政府的领导下铁路一直通到了这儿，每天有十几班到贝拉，准时高效。现在一天就剩下一两班了，肮脏，满车二流子。"

新的资金在投入，铁路系统也正在恢复之中。可当我在哈拉雷宣布我们这次乘火车时，好几个人说："千万别，太危险了，除非能搞到头等车厢票。"

听到这些，多萝茜说她常常乘火车去布拉瓦约，坐三等车厢。说这话时，她正往坐满客人的餐桌上端菜。阿尔顿把她调教成一个名厨。这位身材丰腴的女士，穿着漂亮的裙子，看着我们吃，确信她做的每道菜我们都会尝一尝。当我们对她的手艺称赞一番时，她也咧开嘴笑起来。听说我要去马塔贝

勒兰，她也挺开心，阿尔顿也一样。我们吃芒果时，两人你来我往说上几句，缅怀一下自己家乡的优美风景，又第一百次向穆加贝的团结法案致敬。

多萝茜说，我会觉得开往布拉瓦约的火车“还不算太糟”。人们有的时候根本不了解情况就说三道四，她觉得那实在有点遗憾。实际上，在座所有人近来都没有乘过火车。

小组乘二等车厢。在火车站，等着取早已订好车票的人大排长龙，可过了取票时间却没人露面。队伍又延长了一倍，没过多久，售票厅里已挤满了人，取票的队伍已失去了队形。“毁了这国家的不是腐败，而是效率低下。”这话我听到已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十次。

我们找到站在一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请他帮忙解决我们的问题。显然，他们的职责并不是同我们打交道，可他还是帮了忙，出于好心而不是贿赂。大家终于站到来月台上，我敢发誓，这里与过去相比一个螺钉都没变。长长的月台上人头攒动，列车进站了，一节节车厢有半英里长。过去，大多数车窗边都露出几张白人的面孔。再往后，有几节车厢的车窗边也露出一些黄种人的面孔，最后几节车厢里都是黑人的面孔，挤得满满的。这种安排意味着在往日，月台的大部分仅供稀稀拉拉的白人乘客使用。

我向小组成员们描绘起往日车站月台的情景，她们听得入神，过去对她们难以想象，纷纷大笑起来。凯西说，在她的记忆中，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措施也没有那么严。塔伦特的整个青春都在丛林中打游击，从没听说过索尔兹伯里。克里

斯现在才二十刚出头。

就在我们前面，一位黑人妇女浑身重负，仿佛她的在场就是要向我们展示某些统计数字。她肚子上挂了个孩子，背上背了一个，手里还牵一个。她在月台上铺了张毯子，毯子上还坐着三个孩子，其中有一对双胞胎，约十八个月大，另一个五岁左右。三个孩子坐在毯子上，不吵也不闹，大人们在他们头顶上走来走去。我说，很少有白人孩子会像他们那呆呆地坐着，一点儿也不吵闹。凯西说，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会要乖，可她还是认为迫使孩子这样长时间坐着，一声不发实在有害。我说，要是一个女人不得不同时应付好几个孩子，那孩子还是乖巧点儿好。塔伦特听着我俩的对话，一言不发。我俩问她的想法，才发觉她根本没觉得眼前这个妇女和她的孩子有什么出乎寻常之处。也可能，她累了。小组成员告诉我，五个星期前，当她们刚刚踏上这轮环津巴布韦之旅时，她们情绪高涨。可现在，她们在等着修整。"真正干起来就好了。"

长长的月台上人潮涌动，几乎全是黑人，其间夹杂了十几张白人面孔。几码外，克里斯挥手示意看到了我们，他挤过涌向车门的人流，向我们这儿来。那个孩子的母亲发狂地跑来跑去，哭出声来，一个孩子在人潮中消失了。她身边全是孩子，扯着她的手，抱着她的腿，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哭闹，表情严肃的脸上，深沉的大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克里斯去找车站上的工作人员，请他帮帮那个母亲，我们先上了车。我们三个女人进了一个包厢，克里斯和另外五人进了另一间包厢。我们不想分开，大家已经感觉像一家人。

我发现车厢内同以往完全没有变化，亮闪闪的棕色护木给人坚实、体面的感觉，上面涂着黄、绿两色的油漆。对，我听人说，可能还是过去的老车厢，根本没有换过。这儿是可折叠起来的铁洗脸盆；这儿，还是这个地方，是挂钥匙或皮带的钩子，你也可以拉着它爬到上层床铺上。一连串念头在我的头脑中依次闪过，这会不会还是1948年，甚至1938年我坐过的车厢？

这时，管理卧铺的列车员出现了。卧铺票和坐票同时出售，昔日这位列车员总是白人，现在则是黑人。干这项工作要有一种慈父般的风范，不停提醒大家不要把财物放在车窗附近，车站上的小偷可能会把手伸进来，有时他们还会用长木杆加钩子。最近雨多天凉，注意保暖。当他开始整理床铺时，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塔伦特想把车窗关死，在她的村子里，大家睡觉总关好门窗，防小偷和野狗，甚至野生动物。凯西和我则确信没有新鲜空气我俩肯定睡不着觉。大家最后达成妥协，那位列车员就站在一边听。要是我们允许，他会为我们做出裁决。他去了下一间包厢，我们在里面，感觉被包裹了起来。大家一个个躺下，我睡下铺，塔伦特中铺，凯西上铺。我们原计划火车一动起来，我们就睡觉，可火车迟迟没有开动。月台上，来送行的人还三五成群站着，有说有笑，一罐罐汽水在车窗内外穿梭传递。这一幕，这种活动和对生活的享受，让人想起意大利。我想到的是二战中上百次离别场面，充满骚动与澎湃。不过如今，那种场面只有在机场才能看到，月台上的气氛也失去一味。多少次我看着火车缓缓驶出月台，

听着刺耳的汽笛声。整个二战期间，那种声音左右着索尔兹伯里的生活，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处处都能听到。现在的机车又有了一种新声音，一种短促的汽笛声，不是发车的信号。九点没有，十点也没有，一直到十二点，还没发车。

凯西和塔伦特急于为津巴布韦的荣誉辩护，不断向我保证，她俩常乘这班夜间车到布拉瓦约，在那儿工作一个白天，第二天晚上还是乘这班车回来。这种事儿还从没发生过。

夜里两点半，火车头又鸣了一阵汽笛，向前走了几百码，又停了下来。我们都睡了。

早上六点，还是那位列车员，端着咖啡和饼干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悄悄瞥了眼那扇车窗，可还是没有逃过凯西和我的注意：夜里，那扇窗已经关上了。他问我们，睡得好吗？凯西立刻用绍纳语向他回敬问候，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现在，列车停在哈拉雷和布拉瓦约中间某处，一动不动。这时候，我们本该已经到了。凯西和塔伦特开始焦躁起来，有好几组妇女可是长途跋涉来与她们见面的，最早的一组早上九点半就到。火车还停着，隔老长时间才动一下，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妈常说，出门别忘了带吃的和咖啡，"凯西说。到外面走廊上转转，有的包厢门没关，显示好客，可以看到里面的乘客正在享用鸡和水果。有人发牢骚，那种用来缓解焦虑的低音。塔伦特安静地躺在自己的铺上，说打仗时自己学会了忍耐。有时，他们潜伏在丛林中，等待安全再行动，一等就是好几天，没东西吃，也没水喝，就靠吃树上的果子维持生命——要是有果子的话。有一次下完雨，整连一百多人围着一棵树轮流吮

吸同一簇树叶上滴下来的水珠。塔伦特说："有时回想起来，自己都不知道那些事是怎么做到的，现在肯定做不到了。"有一次一枚炸弹爆炸后，她和几个人一起去收拾残肢碎体。"常能捡到一只手、一只脚、一块肝、一颗心……你想，这可是我们的同志。常常只能把一部分残肢下葬，必须心狠，不去想自己干的事儿。"有一段时间，塔伦特的工作是拆炸弹引信，我问她在什么地方，她说："在津巴布韦，他们轰炸怀疑有游击队营地的地区，有时能炸到我们，也有时炸不到。"凯西也在侧耳倾听，由此可知塔伦特平时很少提起那场战争。"我算幸运的，"她说。"我不算漂亮，所有漂亮姑娘都曾被指挥官们带到丛林里去。"她的话很让我吃惊，我以为她就够有魅力的了。

她的战争进行了好多年，她从没做过女孩，然后突然就成了年轻女人，穿着年轻女人的衣服，涂化妆品，跟男人打情骂俏。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已经是名战士，当遇到她未来的丈夫时，她依旧是名战士。在集结点，一些前游击队员一致同意，在锡穆凯创立一座共产主义农场，她也是其中一员。她说结婚前，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真不明白姑娘们怎么会嫁给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人。"现在夫妇俩有三个小孩，当她外出时，丈夫就照顾孩子，凯西也一样。两人说要不是有个好丈夫，自己根本不可能从事手头上的工作。

"有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做的事情。"塔伦特说："有时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还活着。在丛林里那会儿，也不相信战争会结束，自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战争似乎从来没离开过她，她有严重的头痛症状，

有时一连几天都走不了路。听着塔伦特的话,我仿佛又坐在弟弟身边,听他讲他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我们掩埋死者,照顾伤残,可实际上在看似寻常的人中,到处都有曾参加过战争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伤痛没显露出来罢了。有的麻木了,有的曾被严刑拷打,还有的永远无法真正相信正常生活会再次开始,也有的永远因为悲痛而行动迟缓。

这时,流言在列车上散播,车厢里也热闹了起来:有的说刹车出了问题,有的说引擎坏了,还有的说暴雨冲垮了路轨。窗外,地上到处是水坑,空中布满阴云,只有偶尔无云处才透出蓝天。

列车向前走走停停,在圭鲁附近,它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向前猛冲了一英里多,接着又一英里,再接下来就彻底停了下来,像条受了伤的毛虫趴在地上。

乘客们开始下车,有的溜达溜达,有的坐在路基上,克里斯也下去了。开始还是一两个一两个地下,接下来就成群结队了,最后好像整车人都下了车。那场面看上去有点儿像野餐,不过没有食物。这一场面使我回想起听说过的过去的事情,那是在我出生之前,也就是在一战以前。那时向北去锡诺伊的火车中途停车时间非常长,据说要是正好铁路附近有猎物,比如说小羚羊、捻角羚羊、大角斑羚,满可以跳下车打一头再回车上,肉就在乘客间分了。如果猎到一头狮子,猎人还能有时间剥狮皮。司机要是心情好,会中途停车,让车上所有乘客到车外野餐。

我们的火车终于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准备向前冲一冲，它发出短促刺耳的汽笛声，召唤在车外溜达的乘客回到车上。于是大家一起跑了回来。可没一会，车又停了下来，有人拖着箱子走到路边，希望有人能捎上他们一程。想搭车的有十几人，公路上却看不见几辆车，而且如今人们也不会轻易让陌生人上自己的车。

中间一段相当长的等待中，两个乘头等车厢的白人年轻人独自坐到树下，看着身边热热闹闹，自己却无法融入其中的场面。

约正午时分，列车在一处村庄附近又停了下来，乘客们成群结队地到村里买汽水、饼干。一个半裸身子的黑人小男孩从自家的茅屋向列车跑过来，他的母亲在他身后注视着他。他手里提了个大塑料桶，踏上火车，开始用列车上的水龙头接水。他穿过一节节车厢，每个水龙头处都停一会儿，接点水，他母亲在远方又挥手又叫，怕他被车上的人潮卷走。过不多会儿他骄傲地回到自家茅屋，手里的水桶已盛满了水。

列车轻轻地喷着烟雾，到底是什么在阻挡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停一整天吗？再过一夜？还是要永远待在这儿？时间缓缓流动，都已经等了这么久，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能让等待结束。最好还是别去看手表，到这时候，在布拉瓦约的政府办公楼里想知道我们究竟在哪里的妇女代表已不是一组，而是两组。

又出现两位白人列车员，一脸自愿献身的神情。两人在每间包厢的门口停下脚步，他们的任务就是缓和大家的情绪。

大家问到底是什么让列车止步不前,他俩回答说,暴雨使铁路上的信号系统出现电路故障,在每个交汇口司机一定要等到书面的通行许可才能行车。“这都是为了你们好,”两人说,那样子既自以为是,又带点威胁,官员们束手无策时就这副德性。他俩沿列车一路走下去,身后大笑声不断,仿佛纵火者在丛林中一路留下燃起的火头。什么样的书面指令?谁签发的?会有个人手持下一车站站长签发的指令飞奔而来吗?“大雨冲垮了信号线路,该怎么办?”难道就没无线电吗?没有电话吗?没人信这种鬼话,或许根本就是那两个列车员自己编出来的。塔伦特说,那两人显然很蠢。

没多久,从布拉瓦约驶往哈拉雷的列车也在我们列车的旁边停了下来,车窗里满是一张张欢快的面孔,向我们递糖果、饼干,甚至玉米粥。“真丢人。最好先回哈拉雷吧,明天再试试运气。”一下子我们车上垂头丧气的乘客们又来了精神,笑着回敬那趟车上的乘客。大约两点,我们的列车突然冲了出去,不一会马塔贝勒兰的荆棘树丛与阿拉伯胶树已映入眼帘。列车在布拉瓦约站缓缓停下,晚点九个小时。喧闹的人群涌上布拉瓦约的月台,这个月台曾经以世界第一长而骄傲,每当这个纪录被安第斯、辛辛那提或其他什么车站打破,它就在月台尾再加建上几英尺。人群中也有那个年轻母亲,她现在把所有幼小的孩子都抱在手中。这里的妇女穿得像花蝴蝶,津巴布韦棉纺业现在很繁荣,棉花成了烟草之后第二大经济作物,有时设计师会设计出鲜艳飞舞的图案,装满商店的货架,装扮妇女的身体。黑色的皮肤上,这种图案看上去漂亮极

了。在车站出口，我停下脚步，因为我听到了一种应该属于过去的声音，一位脾气暴躁的胖白人男子正在用这种声音向一小群黑人发号施令，那种带着威胁、恫吓的声音……“怎么会这样？”我问道，“那男的能这么说话吗？”自从我抵达津巴布韦以来，还从没听过哪个白人用这种语气对黑人说话。塔伦特回答说：“没看出来吗？他们是南非人。”经她一提醒，我也看出来了，那种独具南非特色的姿势，肚子向前腆着，下巴朝上扬着，听到这种声音时也总能见到这种姿势。一群南非黑人和一个南非白人，在这里做什么？然而这个秘密也只能是个秘密了，因为我们要赶着去见正等着我们的妇女们。

信使每隔半小时就来车站看一看，带来了慰问，还有好消息。代表们会在第二天早上等我们。

格雷假日酒店的店标上有几匹敏捷的马拉着马车，仿佛狄更斯小说中的描写。哦，那一去不复返的英格兰，根本预想不到，非洲这个地方对它的缅怀竟丝毫不亚于英国本土。这里的待客之道不同于英国，然而，我开始觉得，此种爱耍小聪明，事事为自己着想，具有爆发力的社会不正是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翻版吗？然而，每当民族情绪涨起，现今的英国不也和十八世纪很相似吗？在伦敦街上走一走，看看那些年轻人，伦敦正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城市。机灵的话，就抓紧自己的手袋，因为有掏腰包的。一口伦敦腔，满脑子自我意识，那些年轻人摇头晃脑地说，什么都不能超过我。这些有趣的野蛮人，满口文字游戏，都是从电视广告上学来的，跟二战刚结束时我刚到伦敦那会儿已毫无共同之处了。那时的人沉闷、自

尊、自觉，正好配上那个时代单调无华的街道和进入尾声的配给制。

我们住的宾馆属于旧式风格，里面的环境氛围告诉我它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希望这不意味着它即将被拆毁。我的屋子很大，里面有四张床，够一家人住了。在这个社会，儿女多是一种骄傲。别的房间也都很宽敞。

宾馆中心有一个大露台，或者说是院子，部分顶部有遮挡，里面还摆了几把大遮阳伞。不过天空阴沉，长时间的寒潮还不肯挪步。好几个小时时间里，我们围坐在一张大餐桌边，不断有人加入——朋友、朋友的朋友、各种关系人、上次来这儿时给过帮助的，还有结识的仰慕者。小院落挤满了人，黑人比白人多，常常是黑人、白人结伴一起来。因为这里的过去，这里人以前已对多种族聚会司空见惯了。一位年轻女性——波斯裔——对我说，她们这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种族主义感到惊讶和不解。在这家酒店里，当地一名反穆加贝政府的政治人物几乎每晚都会出现，人们来听他演讲，他出名之处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在团结法案通过之前那段时间，这确实需要勇气。不过，有人提醒我，这里可是马塔贝勒兰，是《布拉瓦约时讯报》的家乡，那家报纸揭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从来就无所畏惧，也因此成为唯一一种"人人都读"的报纸。人们为此而自豪。

自我记事以来，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就在明争暗斗。索尔兹伯里说布拉瓦约沉闷无趣，那儿的公务员都是势利眼。现在，布拉瓦约则说哈拉雷满城大官，一个个脑满肠肥，一身

腐败的铜臭味;哈拉雷说布拉瓦约死水一潭。不过,局外人眼中,两地同样富于活力和趣味。

人们一次又一次说你现在到布拉瓦约来真是太幸运了,这里人人都很快乐,首先因为团结法案,其次因为约书亚·恩科莫——他们的领袖,现在成了政府里的大人物。再其次,干旱结束了,上年的雨水丰沛,今年也一样。团结法案通过之前,这里人人垂头丧气,疑心重重,人们担惊害怕,长期干旱又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凯西告诉我说:"下面几天我们要访问的公共领地之贫穷超过任何其他地区。忘了哈拉雷周围那些用钱堆起来的地区吧。然而,这里的人们照样活力十足,精神高涨,真是奇迹!这里的妇女……什么也不能打倒她们,她们遭受了那么沉重的打击,你本以为她们的心肝五脏都错位了。千万别那么想。"

在这个小院里,稍晚时候在晚餐餐桌上,实际上,在任何有人交谈的地方,相同的话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各地,带来改变的正是妇女。一位去过六个国家的援助人员说,要想推动什么事情,去找妇女。有时候,她们也不得不同掌权的男性打交道,那似乎是一切的基础,可真正推动事务的是哪些人?事实上,正是妇女!为什么在所有地方,贫穷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有人问。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对提问的兴趣明显低于各种事实,低于那些讲述成就的报道?

大家谈起援助、援助资金时就跟那些坐在檐廊上的人一

样，话语中夹杂着遗憾、不满、谴责……

最糟糕的是，大量援助资金被白白浪费掉，部分原因是刚解放时的那些甜言蜜语。过去，人们以为说说甜言蜜语就等于实干。如今，政府号召党员大会时，几乎没什么人参加。这也是成熟的一种标志，希望穆加贝能意识到这一点。上个月这里还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当政府发言人——一位女性，在集会上讲话时，群众毫无反应。可当某个当地的“头儿”站起来发言时，群情汹涌，几乎发狂。旧式的“头儿”又回来了，穆加贝，也向他们投桃报李，让他们掌管地方事务。当然，他们要的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想得到分配土地的权利。

派发援助资金的国家现在也小心翼翼起来，它们派钱时时常烧到自己的手指，不过，那是它们自己的错。它们派起钱也不管什么人、什么事，也不事先搞清楚钱是不是花在基础建设上了……好多援助资金被贪了。

我还听到一则笑话：最危险的工作是什么？回答：分配援助资金，能干十年不出事儿就算走运了。真有人为此蹲了监狱吗？不算多。

老问题又回来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能不出事儿，或以为自己不会出事儿？到处都有人公开大肆掠夺，好像那是从丛林里的老树上掏蜜。援助资金成了许多“头儿”的家产。

一位著名的东非前经济部长说，援助资金是津巴布韦有史以来最坏的东西（必须强调，他也是黑人）。“穆加贝本该坚持自力更生，这里的基础设施完好健全。现在，人们的自动反应是‘给我们援助’。看来，要不了多久，援助组织就会把非洲

国家变成一群乞丐。"一家报社的黑人编辑说:"援助没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回头看看二战时进口中断的那些日子,次级工业发展了起来,罗得西亚做到了自给自足。禁运对这个国家反而有好处。当然,没几个人会说出来。"

另一位南非的黑人朋友说最让他恶心的一幕就看到尼雷尔在电视上双手捧着援助的钱挥来挥去,笑得像个天使,还大喊"送来吧,送来吧!"

这趟旅途中,我把上述那些观点说给不同的人听,想听听他们的见解,得到的回应是:"要是没亲眼目睹过这里的贫穷,那些观点也不错。"在这里,我不忍心向这里的人说同样的话,他们那么乐观、自信。图书小组也用到援助资金,曾有个组织提出要定下几条规矩,以施加政治影响,被小组断然拒绝。"他们从某个地方飞来,加拿大、美国、丹麦、德国,在哈拉雷跟某个政府官僚说上一通,说,有钱给你,但你们要做这做那。要走运的话,他们也会到公共领地上待几个小时,然后就匆匆赶回哈拉雷。"小组制作的图书成本高昂,还没算上人工,因为大部分都是自愿性的。最终要出六种图书,每种都用六种语言印刷。完成整个工程要六年时间,之后还要改版。

一些迫不及待想看到美梦成真的人问我:"你觉得津巴布韦有变化吗?"

"当然,变化也太大了,这几天就像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地震,真想不到你们还能站稳脚跟。"

"可我们觉得变化还是太慢了。"

第二天一清早,服务生端来茶和饼干,外面在下雨。我在

床上坐起身,身边都是小组编的书。我把第二本书迅速浏览了一遍,书名是《在我们村庄中创造财富:农村创业指南》。

全是卡通。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性说,在非洲黑色的大地上,津巴布韦经济是对外来资本依赖最重的国家之一,这里约70%的资本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主要是一百三十家英国公司和四十三家南非公司。外国资本拥有津巴布韦60%的工业,90%的矿业,19%的农场。1980到1983年间,输送到国外的利润达三百三十三亿津元。

另一个年轻女性劝导说:改变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一位年轻的女性说:这个任务无法由国家独立完成,因此农村人民应该积极参与进来,组织起来,获取足够信息。因此,我们对津巴布韦经济状况应有基本了解。

何谓经济?一种回答出自一位农村中年女性之口,另一种回答出自一位中年男性之口。

何谓生产?生产就是把自然原料改造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的行为。要进行生产,需要以下条件: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

当克里斯画这些卡通人物时,他使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他见过、观察过、倾听过、在会议上坐在一起的人物形象。通常他趁他们不注意把他们速描下来。我觉得这样一本书记录下这一时期津巴布韦各型各类人物的形象:他们穿什么、看上去如何、如何站、如何说话。

没人计划,最宝贵的事情往往发于自然。

1. 村里最值钱的产品是什么?

2. 描述一下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原料、人工、资本。

3. 生产你们村的主要产品,获取原料、人工、资本时有困难吗?如果有,描述一下你的困难,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些困难。

这些书会送到津巴布韦每一座村庄,第一种已经送了出去。即使在那些教育条件恶劣的地区,只要有人读过这些书,也是一种良好的国民教育。那原本也没有计划。

八点时,我们已抵达一处政府办公点,准备召开这场延期的会议。会议用语是恩得贝勒语,凯西和塔伦特都会说。与会的妇女们来自饱受数年干旱之苦的最贫困地区,她们都知道这是专门为妇女写的书,人人都表现出一种参与重大事件的感觉,那也是希望的感觉。会上有两个时刻值得一提,其价值都源于过去。一次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发表了一些保守观点,总会有某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说那样的话,而那些年轻些的女性倾听的样子表示,有些观点她们不得不同意。"旧做法并不都是坏的,我们必须保存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另一次是一位年长妇女驳斥一位年轻姑娘,那姑娘说法律应保护妇女免受性侵犯。那位年长妇女说,现在的女人都忘记怎么保护自己了,试试那个老法子怎么样?姑娘在树林里被男人追,她一边跑一边撩起裙子,什么都暴露在那个男人的目光中,那个男人就越来越虚弱,跑不动,也追不上她

了……大家哄堂大笑，然后才想起来会场上还有一名男性，克里斯。他也跟着笑起来，使大家免于尴尬。

会谈在笑声中结束，小组最后提醒大家：南马塔贝勒兰可是个以音乐而著称的地方，别忘了，这本书同样也需要歌曲和诗歌。要是大家愿意，就编些歌曲，写些诗句吧。

小组下了楼，上了当地政府提供的丰田越野车。小组的工作在这里受到重视。这辆车比路虎车又高一档，更大、更舒适、底盘更高，坐在里面感觉像在飞。车里能坐下许多人，今天这派上了用场，因为每分钟都有人问能不能一起去。

还很早。你要是早上五六点就醒，六点半吃早饭，那刚到十一点你就会觉得一天已经过去一半了，天空灰暗阴冷，地上还有没干的水洼。不过，布拉瓦约总给人一种喜庆甚至轻佻的感觉，天蓝色的路灯柱点缀着每条街道，你会以为上面该挂上节日花环和彩色丝带。

跟我们同行的一位妇女代表另一个组织，早在解放前，她就和一个黑人结了婚，她自己是白人。她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也忍受了自己处境中的种种难堪和困难。她说，可恶的老罗得西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沿着公路向北行驶，一路下去就能到维多利亚大瀑布。就是在这条公路上，六名旅游者被劫持为人质。公路两边的丛林清新、嫩绿、光鲜、多汁多叶。上次来马塔贝勒兰，一切都枯黄，到处是尘土，通常也都是那样。每个拐弯处都能见到肥壮的牛羊。这里的山羊到处乱跑，显然没人管，牛则待在栅栏后面。此处是商业农场，故而丛林完整健康。没有野生

动物，虽然动物也不少，但都是牛啊、羊啊、驴子之类。我试着对自己说，动物就是动物。偶尔，一对珍珠鸡或者山鸡，闪过路边。一年中这个季节，珍珠鸡不成群活动，而是两两成队。有人说上一年，在万基煤矿附近，一下来了那么大群珍珠鸡，仿佛大地都在颤抖，足有几百只。

菜　园

人们谈起菜园，就像他们谈起哈拉雷附近那间地方虽小，能量却大的板房。这座菜园中能有什么让大家这么开心？但他们总说等会儿，瞧见就知道了。去大瀑布一半的路上，我们的车拐入一片公共领地。尽管下过雨，这里的丛林依旧稀疏，地已半荒漠化，周围是低矮干旱的小山。突然，在这片显然难有收获的荒地上，出现一大片葱茏的绿色。大家一起下了车，站在一处，听这个菜园的故事。大家站在外面瑟瑟发抖，因为到酷热的马塔贝勒兰，通常没人会带毛衣，我们这群人中没一个穿得够多。

这菜园周边都是极度贫困的农村，广播里正在播放一段富于政府色彩的讲话，关于各种“项目”，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广播中提到了一座菜园，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这里的土壤贫瘠，属于第四型。但这里有座废金

矿,那里有口机井。

这一次,男人和女人携手创建了这座菜园,菜园里种番茄、洋葱、白菜、玉米、胡萝卜、菠菜。你永远无法相信,这里的土壤居然能长出那些作物。

二十四位妇女和九位男性邀请任何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妇女干得比男人更辛苦,不过男人们也作帮手,因为一家人现在吃得比过去好了,既靠园子里种的东西,也靠园子赚来的钱。我们站在园中,看着六位妇女在劳动,双膝挺直,上身折弯下来。你觉得,无法这样劳动,可她们就这样劳动,一干几小时。地上都是烂泥,所以她们都赤着脚。

刚开始时,这座菜园里只有干旱贫瘠的土壤,一位农技人员到这里,教会他们如何挖引水渠,如何堆田埂,如何在整座菜园四周搭起篱笆,以防止山羊跑到园子里面吃菜。现在,这座菜园已不再接受新成员加入了,不过如果有资金,再打一口井,又能建起另一座菜园。由于有了这座菜园,整个这一片儿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怎么才能再打一口井?村里的男女代表们希望我们一行人中的援助组织代表能帮助他们。

与我们同行的女性中有一位代表一个资金不算很充裕的国际组织。几年前,当有人向她伸手要援助时,她只给了一百津元,相当于三十英镑。代表村子说话的男人对她颇有意见,不过语气还算幽默,他说:“只有一百元,这点儿钱能做什么?”

那位援助组织女代表说:“你好像对我说干得很好!”

那个男人还横在她面前,责难她。

"你用那钱买了小鸡,不到一年时间一百元已变成五百元,你是这么对我说的,对吧?"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对。

"这就对了,不知道多少人拿了一个又一个一百元,到头来却依旧两手空空?"

"你说得对,不过咱可不是那种人。"

"我们现在谈的是打一眼新井,这笔钱我们组织可拿不出。"

"那我们该怎么办?"

"跟这位先生谈谈吧,看能不能说服他,他管这事儿。"

这位先生也是从城里跟我们一道下来的,因为他听说我们要去访问这座菜园。他跟村民们走到一边,探讨起了打眼新井的可能性。

我们一群人四下分散开,我一个人,这时一位农技人员快步向我走来。这是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双脚沾满泥巴,因为他刚帮忙排除灌溉渠中的积水。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你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在我身前,他停下脚步,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说:"莱辛太太,您并不了解我们的问题。"在过去,每当有人批评这里的白人时,他们总用这样的话答复。现在又听到,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点点头,仿佛说,嗯,你听懂了,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个文明的国家,"他停下来,等着我的反应。

“能看得出,”我说。

“和每个文明国家一样,我们有个腐败的精英阶层,”他一边说一边笑得浑身乱颤。我俩都大笑起来。接着,他又回去监督沟渠的修整去了,一路笑,一路摇头。

他说的是,最近英国又出了桩腐败丑闻。

在这座菜园里劳动的人都为自己而自豪,免费向其他人提供便利,比如说负责提供菜籽,又比如说用蔬菜换别人家的牲口粪便做肥料。菜农们决定只要有机肥够用,不用化肥。他们说,化肥种出的菜不好吃。要是一块地用化肥,另一块地用有机肥,你一口就能区分出来。

他们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在栅栏里有个大坑,里面全是野草,在那里腐烂,做即将种下的木瓜树、番石榴树和橙树的肥料。他们同样自豪地指给我们看栅栏外的布莱尔式厕所。栅栏保养得完好,屋顶上的茅草厚实。

当我们走向丰田车时,一些妇女上来兜售蔬菜。我们一行人中的家庭主妇积极地买起来,这种蔬菜可不容易买到了。那几个卖菜的妇女赚了几个小钱,既高兴又自豪。这座菜园,这个成就,正在改变她们的生活,已经帮她们在银行里存了两千元。对她们来说,那可是笔巨款,即便要给许多人共同分配。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切地显示出这里的贫困水平了:几枚硬币就让这几个妇女乐不可支,几块钱就能买来一大堆蔬菜。在如此贫穷的地区,迅速提高生活水准不过意味着能为孩子买上双鞋,让他上学穿,或者买件毛衣抵御今天这般的寒冷,再或者买盏煤油灯,好让孩子做功课。

我听说这个地区有两所不错的小学，至于中学，跟我一星期前看到的那所差不多，校长也被指控有贪污公款的行为。

一路上我们不停从路边捎上人，又不停把他们放下，越野车倒成了辆小公交，在这条穿越丛林的公路上，似乎也没人不放心给人搭车。大家讨论各种问题和危机，但大家一直在大笑，尤其在听到腐败丑闻时。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某位哈拉雷来的政客在布拉瓦约街上遇到一个老朋友，昔日的自由战士，今日的"头儿"。后者因为明目张胆地贪污而上了报纸，前者说："这星期我可不该见到你，我承担不起后果。"那个罪犯则说："真扫兴，我还准备请你吃饭呢。""下次吧。"那个"头儿"说："今晚到我这儿来，在我这儿过夜，公众不会见到咱俩在一起。政府的看门狗来检查我是否违反了领导准则时，我也带他们去同一处住所。我不会给你特殊待遇，带你去看农场、商店、宾馆、别墅……"

穆加贝同志制定的领导准则，和罗马人的消费法一样，意在制止这股贪污之潮。

在马里卡兰，我听说了这样一则故事："这么快就发了财，你就不脸红吗？就不怕政府惩罚你吗？""不，不会，这个政府站在穷人一边，不对吗？过去我是个穷人，政府肯定站在我这边。"

另一则故事关于一位政客的妻子，一位以贪婪而臭名昭著的女人。"他是个好人，大伙都知道，永不腐败，谁能对他说三道四呢？可要是你天天抱着腐败睡觉，那又叫什么？"

种种笑话、趣闻说到当中，总有人说："因为咱们穷，他们

就以为咱们蠢。那些'头儿'们忘了咱们在盯着他们。谁好谁坏,咱心里有数。"

"许多腐败行为并不严重,可每桩此类行为背后都牵扯到某个大人物。他们该记住,用政府的车辆偷运犀牛角是危险的行径,犀牛盗猎的背后总有某个有权有势的人撑腰。盗猎者用的枪威力很大,谁能买得起这种枪?只有那些'头儿'。"

"丛林战争中,同志们还能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如今他们都忘了该怎么做了。"

"同志曾经是个光荣的称号,可现在连厨子和罪犯都这么叫了。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人们已经不这样叫了。当人们开始把那个称呼用于讽刺时,它也就到了头了。"

他们谈到恩科莫,话语中充满感情和赞许。大家忘了他在深山老林待了许多年,身背种种反叛、煽动的指控。他仿佛一直就在这里,在那些头儿当中,他是津巴布韦的建筑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有一则故事流传很广。恩科莫访问马托博的一座神庙,那里的巫师尊称他为洛本古拉。他被视为旧日国王的化身,至少也受到了旧日国王灵魂的鼓舞。

"你要是成了洛本古拉就不会听我们的了,"一位智者温言劝诫他。"你跟英国人对着干的时候,我们就劝过你,可你不听,最后失败了。如今,你是要做违逆祖先的洛本古拉呢,还是听我们的呢?"恩科莫的回答谦卑:"我会听你们的。""那你就会有荣誉、长寿和高位。"

这则故事真实可信吗?它显示出人们对恩科莫的感情,

也显示在这样一个过去一百年中不断被暴力撕扯的国家中，人们对社会延续性的需要。

回到宾馆吃饭的时候，好多人在一起，大家聊了好长时间。西尔维娅坐在主位上，她的女儿正在学宾馆管理，坐在客席。现在，轮到西尔维娅说说自己的生活遭遇了。大家听着她的故事，把它视为一部史诗的一章。那部史诗的名称叫——《津巴布韦的诞生》。

西尔维娅出生于一夫多妻制家庭，打小就学会了服从，在一帮哥哥姐姐面前从来只会说"是"，"不是"两个词，更不敢去批评自己的父母。不过，她的婚姻倒是现代的，她的丈夫帮助她，与她共同承担起责任，当她外出时就负责照看孩子。按照旧观念，那些都是女人的事儿。她女儿也向前迈了一大步，漂亮、活泼、独立，我实在看不出她同任何一个欧洲十七岁的少女有什么区别。

大家问西尔维娅的女儿，新一代人有什么想法，她笑着回答，津津乐道于自己所说的话，知道她的回答肯定会吓我们一跳，尤其是她自己的母亲。她的语气仿佛在说，并不是我要跟你们作对，不过你们要听我说真心话。显然，她经常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她在为自己这代人代言。

她浅酌一口杯中的津红酒（她在学习品评这种酒），开口说："首先，我们尽可能待在家中，和母亲一起过，那意味着不必找个丈夫对我们指手画脚。除非我们能独立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否则我们不会结婚。其次，我们完全不会为父母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就心存感激，我们不关心独立战争，那些为

此而牺牲的人，还有那些为此而失去教育机会的人。我们想过好日子，我知道我们自私，可我们就这样，是你要我说的。”

她的双眼闪着狡黠的光芒，我们希望自己大度地听完了她的话。塔伦特就是为津巴布韦奉献出人生之大部分的人之一，不过今晚她累了，只笑了笑。凯西似乎实在大吃一惊。西尔维娅——女孩的母亲，一个快言快语的女性，你以为她会反应强烈吗？不过，她看上去心情还不太坏。克里斯和这个小姑娘是同代人，以一个没她那么走运的同代人的角度看待她。他的生活艰苦，靠为这种图书画卡通画可挣不到几个钱。

小姑娘继续说下去，讲起她的人生计划。毕业后，这当然不用说了，她先到哈拉雷一家真正优秀的饭店工作，然后再去一家优秀的欧洲饭店工作。

她回房后，我指出，她那番话的每字每句苏联青年也会说出来，也正在这么说。就一个星期之前，我还读到过类似的东西："我们不关心你们的战争，你们把什么都搞砸了，现在我们要自个儿管自个儿。”

你想过吗，有人说，把一切搞砸的恰恰是那有着高尚理想和美好思想的一代人。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这自私的新一代人会做得更糟呢？

我上床时已晚了，九点。上床前，一位联合国官员请我喝了杯咖啡，向我提供了他的国际观点。某些非洲国家政府得到个新称号：盗贼统治。对，津巴布韦的确拥有别的国家没有的东西，让我们希望穆加贝也意识到了，从来还没有哪个国家一创立就得到这么多善意的资金援助，可他们对待自己的人

民仿佛对待敌人。

我说，那是因为，据这里的人说，他从不接触普通百姓。他居住在理想的象牙高塔上，四周都是溜须拍马者。

可他说，领导人都一样，在国际会议上，他们不和谁单独接触，却也和所有人保持接触，自己坏心肠，就认为所有人跟自己一样。

我说："穆加贝可没有坏心肠。"接着，我向他转述了从一位农技人员口中听到的一段话："穆加贝同志？他是有缺点，可他也是人。看看坦桑尼亚，那儿的人找了个圣人做领导，再看看那儿的麻烦。赞比亚又如何？你也可以说肯尼斯·卡翁达能算上四分之一个圣人。可谁有愿意遇上赞比亚那样的麻烦？不，我们的领导人不需要做圣人。"

"那倒是很高深，"联合国也同意。

"他们确实高深。"

"你说，他们是农村人？"

"你该去见几个这样的人。"

"他们要还能讲这种笑话，那他们还算走运。在赞比亚可没人敢说这种笑话，你一向那里的人提问，那人就会扭头看看背后有没有秘密警察在偷听。那里不单专制、腐败，更一团糟，简直就是灾难。"

"这个国家可不是这样。"

"还没到那一步。"

"你可真乐观！"

"我待在非洲的日子太久了。"

我们讨论起为什么非洲国家腐败成风。“毕竟,任何一个新执政的党派和领导人都不会决定,下面我们要开始腐败了。”

“不,腐败自己悄悄溜了进来。”他说。

“或许,它悄悄溜进了赞比亚、坦桑尼亚或其他什么国家,但不可能溜进津巴布韦,因为在它之前已有那些教训了。”

“可它已经溜进来了。”

“穆加贝也在努力,”我说。

“我看你被这个地方征服了,人之常情,”他说。“难道你就看不出来,穆加贝做不了什么,要是他把所有坏家伙都送进了监狱,还有谁会支持他?”

“一派胡言,你从来就没离开过哈拉雷或布拉瓦约,你们这种人啊!”

第二天早上,还很早的时候,在餐厅里吃早饭时我听到一位美国援助人员对那位联合国官员说:“穆加贝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再搞砸了,那可真是悲剧了。一个领导人能有几次机会号召起这么强大的支持力量?这场革命可能从那个地方(他指哈拉雷)就变质了……”“可在乡下,关键还在于未来,要是一切对未来的乐观期盼都发酸变质了,那会怎么样?如此高的期盼可不是发表几次讲话,或者召开集会就能唤起来的。在公共领地和安置区,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背后是整场解放战争,是革命。”

联合国说:“我会记住你的话。”

腐败问题人人都在谈,日日都在谈,人们简直为此着迷。

据说，腐败使投资不可想象。同那些持续震动英国的金融丑闻相比，这里发生的更像不良少年抢小孩子的储钱罐。后来，回到伦敦，我把自己的观点说给一位金融界人士听。显然，他对我没能抓住要点而吃惊，说："不知道吗？在一个国家能做那种事之前，它首先要有像样的基础设施。"

第二天，我们的车向西行，穿过马托博，道路两边都是花岗岩小山，披挂着丛林的绿色。多萝茜和阿尔顿说，这里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地方，这会儿我不由赞同起他们的看法。这里不仅美丽，还到处是神殿和各种有魔力的地方。山峦渐渐被甩在身后，眼前的地区甚至比昨天看到的更贫穷。

这里的人整天发牢骚，可不像昨天我在菜园遇上的那些人。

有人说，这里缺乏那种能策动改变的有活力的个人。凯西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她自己就如一支火把，无论到哪儿都点燃起勤奋与努力，总致力于把群体团结到一起。不过，最后还是一致同意，要是在什么地方你发现成功项目，人们昂扬向上，通常这背后都有某个人。

很快，我们到了发展点，办公室建在从白人手中收购来的农场的房子里，大约有六十多人，大多数是妇女，已经在等我们了，有的站在檐廊上，站不下的就围在四周。那么多年，这里的黑人仆人给自己的白人主人、他的家人朋友端上无数的茶盘、酒水盘。房子后面的正方形板房应该就是厨房。房子前面，丛林闪烁着绿色，十几只山羊正在那里大嚼特嚼。

会谈刚开始，我们一帮人中有一个说，听说沿公路下去一

点儿的村子正在开艾滋病会议，她想动身去看看。

会场上有五位男性，其中一位是村主席。凯西和塔伦特说这本书要由妇女们自己动手来写，问妇女有什么建议，那儿位男人则静静地坐在后面。妇女们提出的建议同别处的妇女大同小异。

当一位妇女反问为什么妇女不能干别的工作（比如说，开公共汽车）时，会谈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村主席说妇女的体格不适合开公共汽车，她们不能爬到车顶上搬行李。一位妇女说："咱们突然听说自己没力气，可当我们种庄稼，在地里挥动锄头，收庄稼，做饭，带孩子，盖房子，上屋顶的时候，可没人说我们力气不够。"她还想继续说下去，可话被村主席打住了。不过，村主席并非这次会议的主席，于是有些妇女向他报以一阵嘘声。

村主席说："为自己的男人做这些事儿是你们的责任。"

"每次我们批评男人懒惰，就听到有人说责任。"

"可是，"村主席心平气和，却深信不疑地说，"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在这个时候，为传统代言的上岁数妇女自然就站了起来，会说："过去也有优点，千万别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自由对女性而言存在于家门以外，家门以内，传统还是最好的。""说得好，老妈，"村主席说。

有人叹息，有人大笑，这群人仿佛有什么使她们喜欢对着干，不过也不算丑陋。这里有笑声，有玩笑，完全没有某些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冰冷的仇恨。

一位男性问:"为什么领导人中女性那么少?"这会儿,他并不想挑起事端。

"因为男人说,男女平等并不等于他们要做饭看孩子。"

"就算我干了所有的活儿,累得都要吐了,我丈夫还是一天什么都没干,他就是坐着等饭菜端上来。"

另一位妇女说:"昨天我从地里干完活回家,我丈夫说,怎么洗脸水还没烧好?我烧上水,他又说,怎么饭还没做好?我把洗脸水从火上端下来,再放上煮粥的水。他又说,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洗不上脸?"

那位传统老太太又开了口,声色俱厉:"有些妇女太懒了,就不能生把大火一次煮两个锅吗?"

"可我根本没时间劈柴,羊在地里,我得去赶羊护庄稼。你忘了,现在孩子们都上学了,帮不上手。"

沉默。人人都希望孩子去上学,可这样人手就少了,妇女的生活也更艰难了。那位妇女又说:"就算我叫丈夫帮我赶羊,他也不肯。"

"因为那不是男人该干的活儿,"村主席说。

"那到底什么是男人该干的呢?"一位妇女细声细气地问。有人告诉我,她是坚强女性中的一员,她这样的女性常常代表了妇女组织的意志。她的情况具有典型性,中年,孩子已长大成人,即便身边没男人也能过下去。她被比作西非的市场妇女,勤劳,有经济基础。不过,这儿可不是西非,要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还要继续努力。

村主席直接面对她,说:"老天爷定了,男女有别。"

听到这儿，与会的一位美国来的白人发问："那为什么世界各地男女的角色各不相同？现在大家都能在世界各地跑，能看到文化有多大差异，咱们再也别说老天定了这，老天定了那了。"

一位妇女不无幽默地说，她也出过门，比哈拉雷还远，去看她姐姐，她姐姐对自己丈夫的不满跟她一模一样。

现在谈到赡养费问题，每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都会引起激烈争论。现在有条受自由主义者和先进人士欢迎的新法律，就是男人即使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依旧要对子女负起责任。在农村，人们对这条法律的看法就不同了，那些婚姻体面的妇女们为之而愤怒。

"咱们的丈夫已经有两个家了，一个在城里，却把自己真正的妻子丢在家中，把钱都花在新女人身上，我们的孩子却在挨饿。那些城里的女人是娼妓，政府要是因为她们有孩子就给她们钱，那咱们的丈夫就更容易抛弃我们了。"

村主席说："想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男人抛弃你们吗？看看自己的结婚照吧！"

这句没心没肺的话引得在场妇女们勃然大怒，有些在场的观察者更认为妇女们的火气还应该更大些。妇女们高声交换着意见，你一言我一语："那些坏女人，就关心自己。""她们有钱买新裙子，还能买口红。""我给孩子买肥皂的钱都没有，更别说自己买了。""我都五年没穿过新裙子了。""对啊，有时一个娼妓勾搭四五个男人，从他们那儿拿钱，谁家的妻子能跟她比？"

村主席说:“女人们结婚时都很漂亮,可之后就不再管自己的外表了。”

“咱们得干重活,不明白吗?”

“他当然不明白,男人从来不干活。”

“怎么能这样说,作为村主席,我辛劳工作,为你们大家,你们都知道。”

“我倒想代你辛苦。”“我也想。”“还有我。”许多人在大笑,妇女们望着村主席,仿佛看自己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接下来是伤残妇女问题。常有男人强暴这些伤残妇女,她们有了孩子,却没人管,政府该帮助她们找到工作,男人们也要发发善心,别跟伤残女性睡觉。

村主席说:“虽然她身体上残疾,可作为女人完全没有问题。”说这些的时候,他堆着笑脸,摆出冷静、权威的样子,一刻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他是成心惹妇女们生气吗?我看见凯西和塔伦特在咬耳朵,时时看上村主席一眼,她们在说什么?西尔维娅跟村主席一样冷静、权威,艺术家克里斯在速写。

“该把干这种事儿的男人抓起来,”一位妇女直接挑战村主席的权威,可他只一笑置之。

凯西和塔伦特建议,妇女们该编首歌,谴责那个让残疾姑娘怀了孕,又抛弃她的男人。另一位妇女建议说:“还要叫他自己唱。”

“好,我会唱,我嗓子还不赖。”

一阵无语,接着一位中年妇女又说旧法并不都是好的。

要是姑娘爱上一个小伙子，看父母不喜欢，就不能跟他成亲。旁边的妇女们看她的眼神仿佛在说，你在讲自己的故事吧，人群中响起一阵同情的低语。

和别处一样，会议结束时，小组保证过几个月后再回来收集材料。跟以往一样，大家唱起歌来，歌词昂扬激越，曲调却忧伤、传统。有些非洲民歌同俄罗斯民歌一样，自然而然地带有忧伤的气质，就算唱的是令人欢快的事，也会让你心碎。

妇女们围成个大圈，翩翩起舞，听到音乐，四邻的妇女们都赶来了。有些人退出舞圈，在旁边边拍手，边发出呜呜的和音，不少人背上都背着孩子。

在大家的簇拥下，我们向越野车走去。这时，那个去参加艾滋病会议的人回来了，半笑半怒。实际上，有部拍得相当不错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片，罗列出事实，解释危险之源，可当地传教团的修女把那部片子给否决了。听说修女有这么大的权力，却没人感到大吃一惊。据说，同一帮修女还否决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说那是部好书，但太危险。

最后实际放映的影片说同性者和吸毒者面临艾滋病的危险，然而同性恋根本就不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在非洲艾滋病是异性间传播的疾病。至于毒品，这儿到处都种了大麻，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可比大麻更厉害的东西在这儿还没人听说过。好几百名学校学生，有的才九岁大，就坐在那里，根本不明白电影里说了什么。

当地医生说，该地区上周就有五人死于艾滋病，那还仅仅是官方承认的数字。由于没人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一个人

死后可能你听到的仅仅是：我哥哥太瘦了，身上浮肿，然后就死了。

正当我们上丰田越野车时，一位村民对我们说，现在来马塔贝勒兰，你们挑了个好时候，团结法案让大家都开心，那些闹叛乱的不再给我们的生活捣蛋。去年收成不错，今年也还风调雨顺，咱们的马塔贝勒兰再不会闹干旱了。人人都笑了起来，在一片笑声中，我们的车向发展点驶去。

回哈拉雷的火车准点发车。第二天一大清早，喝了杯咖啡，吃了几片饼干之后，我站到包厢外的过道上。六个女人在一间包厢里，实在太挤了。

向前，离我隔两扇车窗，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孩看着车外飞速后退的丛林。几头小羚羊悠闲地在一片橡胶树间吃草，一只野鸡发疯般在车边狂奔，仿佛在跟火车赛跑。

一个英俊小伙子在走廊尽头注视着那个女孩。他缓步走过来，从我身边挤过时向我道了声歉，向那个女孩走去，同时搭讪说："你去哪儿？今天天真不错。我在哪儿见过你吗？"女孩就用脚尖轻轻踢走廊的墙，垂下头，露出同她的长裙、鞋和粉红色的贝雷帽显得隔了一代的少女的羞涩。小伙子说下去，有一句没一句，明显想引起女孩的注意，不过进展缓慢。女孩不做声，就是不做声，一直垂着头，用脚轻轻踢脚边的木板。

突然，女孩实在忍不住，格得一声笑了起来。小伙子宣告自己的胜利，一拍手，身子在脚跟上转了一圈。之后，他仅用五分钟就说服了女孩到哈拉雷后跟他见面，就今天晚上，一起

去酒吧喝一杯。“谁知道，说不定咱们还能一起去吃点儿玉米粥。”打这之后，女孩兴高采烈地同小伙子一路聊到哈拉雷，仿佛那个低着头、冷漠矜持的她从未存在过。

见多识广的人

一天晚上，在哈拉雷，身边的人有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有权没权的政客，农场主，音乐家，黑人，白人混杂在一起。他们有什么共同特征？他们都旅行，做比较，他们属于见多识广的人。

大多数白人，几乎所有黑人都不愿意离开津巴布韦，南部非洲以外的世界仿佛根本不存在。学者要出门参加学术活动，新闻记者就其职业定义就要四处活动，农场主在欧洲有亲戚，政客则和他们世界各地的同行一样，总有各种会议要出席。

发生了一点儿不寻常的事。

怀着最素朴的热情，年轻的津巴布韦出现于世人面前。报纸从不登任何批评共产主义国家的文章，也绝口不提戈尔巴乔夫的革命。没人注意到苏联对自己的批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在苏联，斯大林已不再是人民的先辈，而被视为杀人如麻的狂人。

有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同那里的阳光、土壤有某种联系。老罗得西亚就跟现在一样，自满自足，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在这方面唯一可与之一较高下的只有几个中美洲小国，那里的人对外面世界的兴趣好奇最多只能走到与内布加斯加或衣阿华接壤的地方。大学里的听众没几个人知道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在什么地方。在加利福利亚，涂上防晒油晒太阳的年轻人听到戈尔巴乔夫这个名字时眼神一片茫然。

津巴布韦也差不多。跟一个历史或文学教授待上一晚，你就会发现他对苏联的态度同三十年前没有两样。要是有人疲倦地说（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俄国人自己都在检讨对农民的强制集体化和斯大林的清洗"，立刻就有人带着真正信徒那种自以为是的腔调回答："都是资本主义宣传。"新学年的新生开学典礼总是以盛赞苏联老大哥取得的巨大成就开头，不过成就并不包括过去五年中勇敢的自我检讨，因为这里的知名学者从没听说过还有那种事儿。如果哪个勇敢的人说："苏联自己都在批评自己的过去，短波收音机里白天黑夜都能收到。"这时，那些硕果仅存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脸上泛起一种饱经风雨后的神色：我们什么没经历过，糊弄别人去吧，糊弄我们，办不到。

苏联和东欧的动荡发出一波又一波冲击，摇晃着旧日的卫士们，可在世界上更孤立的地区，在大学院系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那些人幸存下来，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躲在小湾小河中的人从来就不能像别人那样看待自己，他们所

认同的依旧是纯洁的列宁。那批人的危害性极大，年轻人从他们那里学来了理想主义，可理想却变质了，于是愤怒，玩世，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甚至不愿参加普通的社会服务。

在津巴布韦，在1988年，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很清楚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谈起那一切总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世俗智慧。可那些平民百姓一无所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特权往往就由此而生，特权阶级也就是掌握资讯的人。有人为此而计划吗？当然没有，这种思想上的暴政自然而然就出现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木脑瓜们还想把这种暴政延续下去，就为了保住自己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位子。一旦离开那个体制，他们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无论在政治阴谋的技巧方面，还是在厚颜无耻方面，他们都无以伦比。在他们把持的系科里，体面、明理的人被逼上绝路，能走的都走了，因为他们的精力无法放在教学之上，而要放在与同事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之上。那些同事遭他们的鄙视，却不敢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在津巴布韦全国的学校中，学生们都梦想着抵达知识遥远的彼岸——津巴布韦大学。他们很可能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因为还不够聪明。

心理测试显示有部分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无论你把什么样的证据摆到他们眼前。要是在他们生命中某个阶段，他们得到一种印象，比如说，所有的猫都是黑的，打那以后他们会永远说猫都是黑的，哪怕白猫成群结队在他们眼前走过，脖子上还挂着牌子：我是白猫。

除非亲眼目睹，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到如今，我们中的

大多数都目睹过了。比如说，有位年轻的女性从小成长于东德一个共产党顶层官员的家庭，从内部了解到一切，之后又在莫斯科大学待了七年之久。后来她嫁给一个英国人，生活在英国一所大学。虽然她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她对共产主义了如指掌，也乐意向人们谈起她所知道的。可那所大学的左翼圈子就是拒绝与她有任何来往，她被视为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甚至是 CIA 的间谍。

“穆加贝该做点儿什么了。”

“什么？具体点儿。”

“比如说，发表个讲话什么的。”

“但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意义也不会一次讲话就显露无遗，它们需要数月、数年的时间才能慢慢释放出来，人们也需要时间来适应。”

“或许，他可以指示报纸。。。”

“可我们并不赞成他向报纸发指示，不是吗？”

“那他也别去干涉思想活跃的编辑的工作啊！”

“你怎么知道他干涉了？”

当然，那不可能是穆加贝自己，穆加贝当然总是站在好人一边，在这里就意味着能得到讯息。像这样的谈话可以进行一整晚，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穆加贝讯息不畅，他身边全是唯唯诺诺逢迎拍马的家伙，那些家伙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有人说，在西方，尤其在英国，在任何地方崛起的任何领袖都被视为自由民主的巨人。就算成吉思汗再世，用不了多久伦敦的领袖传记作家们就会让我们相信，他喜欢西方电

影，订《卫报》，支持大赦国际，还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幽默感。

我们，也就是说，欧洲人，带着欧洲民主的经验，以为被我们变成殖民地的国家也从我们那儿学会了民主。在南罗得西亚，白人享受这活跃的民主权利，可这种权利从来就没落到黑人头上，黑人只能以不同形式请白人做自己的代表。凭什么他们就不能转向共产主义呢？

罗伯特·穆加贝是威权文化的产物，在具有威权主义背景的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教过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都说他聪颖过人，总在读书，不会轻易和别人混在一起，而是观察、聆听。“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成长于白人特权之下，就像生活在阴冷的天空下。他的文化、他的族人总受到批评，遭人白眼。如今，争论到最后谁也不能说服谁时，他们就会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那一刻，你听到的是自尊，那是饱受了几十年的屈辱之后一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尊严。穆加贝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时，他反抗的是英国的统治，而那时马克思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通行的语言。有人说，是萨莫拉·马歇尔最终使穆加贝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那在他的斗争生涯中已相当晚。他率领的部队不仅要同白人史密斯政府的军队作战，有时还要同其他反抗组织作战，如穆左雷瓦主教率领的武装，当然还有恩科莫率领的武装。尽管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他们也一样会为未来的权力分配而大打出手。

穆加贝曾被史密斯政府拘留过。蹲拘留所或监狱可是段可怕的经历，监狱里成百上千人被处决，许多都是穆加贝的朋

友、同志。史密斯的党羽犯下各种暴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不过没有官方记录暴露出来，出于埋葬过去与往日的错误的需要。穆加贝只有一个孩子，当那个孩子病重时，史密斯不允许他探视。当那个孩子病死时，仍旧不允许他去参加葬礼。有时候，有人说，那是史密斯干过的最蠢的事。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穆加贝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战争中双方都犯下累累暴行，战争就是战争。一生经历使穆加贝孤立、多疑，人们又何必期待他身上综合了亚伯拉罕·林肯、杰弗逊、甘地的优秀品质呢？可人们确实有此期待。穆加贝同志，像上帝一样，是所有人的领袖。

穆加贝的一生经历中有什么会让他景仰民主？

然而，随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土崩瓦解，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纷纷放松控制，随世界潮流而动，津巴布韦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或许会暗自庆幸，共产主义在这里从来都只是挂在口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真空该由什么来填补？

在津巴布韦，基督教一直是股强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即使到了最强盛时也难望其项背。以下内容引自一封信："教皇刚刚访问了津巴布韦，数千人出席了欢迎仪式，不过别以为人们一下就信天主教了。那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比党的集会更热闹，仅此而已，这儿的人喜欢集会。穆加贝同志也出席了，他说，这就好像再次接受洗礼。他也看到，在基督教和他的政府所代表的东西间没有冲突，至少人们说，他是这么说的，不过报纸上并没有报道。"

随着马克思主义渐渐淡去，各地“头儿”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有笑话说，到头来，现在的“头儿”权势更大。慢慢地，他们会把往日的权力和特权全部拿回来。他们保守，和我们的文化和习俗站在一边。

可也并不总是这样。比如说，罗伯特·穆加贝性情保守，接受权威式教育，可他根本不是个传统非洲人。他同情女性，据说，他受母亲的影响很深。他母亲是位不平凡的女性，一生同大多数的非洲女人一样艰苦。

领 袖

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人坐在那里百思不解：为什么他——她——他们要做这，做那？又会用同样沮丧、难以置信的口吻问自己：“为什么穆加贝……？”

肯定有某种秘密成分，有什么消息被掩盖了起来，有张牌被扣了起来。人们就是难以相信身边发生的事情。

就以最近发生于英国的一件事为例（这种事在美国也有发生）。政府决定关闭精神病院，把里面的病人都赶出来，打那以后就“由社区负责照料”。任何对社区服务设施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对那些可怜的人，那意味着什么。那些不幸的人要么靠自己的头脑过日子，要么遭受房主的盘剥，也可能酗酒

滥药到死。然而，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专家却看不到。显然，过了不久，人们就会震惊于那些被驱赶出来的人的悲惨命运，会大呼："咱们需要疯人院，需要难民中心，让那些人有个能得到照顾的地方。之前怎么就没人想到呢？"

这种事儿一次又一次发生，一次又一次地让既不是专家，也非官员的普通民众迷惑不解。

有种神秘成分：人们一旦掌了权，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丁点儿小权，他们就只跟与自己有相同的地位和相同想法的人来往，屈从于一种群体麻木症。要是你，比如说，先跟一位工党官员待上一小时，再跟一位官阶相同的保守党官员待上一小时，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他们的大脑有着不同的风景，他们一刻不停地修整它，以使其适应自己的政治信念。这种机制太强大了，政客们似乎可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情。矿业工人罢工期间，全英国强硬左派组织的成员都相信国家已处在赤色革命的边缘上，甚至在挑拣自己将要填入的政府岗位。两年后，那些人会悄悄地想："那会儿我中了什么邪？"

群山中的农场主

现在，又一次，我们的车行驶在哈拉雷到穆塔雷的公路

上，我们的车又一次驶过开阔平缓、略有起伏的乡村大地，车窗外的景色壮丽无比。我又回忆起过去缓慢的旅程，我们看着一块巨石出现在车前方，越来越大，车一拐弯，消失在视线之外，另一块巨石又逼目而来。风景渐渐展开，仿佛一则著名的老故事，说故事的人时而停顿，以增强效果。那都已属于过去，甚至六年前的那趟旅程都仿佛在另一个时空中。上次车祸在哪儿发生的？车里人的谈话太有趣了，我忘了寻找上次车祸的发生地点。1982 年时，这里的每一片丛林，每一处高山和低地都让人想到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和所有的战争一样，成为过去，掩埋在日渐衰老的人的记忆中。上了岁数的人说，还记得那晚吗？政府军进了村……可年轻的一代人已经在相互做起了鬼脸，好像在说：*他们就不能省省？我可不想那些事儿了*。我们的车上满载着乐观：雨下下来了，干旱终止了，乡野一片绿色，牲口膘肥体健，居民吃得很好。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依赖雨水的及时到来，可在津巴布韦，这一事实出现于每个人的话中。“要是雨水再充足上三年，穆加贝的位子就牢固了，可要是再发生一次上次那样的旱灾，国家将陷入动荡。”咱们？过去白人用这个词专指白人，可现在，这个词的含义是津巴布韦。

公路上几乎没有车，道路的标准有无提高？有，许多。那些没有牌照，开起来叮当乱响的老爷车被清下了路吗？有，不过有牌照的车也不少。还记得有段时间，因为南非，加油站的油泵里没有一滴油吗？准确地说，是抵运，他们老切断输油线。

“对，他们那样干过，不过现在咱们的输油线有军队驻守。”

“要是你一生都住在一个国家，就很难发现那儿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事情真的与以往有不同吗？”

在伦敦，我等着来访的客人，然后问他们：“自从你上次来之后，有没有发现这儿有什么变化？”他们告诉我，我又说：“真的吗？确定吗？”

在穆塔雷，我们停下车，买点儿东西，然后向山里进发。我在寻找车外的狒狒。

“现在还要派人带枪去野外打野猪和狒狒吗？”

咖啡农回答：“不，现在不用了。好在豹子又回到这片山里来了，它们可以控制狒狒的数量。”

我们坐在檐廊上，俯瞰脚下的群山、湖泊、河流——水，水，因为有了雨水。莫桑比克那边的山峰看上去这么近，你觉得扔个石头就能落到那边山上。

“莫桑比克叛军如今还到这边来吗？”

“几个月前好像来过，不过打仗那会儿那些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农场上穿来穿去，我们不知道罢了。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反而觉得好笑。”

“莫桑比克农民还到这边来找吃的吗？”

“那帮倒霉蛋还来，在那边只能饿肚子。别忘了，他们是到自己兄弟那里找吃的。”

两个鬼影几乎就要从我的心底升起，两个白人官员，一个是罗得人，一个是葡萄牙人，在一张地图上扔骰子，不过还是

决定把那两个鬼影赶走。

"还有那个兵营,快把你逼疯的那个?"

"撤了,谢天谢地。"

"还有什么变化?"

"让我想想。"

佣人端上了茶和饮料,放在桌上。这个佣人是新来的,主人把我们向他介绍了一番,然后他就做饭去了。我们坐看暮色变换着大地的模样。

主人说:"让我想想。"

新搬来几对白人。

"有黑人吗?"

主人飞速瞟了我一眼,笑出声来。"还不知道吗?泰克雷把所有占地黑人都赶走了,是埃德加·泰克雷把那些人都赶走了。过去他们种玉米的山坡水土流失得厉害,不过现在正在恢复,迟点儿带你去看看,森林又回来了。"

"那么你不再讨厌泰克雷了?"

"讨厌?当然不。他是个好人。"

"你估计这儿过去有多少占地的?"

"可能有好几百吧,真可笑,那帮人一点保育的观念都没有。要在山区种地,不懂行可不行。"

"对,你是对的……知道吗,黑人认为你们很有钱,都说:'那帮有钱的旺巴农场主。'"

"他们那么想吗?上一季,大家差不多都破产了。知道吗,某某家的农场差点就没了。那儿有最棒的猕猴桃,可价格

却跌到了底。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在种猕猴桃，太好种了。至于我们种咖啡的，能挺过来完全是因为我们种的咖啡品质优秀，是阿拉伯咖啡。知道吗，买家最中意我们种的咖啡。”

他的话语中回荡着老罗得人的骄傲，也有新津巴布韦人的骄傲，言下之意就是：“咱们总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

“还有什么？”

“咱们准备再建一座水坝，再来一场上次那种旱灾，咱们全得完蛋。”

他讲述着他的故事。一长段水管的橡皮防水圈没了，水哗哗向外漏，有人在偷橡皮防水圈。“咱们派出人手，要查出是谁干的……”

“等一下，那是什么意思？”

“别在意，你要一定想知道的话，我们去学校操场，去查哪个孩子手上有了新弹弓。咱们去找校长，对他说，要惩罚那些孩子。问题是，那些孩子已经被揍过了，在家里，结果被揍了两次。他们再也不敢偷我们的橡皮圈了。不过，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玩弹弓时的情景，太好玩儿了。”

我向他讲了契诃夫写的偷螺钉的农夫的故事。一个农夫从铁道枕木上偷螺钉，当地的地主是法官，问农夫为什么要干这种危险事。发生了车祸，他就没想过他的行为可能导致旅客丧生吗？“老爷，”农夫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喜欢钓鱼，而要钓到某种鱼，枕木上的螺钉是最好的坠子。”“是吗？”地主大声说。“什么样的鱼？我怎么不知道？”地主也是个钓鱼迷，两人于是探讨起了钓鱼经：什么样的鱼在河里什么深度，用什么

样的饵料,线上用什么样的坠子。两人都是高手,对鱼的习性,无所不知。可最后,法官的职责压倒钓鱼迷的地主,他判农夫多年流放。农夫被押走了,可还是难以相信,这位志同道合的钓鱼迷,刚才还跟他像老友一样探讨鱼的习性,一转眼竟会这样对付他。法官说:“我也没办法,毕竟你偷了螺钉,不是吗?”

咖啡农听着这则故事,脸上挂着他特有的微笑。对,就是这样,不管你喜不喜欢。

简直可以给那件事加个标题——《一则可能发生在老罗得西亚的故事》。在新学校里,野蛮体罚依然被用来管学生。体罚触犯了法律,不过在某些国家,比如说英国,成人似乎认为体罚没什么不妥。

杰克后来写信告诉我:“老校长走了,来了位新校长。新校长很勤奋,到目前为止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学校上。可他喝酒,打学生,打得太狠了,我们……”(我们这里指白人海外教师。)“大家去问他,有没有必要那么做。他还打年幼的学生,甚至因为河流涨水而迟到的也要挨打。”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老师,他们都会提到体罚问题。

“过去他们打孩子吗?”

“打,不单男人打,女人也打,那场面难以置信。咱们劝他们讲讲道理,他们觉得我们不过是在空口说白话。”

还有什么事儿?

大家东拉西扯了好几个小时,才差不多把那些变化说完。晚饭吃得早,上床也早。早上,太阳还没上山,我们就起床了。

我想看看山下林子里还有没有长尾猴，再一起看日出。在林子边缘的空地上，有长尾猴短暂出没，嬉戏，追打，一会儿又消失在枝叶中。都是小猴子，没能见到那位猴群中的哲人。

上次我遇到的动物们怎么了？聪明的小维奇在俱乐部被个醉酒驾车的司机辗死了，老安妮死于一场与野猪的搏斗，那只瘦长的罗得西亚猎犬，走上光滑的水泥地面上就四脚打滑，它实在是太蠢了，早早入了坟墓。那只小黑猫下了窝小猫，主人为她留下了一只。小猫的父亲是只丛林野猫，小猫长成了只英勇的公猫，也去了丛林，时不时还回来看看自己的母亲。两只猫面对面，鼻对鼻，坐在屋后丛林开始的地方。

家里来了只新布尔犬，晚上，火堆燃起时，他就躺在地板上，快活地低鸣。家里还养了只年轻的黑狗，叫西马斯，具有部分纽芬兰犬血统。

还有那只大黑狗，塔卡。那时候，主人不在家，极度孤独的他每晚都跑到这来，舔我的手、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他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他太老了，跑不动了，只能待在家里。俱乐部有舞会时，他独自站在房子边上，一只行动僵硬的老狗，鼻头都开始发灰了，看着年轻的西马斯立起前肢，在跳舞的人群中欢跳。人们说："瞧，西马斯在跳舞。来，西马斯，跟我跳一支。"小狗抬起前肢，在人们的牵引下走上几步，大家一起鼓起掌来。几个月前，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咖啡农从水坝的防洪墙上跌了下来，一步也走不了。就是这只小狗在他身边陪了他一整夜。后来，咖啡农缓过点劲儿，慢慢爬回了家，小狗走在他身前，调整好步伐和体态，让咖啡农趴在他背上。

那段一英里的崎岖山路，人和狗走了好几个小时。

餐 会

盛大的餐会，所有人都来了。在英国，要吃到这样的食物可不容易了。这儿的菜农从来不知农药和化肥为何物，这儿的人也从没听说过什么注水肉，用来做熏牛肉的原料中从不含荷尔蒙激素。

餐会热闹、欢快，来了许多年轻人。上次来时见到的小姑娘们已经长成大姑娘了，都爱上了一个从桑德赫斯特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来访的英俊小伙子。那个跳伞运动员，他怎么样了？人们说他到某处开荒去了，干得还不错。

现在，人们的谈话中一点儿也听不到六年前那种怨天尤人的牢骚话，好像同六年前相比完全换了个人。确实换了个人。现在，大家都忙于各种发展项目。

大家计划让种植多样化，其欲望比上次更强烈。猕猴桃价格的崩溃未尝不是件好事，现在大家可能改种世界上最抢手的咖啡，不过已经有一座山种满了咖啡树……

这几家人也种一些无核小水果、澳大利亚坚果、美洲山核桃，还供应穆塔雷市场的蔬菜，在一间厨房里，一位农场主的妻子用剩余的牛奶做奶酪，供应城里的宾馆和使领馆，现在已

供不应求。上次来的时候还观看过她在厨房的餐桌旁工作，现在她有专门的工作间，保持适当温度，还请了帮手。

下面是几段谈话：

听说鲍勃的大角斑羚养得不错，你觉得在这儿行吗？

斑马……这儿是不是太高了？

法国软奶酪都能做出来，为什么不试试……？

今年我打算种上五公顷百香果。

鸵鸟羽毛现在又受欢迎了……

在秘鲁人们……

在墨西哥……

在亚利桑那……

我要养五十房蜂，在美国叫杀人蜂，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歇斯底里起来。

我说："我弟弟养过两百房蜂，我跟他说那叫杀人蜂，他一笑置之。"

"不管怎么说，蜜蜂能培养起人的雄心抱负，我看也没什么问题。"

芒果……菠萝……草莓……番木瓜……有些被制成干果，海外销路很好。

新种绵羊……新种的鱼……新种的猪……

当这里的人谈起新作物、新点子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入这小小的檐廊之上。接下来这种话上次根本不可能听过："真不明白非洲人为什么不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真不明白，在公共领地他们为什么不……""下次部长来视察时，我要

向他提个建议……”

政府部门

实际上，这趟旅程在山里待的时间并不多。我们的车开下盘山公路，开进穆塔雷，开始和官僚打起交道。今天有三人：咖啡农，一位南非来的女客人，我自己。现如今，白人可不会高兴就到村边转转，看看大都能勾起往日回忆的东西。更何况，我们中还有一位南非来的客人，虽然她并不赞成自己政府的做法，可那又没写在她脸上。不过，咖啡农跟当地一位官员挺熟。打仗那会儿，那个神色平和地坐在桌子后的人是个著名指挥官，那时他和咖啡农还是敌人，好多次在夜间率部队穿过咖啡农的农场。现在两人成了朋友。“你从来就不知道我们多少次夜间在你家农场上穿来穿去。”“有次我朝一个家伙开了一枪，很可能就是你。”有时，他们一起去酒吧喝一杯。我爸爸也曾经常带我去看我们家农场附近的一位德国工人。一战时，两人蹲的战壕正好面对面。在哈拉雷，我听说，打仗时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领导定期让政府的一位安全官员通过自己的地盘，因为那位官员给村民送去药品。救济任务一完成，双方又回到战时状态。如今，两人成了好朋友。是啊，还有什么联系比试图杀掉对方更紧密呢？

这位年轻人完全沉浸于大权在握的快乐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在想什么：让南非人来求求黑人，对他们有好处。咖啡农可不喜欢求人，也不必为自己求人，他在为当地的保育部门工作，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似乎，我成了最大的问题，在官员眼中颇为可疑。我拿出记者通行证，可根本没用。年轻人说："那说明不了什么，过去我们也给记者发什么通行证，惹了不少麻烦。""她可是津巴布韦的朋友，"咖啡农说。"朋友分好多种，"官员回答。这个官员乐于此，那种满足感，仿佛在参加一场政治辩论。我说，过去的政府禁止我入境整整三十年，真难以相信现在的政府依旧对我怀有戒心。"啊，你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得不小心。""也用不着小心成这样吧？""那时被禁止入境的人很多。""我可受到了被马尔文勋爵单独点名禁止入境的殊荣。""那种事你怎么会知道？""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俩四目相接，都是政治老手了。他的脸上写满了怀疑的神情，眉毛向上扬起，下巴向前突出，嘴唇绷得紧紧的。他抬起双手，手心向下，仿佛在说，够了，别再说了。然后坐下来，低垂双目，沉思。接着又站起身，说了句"对不起"，到隔壁办公室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他已笑容满面，对我说，他自己也喜欢写东西，有意成为一名小说家。于是我俩就探讨了会儿文学创作的问题。他要用太多的时间来从事行政工作，摇摇头，感叹于自己的命运。他批准了我们进入丛林的请求，亲自把我们送出了门。

重新安置区

我们此行有两辆车，一辆是政府的，另一辆是咖啡农自己的卡车。我们驾车向东行，然后拐上一条路面根本没有铺设的烂路，又开了好几英里，再拐上一条小道，一路上车窗外景色优美，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这里的土壤贫瘠，属于四类，这一带的土地不是从移居南非的白人农场主手中买来的，而是未分配的政府土地。政府在重新安置移民方面倍加小心，首先要确保建起行政中心点，洪水设施、交通设施，现在更是如此，因为有些过去从来未想到的情况正引起人们的关注。保育。这里的土壤珍贵而脆弱，毁起来太容易了。

咖啡农现在是马里卡兰的保育代表，在一个“头儿”手下工作。据他说，这个“头儿”非常明理，属于好人一类。他的职责是监视土地状况，看它是否健康。我们的车在颠簸中前行，他不停地大声说：“瞧那儿，瞧那片地。上次我来过后，成了什么鬼样？看那些沟槽，都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或者，“瞧那个家伙，他很在行，那片地简直没的挑。可再看看路那边的那块地，一塌糊涂！明年那儿一粒土也不会剩下，除非……”他攥紧方向盘，神色痛苦，他这人太容易激动了。我们安慰他，别太激动，容易得心脏病，不过根本没用。只要他看到有块土地状况不好，仿佛是他自己在受罪。看到健康并得到精心照料的土地时，他就心满意足。“看那条深沟，去年还没有，那小子

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他停下来，后面的车也跟着停了下来，大家都下了车。看着他站在大地的疤痕的前面。他用手指着那条深沟，仿佛上帝做出审判，说：“瞧这儿！”

“我真搞不明白，”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这片土壤严重流失的田地，“做好做坏都这么简单，这小子怎么就是不能像刚才那个那样干好点儿呢？”

他似乎觉得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轻易回答，开头是：该这么做……

我们的车一路开下去，离开穆塔雷已有许多英里。一路上经过许多发展点，都是新建的。还经过许多路牌，牌子上写着：欢迎来到某某学校。我们的车还经过成群结队的兜售芒果的妇女儿童，这里是芒果之乡。芒果你可能在别处也吃过，不过这么好的芒果别处肯定没有。这么好的芒果为什么没能蜚声世界？原因是运输。距城市太远，道路状况太差。

一路上，我们不停捎上搭车的，发达地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谨慎在这里并不适用。

有个上了岁数的人搭我们的车走了几英里，一路上紧紧抓住卡车上下颠簸的侧板，一个安静的老人，话不多，总在微笑。下车时，他冲我们挥了挥手，微微一笑，然后走进丛林。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将来要成为一名飞机机械师。另一个儿子刚刚参加了O级考试，全家人都在等结果。第三个儿子考试还没能通过。大儿子和小儿子的人生前途的巨大反差在我们心底留下深刻的印记。

我说，在这密林深处搭上一个穷人，而他的儿子居然在欧

洲的大学学习，这感觉真怪。我的话立刻遭到反驳："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我希望，更多像老人大儿子那样的年轻人能到英国的大学接受教育。

我们离开现代世界几十英里，却像隔了一个世界。下了车，我们走进丛林，围坐在石头旁。头顶上，高大、干燥的树木不仅投下阴影，更送来阵阵淡淡的芬芳。已是正午时分，一只绿斑鸽叫了一声。

这附近就有处村子，不过看不见。人们从村里走出来，跟我们坐到一起。从村里来的有男人，有孩子，但没有妇女，倒是有女性政府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坐车来。我们路上捎上车的人中有两名到这里做人口调查的工作人员，这会儿她俩正和这儿的头儿坐在树下，手上拿着表格和笔记本，和头儿认真交谈。还有一位女农技人员，到这儿观测降雨和农作物生长的状况。就在我们坐在那儿犯懒的工夫，许多工作已经完成了，就像在城里的办公室开会。

谈话转向莫桑比克，这儿距莫桑比克已十分接近，转向那些不断穿越丛林到这边来找食物的农民。莫桑比克战事连绵，我们在津巴布韦又怎么可能住得安稳？"那儿的战争结束不了，南非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一直打下去。"

一则莫桑比克笑话：沙丁鱼是什么？沙丁鱼就是经过七阶段社会改造后的鲸鱼。

一位老人对孩子们说，莫桑比克也曾是个富足的国家，粮食充裕。孩子们听了直摇头，根本不信。自打他们出世以来，莫桑比克人就爬过丛林，向这边的人讨吃的。

“那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穷?”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问。

“那儿在打仗。”

“过去这儿不也打过仗吗?”一位少女问,还依稀记得点儿当年的事。

“我们没打过仗,”十岁的男孩回答。

大人们相互看看,有黑人,也有白人,一齐摇摇头,笑了起来。

我问:“在这儿,如果能要一样东西,只有一样,你要什么?”

“钱,”头儿回答,大家一齐笑起来。

“假如你有五万英镑,你打算怎么花?”

这笔钱数额之巨大让他们再次笑起来,争论了一会儿,最后有了一致意见:“修水坝,那是我们最急需的。我们要修座水坝,把山下那些河流挡起来。”

我向他们介绍起马塔贝勒兰的那座菜园,那儿的土壤同样贫瘠,可他们获得了成功,因为有水。听众们一下来了劲,坐得更近,问各种问题。要多少水?用化肥吗?钱从哪儿来?

我又问村里人娱乐做什么?“大概去年政府派来了电影队。”回答很严肃,接着又笑着说起电影中看到的东西。他们并没说电影到底有什么好笑。

电影队没来的时候呢?

晚上,他们待在家里,聊天,说故事,有时候也跳舞。

有趟公共汽车,载我们到一处发展点,在那儿可以买到东西。有时,我们去穆塔雷走亲戚,不过路太远了,一百多英里。

那天晚些时候，又一次会面，另外一群人，另一棵树下。当地的村民代表们都来见农技员，一个当地的，还有一个外来的。当地的技术员是名女性，还是如今 20%受过农业技术高等教育的人员之一。她年轻，穿着入时，已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一张桌子放在树下，大约十个人就在树下讨论起村里的事情。

看到有从穆塔雷来的官员，村民们似乎不大高兴。当一个男人下了卡车走到桌边时，他们立即开起了玩笑，关于上次他给他们的建议，显而易见，这里有两类人：村民；专家和官员。

在哈拉雷，有人对我说，那些农学院毕业的新专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跑到村里去，向那些世世代代在那种条件下种地的人说该这么做，该那么做。村民回答说，那没用。村民到底是出于保守还是出于经验，很难分清。

我收到过许多研究文章，大部分来自大学，为传统农耕方法辩护。村民们完全懂得在干旱的年份该如何保持水土，如何在这种贫瘠的土地上种庄稼，如何在饲料短缺时养好牲口。可虽然大学层次的农业专家对传统技术赞不绝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会进入农技院校的课程。研究成果要转化为教学实践要走的路总是很长。

我对咖啡农说："连过去的传教士和拓荒者都赞叹说这里的人是优秀的农民。"他回答："你不懂，那时候是那时候，人少地多，现在情况变了，可他们还没做出相应的改变。我不停对他们说……"

那天傍晚，太阳金黄，低悬在地平线上。我们站在一排新建的栅栏旁，栅栏坚固，建栅栏的钱来自某个国外援助组织。

黑白相间的奶牛长得壮实，挤到栏边来看我们。

咖啡农又开讲起来："瞧瞧这栅栏，我清楚它要花多少钱。这种质量的栅栏，每公里不花上多少镑是建不起来的，要把这么大一片林地围起来得花上多少多少镑，但它们能用上多少多少年。一流的栅栏，太棒了。不过，你要是把铁丝挂在树枝上，别伤到树，那同样的钱可围起比这大三倍的地方。"

他站在一群非洲人面前，双脚叉开，牢牢地站立在地面上，双手背在身后。那群非洲人神情严肃地听着他的话。我和那个南非妇女都瞧出了这一幕中浓厚的传统色彩——白人教导黑人，互相交换了下眼神，强忍着没大笑出来，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奶牛，它们似乎既想和我们认识认识，又不想。也就是说，好奇心把它们吸引过来，走到距我们大约五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只要我们有小小的举动，它们就会扭头跑开。

我们听到："这就是援助资金的共同问题，浪费！可你们为什么就不对他们说……"

这些都是废话。人人都知道，国际专家下到一个地方，早就决定了要做什么，怎么做。当地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我能想象出那幕情景，当地人对某个严谨苛刻的德国人或瑞典人说："用不着打柱子，把铁丝挂在树上就行。"

我们又听到："真让人心碎！最关键的是把土地好好圈起来，不让牛进来，好让土地好好修整一段时间，不再流失，那才

是当务之急,看看这个!”

他把自己的学生们引到一片圈起来的地旁,说:“瞧,这片土地已修整了两年,能看到林子正在恢复。看见那种植物了吗?只要能看到那种植物,就意味着至少有两季没有牲口进过里面。懂我的意思了吗?要是利用天然的树木,而不是打桩,圈起的面积可以比现在大三倍。”

栅栏另一边,有牲口出没的地方,一片嘈杂。又来了一群牛,向原先的那群走去,淡淡的烟尘从它们的蹄下升起,遮盖住它们皮革上的光泽。领头的是头公牛,第一群牛的也有头公牛打头。入侵的公牛步步紧逼,似乎要和先来的那头谈判,共享这片草场。两头公牛面对面,鼻对鼻站着,喷着粗气,母牛们却已经混在一起,吃起草来。一头新近出生的小牛犊,又瘦又亮,简直像只站起来的黑丝绒空手套。它鼻子贴着栅栏,背对着牛群,盯着我们看。

“还有一件事儿,”咖啡农说,“钱被浪费在地位标记上。现在时髦建砖房,可建砖房要烧砖,就要砍树。木头都被浪费了。为什么不用金伯利砖?那种砖结实极了。知道吗,世界上有的国家从来不用烧制砖,那里的人用泥和水制土坯砖,一样能用上几个世纪。为什么你们坚持用……?”

两头公牛已达成某种协议,现在和平共处了。“我简直要疯了,”咖啡农说。“我走遍这里的村庄,到处看到这种砖窑,有什么用?钱浪费了,木料浪费了……”

咖啡农走到了听力所及范围之外,我们问官员和村民,这样被数落是否会在意。他们并没有交换眼色,沉默了一小会

儿，然后一位村民说："不，我们不介意，他是想帮我们。他是个好人。"

没法搞清楚他这么说是否出于礼貌。后来我们又就这件事讨论了一番，得出结论：他们说的是真心话。村民说的是真心话，官员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回到车上，沿着漫长的道路，穿过落日下的丛林，先回到穆塔雷，再回到山上。

晚饭时，餐桌上坐了个客人，他过去的工作同穆塔雷的那位官员一样，负责在东部地区重新安置移民，一干就是好几年。这方面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说，在他的记忆中，在早期那段理想主义的日子里，穆加贝想搞集体农业，类似于俄国的集体农庄，土地共有。坦桑尼亚也试过，结果这里的情况不比俄国或坦桑尼亚好多少。人人都知道那是个失败之举，不过知道是一回事，公开承认又是另外一回事。真正发挥起作用的是把土地和原始的农业机械给了农民以后。不过，那些土地真的归农民所有了吗？这里又是个著名的灰色地带。土地是政府的，也是农民的。农民想真正拥有土地，拥有和土地相关的所有权利，可以传给子孙。现在，情况好像在朝这个方向上发展，不过法律依旧模糊不清。还有一件事儿。要在重新安置计划中获得土地，就必须承诺坚持那种生活方式：你同意做个农民，只做个农民。不过他们又想得到和公共领地的居民同样的待遇，家里至少有一名成员在附近的城镇工作。重新安置地的贫困程度更甚于公共领地，所以他们有那样的要求。这是他们的说法。

不过政府的回答是：既然你们已经承诺全心全力于这种生活方式，那就全身心投入吧！只有这样重新安置区才会改天换地，你们自然也就富裕起来了……

到时候？一辈子？两辈子？

在重新安置区，我们参观了一位优秀农民的家。他的工作既让农技人员满意，同时对他周围所有的人也是荣誉和激励。他的家是一幢砖砌小房子，有两间屋，带间厨房。房外有座漂亮的菜园。屋后的田里一片绿色，田埂做得整整齐齐。不过，这个距穆塔雷有一百多公里的农民家庭里的孩子却挖空心思想到城里去，并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即便那意味着和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屋，也在所不惜。

传　说

现在，我们驾车从穆塔雷出发向西，沿着昨天去过的重新安置区的边缘行驶。我们离开一个秩序、舒适、文明的中心，奔向另一个。大约一小时的车程里，道路两边都是贫瘠、干旱的四类土地。我们也清楚隐藏于此处丛林之中的许多村落跟我们昨天去过的那个村子也没什么两样。前安置官员今天也和我们在一起，对这里的每一寸丛林，每一间窝棚，每一处发展点，他都了如指掌。他的情感同那些重新安置的农民在一起，就如同咖啡农看到土地在受罪，自己也感到切肤之痛。我们向他说，昨天看到的，让我们感到有点儿灰心，他回答说，要是我们见过这里过去的样子，就会对所取得的成就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前安置官员也是位历史学家，熟悉这一地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现在与我们近在咫尺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边界在他眼中不过是多变政治的临时产物。那些眼瞧着自己的部族就这样被武断地一分为二的村民肯定也有同样的看法。

对莫桑比克未来的一种看法反映了这里的过去。津巴布韦东部地区和莫桑比克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是一个整体。那是在什么时候？此类看法需要的时间单位跨度之大，简直可以看到印度洋的海水涌入马绍纳兰。不，新莫诺莫塔帕王国并

不需要一千年或一百万年的时间才能成形。不过,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各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的住所,在海岸边的丛林中躺着许多古老的废弃城市,等待着人们去发现,挖掘,因此时间尺度还是模糊些的好。无论对一位领导人,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登上权力宝座的一个恶果就是从此之后你的梦想就狭窄起来,都落到如何维持权力之上。丛林中的自由战士可能晚上围坐在火堆边谈天说地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边界会消失,这里的部族能像过去一样生活。这种边界划分太武断了,完全是白人强加给我们的。咱们又何必在意它?"可战争结束了,你也不再坐在树林中,看着火光在树叶和草丛上投下跳动的影子,这种话也只能在密室中才能说了,还要先确保附近没人,佣人也不行。有多少支军队走出深山密林,却发现他们失去了梦想的自由,那种当他们身上穿着破衣烂衫,除了手里的武器再无其他物质财富时拥有的自由!

快 乐

今天,每一块天空都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在我们后方,降下的雨水形成一道灰幕,灰幕渐渐赶上我们,把我们吞噬。那一刻,我们的车正行驶在山中。突然大雨瓢泼,追着我们走。我们奋力把它甩在身后,回首望去,山峦已不见踪影,只

见天地间一片深灰色。前方照来一束强烈的日光,我们还以为天转晴了。可不,车一拐弯,又一片漆黑的云团罩在我们头顶,我们的车又驶入另一片暴风雨,雨水夹带着冰雹敲打着车窗玻璃。正午时分,在一片阳光灿烂的地方我们把车停在一条小河边。这里既有偏远山区的野性,又有现代文明的便利,河边放了张野餐桌和一张长椅。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来了辆越野车,车上下来三个人,两人是游客,还有一人是向导。我们猜是瑞典人、德国人、丹麦人,还是美国人,可听到的是意大利语。那两个意大利人肯定富有,穿着雅致,能专门请一位向导,把他们带到这条暴涨的小河边。接着,我们的车向相反方向驶去,路两边更多的山,景色也更狂野,一路上再没遇上别的车辆。雨云在四周聚集,雨在车的四周落下,最后天地间一片灰色。在雨中我们抵达锡马尼马尼宾馆,巨大的大堂里已点起一大堆火。这家宾馆十分宽敞,每间房间都又高又大,卧室外带檐廊,坐在里面,可以望见一层又一层的群山。主楼旁就是一座游泳池,泛着蓝色的水光。旧日殖民地风格,可能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宾馆了,可它几乎空着。这么好的宾馆怎么可能不是常年爆满呢?似乎它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这里临近莫桑比克,就在两年前还有一群抵运恐怖分子从山那边渗透过来。那又如何?人人都见过车祸伤亡统计数字,看还是照样开车。看来人们选择害怕什么,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讲。

餐厅宽敞,也几乎空无一人。我们在里面吃了晚饭,听到从外面酒吧传来笑声、叫声,那里每晚都人满为患,宾馆内的酒吧却上客严重不足。那一夜,宾馆沉浸在一片雨声中。第

二天早上，雨停了，大地上升起一层薄雾。我们开着车在山里转来转去，车上的两个男人曾徒步踏遍这一带的群山，对这里每座山头都很熟悉。接着，我们的车驶向山中的轻纱瀑布（在世界各地，野性十足的壮观瀑布被驯服后水量减少，就叫做轻纱瀑布）。薄薄的水帘从数百英尺高的断崖上落下，撞上下面的岩石，水花四溅，溅入下面的深潭。瀑布两边的悬崖上布满了鸟巢，整个地方笼罩在流水声产生的寂静中。香蕉树生长在这里，露出全部的生死年轮。香蕉树开完花后就枯萎，松懈的枝叶里显示它就要重归泥土了，然而在已了无生机的主干旁，新的幼苗已经冒出地面，开始向上猛长。大家在岩石间一块草地上坐下，咖啡农说："打仗那会儿，一帮恐怖分子在这儿杀了几名游客，所以本地人从不到这儿来。差不多就在你们坐的地方。"他的话并没能让大家站起身来，不管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恐怖，它早已远离此地而去，太敏感的人难以适应生存。再说了，我们回应说，这世上恐怕没几个地方没发生过谋杀、战争、死亡。当然，同样的地方也有过爱情、亲吻、野餐和各种美好的事情。我们再次出发，沿另一条路穿过山区，一路上再没见到人的踪迹，只见到了几头长得膘肥体壮的牛，紧张地望着我们的车。在这样孤独的高度上，动物很少见过车辆在它们面前呼啸而过。整个上午我们的车都在行进，莫桑比克的群山就在我们的右手边。有时，车沿着山脊行进，可看到山下的河谷地区，有农场、水坝、种植园；也有时，汽车穿行在依然完整、健康的森林中，车走得不快，我们还不断停车，这趟旅程实在不想让它结束。当最终我们的车驶上大路时，大

家心里明白，我们身后是如今少有的几片大自然拥有自治权的地区。

马绍比的旅馆

从穆塔雷回哈拉雷的路上，我在马绍比停留了一会儿，把车停在那家旧旅店门外。这家旅店不再像上次那样，用木板封了门窗，废弃不用，又能看出许久以前我们在周末来时看到的样子了。我说想见见经理，经理是位年轻黑人，正率领一群热情洋溢的帮手干活儿。我对他说，这里过去很受欢迎，总是爆满。不过那仅仅意味着受白人欢迎，他对那些可不关心。我又说打仗那会儿，RAF（皇家空军）常常从索尔兹伯里到这里度周末，有时聚会一开好几天。他误以为我讲的是丛林战争，也从未听说过 RAF。二战在他出生前就结束了。我问他，能否进去看看，缅怀下旧日时光。年轻人很有礼貌，也觉得我有趣。在旅店的后部又见到了那排卧室，不能辨认出昔日的样子，两头还加建了新房间。1982 年时我没能找到的那段台阶又现身了，旁边堆了一堆新近留下的建筑垃圾。摆放着圆桌和遮阳伞的咖啡座代替了灌木，酒吧还在原来的地方，不过扩大了，一直拐到我们过去跳舞的地方。餐厅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我在里面吃了午饭，就算突然一阵风把门吹开，飘进几

个昔日相识的幽灵,我也不会被吓着,在这个昔日我们常来的地方。“瞧,”我在心里悄悄对他们说,“都发生了,就像那时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也不是完全如我们所预料……”我满可以一面在心里同他们说话,一面想象着他们脸上会露出怎样的讽刺神情,如果不是因为要赶时间的话。我谢过了经理,望了望马路对面枯黄的橡胶树,确定那几只悲惨的狒狒没有再出现在视线中,然后把车开上了驶向哈拉雷的公路。

老好人史密斯

好像如今没人再提史密斯了,六年前,这里的人句句不离他。他去过美国,说现今的津巴布韦政权比南非更暴虐。人们认为,他希望被抓起来,希望成为烈士,“可穆加贝太聪明了,不会那么做。”

人们向我说了一桩发生在地方邮政所里的事儿。史密斯先生和太太排队寄信,“和大家一样”,说的人露出赞许的神情。有一天,史密斯太太对一个黑人妇女说,希望她的小女儿过得好。“记得吗? 我还给过她糖果。”

“记得,阿妈……”那是对年长妇女的尊称。“不过,您要知道,光给糖果是不够的。”

智　库

有“消息”说，有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成员都是各党派中的高层人士。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使用过时、没人信的马克思主义辞令。和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一样，在津巴布韦有两种语言，两套思维模式：一种是公开官方场合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种是真正活生生的语言，承认第一种语言的虚假。据说，穆加贝本人有时也会参加智库在晚上召开的会议，这种传言的含义是人民希望他确实有去，就算他实际从未出席过那种场合。智库产生的思想经过过滤后流淌下来，产生影响，就像快速流动的清水流入一潭死水。不过智库里使用的语言绝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更不会刊登在报纸上。“要是你能私下接触某位部长，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实际局势都很了解。可当他和别的部长一起出席内阁会议时，或者出席某个委员会时，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消息”说这个智库的名声如此之高，以致南非一些非常高层的官员也会秘密前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都有哪些人来过？自由派吗？”“不，不，比那更厉害，听了你都不敢相信。还是不说了，总之是政府里真正有实权的人。”

老农场

现在，该结束孩子气了，我必须回我父母的老农场去看看。为了确保方向盘最终能把车转上回家的路，我决定，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作家心中的神话可远没那么简单，有的作家早早就在那片领域四周建起保护网，打那以后就再不走近。又岂止作家如此？我认识来自各个前自治领、殖民地，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他们在那些地方长大成人，然后才远走高飞，由现代世界的边缘进入中心。当时间到了，要踏上首次返乡之旅时，那就像剥掉自己新长出的皮肤，把自己的血肉赤裸裸地暴露于过去面前。每个孩童时代就远离故乡，在异地长大成人的人都知道，第一次返回故乡时，仿佛一切都在缩小。

儿童世界中一切都是巨大的，每个邻居、叔叔、阿姨，或街角小店店主都可以轻易被转化为童话中或漫画书上的人物。可长大后，当那人回到家乡时，他或她发现那些也不过是些普通人。关键之处就在于此，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因为那些记忆实在太强大了。

但是在本地（我们总是那样称呼它，仿佛津巴布韦只有这一个大区。同样，任何一个民族刚开始时也以类似的方式称呼自己，仿佛世界上只有自己这一个民族。）洛·马冈地地区，一切都大得不合比例，特别适于做传说和史诗的素材。那里

的白人农场相隔很远，可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都逃不脱别人的眼与耳。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地区，一条电话线可能串接着二十家农场，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存在。寂寞的人听别人在电话上聊天，有时甚至会插进话头，加入到聊天中。三四个人同时在电话里聊天是常有的事，仿佛大家坐在一间屋子里。就好像大家都生活在舞台上，故事每传一遍，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都会被放大一次。谁说"流言蜚语"这个词只适于人口拥挤的小街小巷？非洲人也来火上添油，他们按照自己的传统，给白人们取了一个个犹如史诗人物的名字：怒火燃烧的脸、有两个丈夫的女人、火发之子、像狗一样狂吠的男人。

就以我们家最近的邻居马修为例，他叫大个儿鲍勃，因为他有六英尺高，身宽体胖，看上去就像从一大块肥瘦参半的牛肉上刻出来的。他妻子叫小马修太太，因为她只有五英尺高，小巧、圆润。他对当地人很凶，每谈及此，大家都直摇头。"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劲，"在五六十年前，人们最多也就这样说说大个儿鲍勃的过度行为。他曾在格拉斯哥做过警察，很容易想象出那时他的样子：双手背在身后，腋下夹着警棍，漫步在阴暗潮湿的人行道上。我和弟弟骑车出去玩儿，顺便到他家坐会儿时，他妻子总在厨房里做吃的：南瓜饼、燕麦饼、水果饼、馅饼、姜面包、水果面包、麦片姜饼，所有这些好吃的都会被端上餐桌，于是就有了一顿超棒的苏格兰式正餐。他家里摆满了"古旧家具"，也就是沉重、泛着闪光漆的柜子和衣橱。有时他家的侄女来玩儿，小马修太太就会和姑娘们跳起苏格兰剑舞，苏格兰方格裙飞扬，穿拖鞋的脚像长在小猫身上

一样灵活。要是这家人还住在苏格兰，他们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不过就鲍勃那块儿头，还有那双拳头，无论在哪儿都是传闻的好材料。“我的老天，要给鲍勃揍上一拳，简直就等于被铁锤砸了一下。”黑人们管他叫雷电，还在他家附近找活儿干的人经常走的路边的树上留下标记，意思是说，这家农场的活儿不好干。

一个未解之谜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大个儿鲍勃和小马修太太在一战之前离开格拉斯哥，来到南罗得西亚，与野兽和野蛮人为伴？在循规蹈矩的表面下隐藏了什么样的不安分、雄心，或是罪行、或是罗曼蒂克，让他们远离故乡万里之遥？类似的疑问也存在于所有其他邻居身上。礼拜日，看他们上教堂做礼拜，苏格兰长老会和英格兰教会的仪式在村礼堂中交替进行。礼堂中的人一个个穿着礼拜日正装，戴着帽子，神色凝重，双目低垂，目光停留在手中的唱诗本上。很容易想象出他们在家乡时的样子，他们大可以不必远走他乡。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每人身后都隐藏了些事情，虽然不显眼，但却很重要。因其之故，这些人来到这里，躬身耕种于大片从黑人那儿偷来的土地之上。在这里，他们全副心思都放到了地里，个个都成了穷人，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这里到处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在他们看来，英格兰和苏格兰实在太小了，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中每一个人到达本地时，处境同那些走下轮船，踏上新英格兰或弗吉尼亚海岸的家庭完全一样，心里满是冒险和财富，还有自由的念头。

常识告诉我，这趟返乡之旅肯定是高潮的另一端，更不用说朋友的劝慰了，可最后的结果也不尽然如此。首先是天气，或许你喜欢用气候这个词。阿尔顿开车送我回本地那天，所有人的心都悬在降雨上。几星期前，下了几场充沛但却短暂的雨，打那以后就再没雨水落下。现在已是十一月下旬了，大家心底都藏着一个想法：咱们的新气候预报科学与实际天气状况应是前后脚的关系。天气预报一宣布 ITCZ，就应有大团暖湿空气从森林和海面升起，飘移到指定位置，好同东南部接近莫桑比克地区的高压相撞。可天空平静、湛蓝，丝毫没有大雨来临之前的戏剧性场面：镶着银边的乌云向天顶翻滚，闪电划过地平线之上的低空，阵阵雷鸣，犹如预告。人人心里都想到那个词——干旱，可没人敢说出来。这又是一种迷信，一旦说出口，旱灾就会成为现实。

我可不想看到我们家的老农场在干旱中凋零，在林火的烟雾中迷茫。雨水降临之前的丛林一副零落枯萎的景象，看了让人不好受，正是那种心境的真实写照，那种我害怕，却又常常在梦中经历的心境：孤立无援，被排除在外，外面的世界是流放地。我想看到丛林葱茏茂盛的样子，看到它雨季时的景观，计划确定能看到那样的丛林。新闻报道说，东北部下了雨，虽然雨水并不算充沛。再说，候鸟们也已经到了。虽然皮肤上落满了旱季干燥的尘土，好像披了片丝绒，候鸟的来临宣布雨季已经到了。许久许久以前，在那时，白鹳和燕子带来了远方的讯息，那些难以想象这辈子会有机会见到的地方。那时，在我的心底里，英格兰同非洲如此遥远，就犹如上一个梦

中的氛围同接踵而至的下一个那样不同。那里，下雪，起雾，阳光浅淡，田原牧野上，悠长的黄昏中，鸟儿在沙质的河岸上低鸣浅唱，从不离开；这里，太阳准时六点出山，六点落山，色彩浓艳，热浪简直会咬人，住的地方海拔高，天空中随时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从不下雪。年轻时，我同欧洲相隔万里，与那里的联系只有文字。待我移居英国，又被南罗得西亚政府禁止入境后，我所熟悉的非洲便远离我而去。眼中看着一处风景，心里却在想着另一处，这似乎是我的宿命。不过，我结束了 1988 年这趟津巴布韦之旅，回到伦敦，看到电视中的气象预报员指着地图，说南部非洲上空的 ITCZ 正在影响北边的冷暖气团，相应地也会影响这里的天气，改变这里的天空——英格兰的天空。我坐在伦敦寓所的沙发上，窗帘拉得紧紧，把十二月挡在窗外。厚厚的窗帘同不可穿透的墙壁把我的心目所见之景观同屋外的景观一分为二。然而，在电视中那一幅风向和气流图面前，这种分隔顿然消散，两个不同的世界合为一处，比乘协和号飞机还快。或许，那种机械再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从伦敦到哈拉雷或东京也不过两三个小时时间。可最终下定决心去完成这趟不可能之旅，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我之所以最终下决心回老农场看看，真正想了解的是距离，是距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和阿尔顿出发的那天，艳阳高照。我俩驾车驶过哈拉雷北郊，往日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从我嘴里蹦出来：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儿，那儿又发生过什么事儿。有些事儿好像根

本不可能熬过来，可人们就是熬过来了，我们都熬过来了。感谢老天，那些事儿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在这样的旅途中才会悄悄溜出心门。

等等，真是这样吗……或许，事实并非如此。假如，一个人真的可以把童年的所有悲伤，像青紫肿胀的伤处一样疼痛的念家之情，还有被欺骗、被戏弄时的恼怒都锁入心底，如果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心灵日日面对的谎言，就好像那里是个遭诅咒的地方，你爬了出去，把它永远甩在身后，但它还在那儿，随时都能看得见……那片伤痛之处，它所具有的力量，真的会低于我们的预计吗？有一种鱼，在贴近海面的水中巡游，搜寻打算冒险在上下摇晃的海面上睡上几小时的候鸟。发现目标后，这种鱼中之猛兽悄悄出击，咬住鸟儿在睡眠中失去提防的脚爪，把它拖向无底深渊。

我们的车开过平整、路况良好的城市道路，记忆中马上就要开上乡村道路，车随时会突然上下颠簸起来，可什么也没发生。车轮滚滚向前，又快又稳，可和丛林和过去已隔了无限远。不错，就几星期前我刚刚去过“本地”，还去了家离我们家老农场不远的农场，不过当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并不属于我的童年，也不属于那段旅途的记忆。那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旅途……

山谷和小山缓缓向后移动，道路在高高的草丛和一堆堆巨石间拐来拐去。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开车送爸爸去索尔兹伯里，还是那辆旧车。当时，爸爸已是个糖尿病重症病人，随时会昏迷。妈妈陪爸爸坐在后座上，时刻观察着他的脸，手指平

静地搭在他的手腕上,测他的脉搏。现在的公路那时还仅仅是小道,从索尔兹伯里一路向北到赞贝西,一路灰尘滚滚。要是我开得太快,灰尘刺激到病人,他喘着粗气叫我停车。于是我把车停一会儿,然后再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驶过路面上的沟沟坎坎,躲开坑洼的地方。要尽快把他送到医院,可要是开得太快,那些沟坎坑洼先就要了他的老命。那种旅途有过几回?不记得了。后来修了简易公路。如今,车行在现在这条棒极了的新路上,轰鸣着向北飞驰,我望向窗外,搜寻着昔日的老路,沿着铁路线有时还能看到一小段,然后掩埋在高高的蒿草中。那些柏油和碎石标志着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南罗得西亚最先用柏油掺加碎石铺简易公路,打那以后开车去索尔兹伯里不再是一场噩梦,就算小心驾驶,也只需三四个小时。至于那条晴天满天灰、雨天满地泥的小道,也就是第一条路,现在已找不到了。不过我敢说,要是我们停下车,走到车外,下到路基下面,拨开雨后茂密的杂草,一定还能发现那条小路的踪迹。当年,我们的车就在那条老路上上下蹦跳,左右摇摆,有时更要耐心地等上几个小时,等暴雨后形成的小河退下去。如今,就算雨水把河流都注满了,你也未必会注意。没过多久,记忆和梦境中的景物还远未出现,大岩脉已横在眼前。那连绵逶迤的高山,到处是矿物结晶的闪光,在远方呈现出淡淡的蓝色。

真遗憾,妈妈不知道这些大山原来一直连到大裂谷,连到印度洋。她的记忆与言谈中处处是海洋。她生长于伦敦的小街小巷,不过大海才是她心中的腹地,花岗岩般的海浪上下翻

滚，初升的一轮红日之上，大片大片的朝云被映成灿烂的金黄。后来，我得知她的母亲——艾米丽·拉沃尔(生第三个孩子时，她死于难产)原来是泰晤士河上一位驳船船夫的女儿，原来大海和河流流淌在她那个家族的血液中。妈妈能做个合格的水手，也以此而自豪。一家人乘邮轮过里海时，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晕得躺下了，而她还在舰桥上同船长谈笑风生。还有后来到非洲那一路上，刮那么大的风，除了她以外所有乘客都躺在自己的铺上，巴望自己死了算了。在高于海平面六千英尺的农场，她时刻怀念着大海，可负担不起那笔钱。她被困在了农场上。在那里，还从未听说过哪个会去英国度假。如果本地有谁回了老家，不是去看病，就是去见某个沉疴难愈的病人的最后一面。就算是那些“拿支票本的农场主”也很少回老家。那些富足的农场主有时去德班，而我们连那儿都去不了。

当我们谈起他们的旅途和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时，大家总是凭自己的经验添油加醋。我还是孩子时，常听到大人们在摆龙门阵时说起金矿矿脉、石英岩石、阿拉伯驼队、阿拉伯矿工。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那些古代采矿点遗址是那些阿拉伯矿工的杰作。要是那时就知道非洲大陆差点儿就一分为二，印度洋的海水差点儿就涌了进来，大人们的闲聊中肯定会加上海风、海浪，阿拉伯商船。

要是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真正历史就好了……我们一直以为在白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人还未走出狩猎—采集阶段。不错，他们也种小块的谷物和葫芦。事实是，数个世纪以来，

这里一直是个传说，一个关于大大小小的王国的传说，传说中有战争、征服、政变、背叛、条约、奸细。葡萄牙人在传说中的角色不止于贸易者，更扮演着把不同的国王推上宝座，还不止一次自己直接统治的角色。简直就是一部比莎士比亚笔下的金雀花王朝更高潮迭起、惊险刺激的戏剧，比想象中多愁善感的阿拉伯人可精彩多了。

从哈拉雷到大岩脉不过片刻之间，我使劲想减缓旅程，把这个拐弯、那座山头同记忆对上号，可根本没用。大岩脉很快被甩到身后，不一会已进入班克特地界。

只是在这趟旅途中，我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许久以前在欧洲也发生过。大城市相隔如此之遥，人们一辈子可能才去过一次，或者只是听说哪个相识的人去过。要去哪个村子，买点儿自家村庄不出产的东西，步行或骑马要一整天的时间。在野店过夜，惊恐，却兴奋，回到家中就向邻居们讲起一路上的种种惊险与奇遇。后来，突然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现了平坦的道路，人们乘马车出行，世界缩小了。过去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触手可及。坑洼不平的道路原本不过是人们出于出行的必需，用脚踏出来的小径，弯曲萦回，有时断了头不再向前，有时围着小山转，有时沿着河边，寻找过河的浅滩。后来，这种路消失了，先长了杂草，继而长满灌木和乔木。如今，在非洲，在津巴布韦某些地区，那场革命还在进行之中。有时，你把车开到柏油路的尽头，发现眼前是一条崎岖不平的沙质丛林小路，原来也是用双脚踏出来的。在那之前，汽车飞速穿过无限多的丛林；在那之后，它就只能

缓缓追随步行者留下的足迹了。

现在，我们的车进了班克特，这里已发展成了一座小镇。至于旧日的班克特，那座公路边的“站点”，只有我这双穿越历史的眼睛才能辨认出来。那时，这个“站点”的核心区是一长溜带檐廊的单层房屋，叫做达达根斯，依它们的希腊房东的名字起的。内铺、杂货铺、卡菲尔人开的大车店都在这排房子里。这排砖瓦房最北边有间小屋，那就是肉铺，镀锌柜台后挂着巨大的铁钩，上面挂着血迹斑斑的动物关节，摇来晃去。外面，在屋后的树下，他们刚刚把一头牛开了膛，牛的四个胃喷出的浆汁撒了满地。树枝上可能还挂着另一具动物的躯体，上面落满了苍蝇。肉铺的旁边，这排房子的第二家是杂货店，里面有水果罐头、牛肉干、饼干、棉布。水泥地面上堆着一袋袋白糖、面粉、玉米粉，店里的黑人“伙计”不时把一群群蚂蚁从地上扫走，她对这些偷盗者总是打着十二分的警惕。杂货铺旁边是家旅店，里面有一张吧台，五六张桌子为来往的商旅以及向北去北罗得西亚的客人提供餐饮。和大多数乡村旅店一样，这家旅店主要靠那张吧台赚钱，到晚上就顾客盈门，大多数是男性。旅店里只有两间卧房。卡菲尔人开的大车店同这排建筑隔了几码。

就这儿，在檐廊上，站着一个半大姑娘。她从自家农场步行了七英里到这儿，满身尘土。透过门上的防蝇纱网，看着一个坐在屋里吃饭的商旅客人。那人的胳膊、腿，还有喉咙在长时间日光的暴晒下早已灼伤，穿着和当地农场主一样的卡其布衬衫和短裤，他常来这一带的农场推销给牛防虫的药水、铁

丝和木馏油。坐在椅子上，他全身张开，脚伸得老远，椅子向后翘起，只为他的身体提供一个并不很稳固的支点。他吃东西的样子一丝不苟，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咽下一整袋的玛丽饼干，还吞下一杯桔红色的茶，浓得任你胃中有多少折皱也能给熨平了。他不时伸手擦擦额头上的汗，铁皮屋顶下，屋里热得不行。农场上来的姑娘站在那里，望着一个高深莫测，非她所能及的世界。一个男人出现在檐廊上，钻进自己的车，向公路沿线的下一站驶去，也可能去卡萨卡，或者回索尔兹伯里。一个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的男人，当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过夜，就会找个姑娘陪自己睡觉。事实上，那是三十年代，正处在大萧条中。那个旅行推销员能找到份儿工作已经算走运了。他有个妻子，在什么地方做佣人，也可能是个管家，总之做工的地方是个学校放假时能把孩子带去的地方。旅行推销员感受到一种压力，压力来自一双饥饿的眼睛。他抬起头，隔着防蝇纱网，在炫目的白光中看出那身影是个姑娘。调整一下眼睛，再仔细看看，他看到那姑娘的一双长腿也被日光灼伤，脚上穿了一双生皮短筒靴，赤裸的胳膊也被日光灼伤，一支点二二口径的步枪提在手中。身上穿的长裙跟手中的那支枪实在不太协调，就算在城里，那长裙的式样也不算落伍。她给这里的肉铺送来六只珍珠鸡，从一大群中打来的。那大群珍珠鸡铺天盖地，落满了农场，一边叫着，一边到处乱跑，好像林木间穿行的黑影。最后，那群珍珠鸡飞上半空，落到远处林中树上，躲开手中拿着点二二口径步枪的猎手。那六只珍珠鸡换来的钱刚好够买一匹棉布，够做一身长裙。那天

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缝纫机前干了个通宵，把长裙赶了出来。一身长裙，她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如果那个旅行推销员真的推开门，向她走来，她立刻会扭头跑掉。她所需要的是观察，根本不想同那人搭腔。她知道，一旦搭了腔，那个旅行的人就又变成生活必需的奴隶，跟她自己的父母没什么分别。

那一长溜房子现在都空着，门都上了锁，随时会被拆毁。同马切凯的那家旅店一样，我实在难以相信如此单薄、简陋的建筑当初竟容下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生活。过节的日子里，或者有舞会或运动会的时候，好多白人打这儿的檐廊下走过，进进出出那间小小的酒吧。过去熟悉的邮局还在，那是幢小巧精致的建筑，现在旁边盖起了别的房子。至于其他……班克特活力十足，迅速扩张，新城区里黑人有了像样的住处，至少，有些房子建得不赖。至于每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朝北方的大路右侧修了两条平整的新路，其中一条沿着旧铁路线走，一直通到阿尔夏矿。我们管这段铁路叫阿尔夏线，不过很久以前铁路上的枕木就被移走了，也可能被偷光了，也可能被洪水冲到丛林里，积满了水，成为蚊子的孳生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夏矿是座大矿，有自己的酒店。那时，以及那时以后，那座矿都因为残酷对待矿工，不把矿工当人看而臭名远扬。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它已经不是一座正常开掘的矿山，开采方式成了露天挖掘，矿主叫麦考利。给他干活儿的人恨透了他，有时，趁他去索尔兹伯里或班克特时，

工人们会在他回来的必经之路两边的大树上扯上铁丝，一道又一道。他们的想法是，汽车的挡风玻璃会撞上铁丝，造成翻车，可大家都知道那条路上有时会有铁丝挡路。开车经过的时候也格外小心。没有车因那些铁丝而翻侧，麦考利最终死在病榻上。他曾说，法国战壕他都挺过来了，可不会死在卡菲尔人手上。还记得，那时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么个心肠坏透了的家伙怎么会那么自得。

从班克特开车到我们家农场可能要用一个小时，不仅因为爸爸对车速的古怪脾气，还因为只要一下雨，整条路就成了红色的泥潭，我们的车陷在里面，车轮打滑，光转却不向前。天晴的时候，车轮又会埋入厚厚的红土尘粉中。“去‘站点’，”那心情，简直像远航前的奥德修斯。可如果步行，我就要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两个小时。如今，这段路只需几分钟。新的路截断了过去拐七扭八的弯路，也削平了上上下下的坡道，穿过一片又一片田野，道路两边是班克特肥美的红土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红土地一样美丽。原先的密林被伐掉，开垦出这一片红色田野，只有个别地方还留下一条林木，点缀在这儿、那儿。过去，这里的土地每公顷能产十六袋玉米，在全国所有人的口中，那一产量是个巨大成就。如今，获益于基因改良，每公顷要种不出三十到三十五袋简直就是笑话，四十袋才像点样。“光这里的地就能养活半个津巴布韦，”阿尔顿说。虽然他来自马里卡兰，可对班克特和班克特的成就一样怀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的车经过马修家的房子，从外面看跟过去也没什么

不一样。我等着那一时刻，等着那幢又矮又长，屋顶铺着茅草的房子出现在眼前，让那么多美梦和梦魇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可眼前只有小山，没错，绝对是那座小山，它还没有消失，可山顶上原先那幢低矮的房子不见了，在比它靠后的地方，竖立着另一幢毫无风味可言的灰砖瓦房。真正吸引我视线的是那片地，那片广阔的田地。它还在，那一百公顷田地，1925 年时，爸爸亲手在那片田地四周打下界桩。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在那儿，爸爸，妈妈，弟弟(那一年才三岁)，身边站了个五岁的小姑娘。四头牛驾在一起，拖着一长节伐倒的树木，就像拖着一列罪犯，拖到清理出的空地的边缘。

“真丢人，”妈妈说。“这儿的林子要在英格兰都是公园。”我们这英国来的一家人站在那里，看着黑人挥动斧子，树一棵棵倒下，燃起熊熊的篝火，黑烟夹杂着噼啪作响的火星，向空中飞窜。烟火的上方，许多鸟儿拍着翅膀，盘旋不去。人们说烟火总能把鸟吸引来，因为它们借机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只要有烟的地方就有鸟。妈妈想到了公园林地，可就在六个月前，我在英国时，待过一段时间，那年我五岁。记忆中那里黑暗、潮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英国的形象全在于此。那时的一幕又一幕纠缠着我，之后好几年时间都挥之不去。雨中，阴暗潮湿的铁轨；卖鱼小贩的砧板，一只灰暗潮湿的龙虾在上面无助地动着八只脚；出租屋里的一个房间，灰暗的雨水顺着玻璃向下淌；一排小花园，每一座都洁净漂亮得如儿童读物中的插图一般。其中一座，一个忧郁的老人咬着牙，喘着粗气，把铁锹死命插入土中，仿佛要把大地插死。冰凉、如丝的雨雾中，他

穿了件防雨的大衣，湿气已经浸透了大衣，在上面显出斑斑水渍。大衣肩部的肩带上扣着一双软塌塌的皮手套，晃来晃去，仿佛死人发灰的手指。

在那个十一月的一天，那一百公顷土地，我们家的大田，被砍伐、清理出来，都是肥沃的土地，泛着红色的光泽。大田对面是爸爸堆好的田埂。整整六十年了，这片地一直能长出庄稼，当初肯定有什么措施做对了。

上山的路口边，过去是牲口栏，从那儿一车又一车动物粪便被从小道上运到田里做肥料。现在牲口栏已经不见了，原先那一小片林子也不见了。不知为什么，那片林子里长满了洋紫树，开的花仿佛一条条丝绸，散发着一种干爽、诱人的香味。小山就在正上方，上山的路现在平整硬实，不再有沟沟坎坎，也不再需要打紧方向盘，把握车子的平衡。稀疏的林木中富含蜜汁，那时我们每年都去割一次。现在穆旺加树全没了。我父母曾说："等我俩死了，就把我俩埋在那棵老树底下吧"，他们的意思是说，穆旺加树仅次于榆树、灰树、橡树，在非洲算是最好的了。那棵老树后来被雷电劈倒了，在我们那时候，那棵树白色树干的一侧就遭过雷击，留下一块焦黑的印记。

我俩站在山顶上，背对着那幢丑陋的砖瓦房。

"他们什么意思？整座山顶都没了？"我和阿尔顿相互问对方。

整座山顶都被削平了，露出一片平坦的地方，现在老房围墙外就是陡峭的石崖。山头矮了不少。十英尺？二十英尺？

现在这块台地面积颇大。正是十一月雨季，从山上望去，应该说剩下的丛林茂密碧绿。我终于实实在在地站在这座小山上，不是虚构出来的，由此而生的慰藉之感也减缓了心中隐隐之痛：从山顶望去，丛林稀稀拉拉，已遭到破坏。过去，从这儿望下去，满眼是浓密的丛林，只有少数几块地散落其间。现如今，那样的密林已经消失了，眼前看到的是向四处攀爬延伸的田地，只有一些面积不算大的树林点缀其间。这就是班克特的土地，肥沃的红土地，生长奇迹的土地。我想，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宝贵的土地怎么会那么长时间默默无闻地躺在密林下面，没被用来种庄稼？

小山的山顶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全景，农场房舍过去在的地方也只比山顶矮一点儿。从这里向北方群山的方向相去约一英里是库都山，我和哥哥常去那儿远足，一去就是一整天。那山上全是野生动物，野猪尤其喜欢上那儿。与我的记忆相吻合，这里实际是一群小山或高地，成为在群山环绕起的一大片地区的中心。东北方向上是汗雅尼斯山，东南方向是乌姆武奎山，在我们的正前方是阿尔复山。在这个下午，群山峻峭，轮廓清晰……一切都没有改变……理所当然。可为什么理所当然，现在一切都在改变。他们总不能把那种大山的山顶也炸平吧？可山脚下呢？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正在建一座大坝，建成后将是这个国家规模第三的大坝。从这儿，在大门过去所在的地方，远眺阿尔复山，丛林仿佛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改变，可小山和河谷遮掩住了新开的农场。

我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风景。父母当初之所以把房子建在这里，原因全在于此。那之后的那么多年里，生活在农场上，没一样事儿让他们顺心，也只有这眼前的景致能充实他们的眼睛与心灵。

真美，甚至比我的预想更美。真不明白，弟弟之前怎么会警告我，别回去，你会心碎。是什么让他的心破碎？不一会儿我就明白了。不是因为老房子不在了，那泥坯墙、茅草顶的房子不可能还在；也不是因为“我们家”的山头被炸平了，真正的原因是：丛林消失了。他童年嬉戏的地方，无边无际的红土地，他的丛林，全消失了。上一次冰川期结束后，欧洲也曾被森林所覆盖，后来，森林为放牧和农耕让出空间。那时的人年轻时躺在大树下，还要提防着狼和熊，离开一段时间后又回来，却发现那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已不在了，他们会到处警告那些还在外乡流浪的人吗？“别回去，回去会让你心碎。”他们会在哀悼中度过余生吗？为那些在火光中灰飞烟灭的树木而哀悼。

我站在那里，眼睛已湿润，泪水就快要夺眶而出。这么壮丽，这么广阔，奇迹，简直难以置信。我被带到这里，从五岁起生活在这里，直到十三年后永远离开它。这里，曾有我的生命。难怪这片神话般的土地一直在拉着我的手，牵着我的心……这又是何等殊荣，何等恩赐。可怜妈妈还长年累月哀声叹气，觉得在这里委屈了孩子，应该送他们去英国，去上所传统学校。

现在，是时候转身看看那幢新房子了。要是有人成心想

造个什么东西，以体现出我父母讨厌的一切，那无疑就是这幢房子。灰暗的圆木料，毫无风味可言的一堆，木头上涂了漆，可看上去更单调沉闷。这幢木头房蹲在老房子靠后约二十英尺的地方，大约比原来的老屋低十五到二十英尺。

房子的那一边，靠山下的地方，有几个妇女和儿童，阿尔顿走过去，想和他们聊几句，可回来时说他们不会说英语，也可能是不愿说。透过窗户，能看到房子里面到处是孩子，在望着我俩。我俩冲他们又是微笑，又做手势，表示想和他们说上几句。许许多多孩子。

最后我俩还是放弃了，转到小山背面，过去，那里的蒿草又密又高，除了我和弟弟根本没人会去那里。山后的水塘周围到处是鸟和动物，那里还有成片成片的大麻树，不过当时我们还不认得这种植物。有时候，整座林子里都飘满了这种植物的气味，一种粗糙的气味，有点像人流的汗。

这里也曾上演过一幕趣事。妈妈在这里种下了几棵木瓜树，希望它们长成后能美化一下这里的环境，可没成想那几棵木瓜树一下子疯长起来，树籽就是落在垃圾堆上也能长出一丛小树苗，在四周垂下粉红中带点黄色的球形果子。太多了，根本来不及摘。地上沾满了木瓜果肉。

离那几个站着看我们的妇女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家厕所的位置。那是在地上挖的一口深坑，上面倒过来放了个包装箱，中间掏个洞，再在坑上盖间小茅屋，门上挂上草帘。在本地，几乎家家的厕所都是这个样子。

小山削平的顶上，到处是荒废的砖瓦建筑，一半已掩埋在

高高的蒿草丛中。有一排砖瓦和混凝土混建的牲口圈，圈门上的铁栏杆已锈迹斑斑，看来是养猪的，也可能是养牛的。这上面还建了座谷仓，太不聪明了，因为这意味这什么东西都要用车拉到山上来。山下，靠近小路，我们家的谷仓原先在的地方，现在是一片空地。要建起这些设施得拉多少砖上山啊！可现在却只剩下残垣断瓦。然而，地上剩下的砖少得可怜，都没法说哪儿曾是牛棚，哪儿曾是工具房，哪儿曾是猪圈。现在这里剩下的不过是昔日建筑的残肢断臂，大部分的砖都被拉到别的地方，用到新建筑上了。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我昔日生活过的地方，那段生活在这里没有遗留下任何痕迹，白蚁早已把那一切拆解得无影无踪。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后来又一次努力剩下的遗迹，一次失败的尝试。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失败的气味。

他们在这里种过果树，弟弟发牢骚时曾经提到，果树。

果树就在那里，因为缺水而树形丑陋。如果家庭自用，这座果园大了点；可如果供商业用途，又不够大。从这些树上摘下的桃子可以拿到站点去，卖给来那儿的邮局寄信、取包裹的农民（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农民自家也有桃树），可要想仅凭这里长出来的果子就挣出一家人的吃穿可没门儿。我眼前所看到的可能跟我父母当年一样，这也种点儿，那也试试。或许，你会相信他们当年的精神也感染了此地的后来者。

他们也像爸爸一样做过淘金的梦吗？我俩在灌木中搜寻爸爸当年留下的淘金沟槽，还在原地！当年，他在那里挖满了竖坑，希望能嗅到财富的气味，现在那些坑都已填满了，后来

者可能也随身带了柄地质锤，随时敲下一小块岩石看看，这也不过是这一地区农场主的惯常所为。要知道，本地的名字，班克特，就是因一条金矿脉而得。

我俩走回到新房子那里，那儿，一块长方形的地上种着金盏花，刚浇完水。看来，妈妈在园艺方面的热情与博识，以及她与石质山顶持续不懈的搏斗得到了延续，就体现在眼前这一小片勇敢的金盏花上。

我俩再一次尝试跟孩子们交流。他们一家是占地的吗？这片农场是本地庞大的高技术农场的附属吗？这幢房子里住的是黑人经理吗？里面的孩子是他自家的？还是亲戚朋友的？

父母的幽灵在此处盘旋，似乎呼之欲出。爸爸肯定在大笑，眼前这一幕第一百次证实了他有深刻体会的人类之欲望与虚荣。妈妈必定一脸肃然、决然的神情。看着眼前这座丑陋的木房子，看着窗户上已有裂纹的玻璃，和挤在玻璃上一张张黑色的面孔，上面挂着一副破烂的窗帘，我几乎能听到妈妈用她在众人面前一贯的声音说："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不知道的好。不知他们有没有种过天竺葵，那种植物在这儿长得好。或许，我该……"

至于我自己，我站在那里，目光试图越过窗户中那一张张脸，进入阴暗的室内。我觉得，同我小时候比起来，这些孩子同现代文明的距离还要近些。我还是小姑娘那会儿，因为家里穷，书中读到的一切世界奇迹，甚至连南非的城市都远在天边。

不过也有不同，我们家的客厅里有好几个摆满书的书架，还有从伦敦寄来的报纸和杂志。眼前这间屋子里没有书，也没有为孩子们准备的物品：图书、玩具、杂志、练习本、铅笔、图画，统统没有。

接下来，我俩眺望远方的田地与丛林，就跟那时一样，先看看这座山脉，再把目光转向另一座山脉。群山之上，光线一直在变幻，要是盯着一组群山的时间太长，你或许就会错过乌姆武奎山上的壮丽景观。那里，当它的顶峰已被落日点燃时，四侧的卫峰还停留在阴影之中。

在这里，比我俩现在立足之处高不少的地方，我们每晚都上那儿看星星，还有夜空中划落的流星，只要不下雨，没有风暴。那时的天空那么洁净……够了！

我的心在隐隐作痛，不是为了父母，不管怎么说他们干得还不赖，虽然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而是为了弟弟，他回到这里时竟会那么痛苦，每时每日，世界上每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失去的树木、森林、丛林、河流、动物、景观而黯然神伤……可以说这是人类心灵固有的一部分，一层一直在加深、变暗的悲伤。

之后，我俩驾车向阿尔夏山下新建中的水坝疾驰而去，几分钟就到了。那座大坝叫马兹维卡代。1956 年时，我也曾站在山顶，望着山下即将被卡里巴大坝淹没的景观。那时大坝已完工，高耸的混凝土坝体呈弧形，耸立在赞贝西河之上。那一切壮丽的景色即将被淹没。“为什么不？这种景观，非洲多的是，不是吗？”现在，卡里巴成了个巨大的湖泊，无论在地图

上还是在当地人心中都占据头一号的位置。再向南走，同样的位置则归于大岩脉。

经过一个降水充沛的雨季，新大坝几乎已蓄满了水。

弟弟和我曾带上步枪，步行穿过丛林，到阿尔夏山。一路上我俩默不作声，像黑人一样，确实也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我俩竖耳聆听蝉鸣和动物的动静，极目搜寻林中的飞鸟。我们农场上的小山谷里长满了带刺灌木，倒还是和过去一样。可现在，那里悄无声息了。过去，那里到处都有鸽子的咕咕声，那种鸽子脖子上长了一圈精美的黑色羽毛。那片林子里，曾经到处都是鸽子，最多的还是那种悲伤而迷人的绿斑点鸽。非洲人说，那种鸟的叫声像："妈妈死了，爸爸死了，所有亲戚全死了，哦、哦、哦……"

我俩踏着石头过了麦尼尼河，小心注意河中的鳄鱼。过了这条河，就能看到新近被大坝截断的马兹维卡代河，就在山脚下。过去，我们常常蹲在一片粗糙、温暖的花岗岩缓坡上，盯着河对面一条狭窄的溪谷，尽量一动不动，要说话也只能用低低的声音耳语。没多久，狒狒们就下来了，一群有几十只。打头儿的是只大个头的公狒狒，它的双眼不离我们左右，只要我们有任何异动就又吼又叫警告同伴。我们看着它们下到河边喝水，差不多有五十只，幼崽伏在妈妈的背上。喝完水后，它们又迅速退回到丛林中，那只公狒狒最后一个离开，临走时还隔着河向我们大吼一声以示警告。

那片土地即将淹入水底，淹下去了……

那又怎么样？一个带着常识理性的声音对我说，至少我

自己有时会这么对自己说。几百年前,欧洲不也经历过同样的事吗?一片大陆上也未必只栖居特有动物,生长着原生植物。欧洲不也不错吗?不也很美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了那儿都赞不绝口。可那又怎样?我们真的还不错吗?

然后，又一次
1989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

我身边坐了位“头儿”，一位“小头儿”，刚刚被任命到某个新部门工作。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出津巴布韦国门，目的地是纽约，去参加一个会议。他也有个从贫穷到富贵的故事可讲，肯定如此，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他的老家是鲁萨佩附近的一座村子，十八岁时，他走进丛林，加入到同志们的队伍中。他算是幸运的，虽然也见过一些可怕的场面。一次，他亲眼看见自己一个朋友踩上地雷，被炸死。没东西吃的日子一连就是几个月。“那会儿我瘦得不成样子，妈妈来看我，一见我就哭了。不过姑娘们见到我可不会哭，我长得太帅了。”战后，他在哈拉雷一个部门做职员，部门的头儿也就是在丛林里打游击时他的指挥官。后来，他的上司升迁到更高的职位，他就得顶了留下的空位。“连我在内，有三个人争那个位子。最后他们宣布是我，那晚回家，我抱着老婆，我俩都哭得一塌糊涂。”他身形肥胖，有些自以为是，过度的兴奋中，他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还忍不住轻轻拍打，仿佛为自己的好运而鼓掌欢庆。要么他就微微晃着脑袋，仿佛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可脸上挂满了笑容。你去过纽约吗？知道白色广场酒店吗？喜欢泰国菜吗？看过《悲惨世界》吗？实在太惨了，我都哭了

起来。去过巴黎吗？不久他又要去巴黎参加个会议。我问他，要是你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你会为津巴布韦选择什么？“这还用问？当然是繁荣。”“假如有位童话中的老祖母，代表津巴布韦，给你……”“谁是这位祖母？世界银行吗？”这是童话，我说，大多关于或善良，或邪恶的精灵，她们有的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也有的给人下咒语。于是，我从《白雪公主》开始讲起，他听入了迷，我还从没遇到过像他这么专注的听众。他双手紧握，一会儿拍手，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又叹气，全身心地在听。一整晚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他入睡之前，我一直在给一个“头儿”说童话故事。

入境官的态度有些讽刺，不太友好，让我受了点儿罪，这恰恰表明津巴布韦已彻底融入现代世界。津巴布韦不欢迎记者，常听说有些记者和作家给自己弄到特别护照，护照上没有那些危险的字样。后来，我还同某位头儿有过争执，那位头儿说，要是照他的意思办，一个记者也不会被放进这个国家。我问他，你是否也凑巧喜欢看布拉瓦约的《时讯报》，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喜欢。你是否喜欢看英美的报纸杂志？喜欢，不过我们还是个新国家，我们可经不起批评。我说，为什么经不起？过分敏感是虚弱的标志。你真心喜欢看《论坛报》上的文章吗？就像这样：我们伟大的领袖穆加贝以自己的行为激励着津巴布韦，他带领我们前进……头几个词让他颜色顿开，可接下去，就对我的轻佻多变发起了脾气。

富人居住的郊区的房子

阿尔顿和我再次站在他家的花园中，抬头看着他的房子，再看看那堵高高的隔墙，把佣人区同这里分开。隔墙后有两间屋子，还有个做饭的小院子，从墙那边传来说话声、哭声，常常还有音乐声。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那里还有园丁的十一个孩子的声音。

我刚到，阿尔顿说的就是这些。他处在极度不安中。

每天下午，一到五点，那儿就传来高喝声、哭闹声。孩子们的母亲把孩子们排好队，一个个在院里的木盆里洗澡。邻居们意见很大。

“乔治，你老婆干吗非得在那时候给孩子洗澡？大伙儿刚下班，想清静会儿。”

“上床之前要把他们洗干净。”

“可你老婆干吗手那么重，非得把他们弄哭？”

“小孩子都讨厌洗澡，谁不知道？”

十一个孩子很吵人，也需要很大的空间。他们常常溢出那个小小的院子，跑到阿尔顿的花园里来，阿尔顿只是假装没看见。邻居们又提意见了。他们被请来会会那两名罪犯：园丁和他老婆。两人腼腆，羞涩，但却很固执，他俩唯一的辩词就是：孩子当然会吵。双方手里端着茶杯，言辞有些紧张，谈判在阿尔顿的客厅举行。“我坚持双方在我的客厅一起坐下

来，以免把会谈变成白人和黑人仆人间的对抗。”

“成功避免了吗?”

“当然，没成功。关键是，孩子理应待在父母身边，乔治理应带上他的全家人。可另一方面，你也总不能把十一个孩子都塞在一间屋子里吧？还没算上两个大人。”

“这是个难题。”

“乔治在乡下自己有幢房子，附近还有间学校。在这里，孩子们都没的学上。”

十一个孩子加上两个大人，十三个人。还有多萝茜，她的三个孩子和男人时不时也住到她这里。十八个人，两间屋，不可思议。

“我非常抱歉，乔治，可你真不能把十一个孩子都放在这儿。两三个，或者四个，可不能全在这儿。”

“这是您在说话吗？我怎么觉得像是那些邻居在说话。”乔治的话中既有自尊，也带着控诉。

“实在抱歉，这就是我的意思。”

没多久，乔治的老婆把十一个孩子都带回公共领地的老家去了。过不了多久，第十二个就要出世了，那证明了她还是个女人，于是她也不再抑郁了。孩子一出生，她就带着新生婴儿和几个年龄小的孩子搬了回来。

阿尔顿有别的看法。

“你觉得八个月的时间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可这个家里还是有变化——我不是说乔治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毕竟那只是我们的看法而已。”

乔治的大女儿,那个有时能请神上身的,正在跟她的堂姐,乔治哥哥的女儿竞争,看谁能继承她们的祖父,一位巫医的衣钵。最后,园丁的大女儿败下阵来。如今,她显然越来越疯了。她父母想要她回乡下住,可她说,哈拉雷就是她的家,她根本不想走。开始时,她还能语气平静,可接下来就开始又哭又闹。她睡的厨房在园丁夫妇的屋子和多萝茜住的屋子中间,她就在那儿招呼男人。要父母听到孩子做爱的声响,实在有点让人脸上无光,可她的父母又没法不听到。同样还有多萝茜,她那个男人(人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求多萝茜赶快与他一刀两断)居然就在与多萝茜睡觉一墙之隔的地方与园丁的大女儿干起那事。她干吗还不跟他一刀两断?可这个有三个子女,却从未结过婚的女人还指望那个男人能让自己成为个体面的女人。还记得吗?园丁的大女儿跟同一家机构的八个保安都发生过关系,保安是警察,而据传警察和军队中一半的人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政府从未公布过确切数字,也有人说实际比率还要更高)。多萝茜自己说所有艾滋病毒携带者都该去死。就这样,悲剧悄无声息地在人满为患的佣人居住区蔓延。

"政府最终可能不得不展开清洗艾滋病的行动,艾滋病已不再是白鬼子的阴谋。现在,到处都能看到新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画,画面中一个妓女站在阴暗的角落里,一个男人则在辩说该不该同她发生关系。可实际上,感染最严重的是军队和警察。宣传画中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旁边一个女人辩说要不要同他发生关系。可这里的文化处处都针对女人,那种宣传画离现实实在太远。"

这会儿，为了让我“精神起来”，阿尔顿要带我去超市看看。“恐怕咱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世界各地的人民对自己政府的评价主要看吃得怎么样，谁会理什么民主！”

超　市

津巴布韦从不缺什么。有些人缺了橄榄油、罐装鱼和某些作料就活不下去，那也只好请朋友从国外带了，每个出国回来的人都会带些威士忌。可这里每有食品企业开张，货架上就会堆满小山般的商品，冷藏库也是满满的。商店里，堆满商品的货架从一头排到另一头，上面有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牛肉、咸肉、猪腿肉，注水的事还从没听说过，还有一流的香肠。鸡肉和鸭肉成行成列，奶酪的品种虽然不多，但品质优良。面包、蔬菜、水果都没得挑。这家商店里的顾客黑人超过白人，这里的玉米粥有许多种吃法，不过顾客的购买也不仅限于玉米粥。一排又一排架子上放满了各类酒，从高度数烈性酒到一般酒类，都是有牌子、有生产许可证的正品。啤酒爽口，而津巴布韦葡萄酒，不久前还难以入口，现在已经在国际上赢得大奖（这里指津巴布韦白葡萄酒，这里出产的红葡萄酒还要继续学习，努力）。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国家自己出产的。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养活自己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周边

的许多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对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的人民来说，津巴布韦的食品简直就是难以企及的奢侈，更不要说再往北边，处于这种那种灾难中的国家。“不应把津巴布韦同其他非洲国家做比较，它更接近一个南美国家。”(联合国报告)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贸易行为会让政治卫道者们感到失望。博茨瓦那同南非和津巴布韦都有优惠贸易协定，它从南非进口商品，重新贴上标签，再卖到津巴布韦。南非也在津巴布韦出产的水果上重新贴签，然后出口到海外。津巴布韦国民常常到博茨瓦那儿去买本国短缺商品，而那些商品常常产自南非。

“穆加贝同志为什么不……?”

穆加贝同志当然不认可这些行为，也有过明确表示，可就算克努特国王也无力阻挡汹涌涌入的潮水。

莫桑比克

除了它，人们还有什么好谈?

去年，莫桑比克出现在所有人的交谈中，或早或迟，不过现在很少有人提它了，原因是问题正在解决的途中。马普托再次获得新生，人们又开始流动起来。胆子大些的莫桑比克

人已经在回农村老家的路上。不过，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难民营里依旧人满为患，每天都有更多的难民涌入。在莫桑比克，老百姓还在饿肚子，一股股武装匪徒仍在肆虐乡村，津巴布韦依然每天花费一百万英镑巡守到贝拉的输油管线，并支撑莫桑比克武装部队。没人抱怨过这种援助，不过有笑话说不久前津巴布韦自己还是个殖民地，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对于自己，以及自己这个饱受摧残的邻居的援助，津巴布韦引以为豪。输油管线就是个例子。据估计，如果"抵运"炸了输油管，津巴布韦部队七十二小时之内就能把它修复。整条管道有几百英里长，不可能每英里都派人驻守。最近一次炸输油管事件发生于上个月，不过输油管几乎立刻就恢复运行了。现在，津巴布韦军队由英国人负责训练，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已经滚蛋了。"我们军队的小伙子现在都是好样儿的……"这可是出自咖啡农之口。"看看是谁在训练他们！他们什么都行，埋反步兵地雷、搞炸弹袭击、空中打击，等等。你在这儿的时候，输油管被炸，搞得好几个星期都没油，还记得吗？那种事现在可不会再发生了。"

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莫桑比克境内所有抵抗武装都被视为"抵运"成员，不过一位捕鳄人的遭遇说出些别的东西。那个捕鳄人得到许可，在莫桑比克的湖泊里生捕鳄鱼，供活体出口。他驾船到一处湖泊，可遭到武装团伙的枪击，先是"抵运"，后来又有"解阵"。他们强迫他靠岸，要分成，好几次他差点送了命。最后他不干了。"抵运和解阵的家伙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活该。"

腐 败

在津巴布韦,从东到西,人们到处在谈论腐败。

人们好像已经同腐败妥协了。在一座白人农场的檐廊上:“咱们凭什么对穆加贝的手下说三道四?史密斯的手下不也都给自己造好了安乐窝吗?唯一诚实的是怀海德,可他死的时候就像个乞丐。”

“那史密斯呢?”

“噢,他倒是个诚实的人,可他不听人劝。”一位史密斯的前狂热支持者欢快地说:“看看他给咱们惹来的祸!咱们原本根本没必要打那场仗!只有少数几个白人想打,可大家都给卷了进去。”

或者:“整个国家都是骗子。我并不是指责穆加贝,要想生存,就必须撒谎、骗人,现在这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特色。在穆加贝的金融法规下,不骗就活不下去。如今人人都在骗。”

一则旧笑话的新改版:两位津巴布韦部长站在天堂的大门外。“津巴布韦?”圣彼得问。“从没听说过,我得去问问老板。”他找到了老板,说:“来了两位津巴布韦的部长。”老板说:“津巴布韦?一个有趣的小国家,我跟你一起去问问他俩。”两人一起来到天堂大门口,圣彼得大喊起来:“怎么不见了?”老

板说："我也看不到人影。""我不是说人，我说是大门。那两个家伙把大门偷走了。"

一份联合国的报告中写道：整个非洲都陷入华而不实的宣传中，所听到的和真实情况没有任何联系，这尤以津巴布韦为甚。

丰田丑闻

《时讯报》揭发这桩丑闻的编辑被炒了鱿鱼，或者按照官方说法，被升了职，升到一个再也用不到他的新闻才能的职位上。如今，《时讯报》几乎和《先驱报》一样平淡如水。

不过，情绪高涨的辩护者说，《金融观察报》内容还比较丰富，也有批判精神，还有份杂志叫《巡游》，也敢说话。玩世不恭者则说，那又怎么样？《金融观察报》和《巡游》只有知识分子才看，平民百姓从来不看。

《时讯报》曝光后，一个调查委员会得到任命，其后召开了数次听证会，每次都有大批民众旁听，现场一片嘲讽声、叫喊声、笑闹声，辩解者凭空捏造伪证的水平简直登峰造极。当时在场的一位听众形容说："简直就像吹牛大王闵希豪森男爵①

① 德国民间故事中人物。

和西里尔·罗德面对面吹嘘把马绍纳兰合并。跟你说,同志,只有在津巴布韦才能见到这一幕,比任何戏剧更热闹。"穆加贝亲自任命了委员会的成员,全津巴布韦都为他拍手叫好:他终于要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了,建造抵御腐败的堡垒,保护善良和正义。学生们尤其交口称赞。可接下来,腐败者获得了总统的赦免,那些在法庭做伪证,本该去监狱服刑的家伙同样地得到赦免。愤世者于是说:"头儿们用一套法律,平民百姓又用一套法律。"大家都清楚,没有谁比那些发现自己被理想出卖的人更愤世了。不用说,各种传闻满天飞,解释总统为什么做出这种缺乏判断力的决定。"他们"说总统身边的人也牵扯了进去,还说总统不敢得罪那些"头儿",他的权力还要靠他们来支持。心眼好的人则说穆加贝不愿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监狱里蒙羞,那会让他心碎。

莫里斯·尼亚冈布:令自己蒙羞的津巴布韦英雄

莫里斯·尼亚冈布,前津巴布韦政务部长,服毒自杀,送医院抢救后不治身亡,享年六十四岁。上周,他因卷入一桩非法汽车交易丑闻而引咎辞职。由穆加贝总统发起的司法调查显示他卷入了那桩丑闻,他帮助他人购买新车,再把那些车在黑市上以高价转手倒卖。

尼亚冈布过去一直是争取津巴布韦独立运动的重要成员,曾因反对白人统治而被监禁多年。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后,他成为罗伯特·穆加贝政府领导层的一员,很快升为内阁第四号人物和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ZANU)的第三号人物。

1924 年,尼亚冈布出生于南罗得西亚鲁萨佩一个农民家庭。他在一所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1940 年前往南非寻找就业机会,做过各种

工作，包括餐厅服务员，还曾和一群黑人舞厅表演者搅和在一起。后来他加入了南非共产党，直到1948年该党在南非遭禁。

1955年，他被逐出南非，理由是他同肯尼亚共产党有来往。回到南罗得西亚后，他协助组建了非洲人国民青年联盟，之后又成为南罗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在他所在地区的书记。1959年，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遭到拘禁，之后一直被监禁在戈克威地区，直至1962年。

获释后，他加入了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可第二年就同其他人，其中也包括穆加贝，一起脱离了该组织，成立了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ZANU)。1964年，ZANU被取缔，他也被逮捕，之后的十一年在多间监狱和集中营度过。1975年释放，旋即又被指控帮助游击队招募青年。被认定有罪后，他被判处十五年监禁。

1979年他被释放，正好目睹了在伦敦召开的兰斯特大厦会谈的最后阶段，也正是这次会谈为津巴布韦带来了独立。之后，他在政府多个部门任职，包括矿产部长、政务和合作发展部长。

1980年，他的自传出版，书中的信条就是："有些人必须同人民在一起，哪怕那意味着一起下监狱。"无疑他是个勇敢的人，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煎熬。独立后，他成为政府的政务部长，常戴着布帽子出现在穆加贝身边，是过去斗争年代的象征之一。

他留下一个妻子，六个孩子。

《泰晤士报》讣告

一心二面的泰克雷

埃德加·泰克雷是个标新立异者，总被人排挤在外。人

们谈起他时既不无讽刺又津津有味,话语中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对那些名声不好,却能让我们开心的人和事,我们总是以这种语气表示敬意。

要是你玩过那种私下里的游戏,离一群聊天的人坐得远远的,只听他们的声音,不理会意思,你就会发现泰克雷、泰克雷、泰克雷,这个声音一会儿响一次,像是蛐蛐在叫。

他在独立对抗穆加贝时,因为批评腐败和穆加贝对腐败的暧昧态度而被穆加贝的政党——ZANU 开除了党籍。他组建了一个新政党,叫津巴布韦团结运动(ZUM),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种实质上带有分裂性的政治运动都喜欢用"团结"或"联合"这样的词。不过 ZUM 正带来冲击,因为人人都知道他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冲击,没人清楚。对有些人来说他也有吸引力,那些希望看到议会中有更多白人成员的人,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大多是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在黑人国家里,白人如果受到重视,绝不会是因为他们的魅力、智慧,他们乐天的性格和善良的心地,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握着通向世界的钥匙。各地都有造势活动,为下一届大选做准备,主要是沿着津巴布韦、肯尼亚、印度所熟悉的路线。当然,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曾精于此道。各种肮脏的把戏让对手丢脸,出丑;成群结队的青年暴徒冲进支持泰克雷的集会,以暴力威胁他的可能支持者,有时还真的大打出手,却从未遭受谴责或惩罚。其中之秘密是那些暴徒都是 ZANU 青年团的成员。(穆加贝为什么不……?)泰克雷本人公开遭到诋毁,此外还有巧妙操控的流言和传闻。

刚解放时，泰克雷酒后杀害了一名白人农场主，这当然令一名自由战士的光辉形象蒙尘。那件事现在又被人提了起来，同时被人提起的还有他跟史密斯合作的意愿。不仅如此，当局还故意泄露出泰克雷的医疗记录，那份记录听起来泰克雷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酗酒这一事实似乎并未让泰克雷脸上无光，这也让一些人认为“他们”(平民百姓)并没真把泰克雷当回事儿。

泰克雷把批评转化成自己的优势，他把自己形容为“一心两面”，在这一地区，人们提到精神分裂症患者时，都会用到这个词。在自己的竞选海报上，他对自己形容是“爱德加·泰克雷，一心两面，信奉上帝的酒鬼”，看到的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泰克雷所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政治角色，或者说他自己进入人们指派给他的政治角色中。他被视为穆加贝的反面，代表着穆加贝所不是的一切。穆加贝从来不会令人发笑，穆加贝一出门就坐进贴着遮阳膜的汽车，还有一整个摩托车队为他开道，泰克雷却是人人都能接触到的，不会让平民百姓心生畏惧。“他活得挺危险，就跟我们一样。”泰克雷不会整天匆匆忙忙赶着去开会，自己开辆小车，也从不穿三件套西服。

在这样的讨论中政治家的部族根源总会冒出来。泰克雷来自马里卡兰，这使他成为津巴布韦东部的代表。同样，约书亚·恩科莫代表着马塔贝勒兰。

不过，有个人在这种部族问题上给我上了一课。开口闭

口马塔贝勒人，马绍纳人，马里卡人！根本不存在所谓马绍纳人！有四个主要马绍纳族群：卡兰加、马尼卡、祖祖鲁和克尔克尔，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祖祖鲁，主要居住在哈拉雷四周。穆加贝的根是卡兰加，不过在祖祖鲁人中长大。这个国家执政党内部的斗争只能理解为这几个不同族群间的权力平衡。现阶段，卡兰加正在失势，其余三大部族在与它为敌。不过根据特伦斯·兰杰的说法（津巴布韦著名历史学家），白人到来之前，这些区分并不重要。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使区分加剧，每个族群都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才是部族的真正代表。

那个人又说："泰克雷跟穆加贝一样是马绍纳族。为了让泰克雷丢脸，他们什么都说得出。"

一天晚上，在一个非正式场合，我同某位高级官员聊了会儿，那位官员坚持说泰克雷是个"纳粹分子"。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抗议这种愚蠢的说法。"跟过去一样，开始希特勒也不过右倾，后来人们才发现他是纳粹。""这就等于说，那些支持泰克雷的学生也是纳粹分子。"（大学生又游行了，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又暴乱了，目标依旧是腐败）那位官员咬定学生们是纳粹，可自始至终也没有面对学生抗议行动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简直已到毫不讲理和歇斯底里的地步。同类人在同一个时间说同样的话，这是条定律，由此也可见政府高层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艾滋，艾滋，艾滋

八个月前，这里的气氛让我想起 1986 年时的巴西。那时有人在私下里说："艾滋病是枚定时炸弹，定时器一直在嘀哒嘀哒地走，可政府不想知道。巴西是个让艾滋病毒发威的好地方，这里的人什么都不在乎，贪图享乐，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什么都行。输血简直就是死刑，满地是毒品。"几个月之后，巴西政府了解到，艾滋病毒不会自己撤退，于是电台、电视台、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有限的宣传。那些穷国可拿不出那么多钱，做像模像样的宣传。同巴西相比，津巴布韦的基础设施，如医院、诊所更完备些。可问题在于，没人清楚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毒感染者。医生们说，实际数字比官方公布数字高很多。政治家有时会透点口风，可也不可能精确。

人人都知道在北方，在赞比亚、肯尼亚、扎伊尔、乌干达，还有其他国家，整整一代人可能在本世纪前死于艾滋病。乌干达和肯尼亚已经有无人村出现，太多人死于艾滋病，剩下的人也逃走了，他们认为村子中了邪，恶魔之眼盯上了那里。津巴布韦相信，同那些国家相比，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可真是这样吗？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还停留在"我认识的一个医生说……"或"有人说在公共领地……"这个阶段，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有准确数据。它悬浮在谈话的边缘，刚冒个头，又自行沉了下去，它让人感到不舒服，仿佛谈起

它就是在散布谣言，害怕会为此而受到惩戒。同时，在左派政治神话中，艾滋病被严重扭曲，一提起艾滋病就会引发对 CIA 的声讨，说艾滋病毒是 CIA 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说什么这种病毒是从中非的猴类身上演化而来，这完全是西方科学家的恶意捏造；西方科学家的实验事故使这种病毒从试管中逃了出来，现在又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把屎盆子扣到非洲头上……他们总是如此！这些人还停留于不久前苏联所处的阶段，说艾滋病不可能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只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恶毒的东西都是他者的特性，恶魔、危险、威胁都是敌意的结果。或者，恶魔之眼？

与此同时，输血开始造成恐慌，也引发了许多流言。有人说，在莫桑比克守卫设施的津巴布韦士兵接受输血，所有人都被病毒感染，回国后又把病毒传给自己的妻儿家人。莫桑比克到处都是艾滋病感染者(这倒是实话)。“我们津巴布韦人花了巨大的财力守卫莫桑比克，喂饱了几十万难民，他们居然还用艾滋病毒来毒害我们！我们有有效的医疗基础设施，在我们这里输血是安全的，可那些莫桑比克人根本没得救，要时刻盯住他们。”

有些巫医也来添乱，胡说什么跟处女睡觉可以治愈或预防艾滋病。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懂得艾滋病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转而与科学结盟。

医者、精灵和安全套
——节选自《观察家》

在这间尘土扑鼻的茅草屋里，在屋里的物什中看到这些长形的白色硬纸板箱着实让人吃了一惊。那些物什包括几柄长矛，几张晒干的兽皮，一口盛满药膏的铁皮箱，那些硬纸板箱中装的则是安全套，每箱一百只。在过去三个星期中，斯蒂芬·尼科雅已经向自己的主顾分发了大约二十五只安全套。“我是名医生，”他一面说，一面点着头，梳成小辫的长发晃来晃去。

对于居住在津巴布韦南部小镇古图的居民来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干起了这个行当。之前，他本是名餐厅招待，有一次突然神志不清，被解释为“有精灵上了他的身”。打那以后，他就成了名学徒，学习传统医术。

他说，这些草药从他的先、先、先辈就开始用了，现在依旧有效。尼科雅是津巴布韦传统医疗协会的成员，一个拥有三万五千名成员，由神媒、草药剂师、传统接生婆和信仰治疗者组成的组织。随着与艾滋病的斗争在津巴布韦展开，这个组织也承担起新的作用。

昨天,随着世界艾滋病日的到来,人们的关注集中于非洲。今年九月,津巴布韦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5,086例艾滋病,代表了这个大陆上最大的增幅。对捐血者血样的随机抽查显示4.2%的津巴布韦成人受到艾滋病毒感染,有几位专家认为实际数字还要高许多。

津巴布韦超过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许多人既不识字,也无力购买收音机。对于试图扩大警惕意识的健康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今年二月以来,津巴布韦传统医疗协会在古图地区开展了一项指导工作计划,把当地巫医聚到一起,向他们传授关于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并在预防方面寻求他们的协助。

在津巴布韦的一千万人口中,大约80%的人在看西医之前都会求助于传统医术,巫医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在社区中广泛受到尊重。"只要想想传统医疗者的庞大人数,就能看到他们在预防艾滋病方面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说这话的是席林·吉尔伯托,津巴布韦托拉斯(一个支持津巴布韦传统医疗协会的独立援助组织)的项目负责人。

尼科雅说他在1985年首次在病人身上发现艾滋病症状,这种病让他大伤脑筋,因为它不像其他性传染疾病那样可以治愈。据他说,开始他把这种病症诊断为一种通奸者染上的疾病,起因是有蚂蚁在患者体内爬。

在得知接触艾滋病人的血液会传染艾滋病后,巫医们都担心卫生条件恶劣的治疗会扩大艾滋病的传染范

围，尼科雅现在要求自己的病人自己付钱买新刀片，所有刀片只用一次。

安娜·唐多，另一名传统医师，说过去有项技术，要咬进患者的肉，然后把医师诊断出的病根吸出来，现在再也没人这么做了。作为替代的方法，她把网球切成两半，用半球的凹面代替人的嘴。

他们已接受了自己对艾滋病无能为力这个事实，不过这里的西方医学专家认为传统医师在治疗性传染疾病方面经验丰富，在诊断上有自己的诀窍。在古图，传统医师开始把自己的病人转到当地的诊所。他们对病人说，自己也用尽了传统医术的一切来救助他们，现在该西方医学上场了。

丛林中的学校

那个毫无原则可言的校长被撤了职，成了名普通小学教师，还要把从学校、学生那里贪的钱都吐出来。人人都知道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薪水就那么点儿。大家讨论，没送他进监狱是不是不应该。“那会给他一个教训。没错，可他进了监狱，他家里人日子怎么过？”“从校长降职为普通小学教师，这个惩罚也够了。”

新校长开头干得不错,疯狂工作,“从清晨到黄昏,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都歇不下脚。”可后来,大家发现他是个酒鬼,凶狠地殴打、体罚学生。杰克有次逗他说:“学生因为大雨过不了河而迟到,你怎么连这也要打?还有那些已经大了的女孩子,你怎么能下的去手?这样不对,更触犯了法律。”

打学生的行为持续下去,不仅校长打,别的老师也打。杰克到地方政府,举报了校长,校长受到了正式训斥。

后来,杰克要这位校长就自己的工作提交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杰克·佩特弗(化名)工作勤奋、自觉……我绝不会再与他在同一间学校共事,因为他对自己的同事缺乏忠诚之心。”

杰克找到他评理:“你这么写不对,不公道。你触犯了法律,举报你是我的义务。你报告里对我这么不公道,叫我怎么再去找工作?”

于是,校长又给他重写了份公道的报告,继续打学生。

杰克还在犹豫,是否再待一年。“我走了,学校图书室怎么办?还有谁会把校报再办下去?还有谁会替孩子们说话?”

三个月后,杰克走了,他走后不到一个月,图书室里的大部分图书就不见了,校报也停了。杰克问来接替他的教师,是否要列出一些注意事项?回答是:不,没那个必要。所有维护操场的设备都被偷,不过现在有了六名合格的教师,而不是一名。

十一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杰克、阿尔顿和我又来到那间教

室，教室屋顶的椽子上依旧有条裂缝，破了的玻璃还未更换，不过地面上的灰倒是扫干净了。我们身边是十五名健壮的年轻小伙子和丰满的年轻姑娘，这是他们在学校中的倒数第二年。他们看上去已成年，确实也已经成年。这次，还有上次，我常常会看错这些年轻人的年龄，以为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上好几岁。看婴儿时也常会如此，你看着一个体型硕大，满身活力的婴儿使劲伸手伸脚去体验新的世界。仔细、认真观察一番后，你觉得这个婴儿已有十个月大了，可实际上他出生才刚刚三五周。

放眼之处，尽是不可抑制的活力。

年轻人很吵，不停地大笑，浑身散发着不可阻挡的快乐。他们刚刚从哈拉雷回来，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从没去过那儿。杰克自己掏钱带他们坐公共汽车，然后参观一家印刷公司和一家报社，之后在一家餐厅吃饭。两程公共汽车花了许多小时，不过那也是经历的一部分。

我们出现在教室中，因为杰克觉得，作为新闻写作课的一部分，给学生一个采访我们的机会对他们大有帮助。于是，杰克自己、阿尔顿、当地一位教师，还有我就站在教室中，每人身边围了一群学生，争着向我们提问：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你觉得这所学校怎么样？你对津巴布韦有什么观感？你觉得让女孩子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否公平（提问的是个女学生）？我注意到，在笔记本上记下回答的学生越来越心不在焉，他们的目光越过我们，聚集到那位正在谈论自己的问题的年轻英俊的教师身上。没一会儿，学生们都拥挤到那位年轻教师身边，

而原本是受采访者的我们也和学生挤在一起，因为那位教师同样令我们着迷。

这位教师是学校的明星，已拿到两张A级证书，不仅在这所学校，在附近几所学校中都是绝无仅有。他已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已爬上了人生之梯的第一级。一级级爬下去，最终他会到哈拉雷。他说话仿佛在梦中，常常提到“在这里生活的日子”。这会儿，他谈到自己的妻子。他依墙而立，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仿佛手中什么也没拿反而感到疼痛。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着面前任何人，双目饱含泪水，他在对着墙说话。

“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他说，“非常、非常悲伤的日子。今天早上，我听说，我已是个离了婚的男人，我的婚姻到头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假装在等着这些练习采访的学生把他的话记录下来。

他妻子在距此地五十英里外的小镇工作，小镇的宾馆里有电灯、酒吧、餐厅，院子里成串的彩灯挂在树枝上，也常常有音乐。她在宾馆吃饭，这倒也没什么，可有人看见她很晚的时候出现在那家宾馆。（十点？十一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朋友告诉他，她在那儿跟男人风流快活。他不得不同她离婚。

他的听众中不止一人觉得这其中有点儿……一位漂亮的年轻女生双眼闪烁着爱慕的光芒，问他：“你去了师范学院，你妻子会不会……？”

“我的前妻……”他话中已带有哭腔。

“那她就只有一个人待在库萨了。你在这儿的时候，她是不是很孤单？”

“我也孤单。”

他倚墙而立，浑身松软，弯了下去，双臂垂在身体两侧，头微微后仰，双目紧闭，等着挨枪子儿的人可能就是这种姿势。

“我叫她再拿张O级证书，那她也能做教师了，可她更喜欢库萨的宾馆。我对她说，你该多学点东西，多拿几张证书，这样才能服务津巴布韦，这是你的责任。”

几个青年男学生支持他，叫着：“真丢脸。”

“再说了，”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正义的表情，“女人要服从自己的丈夫，这可是圣经上说的。”他的话稍稍令人头晕目眩地从一个层面跳到另一个层面，当不同的文化在碰撞交融时，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年轻男人教训妻子要多拿几张证书，另一个则说妻子必须服从自己的丈夫，二者间存在着一条文化鸿沟，其宽度丝毫没有因为他引用了句适合自己的经典就变窄。

阿尔顿说：“男人在这种事上总从上帝的话中找支持，可现如今全世界的妇女都越来越觉得那些话没法让自己信服。”

在听者耳中，这句话可远不公道，开口说话的仿佛是哈拉雷。年轻教师觉得自己在受审判，站直了身，面向阿尔顿。

一位漂亮的女生在这节骨眼上解了围，她格格一笑，铅笔停在笔记本上，问道：“您对爱情有何感想？”

他语气严厉地回答，在校学生应该一心学习，爱情是大人们的事情。女孩子们的脸上露出怀疑的微笑，最近还有两个

毕业班的女生跟老师结了婚。

“今天,我办好了离婚手续。”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说,该学习的时候谈情说爱,离婚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情就会成为其自然的结果。

“现在,”杰克对学生们说,“你们该问他,他说的话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能公开,好的新闻记者要懂得尊重受采访者。”

“没关系,我说的一切都可以公开,”年轻教师大声说,“我不介意。它会给人们一个提醒,别仅仅为了爱情就结婚。”

泪水涌入他漂亮的大眼睛,那些漂亮姑娘们真想把他的泪水吻干,一个接一个。

与此同时,在五十英里外的库萨镇上,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当天刚办完离婚手续的年轻女性正计划着怎么跟当地一位追求者度过这个晚上,甚至是某位从哈拉雷来路过此地的头儿。在餐厅的餐桌旁,在被巧妙地调暗的灯光下,她会说自己太不幸了,跟一个根本不在乎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是多么痛苦。

接下来,傻子都能想得到。“可怜的小东西,没关系,我绝不会那样对你,一个像你这样聪明、漂亮、不同凡响的姑娘。”

消失的丛林动物

第二天，杰克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来向我们道别的学生和老师，同时也可以与这几个能饮到哈拉雷的玉液琼浆的人亲近亲近。

那位英俊的年轻教师也来了，他说，自己最爱做的事就是独自到丛林里散步。“我是个不爱说笑的人，”他神情严肃地说，“人们不大了解我。”他站在门边，扬手指了指外面参差不齐的树林和水土流失的土地，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丛林”和我说的“丛林”可能并不是一回事。我对他说这四十年来，我一直在记挂着这里的丛林，一直以为这才是丛林应有的样子，已有几百年树龄的穆萨萨树，到处是动物。他没作声，好像有点儿吃惊。我感到一种悬念压下来，外出旅行时，如果碰上了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往往就有这种感觉。我从未想到这一整代津巴布韦人居然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样子一无所知。

“动物?”他问道。“什么动物? 你是说牛吗? 还是羊?”

“我还是小姑娘的那会儿，班克特的丛林里到处是捻角羚羊、黑貂、大角斑羚，还有各种小一点儿的羚羊类动物，尤其是小羚羊。还有各种野猫、猴子、狒狒、野猪。鸟儿多极了，什么品种都有。那时山上还有豹子。现在象群没了，狮群没了，那时候只要一进入丛林就肯定会惊到里面的动物。”

“你住的地方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吗?”

“不是，过去丛林都那样，各地都一样，那么多鸟，早上一

起叫起来，简直把头都吵裂了。电话线上蹲满了鸟，什么品种都有。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老鹰在空中盘旋，一次有五只、十只，甚至更多。天空中到处有隼乘着热气流扶摇直上，能有二十到三十群。那时的天空中到处都是老鹰、隼、鹞子，湛蓝的天空下，远方的老鹰就是一个小黑点，就像苍蝇一样。现在抬头望望天空……”我俩走离杰克的小屋，站在屋外的小路上，前方几码外就是间布莱尔式厕所，远方的高地上耸立着依旧没法用的水塔，大地上的树木稀稀拉拉，向远方延伸。我俩站在那里，凝神远望，空中没有一只鸟。“那时有几百只，”我说，“如今能瞧见一只就算走运了。那时候，早上起来，去看昨天夜里都发生了什么，土路上和小道上铺满鸟类和兽类的粪便，那么厚，要半个小时才能清理完。”

他垂下眼睛，不再看空无一物的蓝天，环视四周，神色有些抑郁。当然，是出于自身的不幸，不过也有些不解。

“你说的地方不是保护区？”

“当然不是，还不明白吗？过去到处都是那样，那就是丛林曾经的样子。现在，那条路上只能看到自行车留下的轮胎印。”

“可能就是我的自行车，”他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

几天后，在山里某个俱乐部的檐廊上，我被介绍给一个男人认识。要是我把那人描述为曾是白人死硬派中最死硬分子，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他过去就是那种人。

“输掉战争后，我连行李都打好了，就准备飞了。要是真飞了，那将是我一生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这么说你喜欢那些黑小子们咯，是吗?”他的朋友在激他，仿佛在逼这个孩子，希望他好好露两手。

“我挺喜欢他们，一群性情开朗的好小伙儿。”

他凑巧发现镇上的黑人孩子们无论对丛林，对曾居住在丛林中的动物，还是对自己祖辈的生活方式都一无所知，于是他在远离城区，尚未被破坏的丛林中设立了一所训练营，常常组织城里的孩子到营地住上一两星期，向孩子们传授关于树木、植物、动物的知识。

身边没有孩子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淘汰野象。

“把象群数目控制于合理水平。”

他做了个带讽刺意味的鬼脸。“对，问题在于此，不过别忘了，咱们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处理好大象问题的国家，这里不会缺大象。”

不过，他还是最喜欢和黑人儿童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过去对老非的看法不对头。”

“我好像记得类似的话从不少人的口中说出过。”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几位黑人诗人朋友听。那天，我们坐在哈拉雷一幢房子的檐廊上，那种又是铁条、又是铁网，搞得活像个笼子的檐廊。这幢房子上个星期刚被窃贼光顾过，大家都在想，这个世界越来越变成窃贼的天堂了。过不了多久，窃贼会多过老实人吗？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应加入这个兴旺的行当？

这几位诗人生活贫困，在这里，大多数作家都在贫困中度

日,除非你在大学中有教职。

同这些人在一起,用不了几分钟我就能感觉到他们都在写什么。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抑郁的心境中,他们可不是对一切一无所知的人。这些日子里,非洲大陆可不是激发乐观、快乐思想的地方。没人喜欢把报纸搞得如婴儿般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都知道在东欧,在苏联,共产主义已病入膏肓。可这个国家的诗人都还年轻,这意味着他们都曾体验过革命带来的欣快,现在,他们坐在病榻旁,看着共产主义奄奄一息,就如同看着自己就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父母。

我向他们说起大山中的训练营,还有那个大象猎手,我的话似乎令他们沉默不语。这次旅途中,有时我想问个问题,或做个评论,可常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舌头仿佛成了体现文化鸿沟的人体器官。此外,所有我遇到的人似乎都有某个刚刚长出新肉的痛处。

“抱歉,”诗人 A 说,“你是说一个白人农场主带我们的孩子去丛林,向他们传授丛林的知识吗?”

“对,我是那么说。实际上,是前农场主。”

两个年轻人用喷火的眼神扫了我一眼,不过这并不是关键。他们窝火,感到心痛。

“他干吗要那么做?”

虽然感到难以启齿,我还是硬逼着自己说:“因为他无法忍受黑人孩子对自己国家的丛林竟一无所知。”

我的话揭开了盒盖,各种难以容忍的话竞相而出。所有黑人都认为,所有白人农场主与西蒙·内格里都是一丘之貉。

“我倒想会会这位大英雄，”一个人说。他想在自己的话中增添点儿幽默成分，可当他大笑时，我闻到酸水的味道。

“我觉得你不大会想见他，”我和他一样幽默一下，“你得和这帮人一起长大，这样才能……”我犹豫要不要把话说完。

“看到他们金子般的心，是吧？”诗人B讥讽我。

“并不完全这样，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中一些人已经很努力了。”

“我怎么没注意到？”

“要说如今他们还有点家长作风，可想想他们过去怎么样吧！”

“现在还提什么家长作风，太迟了。”

“你们已经相互交融在一起了，”说这话时，我同穆加贝站在了一起，他也说过：“现在我们都是津巴布韦公民。”

那两位年轻人一副中了圈套的样子，眼神躁动不安，脸色越来越黑。

诗人A说：“白鬼子对丛林知道多少？”

又一次，我舌头上仿佛压上千斤重担，发不出声。

“他了解，我弟弟也一样了解，对动物他有一种直觉。你要是跟他一起到丛林里去过，他会告诉你哪儿有小羚羊，哪儿有条大角斑羚，他知道哪些动物会出现在哪条小径上。”大家沉默不语，因为我说的是自己的弟弟。又一缕丝线织入禁忌之网：家人。

“他的厨——佣人。”

“对，他的厨子，”诗人B用刻毒的语气说，“哦，别担心，我

姐姐的丈夫有份儿好工作。”

大笑，所有人都大笑起来，笑声背后仿佛藏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你弟弟的厨子？”诗人 B 促请我继续说下去，还摊开双手，做了个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手势。

“他过去常来找我弟弟，要我弟弟跟他一起去打猎，因为我弟弟知道哪有猎物。”

又一阵沉默。

“什么时候的事？”

“还有动物的时候，”我的声音已和他们一样苦涩。

“是啊！”诗人 A 说。

诗人 B 说：“我在哈拉雷长大，我也会叫上你弟弟。”

“好长时间没回过村里了……两年……不，三年……可能有五年了。”诗人 B 说。

我原本也可以接下去说，弟弟确实了解这里的动物，可对这里的非洲人他总是戴着歧视的眼镜。

可那又有什么意义？他们谁不知道？我问过弟弟，也问过其他热爱丛林的白人，可他们却不知道有一种树，穆哈察树，是马绍纳人心目中的神树，尽管他们可能和黑人一起从树下经过上千次。

“真的吗？”弟弟说，仿佛我说的是另一个星球的事儿。“那倒挺有意思，我还不知道。”

他对丛林的理解和其他热爱丛林的白人一样——不是作为白人，因为说那种话没一点意思，而是作为现代人。

一位人类学家说过:“当我与老人们在一起时,我要提醒自己,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疆域中。每块石头、每棵树、每条小路、每座小山、每只鸟、每头兽都有自己的意义。夜枭鸣叫,或者看见了某种鸟,那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讯息。路旁的小石头构成一种图案,要是你看见灌木上挂着块布,那可要小心了,那是一种巫术,意思很可能是:别来打扰。我们不生活在那个疆域中,可问题是,他们自己的年轻一辈也不生活在那里,对那个疆域,他们了解得不比我们多。可当我与老人在一起时,我尚能窥探上那个疆域几眼。现代人出现之前,世界上到处是那样的疆域。”

1964 年,在赞比亚独立庆祝活动中有个南罗得西亚艺术展。靠近门口的地方有张巨幅照片,照片中是一棵古老的树。拍照片的艺术家就站在一旁,脸上挂着那种在南部非洲常会见到的表情:你要是注意到了我,就问我几个问题吧,我的回答保证有意思!同伴和我驻足观看,说,真是棵漂亮的树,等着老人搭腔。艺术家有点上了岁数,先把我俩仔仔细细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这棵树是我们村的电话。”

听到这些,旁边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匆匆离开。

“什么样的电话?”

“你们有电话线,我们有树。靠这棵树,女人们向外出打猎的男人传话:什么时候回家?打到了什么?男人回话:今晚回来,或者,要等到明晚,我们正在追一头大角斑羚。”

“你怎么不告诉政府是怎么做的呢?”我俩跟他开玩笑说。“那能省下不少钱,他们会感兴趣。”

“是啊，可问题就在这儿，”艺术家回答，“咱们那儿的老人都知道怎么做，有些孩子也还知道，可年轻人都不懂了。就要失传了。”

“你会吗？”

“我还是孩子那会儿，老人们常派我到树那儿去。”

同样，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也拥有一些年轻一代不再拥有的能力。比如说，他们能提前几天就知道有人要来。一本关于海地的游记也提到那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利用大树。同样，这种技术在年轻一代中也失传了。

那个为消失的疆域而哀痛的人类学家向我讲了下面这则故事，不是发生在过去，而就发生在去年，1988 年。“一个年轻姑娘不肯嫁给父母为她挑的老头儿，他们就在她身上下了道咒，于是她就虚弱下去，得了病，还想投水自杀，可人们把她从水里拖了上来。后来，她同意嫁给那个老头儿，家人才撤了那道咒。”

“这个故事真可怕。”

“对，可关键并不在此。你想过吗？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多少人也给别人下了咒？不，不，我不是说巫术那种事。什么叫咒？强烈的意愿！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某个心存怨毒的人多少次对其他人许下恶愿？想想这个问题……”

无疑，巫术在许多地方依旧有用，只不过我们从未怀疑到它头上。阿尔顿家有只小猫，现在已经是老猫了，还是他母亲在的时候养的，他母亲非常喜欢它。现在，多萝茜和乔治都相信阿尔顿母亲的鬼魂附在那只猫身上。“这是好事，”阿尔顿

说，“就算我不在家，他们也不敢对猫不好。”

对动物的冷漠和残忍有时被视为是对白人的多愁善感作出的回应，也可能是愤怨，白人对动物都那么好，可对我们黑人却这么心狠！

动 物

有个笑话，也是一首流行歌曲。一个白人开车外出旅行，他的狗坐在前排他身边，黑人仆人坐在后排，路上出了车祸，白人司机送了命，警官问后座的仆人发生了什么。仆人说：“别问我，问那只狗。”

在过去几百年中的某个时刻，赞贝西河改变了自己的河道。旧的印度洋出海口成了现在的贝拉，现在的三角洲要比过去向北偏移了一百英里。“我好奇的是，动物会如何面对这种改变？”

下面是人与动物之大战的一幕插曲。某个种柑橘的农夫收成不好，因为长尾猴常来偷吃。他在果园四周架起电网，可猴子轻而易举地跳了过去。他把电网加高，猴子又发现电流打不死它们，最多让它们震一下。猴群更学会以一种姿势跳

到电网上，电流正好把它们弹到果园里，它们就在那儿吃个饱。然后再调整好姿势，跳到电网上，让电流把自己弹到果园外。农场主怎么也狠不下心，把电流增大到能给猴子造成严重伤害的强度，最后只好雇了个人，拿上条枪驱赶猴群。人工贵不说，效率还不高。

长尾猴最近被重新引入原本已消失的地区。

两种无关紧要的动物的故事

在哈拉雷的一幢房子里，一条体型硕大的黑狗欢迎着家里的客人。这是条纽芬兰犬和洛特威勒犬的混种，眼神坚定，让你不得不留意它。它大胆——如果说还算不上傲慢——双眼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它时刻陪在你身边，在屋里，在花园里，总是跟在你脚后一步之遥，鼻尖正好在你伸手能摸到的位置。当你驻足转身时，它的脑袋正好就在那里，让你摸摸它，拍拍它，它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你的面庞。另一条狗，一条小个儿阿尔萨斯犬正趴在靠近后门口的地上。它看着我们，整个躯体仿佛都在说，我不值得你留意，双眼却流露出对爱的渴望。你要是去爱抚爱抚这条狗，那条大狗就会跑过来，把鼻子、脑袋、肩膀挡在你的手和那条小狗的脑袋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你根本没法抱上一抱那条小阿尔萨斯犬，因为大狗不让你抱。阿尔萨斯犬知道你想对它好点儿，可它也清楚自己只能趴在满地尘土之中，别无他求。来到这个友善的家庭时，它本就是个避难者，这个家里满是各种肤色的人和各种颜色

的猫，都在那条嫉妒心极强的大狗的监督下。阿尔萨斯犬的主人飞了，到南非去了，把它留了下来。它的新主人同家里的黑人客人开玩笑说，这是条种族主义狗，它的旧主人教它咬黑人。现在，要是它再展现当年练就的本事，就会被呵斥、责罚。这条狗给搞得蒙头转向，闷闷不乐，不过有件事情它已下定决心：绝不离开这个家，这里至少有东西吃，有地方睡。看着那条自信、成功的大狗，阿尔萨斯犬的心在流泪。它要是会说话，肯定会说："对不起，可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坏。"

图书小组

我们乘大客车到中央省的一个小镇，大客车高效、准时，司机驾驶技术精湛。现在，小组再也不用挤长途车了。当局看到了克里斯画的一幅卡通：大雨中，小组成员站在一辆抛了锚的长途车旁，坚持小组要以更安全的方式旅行。这次我到了已经有五个星期，新闻中已报道了四次长途车车祸了。"我们可不想整个小组一下全报销了，"官员们大声说。小组成员也不再仅仅吃橘子、面包和牛奶了。"至少，那是健康食品。"可在这次旅行的末尾，资金已所剩无几，我听到小组成员对凯西说，她不能指望大家再撑下去了，要还是这样辛辛苦苦一天

后只给大家吃五块钱一份的东西。“每外出一次我就要掉几磅肉，”已经太瘦的克里斯说。

半途休息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家花园式咖啡屋的树荫下，塔伦特、西尔维娅、凯西和克里斯好像在闲扯，实际他们在交流，我则坐在一旁听。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很随意。小组已发展到某个阶段，所有成员都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这四个人已身陷入各式各样的要求中，可他们和大家一样脆弱、渺小，并非百害不侵。津巴布韦的每个村庄都希望小组能去自己那儿看看，在哈拉雷，电话铃声就没停过。援助组织、政府官员，还有热爱第三世界的人都感到小组成员身上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小组成员看到，自己越来越强大，因为别人都这么看。要是他们脆弱、不够强大，又怎么能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呢？这会儿，他们讨论起彼此的“工作风格”，委婉地相互批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这幕不正是旧日共产主义活动者的目标吗？不过小组成员没一人是共产主义者，对政治马戏他们都持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耐心。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读过，过去俄国的理想主义者也怀着满腔热情，带着各种技术下到农村，他们回答没有，不过挺有兴趣了解一些。“如果有人说咱们跟那时的人一样，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塔伦特说，“他们的人民需要大量帮助，我们也一样。”

一想到所需要帮助的深度和广度，四人一齐不由自主笑了起来，相互望了望，脸上都带着既幽默，又不敢相信的表情。

人们对小组的期待之高让他们吃惊……支撑着他们……

激励着他们，也常常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

期待源于两口源泉，或者说两条河流，或两场洪水。其中之一是：白人统治已一去不复返，同时消失的还有白人的冷漠、势利、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否定、贬低黑人所做的一切。卸下这样的重担，非洲人觉得没什么不可能。另一则是许诺一切的革命辞令。“当黎明到来之时……”在津巴布韦，没有哪个男人、女人、孩子不在期盼着好日子转眼间就降临。可实际上，没什么变化发生，只有新官僚用各种新的旧的规章法令使人们摇晃、呻吟。在哈拉雷，那群硕鼠……小组正是切入这一真空地带，他们说：“只要心诚，什么都能干得成，你们所缺乏的是专业技能。从现在开始，学会该怎么做，为了你们自己。”在编写那本妇女读物时，话题由你们定，材料由你们找，书由你们写，他们只是坐着听。

大家喝着可乐，吃着肉饼，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对大援助机构的鄙夷之情。“那帮人冲进津巴布韦，可要是没有办公地点、文字处理机、电脑、员工，还有大笔资金，他们寸步难行。”

凯西说：“我只有张办公桌，用家里的电话，有台打字机。此外就再没有任何办公设备了。”

“但我们拥有一个遍布全津巴布韦的人员网络，他们都乐意为小组帮忙。”

“小组能成功，因为它赢得了人民的善意支持。”

小组成员开了许多玩笑，靶子都是那种被称为顾问的专

家。“他们中有好多人一步都没有出过哈拉雷。就算到农村地区，他们也要住三星宾馆，只去当地政府转上一转。对地方上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却要定下规矩，告诉我们他们的援助资金该怎么花。”

“你相信吗？我们刚刚在外面跑了一个月回来，这时冒出某个丹麦人、德国人、美国人对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主要问题是……”

我身边带了份剪报。

他们倚在桌上读，脸上慢慢绽露出笑容。

“那么大笔钱，我们只要有一丁点儿……”

“千分之一也行。”“百万分之一也行。”

剪报内容如下：

> 为非洲提供咨询服务已成为一项大产业，欧洲和北美的咨询公司收费高达每年十八万美元。在任何时候，在下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各国，至少已有八千名海外工作者就职于负责官方援助项目的公共机构中。捐款人每年向非洲投入七十到八十亿美元，可其中一多半落入这些人的腰包。然而，独立二十五年来，非洲已由粮食自给自足坠入大范围的饥荒。非洲得到有效的咨询服务了吗？

凯西从挎包中取出准备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材料，把它递给大家看。凯西说，存在着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四

人都探过身子，伸长脖子，一脸专注的神情。西尔维娅先发表意见，然后是塔伦特。当四人聚在一起，却并非正式工作时，要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集中起来，那就什么也干不了。这种树荫下的闲聊就相当于一次组织会议，可不那么叫，他们也不把它当成一次会议。这个小小的组织，脆弱但却富于生机活力，一旦它也僵化起来，要求有固定的结构，那就要开几个小时的会去搞掂现在几分钟就能搞掂的事。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都承受着压力。塔伦特的三个孩子还小，还要担起相当一部分担子，经营集体农场。完全因为有了丈夫的支持，她才有可能参加这些外出活动。她丈夫曾说过："农场上不分男女。"家里有八个子女的西尔维娅要出门也面临许多困难。凯西是小组的核心，那种天生的组织者，她的活力激励着所有其他小组成员。她也有子女，也说过要不是因为有丈夫的支持就不可能从事这些工作。当小组成员像现在这样坐到一起时，这个家庭（他们说自己是一家人）的不同成员各自的秉性、脾气、风格也一览无余，在他们每个手势中，在他们说的每句话中。凯西喜欢身体前倾，脸上总挂着微笑，双手配合着从她口中滔滔而出、一个顿儿都不打的话语。西尔维娅四平八稳地仰坐在椅子上，有时点头，有时面露怀疑，仿佛是个法官。塔伦特说自己生性腼腆，不大会说话，可跟朋友在一起时也常有妙语，有时也语中带刺。克里斯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他观察，他倾听，五分钟后递上一张速写画，画中三位女性正激烈地进行着言语的交锋。

一位年轻人向我们走来，他神色忸怩，想开口又未敢开口。凯西把他介绍给大家，大家都表示欢迎，直到这时他才开口。去年，他在这个地区帮小组工作过。得悉小组今天肯定会在这儿歇歇脚，他一早就来了，寻找小组乘的车。他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

下面是他的麻烦。他的家人一直在催着他赶快结婚。今年他三十，在绍纳文化中他已太老了，超出了婚配的年龄。再者，他也养不起一个老婆。他是个低级福利工作者，就他那点微薄的收入，还要赡养老母，资助各式各样无业的朋友，还有哥哥一家人。这个哥哥十五岁时就把一个十四岁的姑娘搞大了肚子，两人双双被赶出校门，也注定要在无业中度过一生。女孩的父亲要两人结婚，两人都不到二十岁已有了两个孩子。面前这位年轻人要养哥哥全家，对婚姻，他有恐惧心理。年轻人的父亲早早离他们而去，他母亲独立把兄弟俩抚养大，很长一段时间她在白人家门口的垃圾桶里扒出什么，全家人就吃什么。（到这时，我也听过好几桩类似的故事，而且这样的事情仍在发生。“不过现在不光是白人家门口才有能找到吃的东西的垃圾桶，这就是进步。”）年轻人说，他想要真正的婚姻，就像凯西和塔伦特的。他听她俩谈起过自己的丈夫。他不想和那个家里人帮他挑的姑娘结婚，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那姑娘。他该怎么办？他觉得她们知道答案。凯西和塔伦特商量了会儿，然后凯西说，婚姻不应成为人生的局限，而应该丰富人生的可能。塔伦特也说，你该找个像我俩的丈夫那样的伴侣，一个能让你思考的人。

年轻人说:"可事先怎么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也喜欢她,可我怎么知道她会成为个贤妻良母,就像凯西和塔伦特?"

就在这时,我们被叫回车上。我们五人在拥挤的旅行车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实际有六个人。不管小组到哪里,都会带上一面大鼓,因为没有音乐就别指望哪次会议能搞得好。"这可是津巴布韦去过地方最多的鼓,"凯西说。

车到城里的终点站时,一辆政府的车已经在等着我们。凯西说:"真不懂他们什么意思。瞧,那是本区行政长官的车,他们说太盼我们来了。瞧,那几个都是本地区的大人物,居然会来接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被送往培训中心。中心不在城内,而是建在离城区挺远的郊外,一幢占地面积颇大的五层建筑,四周是草地、树木,仿佛在毫不含糊地宣告:这就是进步,这就是现代,这就是津巴布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里天天挤满了人,来自中央省各个地区的学员在这里学习管理、记账、会计、服装设计。

中心一次可容纳二百名学员。三十名女性,外加九名男性赶来参加小组组织的这次研讨会。会有男性参加这样的研讨会,支持女性和这本妇女读物的编撰工作,这又是个不小的革命。与会的男性必定各有非凡之处,他们不仅在对抗传统观念,还肯定会遭到其他男性的非难和嘲讽。为了这九名男性的出席,小组成员互相庆贺。"瞧,克里斯,你不再是唯一的男性了。"

我们一到会场,四十多人就围了一个大圈坐了下来,开始自我介绍。先由小组成员开始,凯西、西尔维娅、塔伦特、克里斯逐一介绍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经历简短介绍了一遍。所有人都身体前倾,凝神倾听。除了介绍者的声音,会场上鸦雀无声。几个月前小组也到过这里,向当地的与会者说,这本妇女读物怎么写由你们自己决定。今天的与会者中有不少上次并没有来,她们肯定会想:"这群人真出人意料。她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现场的观察者,我自己,还有两名当地官员,也在想,这些准备好为了这本书付出大量时间和努力的人又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看得出她们差别很大,有的穿得好,有的穿得差,有的自信,有的则正在同羞涩作斗争。这些差别在两位妇女身上最突出。有八个孩子的贝丽塔·姆辛都太太说,自己一直在工作,先做教师,后来做高级发展官员。她是这个省里第一位拥有摩托车的女性,对此她引以为豪。她刚刚去过罗马参观学习,"我所有的孩子都很成功。"最大的两个都是大学毕业,一个正在英国学习农业和经济。另两个是教师,剩下的四个还在上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姆辛都太太说自己的丈夫为此而骄傲,可没有他,自己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她是个高大、漂亮的女性,说话风趣。她介绍完自己,大家一齐鼓掌,她自己也挺满意。

另一位妇女则瘦小,说话瞻前顾后,神色中充满焦虑。她来自一个饱受干旱之苦的地区,每天清晨,她和村里其他妇女三四点就起床,步行几英里去打每天喝和做饭用的水,洗漱对她来说已是一种奢侈。她们那里缺衣少穿,当她听姆辛都太

太介绍自己的生活时，她双眼炯炯放光，尽是艳羡。她说，等下了雨，日子好过点儿，她想参加O级考试。只要有时间准备，再加上参考的机遇，她能够考出好成绩。大家一齐热烈地鼓起掌来，她在掌声中坐下来，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心里似乎也注满了大家的同情与鼓励。

大家打成一片，真心交流，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位妇女说出自己的成就，大家轻轻鼓掌，男性发完言掌声尤其强烈。会场上的官员坐得有点分散，一直在观察，倾听。自从一开始的正式欢迎后就再未开口。会议给官员的印象很强烈，地区代表说："你们干得很好。"他的语气中既有不解，也有好奇，或许他在想，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团结一心的气氛是如何营建起来的呢？

所有导入程序走完后，妇女们开始跳舞、唱歌，欢迎小组的到来。

我们到食堂的时候，晚餐正在进行中。食堂很宽敞，一排放四张桌子，向下排下去，尽头是打饭打菜的地方，排了好几行队伍，有男有女，大部分是年轻人。装食物的盘子从窗口递出，里面有玉米粥、肉、蔬菜，分量很足，都堆出了尖儿。玉米粥的分量尤其让我吃惊，足足有两磅，而且很稠。肉是牛肉，上面有丰富的膏脂，菜是白菜，做得很棒。就算饥饿的意大利人，这样一餐也足以让他心满意足。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分量餐餐如此，还常配切得厚厚的白面包。受邀去吃"白人"饭食的非洲人常常回家后再吃顿玉米粥，上次杰克请他教的小记者们到哈拉雷一家餐厅吃饭，那帮孩子也半开玩笑地说没

有玉米粥吃。这肯定纯属情感问题。二战刚结束时，在日本，由于饥荒，米饭成为一种情感上的必须，即便食物充足的时候也是如此。装米饭的桶放在那里，人们在漫长的一顿饭的最后总要吃上一两勺，那已成为一种保证。这里新富人家庭每餐必有玉米粥，尽管大多数菜式已“白人化”。

然而，玉米粥也不再仅仅是一种“黑人”食品。在一个家境优裕的白人家庭，父母问儿子过生日时想吃什么，他回答说只想吃玉米粥和炖肉。每家餐厅，每家宾馆，每次烧烤都有玉米粥。看着那些留在津巴布韦，却保持自身优越感的白人往自己的碟子里盛玉米粥，这真是让人再开心不过的一幕了。当然，这是对那些一脑子历史讽刺感的人而言。那时候，玉米粥这种东西只有黑人才会吃，白人碰都不会碰。

那晚的就餐时间——其实所有就餐时间，食堂里都热热闹闹，仿佛在过节。对于在此受训的学员而言，在中心受训的日子代表着一段富足的时光，他们中很少有人能餐餐都吃上肉，有的甚至一星期吃一次都有困难，那么大块的肉排更是想都别想。我们去卧室的时候，淋浴区还传来水声，人声鼎沸，好像在开晚会，又像在庆祝泼水节。洗澡的人站在源源不断的热水中，彼此大呼小叫，叫出心中的兴奋、欢快，还有震惊，这里的生活竟然奢侈至此。那些农村来的妇女谁也没见过干净的热水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出。

克里斯住男学员宿舍，塔伦特和凯西住一间屋，西尔维娅和我住另一间。我们四人一起挤到塔伦特的床上，讨论第二天要采取哪些策略。那种气氛令人愉快，不由让人想起上学

住校时熄灯后的光景。

“咱们必须慢慢来，”凯西说。“这些东西咱们干得多了，可对这里的每个人来说差不多都是第一次。要不怕麻烦，解释、解释、再解释。这还是第一次要大家自由选择主题，写出文章、诗歌、故事，再自己发表评论。千万不能使她们害羞，一定要注意那些不大开口说话的人，要给她鼓励。”

塔伦特有军队和集体农场的经验。“每一部分，我们都要把她们分成小组，讨论自己的东西，那样她们会相互支持，批评起我们来也更容易些。”

接下来，塔伦特和凯西开始相当专业、细致地讨论各种不同目的的小组应由多少人组成。西尔维娅已经困了，想睡觉了。屋子中间有幅隔帘，让大家有点儿个人空间，不过说起话来还是很方便。我和她一直谈到很晚，凯西和塔伦特也一样。在女学员宿舍这一侧，一直到夜深时还能听到说话声、笑声，一两句歌声。西尔维娅没笑过，她对我说起一个婚姻破裂的好朋友的事情，用她常用的方式。有些东西我很难理解，她也不希望我过早得出结论。

那对夫妇有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快二十了，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丈夫是名公务员，婚姻一直艰难，丈夫有时爱喝酒，妻子就盯着他，不让他喝太多，碰到胡乱派酒的上司也帮他挡回去。后来，出现了另一个女人，可她还是把他抢了回来。几个月前，她发现他不仅有外遇，还有个私生子，她一直蒙在鼓里。她去责问丈夫，她丈夫要她接受一夫多妻的婚姻。她说：“我俩结婚时，你选择了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婚姻，选择了我们

的婚姻习俗，按基督教仪式完婚。""我改变主意了，"她丈夫说。她不肯接受一夫多妻的婚姻，可她丈夫整天跟那个女人和孩子在一起。偶尔回家还冲她大嚷大叫。与此同时，她几乎是独自养育子女，因为他的钱都花在那个女人、孩子，还有新房子上了。那个女人的亲戚要她丈夫同她断绝来往，还上门来威胁她。新法律下，她可以要求丈夫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可她有些害怕。西尔维娅说这种事她实在有些难于启齿，我说所谓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男人，同她说起的那个丈夫没什么区别。一夫一妻、一夫多妻，这些名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西方许多婚姻实际上是一夫多妻，越来越多的夫妇分手，再婚，孩子在两个家庭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甚至自己的房间。孩子在家里拥有独立的房间，这种观念最躲不过西尔维娅的揶揄，更别说有两间独立的房间，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了。

她说，这种相同仅仅是表面现象，她指的也不是生活水准上的差别。她说，判断事情不能仅仅看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更要回过头看看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小时候，她父亲有四个妻子，每个都是按礼俗正经娶过门的。女人身边没丈夫通常被视为娼妓，或浪荡货。一个哥哥去世后，她父亲必须把他留下的孀妇娶回家。可直到他娶第四个妻子之前，他从未爱过自己的妻子中的任何一个。"这里的风俗就是兄弟间有谁去世了，他留下的孀妇一定要由活着的叔、伯娶回家。这种做法有好的一面，女人不会无依无靠；可也有坏的一面，孀妇肯定招新丈夫的嫌。"我问她，四个妻子一起能相处好吗？西尔维娅

先说能，接着又承认还从没听说过一个男人的好几个妻子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虽然会假装友好，讨丈夫的欢心。“一夫多妻制对妇女来说太糟了，”最后，她还是承认了原本不愿承认的事实。现如今，人们张口闭口“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这些用词应得到严肃对待，可事实上它们像暴风雨中的独木舟一样飘摇不定。

我躺在黑暗中，听着大楼里到处有人说话、谈笑；淋浴房还传来冲水声和歌唱声，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个有三个妻子，却没一个是自己挑选的男人。不过，没法谈这些，时下之气氛不允许，仿佛有只无形的夹子夹住了舌头，我俩可不是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文化差异，也不能是。西尔维娅太抑郁了，躺在隔帘那边的简直就是一堆悲伤。为了那段破碎的婚姻，或许更夹杂了对自己婚姻的担忧。

我想起《纽约客》上登过的一则笑话：一个晚上，一个约摸十五岁上下，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成人礼服的男孩向一个喝得醉醺醺、满脸忧色的男人走去，对他说：“还认得我吗？我是你跟第三个老婆生的儿子。”

我没法向西尔维娅讲这个笑话，环境不允许，她不会觉得好笑……或许那个笑话原本就不好笑……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居然会觉得它好笑？要真是这样的话，关于“西方文化”它又表明了什么呢？西尔维娅有没有让我震惊的笑话？会是什么样的笑话呢？可西尔维娅没有向我说过笑话，那晚没有，整个旅途中也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大家开始工作，接下来要工作一周。研讨会

的每一部分都以一部短剧开头，短剧中包含一个问题。早餐后，大家把短剧再排演几分钟，之后又是唱歌、跳舞，人人都有份儿。

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数与去年相同。主要议题有两个，凯西和塔伦特说。这本妇女读物在两个问题上真正具有革命性，挑战了本土文化习俗的基本构造，也注定会引发反对。议题之一：新生儿自动以父亲的姓注册，虽然孩子被从一个女性交到另一个女性手中，"我们对于自己抚养成人的孩子在法律上却没有监护权。有时父亲几年不见人影，可法律上他随时可以出现，把孩子带走。"议题二：为什么土地自动以男性的姓名注册，而实际干活劳动的都是女性？

现在又多了个新议题。去年，整个会议期间，艾滋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起。不过今年，政府的宣传起到了效果。首先由一个小组中的一位男性提出了娼妓和嫖客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在教室中传播，由弱转强，最后几乎所有人口中都在重复"艾滋"这个词。

在那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星期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一次，凯西站在黑板前，在黑板上画统计图表。她说，要把读本未定稿上的下一页跳过去，因为那页太难了。她的本意是那页上的统计数字太详细，太难用图表来表示，可下面一位妇女会错了意，柔声对凯西说："您不妨试试，说不定我们的智力还是理解得了的。"

一位男性地方官员说："我真搞不懂，做大部分工作的几

乎总是女性，她们从早干到晚。走老远的路，报酬几乎为零。男人们坐在办公室，收入却是女性的十到二十倍。”他自己也是个坐办公室的男人，他的话一出口，妇女们立刻热烈鼓掌，还现场编了首歌献给他，妇女们一边对着他唱，一边打着拍子。

法官有时十分严厉，尤其对妇女。一位妇女杀了自己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她要养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凭我那点儿收入实在养不活这么多人。”她被判入狱，不过她的两个孩子得到照料。

另一位妇女杀了新出生的第九个孩子，被判入狱，她的八个孩子也得到安排，有人照顾。可政府的福利官员说：“我们去看看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却发现孩子们失去了踪影。政府把抚养八个孩子的津贴发给了他们的一位亲戚，可那家伙竟然连孩子们在哪儿也不知道。”

大家讨论起为什么法官的判决毫无弹性，结论是：那些法官都是新手。“只有对自己信心十足的人做起事来才会有弹性，可他们在学习中积累自信，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受了。”（津巴布韦国内有多种法律体系：绍纳习惯法、恩德贝勒习惯法、姆巴察习惯法、罗马—荷兰法、英国法。）

好几次，课室中的妇女们都提到一个现象：农村地区贫困的黑人妇女受雇于富有的黑人农民，尤其是女性。这些雇工的收入少得可怜，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收入，只能得几餐饭。“没办法，不给她们干不行，总得养活孩子啊！”

一天傍晚，一位妇女单独和我坐在一起，她问我：“见过比

我们更穷的人吗?”

“在有些国家，人们比你们还穷得多。”

“我从未出过省，我觉得自己已经够穷的了。连肚子都填不饱，这还不叫穷啊!”

我对她说:“世界上有些地方的人一无所有，只有贫穷。你们的生活状况也不好，可至少你们还在尽力摆脱贫穷。你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可你们下定决心要解决问题。这就使你们相比之下比那些人富有得多。”

她深深思考了好一会儿，足有一分钟，甚至更长。我本以为我俩的谈话已结束了，可就在这时她又说:“我们还欠了好多债。”

我说:“所有非洲国家所欠的外债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一个南美国家。”

“你意思说非洲比南美富裕?你去过南美洲吗?”

“去过巴西。”

“那儿比这儿还糟?”

“是的。其中一点，那儿的贫富差距比这里大得多。”

“咱们这儿也有有钱人，你见过那些有钱人吗?”

“跟巴西残酷的贫富差距相比，这里就不值得一提了。”

她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又陷入深思，接着又问:“那些国家的穷人难道就没有怨言?”

“有时，因为他们精力没那么足，他们吃得不好，又一身是病;也有时，宗教令他们默默忍受。”

“我也信教，可我有怨言还是要讲出来。我一直有怨言。

我丈夫对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老是牢骚满腹?我回答,你过得滋润,可我活得辛苦,所以牢骚满腹。"她笑了起来,笑声那么响,引得周围的人扭头看看她,跟着,受她的感染,也笑了起来。

一次讨论中,有人讲了个关于残酷和官员的愚蠢的故事,一个很可怕的故事。故事讲完,全屋四十多人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怎么还能笑出来?那个故事多可怕。""就因为可怕我们才笑。"

上次小组来的时候,现场有个男性对女性成见颇深,这次那个人又来了,还改变了想法,认识到自己过去错了。不过,他说,听到女性批评男性还是让他心痛,因为所有男性都爱女性。"我自己就觉得女性是上帝的礼物。"那一整天,如果大家觉得讨论太沉重了,就会有人大叫:"女性是上帝的礼物",于是大家一齐大笑起来,包括在场的男性。

这些男性知道,自己能在这儿,就已经是革命之举了。他们也喜欢有人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令你不同于其他男性,令你比其他男性更勤勉。下面是一位与会男性的一小段自我介绍:

1965年5月9日,一个男性婴儿出生于公共领地上的小村庄。家里人最终决定,"就叫他阿莫斯吧。"

这个孩子满身活力,天真无邪,怎能预见随他的出生而至的灾难。直到十七年后,他才瞧上了自己父亲一眼。

和村里的大多儿童不一样,我于1980年成功考入位

于伯格纳的教会学校，开始中学生生涯。

我成了个闪亮的典型，许多家的男性家长也开始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现在我工作了，我的一切要归功于我母亲，她一直不知疲倦地辛苦操劳，把我塑造成现在的我。我也想念父亲，不过我也不敢肯定是否是他把我塑造成现在的我。我的全名是阿莫斯·西斯德，现任古图地区合作助理。

这次，我遇上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也抓住这个机会，问她们对埃德加·泰克雷有什么看法。这时，泰克雷的大名已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被说成是对政府、秩序、安全和穆加贝本人的威胁。

可在这里，没人会去谈泰克雷和他的新政党，也没人提团结法案。毕竟，这儿是中央省，而非马塔贝勒兰，可就在几个月前，津巴布韦全国都在谈论团结法案。人们很快就会视好运为应当。

泰克雷，咱们不会投他的票。别忘了，咱们不过是普通村民，可不想再打一场仗了。

泰克雷？作为反对派倒也有点儿用，能让那些人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要当领导人，他还不够稳定。

泰克雷？我喜欢他，因为他是另一项选择。不过他们说，下次选举，咱们就能推选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由穆加贝圈定名单。要那样的话，就没人再在乎泰克雷了。

这一周一天天过去，小组成员也眼看着疲惫下来，她们对

研讨会投入了太多精力，还有每天夜里临睡前的讨论。又一次，她们外出已有好几个星期，女人们开始挂念丈夫、孩子。克里斯张口闭口都是他的女朋友。

回到哈拉雷时，这次和上次研讨会上得来的材料会堆满整间屋，克里斯还要画出许多图画，交给小组。对任何地区都既不能有偏爱，也不能有偏见。

凯西回家后依然歇不下来，她还有大量的来信要回。从津巴布韦全国各地请求小组来访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入。凯西没有秘书，这么多事情她怎么做得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说，要做的越多，干的也就越多。不过，她也不是没有忧虑，“有时候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塔伦特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去做。”

小组也有要担忧的事情，像这样的礼遇并不是次次都有。小组也有“敌人”，要那些人接受这本满纸爆炸性观念的妇女读物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没人会公开说我们的坏话，因为村民们喜欢我们。可有时候突然就遇到阻挠，那时我们才知道……”

“很多时候。阻挠倒不是出于敌意，而是出于低效，”塔伦特说。

研讨会的最后一晚，晚餐后有晚会，汽水、啤酒、小吃，还有各小组自编自演的小品短剧，其间夹杂着舞蹈。

一出小品的内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姑娘去求职，可没成功，因为“头儿”更喜欢虽然各方面都不合格，却长得漂亮，或者有家庭背景的姑娘。“你说你是我妈妈的阿姨的二表

妹？请坐请坐，填好这份表格，一式四份。”那位出色的姑娘走了，在别的地方，她还要一遍遍背诵那些得来不易的资质证书。

另一出小品的内容是一个滑头的乡村医生如何欺骗容易上当的病人，发了财。

还有一出小品里，一名妇女神灵附体，预言这本妇女读物的未来一片光明，接着她又摇又摆，向身边的观众伸手要钱。她实际是在讽刺巫医。

一出小品十分严肃，小品表演者说：“这本书很重要，它帮助我们，把我们凝聚成一个群体。它改变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工作方式，使大家感到自己是津巴布韦的一分子。无论对于社会的领导者，还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社会发展工作者，这本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晚会结束时才十点，妇女们说要是不能好好送送小组就没法上床睡觉。训练中心大楼入口处有个宽敞、正式的大厅，妇女们，还有几个男性把这个大厅占了下来，还借来了小组的那面大鼓，开始狂野舞蹈，又蹦又跳，使劲跺脚，与正式晚会上那种平静庄重的跳法简直有天壤之别，整幢大楼都在歌声、鼓声中抖动，已经上床睡觉的人也下到大厅，原来是来提意见的，可不由自主地被拉入舞蹈的圈子中。

要是有人整周都观察这些妇女讨论、创作，会形成一种印象；可要是他也看到同样的妇女无拘无束地跳舞的样子，他又会发现一些相当不同的东西。

大家注意到，我说非洲人，至少是这里的非洲人做事很有

板有眼。为什么不能有呢？他们自己也这么说。这些妇女非常清楚板眼所具有的价值，因此，在载歌载舞开始一个创作单元后，她们就会坐下来，神情严肃地说："恐怕第四页上第二条第四款起草得不准确，我们想如此改动。"她们明白两种世界各自的价值，想把它们都掌握在手中。

不过，说心里话，有些政客就是不能忍受黑人做事也能有板有眼的说法，就是不肯相信板眼和其他的东西能共存。一位诗人刚刚去过农村地区，那里一切都以歌唱、跳舞、讽刺、表演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哈拉雷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那位诗人要会上的其他诗人、作家也唱一首歌，可他们的身体在尴尬和不情愿中下意识地扭来扭去，就是开不了口，估计文明社会中的人反应都会如此。

有一次，在布拉瓦约，我在车里一连坐了两个小时，观察眼前一条人行道。那段时间里有几十人从那条人行道上走过，可只有两个妇女还保持着昔日的步行姿态，那种姿态只能形容为"仙女的步伐"。其余的人则和我们一样，步履沉重拖沓，姿态笨拙难看。小时候，我看农村妇女到井上打水，抬起一只手扶住头顶上的水罐。我想模仿她们走路的样子，可从来学不会。

那天晚上，妇女们根本没上床睡觉。跳完舞后，她们冲完澡，又一齐坐到第二天送她们返乡的公共汽车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有的人已泪流满面。

小组成员也没睡，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总结过去的一周，那是成功的一周。一位参加其他培训课程的妇女

也搞了份读物的初稿，她坐到我们身边，对我们说："那些头儿和当老板的真该读读这本读物，好好向我们学习，他们张口闭口教育群众，可真正该接受教育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走近我们。"

其他妇女也来和我们一起坐坐。"人人都知道真正干活儿的是妇女。那些头儿的老婆，还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女性，她们下到村里来，打扮得像时装模特，头发束得整整齐齐，脸上涂了粉，她们向村里的妇女们祝贺一番，就又回到哈拉雷搞政治去了。"

在哈拉雷，一位农技员说提起她在乡下听到的一首关于趾高气昂的来访者的歌曲。自打听过那首歌后，她下乡就一定要住在村里，要不就不去。

乡下妇女也常常嘲讽那些穿着入时，想做"黑皮白芯"的城里姑娘。药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增白霜，增白乳，有些产品甚至会含有在别的国家已禁用的化学成分。

乡下人并不羡慕哈拉雷，那个地名已同一种心态联系起来，或许，就像巴比伦一样。

大家谁都不想离开这个充满活力和昂扬向上的地方。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凯西说，"可在哈拉雷的办公楼里，他们说这些人愚蠢，什么都不懂。然而我花了几个小时才向官员们说清楚的事情她们一下子就全懂了，这里的人思维更敏捷，那些搞政治的女人都是知识分子，满脑子抽象的大道理。"

培训中心的员工关心社会，达观向上，不过在一个地方，

它让我想起曾去过的那所丛林学校。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石棉瓦已经松动了,或不见了。窗帘耷拉了下来,浴室里的挂帘破了,餐桌边缘小片木头已脱落,有些椅子摇摇晃晃,或根本就不能坐人了,因为钉子掉了。所有这些微微给人一种保养不善的感觉。不过,一个去过许多家培训中心的年轻小伙子说:"我总喜欢到这儿,因为这里的设施保养得最好。"真不可思议,在这里,确实只要找个勤快人,给他一瓶胶水、一把锤子、一架梯子、几根针、一把棉花,什么都能搞得定。一天晚上,一处小管漏水漏了几个小时,员工就在漏水的小管旁走来走去。要知道,这里可是缺水地区!

"他们该培训一组年轻妇女来对付小修小补,再派她们到各个机构巡检。"

"为什么那些援助组织不……"

"为什么穆加贝不……?"

回来的路上,在大客车里,我们途经最大的黑人市镇之一。

新市镇

过去,城市周边的黑人市镇就是各种廉价住房的大杂烩,有时单间砖瓦房建成一排,连厕所都没有,也有时就是波纹铁

皮顶的棚屋，跟简易厂房一样。有时，地方政府在郊区建起成百上千幢一模一样的小砖房，通常是单间带厨房，后面有公用厕所。要是有两间屋就算“豪宅”了。现在的郊区完全可称为独立的市镇，建了几千幢小面积砖房，每套有两室、厨房、浴室，还带个檐廊。要建起这样一座市镇，首先要把所有原生树木全部砍伐掉，然后铺设道路系统（通常按照棋盘格局）。最后，在尘土满天、泥泞满地的平地上，一幢幢房屋拔地而起。房屋建得很挤，彼此的间距很小，还是跟白人统治时代一样。新郊区和旧郊区一样，一眼就能看出其根本：建造廉价房屋。津巴布韦并不缺地，不像欧洲寸土寸金，可为什么市镇还要建得如此拥挤？因为这样可以大幅降低服务成本，包括建设各种管线的成本。可这种做法是否有些短视？要是穆加贝从一开始就坚持拿出更多的钱，在市镇规划时在房屋间留下足够的空间以适应某种个人隐私感，那样做是否更好些？现在，人们挂根晾衣绳都要好好找找地方。居民们一搬进新居，就开始在宅前屋后种果树。可要接触到丛林，要触摸他们的传统中的丛林，他们就必须离开市镇，远行到“乡村”。穆加贝为什么不……？他本人不可能同意这种短视的政策，那是当然。

和过去一样，从市镇去到大城市的工作地点要一个小时，下班回来又要一个小时，路上拥挤堵塞，满是自行车、公交车，也有小汽车，不过数量还很少。市镇中的居民大多数买不起小车，有传闻说要建铁路把黑人市镇和大城市连接起来，如今大城市里住的不再仅是白人，而是多种族混居，而廉价的郊区住的依旧是穷苦黑人。

当你驾车驶过这样一个市镇，或乘飞机从它上空飞过，看到许许多多完全相同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如果说还不算刻板划一，你会产生一种印象，那每一个单元代表一个家庭。可实际上，为一个家庭设计的房子可能住了二三十人。如果谁对农村生活已心灰意冷，又有个住在市镇的亲戚，他就可以要求行使旧式的氏族权利，挤进一幢已经差不多要“爆棚”的房子，而那种房子其实都是为现代小家庭设计的，其合理成员只包括父母和两三名子女。这种现代设计根本不适合氏族成员共同居住，过去的传统设计是一群茅屋，如果家里来了亲戚，很容易在旁边加建一间。准确地说，过去很容易，而现在，无论是建房的树木还是铺屋顶的茅草都不够用。

在现代市镇中，氏族聚居已渐渐绝迹，同时消失的还有这种居住方式所产生的需求。

新市镇中的房租也不便宜，实际上过去租房更便宜些，那时还有租房补贴。

两间小房间，一间厨房，一间浴室，能住的人实在有限，可实际上有的房间里住了十个人，甚至更多。某位妇女给一位要求在她家里找个角落的乡下表亲回信，信中说：“我的心够宽，可我的房子太窄。我们家里实在挤不出给你睡觉的地方，除非你睡在厨房餐桌底下。”

小组担心，她们把所有时间都放到了农村，忽视了这些拥挤、贫困、情势复杂的地方，这里的人肯定也需要帮忙。“不过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不需要学习如何开始互相合作，如何开银行账户，或许他们需要学的是如何同官僚打

交道。”

“我们都要学。”

檐廊之上

有传言说，史密斯在美国时有人问他对黑人政府有何感想，史密斯回答说之前他低估了黑人的智慧。

哈拉雷的街头少年，有的拉帮结派，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也有的就是普通少年，他们聚在一起玩各种根据传统故事改编的游戏，也就是那些关于龟、兔和其他动物的故事。游戏保留了原故事的结构和情节，但故事中的角色被叫做 J·R·波比、苏·埃伦、等等。

一位男子参加了一次庆祝仪式，庆祝更多布莱尔式厕所的建成。据他说，即使在偏远地区，这项事业也在腾飞，因为它已被视为身份的标志。“我家有座布莱尔式厕所，可你家没有。”他说：“人类有多少进步都依赖于这种攀比心理？这点值得深思。”

现任司法部长在史密斯当政时代蹲过十年大狱，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他正计划废除死刑，大家说他是个好人，还能想到监狱中的囚徒。“我知道那种滋味，”他理应说过那样的话。监狱中有些不同政见者在团结法案得到通过后的全国大

赦时依旧没有得到释放，因为他们曾犯下暴力罪行。据说，不久后这批犯人也会被释放。津巴布韦监狱中没有政治犯。我问过的每个人都说："情形还好，咱们这儿还不错，我们不必像南非人或赞比亚人那样为自己的国家觉得脸上无光。""牢里吃得怎么样？""我还没见过哪儿的犯人吃得这么饱。"

历史的潮流

"津巴布韦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

"政府的内政部长：良心会要了你的命。"

我们谈论的是那个在解放战争时期管理索尔兹伯里城外的监狱的男人，那么多人在那里遭到拷打、虐待，许多人被吊死。"咱们也不能把什么都怪到典狱长头上，他也是在尽自己的职责。真正该负责的是内政部长。"

不过，幻想某位充满责任感的官员，因为受到良知的谴责而悔恨，这很可能根本就是个错误。

五十年代，伦敦聚集了不少非洲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所有那些人都生活贫困，许多人根本无力回到自己的故乡，就算回去也会被立即投入监狱。他们中的一些在邮局干份差事以养家糊口，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超出工作机遇之上的人来说，邮局的差事始终是一条维持生计的生命线。

还有些人靠好心人的捐助勉强度日，有些家庭为这些人提供一餐饭，也为他们提供与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者会面的地点。

经常去我的住处的人中有一位叫奥顿·齐日瓦的教师，马拉维解放后不久他回到那里，可一回去就被心狠手辣的班达总统投入监狱，一直关到现在还没放出来；一位未来的总统；几位未来的部长；一位不久后死于疟疾的工会领导人；一个人回国参加斗争，被投入英国殖民当局的大狱，解放后被任命为经济事务部长，可后来又被视为国家的威胁而再次被监禁。他在牢中被关了整整七年，大多数时候被单独关押。还有一位年轻英雄，圆圆的脸，甜甜的笑容，浑身透着理想主义。年长者都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常常灵感勃发，脱口而出几句“自由颂”、“正义颂”之类的诗句。

时光飞逝，这位前理想主义诗人和我一起站在一座农舍的厨房里。现在他胖了，浑身闪耀着成功的光芒。现在，他是某个前殖民地的内务部长，一个“成就”都被世人看在眼中的地方。

能与他偶遇我特别高兴。就在上个星期，我还跟那个被关了七年的人聊过，现在他又自由了，在美国大学讲授非洲事务。凑巧的是，其中一年关押他的监狱正好在那位部长的领土上。又是一个难以相信的故事，不过非洲总是充满出人意料之处。

“还记得 M 吗？”我问他。

“我怎么可能忘掉那个好同志。”

"你知道他在监狱待了七年吗?"

"我想,有所耳闻。"

"知道吗,有一年他被关在你手下的一所监狱里。"

"真的吗? 这实在——太意外了。"

"凑巧的是,有几个月时间跟他共住一间囚室的是 L。我提起了又一位当今非洲国家总统的名字。"

"L 总统,对,听说他也被关过。同一间囚室,那时他俩肯定都不错。"

"M 说解放前他蹲过的英国殖民者的监狱同你手下的相比简直就是游乐场,他差点在里面送了命,L 总统也一样。"

我俩相视而立,德文岛的春雨遮暗了窗上的玻璃。此刻,我们距非洲炎热的天空已有万里之遥。

他的目光开始有些闪烁,叹了口气,看了看腕上的表,决定在下一分钟重拾昔日的友情。

"嗨,要是咱们年轻时候就知道生活是如此残酷……"透过时间的迷雾,他回望我们热烈奔放的青春年代。

我还不放过他。"那是你的监狱,你不可能不知道那儿有多糟吧?"

他的目光犀利起来,肯定在想,爱惹麻烦的一辈子都爱惹麻烦,可接下来,他却泪如泉涌。"我常对自己的妻子说,亲爱的,要是我们在斗争之初就知道了现在才知道的东西,就……生活真残酷,生活实在、实在太残酷了。"

"再残酷也残酷不过你的监狱,咱们的老朋友 M,还有 L 总统,差点就死在里面。"

“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们中了咒，不管咱们做什么都与咱们的初衷相背。”

“等一下，你是内务部长吧，是不是？你总该对自己的监狱负责吧！”

“突然有人对你说你要为老朋友挨的苦负责。”

“你为什么不改善监狱的条件？有好几天他俩一口吃的都没有，一条毯子也没有，他俩……”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他的目光透过粉刷得雪白的墙壁，遥望着什么能给他的心灵以抚慰的地方。

“你是内务部长！”

“很高兴，咱俩聊了这些事。有时候，我的下属对我隐瞒不报，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你。”说完，他笑了笑，不过笑容中尽是凄凉。他轻轻摇摇头，张口，不知是哭还是在笑，又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匆匆走出厨房。外面，他那辆体积庞大的车几乎占满了整条乡村小道。

不妨想象，有人问成吉思汗：“杀戮两千万人是什么感觉？”

“那又不是我的错，”他会生气地抗议，“我也不过是根稻草，在历史之潮流中沉浮。”

政 治

1956年，我访问南、北罗得西亚时，大约四万名居住在赞贝西河两岸的汤加人被强行从他们建在河两岸的居住地迁走。那些汤加人根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被赶上卡车，有时在枪口下，运到许多英里外的干旱高地，在那里被卸下来，然后自生自灭。许多人为此送了命。对那个政府来说，那次行动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强行迁移都是为了不久后就竣工的卡里巴大坝。强制迁移事件成了当时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撒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出现于无数次政治演讲中，下面的听众大喊可耻！可耻！有人叹息，也有人痛哭流涕。有人为此而暴动，也有人为此而游行请愿。白人自由主义者也有许多话要说。河谷汤加人所遭受的虐待成为一种标志，代表着当时白人政府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1989年，在培训中心，我对人说，自己即将去造访汤加人，他们说："你不会真想去吧！""他们是原始人。""他们还穿兽皮，睡在火灰里。"我说自己有朋友认识汤加人，他们现在也住茅屋，穿衣服。我得到的回应是："那些衣服肯定都是我们捐的。"

确实，河谷汤加人和我在津巴布韦见过的其他民族一样贫穷。他们大多数身形瘦弱，有些还是侏儒，住的村子也很破落（头人住的村子除外，那里的茅草房建得很精致）。自从汤加人被赶离他们的土地，神庙和祖辈的墓地后，他们的生活就异常艰辛，年复一年，季复一季，为生存而苦斗。既不能打渔，

又失去了一年能三熟的肥沃冲积土地，他们开始试种一些耐旱作物，如粟米、小米，及其他谷类，可成群结对的红嘴利亚雀早已在等着作物成熟。一连几天，女人和孩子们守在地里，敲铁块、铁条、平底锅，可那些雀鸟还是如乌云般落下，遮天蔽日，一下就把地里的庄稼吃个精光，跟蝗虫一样。在电视上，我们看到大群大群的鸟在空中飞翔的画面，引人入胜，那就是红嘴利亚雀。后来，汤加人又种玉米，可又要跟大象斗，玉米是大象爱吃的植物。就在我们造访之前，还有群大象来过，毁了一大片玉米地。

大象毁的地就在宾加镇后的村庄附近。宾加镇在卡里巴水库的另一头，远离建在山上的卡里巴镇。卡里巴镇或许是津巴布韦最富于魅力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你还以为自己到了希腊或西西里的海滩上，蓝蓝的天、蓝蓝的水，中间是色泽浅淡的石山和小岛，更吸引人的是在小镇里就能见到大象、水牛群、各种鸟，还有羚羊……这里的水岸和娱乐为旅游者而存在，他们每年带来至关重要的外汇，带走了照片，野生动物的，卡里巴湖的，还有鳄鱼和河马的。

可鳄鱼会咬坏渔民纤细的渔网，河马会撞翻他们的小船。

宾加镇在迅速扩展，如今这里建了好几公顷小型的两到三居室房屋，也就是所谓的中密度居屋，房屋的四周厚厚的红白相间的尘土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菜园。这里的空气中充斥着驴、山羊、奶牛粪便的味道，矮脚鸡整晚都在打鸣，一刻也不停。正是满月之夜，许多小屋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炊火，比白人喜欢用的厨房和炉具好看多了。宾加镇到处是形形色色的

援助人员，他们都很敬业，也必须如此。在这里有时一连几天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而要到达这里要经过许多英里的烂泥路，只有好车，比如路虎那样的车才能胜任。

电力不久就会输送到宾加镇，巨大的输电线已经架设到位，就等通电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们将不再晚上八点半就上床睡觉，也不会再被烛光搞得双眼酸胀。一座新医院刚刚竣工，不错的医院，美国人的礼物。这是座高科技医院，必须有电力才能按计划发挥效用。电力并未泽及这里的村庄，那座夺去汤加人家园的大坝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大坝蓄起了水，却没有灌溉到它沿岸的土地。卡里巴库区非常庞大，简直像海一样。我会向旅游者推荐卡里巴，这样的景观世上绝无仅有。不过，别去河谷汤加人的村庄，那会让你心碎。

我们和一群汤加渔民一起坐在如塔般高大的大树下，我们屁股下的汤加式木凳要拿到旅游品市场上去可都标价不菲。渔民们向我们说起自己的遭遇，我们一行人中有两人会说他们的语言。他们被安置在远离库区的地方，被迫改种地，可生活很糟，于是一些人又偷偷回到岸边打渔，让饿着肚子的家人糊口。最后，当局不再驱赶他们，允许他们成立一个合作渔社。渔社有四十名成员，四条渔船，只能这么多，不能再有更多的人加入渔社，也不能添置新渔船。一些孩子正在茅草屋前欢快地玩儿，在这里孩子们吃的是鱼，故而健康活泼，不像在远离库区的村子里见过的儿童那样神情麻木。不过，这些孩子本也不应在这儿，学校放假，他们的父亲才把他们带到渔村来，让他们吃点儿好的。渔民自己反倒很少吃鱼，打到的

鱼都换成钱，用来交孩子的学费。和这个国家的所有父母一样，他们下定决心要让子女接受教育，这样孩子们以后才能远离贫穷，进入现代社会。

因为家里人不能到渔村来，所以都是男人在挂得到处都是的渔网前作修补。渔网常常被鳄鱼咬破，网很贵，一旦破了无异于一场悲剧。渔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与鳄鱼和河马的游击战，几英里之外，他们的妻子则要和大象斗智斗力。水下到处都是枯死的树木、水库蓄水后被淹没的森林。这些水下树木对打渔有利，鱼喜欢待在老树干附近，渔民就悄无声息地把小船从一棵树干划到另一棵树干追踪鱼群。可鳄鱼也知道鱼群喜欢待在树干附近，也在附近出没。

这些渔民幽默、明理，谈到自己的贫穷和对官员的漠视时，他们笑声不断。听说访客中有位作家，他们提议把自己的生活描写出来，他们似乎觉得，要是官员们真正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心肠就不会那么硬了。渔民们边笑边说自己不能把船划到对岸，去看那边的亲戚，因为那边已是赞比亚。“那边的警察会用枪和我们说话。”“护照可不是穷人的玩意儿。”“我只不过划上半英里，去我的家人住的村子，干吗还要护照？”一位渔民说，他喜欢看穆加贝总统和卡翁达总统如兄弟般抱在一起的照片，虽然现在不能去赞比亚看家里人了，可看到那张照片心里好受多了。

这些渔民是强制迁移后的第二和第三代，当我问起汤加人现在是否还说自己的过去，他们回答说老人还说，可年轻一代都不信他们那些故事。

"过去我们住在水边,那是条大河,那是赞贝西河。我们打渔,我们狩猎,在肥沃的土地上我们一年收三熟。现在,我们一年只能收一熟,也不让狩猎了——谁要再狩猎就要坐牢,连鱼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打了。"

过去我们住在伊甸园中,自然如此宽厚,我们根本无需穿衣,果子自己从树上掉下来。可后来来了个天使,手中拿着喷火的剑……

我们又去了那家漂亮的医院,医院的建筑有点西班牙风味,围墙高大,带有曲线,红砖间嵌有镂花砖窗,非常适合这里的气候。医院的设计师也是位津巴布韦人,曾经。我们和一位绍纳年轻女性一起坐在屋里,她负责这一地区的卫生健康。她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凭她的资格,到哪儿都能找到份工作,可她选择了这里,选择了汤加人。

这令她相当与众不同,一般说来要说服护士和教师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医院定额三十六名护士,可实际仅有十八名。医生也往往为前途悲哀,之后就酒越喝越多,要替换也不容易找到人手。"肯来的几乎肯定是海外志愿者,他们不怕条件有多艰苦,总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天知道没了他们偏远地区的医院学校会怎么样。""不过,"她也说,"海外志愿者过上三四年苦日子,之后就又回到文明世界之中。因此,有些人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第一次过上好日子,要他们放弃那一切,再到丛林中吃苦受累,确实很难。""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吃上一两年苦,再过过好日子呢?""你可别忘了,一旦你落了趟,就很难再赶上去了。"

这位年轻的黑人护士显然觉得自己该去干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陪我们坐着聊天。不过，她很有礼貌，满脸笑容。“我接治过自从怀孕就营养不良的妇女，在津巴布韦任何别的地方你都不会见到那样的病人。你还以为她是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姑娘，后来才知道她已是五六个孩子的母亲。缺乏营养导致身体长不高。这里分娩是个大问题，90%有血吸虫病，有些人还有麻风病，差不多一半的婴幼儿死于疟疾。上个雨季以来，疟疾越发肆虐了。对了，还有艾滋病，我知道你肯定会问。”她微微一笑，接着说：“我们也了解一些艾滋病的情况，不过那还不是最糟的。我这么说是不是让你感到吃惊？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说，蚊子传染疟疾，蚊子看得见，摸得着。可要解释像艾滋病这种复杂疾病，你该怎么说？是不是说：有种很小，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叫病毒，它们会改变自己的形状，变成一种稍大一点，可依旧非常小的东西，那种东西活在体内，会杀死……最后，记住，从感染到最后发病身亡可能要八年的时间。不管我们说什么，这里的人也不会信。这里有整架整架的安全套，可根本没人用。不错，一直有人死于艾滋病，可我们不说那是艾滋病，艾滋病毒检测也不是常规项目，因为那被人视为侵犯了人权。”她大声笑了笑，可笑声中充满了愤怒，我觉得，那是一种没有确切目标的愤怒，一种我们大家都能感到的愤怒：那些人怎么会这么蠢？“有人说，在津巴布韦其他地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已经开始奏效，可这里……”

不一会，她说自己要走了，不走不行，要干的活儿永远没

完没了。

有人告诉我们，这位年轻女性和她的一位男同事一直在广阔的区域内巡诊，宣传卫生常识，传授医药知识，所有那一切都安排在他们不在这里治疗和授课的时间内。“他们从来不知疲倦。看到他们，我就看到了津巴布韦的前途和希望。”

这座医院的门诊部建在一片树荫下，是一排类似于棚屋的建筑，病人可以睡在里面，不过大多数病人还是喜欢待在露天。妇女们从邻近的村子来到这里，等待分娩，或接受治疗，无一例外，她们都身材矮小，神情麻木。我不由把她们同在训练中心遇到的活泼奔放的女性相比，心中一阵阵隐隐作痛。她们这一辈子中吃过满满一碟玉米粥、肉和蔬菜吗？

一棵大树边，一位年轻妇女就坐在土地上，身边还坐着一个一声不响的孩子，那位妇女正在编篮子。汤加竹篮是世界上最精美的篮子，从她那瘦削、沾满泥土的手指间，竹篮渐渐成形，有了生命。她的脑袋看上去更像个孩子的脑袋，也沾满了泥土，可里面装满了各种精巧的图案，在她的手指上成形。这里的竹篮很出名，每只能以二至三，甚至四津元的价格卖到这里来收货的人的手中。当它转售到地方上的商店中时，每只又能增值一至两津元。最后，当它们出现在大城市旅游商品商店的货架上时，价格已翻了几番。汤加木凳也非常出名，我们也采访了位制作木凳的汤加工匠。他蹲在土地上，旁边生着火，火头里面工具被烧得通红。树下躺着一块块木头，等着在他手中脱胎换骨。有时，新做出的木凳要放到火上烤一烤，给它一种饱经沧桑的模样，更对旅游者的口味。这位工匠每只

要价五至七津元，做一只木凳要两天的功夫，他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工资线。在哈拉雷的国立艺术品展览馆，我见过完全一模一样的木凳，可那里的售价是每只一百至一百二十津元。

汤加人的艺术精妙绝伦，对此从无异议。这里出的竹篮和木凳会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看到的人无不会由衷赞叹，多美的木凳！多美的竹篮！

在那里，我住在两位年轻美国教师的家中，那两位教师也买了些东西，准备当作礼物带回美国中西部。两位教师都是教徒，工作非常勤奋。这里别的教师就算不是教徒，可工作起来一样勤奋。

一位来自芝加哥附近的志愿教师为这里的情况而震惊，上数学课时，学生们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他们坐在下面，好像什么都懂了，可一检查才发现他们一个字都没懂。”全班四十个学生中，据她估计，有八个有机会通过O级考试，不过前提是要好好调教一番。现在是假期，但她坚持每天开车驶过坑洼不平的道路，到学校给那八个学生补课。那八个学生都来自邻近的村子，有的到学校要走好几英里。她和这八名学生一坐就是几小时，把相同的问题复习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这个做教师的女孩，向我提起过另外一件事。有一次，她在哈拉雷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要去官僚机构办事，排这么长时间的队是司空见惯。一位年轻的黑人女职员捉住办事人的手指摁指印，根本不抬头看手指的主人。当一只白人的手指伸到她眼前时，她终于抬起了头，然后用尖利的声音问：“洗过手没有？”“没有。”“洗过手再来。”

昔日，白人也曾武断、无礼地对待黑人，那位教师的遭遇是昔日黑人遭遇的翻版。

也不是说所有的海外志愿者或援助工作者都大有作为。当我遇上这位同村民一起在地里劳动的英国青年时，我正在村里。这位青年说他明天就要走了，感到很悲哀。“到这儿来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抉择，在这里我学到了一切。这儿的人民实在了不起。”

我问了问旁边的农技员，正是他把这个年轻人引见给我的，农技员身边站了几位当地村民。农技员说：“他们派来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原本是来教我们的，可到头来反倒是我们在教他们。他们刚来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礼貌，言行粗鲁，他们在学校里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个小伙子后来崩溃了。有时候他们酗酒，因为他们实在太孤单了，他们感到很难和我们交朋友。”

这个年轻人借宿在一位妇女家中，和她的儿子住一屋。那位妇女也在场，她说：“其实他心不坏，他也想和大家相处好。”

农技员说：“这些年轻人有钱拿，是来教我们的，我们教他们可没钱拿。”

女房东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健康的光泽。突然，她好像变了个人，模仿起年轻人过去的样子，头扬起来，下巴也翘起来，眼睛从在场的所有人的身上一一扫过，目光中既有傲慢，又有歉意。模仿完年轻人，女房东又做回自己，哈哈大笑，所有人都跟她一起笑起来。

或许是爱（上）

在津巴布韦的偏远地区，一座尘土满天的小村边上一幢小小的屋子里，住着两位美国来的志愿教师。小屋旁边不远就是建在一大片空地中间的学校。两位教师都是年轻女性，来自美国中西部同一座大城市的富裕家庭，都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一天晚上，晚饭过后，两人并排坐在收拾好餐具的饭桌前，在烛光下批改作业。门外传来敲门声，两人打开门，走进一位老人和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当地一位头人和他的两名随侍。“真是的，”两个姑娘想，“都八点半了，就要上床睡觉了，明早五点半还要爬起来。”桌上的蜡烛已烧成一堆烛油，烛火摇曳不定，两位姑娘赶紧又点上一根……

两个姑娘认识这位老人，老人有两个孩子是她俩的学生。

“我来是为了件很重要的事，”老人说。

两个姑娘交换了个眼色：老人肯定是来找旺达的，老人有个女儿是旺达的学生，经常找她的麻烦。

另一位姑娘知趣地退到厨房里，站着在烛光下继续批改作业。

旺达微微一笑，鼓励老人把话说出来。

“请做我的第二任妻子，”老人说。

“什么？”

“我爱你，请做我的妻子，”老人坚持说。

终于，旺达说出话来："你觉得我们能相处好吗？"

"能，我爱你。"

"可你的第一个妻子要不高兴了，她会嫉妒。"

"这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嫉妒。"

是吗？隔壁那姑娘也在听，几乎能听到她在想什么。屋子这么小，屋中说的每句话都出不了屋里所有人的耳朵，这也让旺达更加紧张。

"可你比我父亲岁数还大。"

"这没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年龄并不重要。"

旺达站在那里，手中还拿着瓶没打开的啤酒，望着老人。突然，她脑中灵光一现。"可我父母不会同意，他们不会让我住在离他们那么远的地方。绝对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这番话的时候，旺达知道自己有救了。

"那样的话，"老人说，"我也无话可说了。"

啤酒打开了，两个年轻人也被请坐了下来，两个姑娘和客人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同意，打这以后大家就是好朋友了。

或许是爱(下)

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两个姑娘，晚上差不多的时间，窗

外一阵喧闹声。两人揭开窗帘一角,窗外一个她俩工作中认识的年轻人,一位社区工作者,正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看来喝醉了。“旺达,”他扯着嗓子嚎叫,“旺达。”

“不准出去,”她的朋友警告她说。看着同室友投来的嘲讽的目光,旺达申辩道:“我可什么也没说过。”

这个叫旺达的姑娘确实挺漂亮,可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她的同屋也挺漂亮,也有不少追求者。

旺达是个好心肠的姑娘:再不去扶把,那个年轻人就要摔到地上了。

“好了,”她机智地说,“该回去睡觉了。”

“旺达,”他边拥抱她,边大声说:“今天糟透了,我刚刚帮忙重新安葬了六位牺牲在这个村的战友。我爱你,我想有个白人女朋友。”

她把他推开,说:“可我不想找个黑人男朋友,跨种族婚姻非常困难,再说,我在国内有男朋友。”

“对,对,你要考虑那些,可我爱你。”

她用严厉的语调说:“你这人光顾自己,你得学会考虑别人的观点。”说完,她回到屋里。

第二天,两人在超市又碰头了。那是家小型超市,你很可能会错把它当成乡村商店。在这种地方要碰上不想遇见的人,想躲也躲不开。

他说:“他们说昨天我对你很没礼貌。”

“确实。”

“十分抱歉,今天早上我也很不好受。”

"我接受你的道歉。"

在津巴布韦全境，前自由战士被派回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回忆牺牲的战友草草下葬的地点，有些战死的自由战士根本没有埋葬。找到的尸骨在举行适当的仪式后重新正式下葬。有人相信，津巴布韦的乡下还到处飘荡着不满、怨恨、有仇要报的鬼魂，津巴布韦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它们造成的。

白人农场主和图书小组

我们回到上次那个大唱泥土赞歌的农场主的农场上，眼前，一队队季节工正在种植烟草。现在种植可大异于昔日望天收的年代，一切都要看雨水。现在用上了滴灌水管和长距离喷口，种植可以提前几个星期，"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水，"农场主大声说，他指的是新修的水坝。雨季降水充沛，大坝已蓄满水，开始灌溉四周的农田。农场主脾气有点躁，因为他面临的冲突：他热爱真正的泥土，却要与眼前这种泥土打交道，硬得像砖粉，浸透了各种化肥和农药。在这种土地上可不大可能看到农场主弯下腰抓起一把泥土，放在眼前……赞叹，那一幕，简直是膜拜。他指了指河对岸，说："瞧那片农场，那儿的主人可不会三更半夜还睡不着，躺在床上感叹自然。那是座高科技农场，什么都有……这么跟你说吧，在这片地区，以

色列人那套玩意儿也没什么领先的地方。当然，那是白人农场，老非对这一套可没多大兴趣，说不定是好事。我宁愿相信他们永远对高科技农业没兴趣。”

同上次相比，他火气有点儿大，情绪有点儿低，因为他同农场上的工人闹了点儿“矛盾”。

他说，都是他的错，是他自找的。农场上的女零工一向都背着孩子坐在工棚的地板上捆扎烟草，一干就是八小时。上一季，他突然觉得那一幕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他办了个日托所，还请了两位受过培训的护士，这样妇女们就不必身背重负干活儿了。可没成想没一个妇女愿意把孩子送到日托所，说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交到陌生女人手中，要提防巫术。“巫术！太没道理可讲了！今年我又试了试，可那些妇女听都不要听，好像对我心有怨言，可又不肯说为什么。我就知道，在她们眼中我是个恶棍。”

我向图书小组问起这件事，西尔维娅和塔伦特都想当然地认为那个白人农场主之所以要办个日托所，目的就是提高女工的工作效率。我说并不是这样，他看到那些女工身背重负干活于心不忍，可她俩根本不愿意接受我的观点。“你们意识到了吗，你们一上来就把事情想得最糟，根本就是因为他是个白人，你们是不是不愿意承认白人也有人的情感？”我的反驳根本没用，无论我怎样坚持，她俩总是说（仿佛得到证明的是那个农场主的动机不良，而非缺乏理解）：“不管怎么说，他的起点太高了。他应该先在农场的村里调查一番，找出所有妇女都信任的女性。当然，那也不容易，妇女们彼此间缺乏信

任，因为她们来自不同部族。”“那么，”我问道，“要是换一种处理方法，你们觉得会让她们接受日托所吗？”这个问题引起长时间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可能不会。巫术话题令凯西不开心，她希望大家都同意它的严重性被夸大了。可西尔维娅、塔伦特和克里斯都坚持巫术确实是个严重问题，就算对它视而不见它也不会自己得到解决。

带着图书小组的评论，我又回到那个农场主那里。

“不知道多少次，由于无知，咱们好心办了坏事，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先到村里找个妇女，再把办日托所的事儿交给她。我怎么可能想到巫术这档子事儿？咱们做得不对的时候，她们干嘛不告诉咱们？”

白人农场主是恶棍——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子。确实，他们中的一些人算不上世界上最亲切的人，可剩下的呢？那些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呢？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我想到阿兰·派顿的话：“恐怕他们转向爱心之时，也就是我们转向仇恨之时。”我还记得同我的一个黑人朋友间的一场争论，那位朋友想在自己心目中留住白人农场主的形象——冷酷无情的野蛮人。在我的步步紧逼之下，他一退再退，最后叫了出来：“他们不像我们这样爱自己的故乡。”可从一开始，如果这些白人身上只有一点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的这番话让那个朋友难以接受。我想到了普罗斯特笔下的公爵夫人，当面对不顺心的事实时，就会大喊：“至少别跟我说。”在政治情感中，某个看不见的平衡点被打破，可人们不想知道。

黑人口中的白人一成不变，始终如一，死守着自己的特权，不管那是什么样的特权。不错，有些白人“飞了”，可那些留下来的……可实际上，这样一个同质、稳固的白人少数群体从来就不存在。自从1890年白人占领这里以来，总共有六十万白人在这片土地上逗留过。在白人特权的最高峰时期，也就是史密斯政府统治时期，这里有二十五万白人。我那时候，这里有十至十五万白人。在这里的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永久居民，大多是农场主、公务员、政客、商人。其余的来了又走，有的因为憎恶这里的白人压迫，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也有的因为经济破产。直到现在，依旧没几个黑人愿意承认白人中也有穷人：过去，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鸿沟太宽、太深了；所有白人都是富翁。1930年，英国青年因为萧条和失业来到罗得西亚，在这里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还常常找不到，于是又回到本土——那是说，如果能让亲戚给自己汇来路费。他们又回到失业大军中，酗酒，可就这样在黑人眼中他们依旧是富翁。一个天主教机构的非神职人员向我说起过她去爱尔兰的经历。在那里，她吃惊地发现，那里的人和我们这里一样穷。可就这样，他们仍在为使国和教会捐钱。“那你觉得他们的钱打哪儿来？”她欢快地回答：“我原以为白人都是富翁，可那一刻，看那些穷人把一枚枚硬币放到我们手中，我实在有点儿惭愧。”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黑人女孩，聪明伶俐，抱负远大，父母以她为荣。她通过了一层层考试，最后获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自到达美国之后，她收到的每封可称的上信的邮件都在向她要钱、要衣服，要各种东西，还有书。写信的不仅有她的家人、族人，还有同村的，甚至邻村的。她已经在自己村办了间图书室，捐了不少书，有些书直接从美国寄去。那可谓代价高昂，美国的邮费并不便宜，津巴布韦海关对每个包裹的收费可谓随心所欲。她向各种基金会求书，因为她自己的津贴实在不够额外开销了。各种要求还在随一封封邮件到来，她使尽浑身解术去满足这些要求，日子过得比大多数学生都寒酸，吃不好，穿不暖，因为她要寄东西回国。最后给逼急了，她在一家当地报纸上登了则启示，为自己的村子征求捐赠。一位在华盛顿的津巴布韦代表警告她说，她这是在往国家脸上摸黑。她要是敢再这么做，就取消她的奖学金。

因为生活拮据，她也很难有普通学生的社交生活，她感到很孤独。在家的时候，她跟一个妹妹很亲近，于是费了老大的劲攒足了机票钱让那个妹妹来看她。那姑娘一到，看了看狭窄的公寓，又看了看简单的饮食，还有她身上朴素的穿着，就开始指责自己的姐姐在骗自己。“你把我们都骗了。”她原以为会看到什么？显然，就是她在《达拉斯》、《浮华世家》和《王朝》中所见到的，那才是美国人的生活。她仅仅待了三天，就

坚持要回津巴布韦的村子。那个可怜的学生沮丧到了极点,整整过了一年才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她已下了决心,再也不回津巴布韦了,她根本没法满足那么多要求。或许,她是否该去做修女?

还是那个女孩,有次过感恩节受一位老师之邀到他家去吃饭。吃饭前,大家要她念祷词,她祷告道:"上帝,请宽恕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够我们全村人吃一星期了。"同桌的其他客人中有些听了很不高兴,常常把这件事当做缺乏礼貌和感恩的例子说给别人听。

我把这件事讲给一位耶稣会的神父听,神父听完后一言不发,好一会儿才说话:"过不了多久那些村民就会说,宽恕我们吧,主!都是我们的无知……"

可问题在于,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为什么还存在着这种无知?

答案只能是黑人将他们对白人的看法、观念都推入某个神话传说的疆域,一个一切伸手就有,用不着干活出力的疆域。

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那座能俯瞰群山、河流、湖泊的檐廊上,一个黑人年轻人走出树林,小心谨慎地向我走来,面带笑容,在我身边坐下。我叫佣人给他端上茶。他的名字叫奈维尔(永不)·哈拉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出生时所耗时间太长。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听到我的问题,他大吃一惊,不过还是回答:尤恩加纳。他上过几年学,手上有一张O级证书,现在是名季节工。他英语说得很好,人也聪明,说自己准备申请做警察,不过资格还不够。既

然不够,又何必申请?我读出了他脸上的表情:说不定,谁知道呢。我问他,要是能够让你满足内心的愿望,你想做什么?在英国,你要是问谁这种问题,对方只会尴尬地向你嘿嘿一笑。可在非洲,不存在禁忌的负担,这种问题立刻就会打开一扇门,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扇通向幻想的门。他的神色灿烂起来,觉得我手中有支魔棒,能立刻实现他的愿望。他想做名农场主。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向重新安置计划申请土地?他的脑袋立时因失望而耷拉了下来。他的意思是,他想和白人农场主一样过上檐廊上的生活。他从失望中回过神来,至少也回过了一点儿,又问起买一座这样的农场要多少钱?许多许多钱。我俩四目相视,小心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对对方的评判,我想证实对面这个青年是否觉得自己也能经营这样一座农场,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经验,更别说资金了,还要随时准备应付贷款、透支这样的问题。我的心目中闪过一系列这一地区的农场主,他们许多人都有经营农场的家庭背景——父亲、兄弟或某个亲戚在英国某个县经营农场,也有自己的资金来源。眼前这个一脸灿烂希望的年轻人能看到那些农场主背后的一切吗?他看不到。他只是想过上他们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他得到过许诺,或者说以为自己得到过许诺,在丛林战争年代。他又如何看待自己?仅仅是一个得到过许诺的人。真要让他成为这里的主人,会怎么样?当然,像白人农场主一样生活,可在他心底,另一个声音告诉他,农场上立马就会挤满八杆子都打不到的亲戚,他无论如何也过不上檐廊上的生活。不过没关系,他在做梦……自打他走出树林,坐到我身边那刻

起，农场的正主儿就被赶走了，他也走进了自己的梦乡。这会儿，他正享受自己的梦，喝着茶，听身边一个老女人说“你有什么愿望”，尽管她并不能让自己的美梦成真。

要是我说，奈维尔，我手上正好有座农场的所有权，那座农场比这座还好，拿去，他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白人都是富翁，有的心肠也不错，心情好的时候，白人会突然心血来潮，把农场赠给自己的年轻朋友。

1956 年我访问这里的时候，读过一些黑人作家(那时所有黑人作家都是男性)的小说，所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幕：白人雇主把小说中的黑人主人公请到家中，对他说：“睡这张大床吧！吃这些好吃的！穿这些漂亮的衣服。”打那以后，那位黑人主人公就成了奥利弗·特威斯特①，倍受别人的关照，最后变得有钱有势，不过具体转变过程并没有描述。一个微不足道的穷小子转瞬间变成某个白人恩主的儿子，或教子。

奈维尔·哈拉雷离开前，我问他，有没有想起过丛林战争中战死的战士？我没说出口，不过我的意思是他们为了你们的自由而牺牲。他笑了笑，以示礼貌，不过笑容有些紧张。他实在搞不清为什么我有此一问，不过为了讨我开心，他说自己热爱他们。接着，又说：“其实我一个同志都不认识，那时我还在上学。”

---

① 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译注

战　士

两位经历过丛林战争的老兵在聊天，言语尖刻，又处处透着对往日的留恋。

“某某将军前两天说……”

“将军？现在谁都是将军。”

“我是说真正的将军，跟我们一起打过仗的。”

“知道了。”

“将军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尊重咱们？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有一代人都记不起我们的战争了。他又说，是咱们为他们打下了津巴布韦。我又说，咱们丛林战士已经成为历史了。他又说，放屁，我要名垂青史。于是我说，我们会被写进历史，可这些孩子们会读吗？”

有位牧师整个丛林战争期间都在远离索尔兹伯里的地方传教，据他说：“保安部队向另一个方向搜索时，小伙子们就会来串串门儿。他们想过一晚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又喝酒，又跳舞，有点像开晚会。他们还教我跳摇摆舞，想看看我跳吗？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是孩子，才十六七岁。”

还有一个轮流交替同自由战士和政府军打交道，因而也常能见到自由战士的人说：“战争之所以会结束，并不是因为

丛林小子们作战英勇。他们其实毫无士气可言,天天晚上喝到烂醉,因为他们的日子实在太苦了。战争能结束是因为经济原因,因为禁运,也因为人人都受够了。”

一位前自由战士说:“他们利用了我们,我们为他们打仗,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可突然间那一切没人信了。”

有一本书名叫《白皮肤的人,黑皮肤的战争》的书刚刚出版,作者是一位白人参战人员。读那本书就像读美国越战老兵的回忆录,满纸都是作者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恐怖。那时候,作者全心支持白人一方,可现在他彻底转变了。当年他崇敬的现在他憎恶,所有罪恶都被推到白人一方,黑人一方则洁白无瑕。这种心理转向其实也并非罕见,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对白人的鞭挞。书中出现的每个白人都是傲慢的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心怀恶毒。我也知道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这样的白人存在,不过这趟旅途中还一个都没遇上。过去像那样的白人现在已变成良好公民,想想看,这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再过六年或十年,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解放战争时期自由战士会请教巫师,请教该如何打好战役。这是历史书中的事实吗?它出现在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在中学里,当做历史教给学生们的又是什么?除非他们走运摊上了个好老师,他们学到的就只有政治口号和神话。不过,你要是跟亲身经历过战斗的战士们聊聊,他们会

证实巫师的存在。

我同一位史密斯军队的前战斗人员聊起这些，他说："我们也请教巫师，或许那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一次晚会上，出席的贵宾中有位女性"头儿"。虽然许多女性都曾同男性在丛林中并肩作战，能当上"头儿"的寥寥可数。她们有些后来发展得好，也有的发展得不怎么样，跟男性一样。晚会上的客人彼此间都很熟。早在那位女性"头儿"当上"头儿"之前，她同晚会上的许多人已经是朋友。

有人说她其实不想当"头儿"，可穆加贝同志说："这是命令。"他喜欢她，因为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像那些围在他们身边溜须拍马的人。

晚饭间，晚饭后，她一直在说个不停。大家分散坐开，喝着咖啡和津巴布韦国产葡萄酒。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如今她说话也小心了……"不过现在没这个必要，因为身边都是老朋友。

她在谈论丛林中的营地，刚到那里时，她还是个小姑娘。随着战争一年年打下去，她也成为一位年轻妇女，她的全部成长岁月都是在游击队中度过的。她的工作是给那些因战争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孩子们做老师，她的学生也包括那些逃避战争中农村的残酷环境而逃到丛林中来的青年男女，战争结束后他们还是要面对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坐在树下上课，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袭击，正常生活显得多么遥不可及。

有时她一说就好几分钟，像在背诵那场战争的官方历史，

话语中许多官方认可的用语，比如说反帝国主义战争、人民武装，可其中也夹带了一些其他词。不久，权威说法让位于她自己的看法和用语，她开始回忆了……

某些被展现为完美的官方形象，带着雕塑的完美感……某某著名战士，现在被视为革命之父、最优秀的战士，对政治一窍不通——他鄙视政治。有个人总是醉醺醺……还有个对女战士总是很坏，搞到女战士们一看到他就躲起来，等他走过去才敢出来。有一次他又向一位女指挥官要姑娘陪他睡觉，那位女指挥官回答说："我要为姑娘们负责，她们到这儿来是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你做婊子。"她又谈起营地中模仿伟大的共产主义典范而组织的审判，那些审判在密林中、荒野中举行，有人被吊死，有人被枪杀，因为他们被宣布是叛徒。可实际上，一切不过是权力斗争。"都是为了权，"她一再说，表情痛苦，却又停不下来。那么多战友，那么多好同志被杀，就因为被怀疑有野心。

第二天，大家又谈起了前一晚上的事情，大家都觉得那实在是个奇异的晚会。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她为什么还要说个不停，就像动物把自己的旧伤口舔了又舔。

一些大家原本没有留意的细节再次暴露出来……比如说，她曾分到过一条裤子，因为炸弹的气浪把她原来的衣裤全给冲烂了。都这么多年了，她就是不忍心把当年穿过的那条绿军裤扔掉。

那一整晚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老战士的独白。那个年代在她的记忆中那么清晰，每分钟都那么强烈，没有什么比那更真

实了。当时我怎么就没能看出来呢？我简直就是伴着这种独白长大的，爸爸一直说啊，说啊，说他的战争。突然，一个念头闯进我的大脑，怎么过去就没想到呢？政府机构中的男男女女，那些“头儿”，哭的，笑的，都来自那片营地，来自那场丛林战争。那场战争，还有对那场战争的回忆把他们凝为一体。他们会坐在一起，相互问，还记得吗？其实根本不用问，他们都知道那一切都永远铭刻于心，不可能忘怀。即便他们在谈别的事情，最后还是会转回到那场战争之上，受过强烈的情感冲击的人总是如此。对这些人而言，往后的一切再也不可能比他们经受过的更强烈了。那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才刚刚二十。

那一晚，一幅大幕被揭开一角，我们看到了一位老战士的孤独。她的战争已成为过去，现在的世界上到处是年轻人和后来者，不想听她的故事的年轻人和后来者。

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未来。官方历史、各种权威说法被当成事实给出来，被当成官方仪式的一部分，在学校中教授给下一代。整整一代年轻人学着它们长大，把它们视为津巴布韦的神圣基石。可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见过战争的真实面貌的人，如今不过二三十岁，过不了多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写回忆录和自传。那时，战争的真相会暴露出来，于是会出现两种版本：官方版本和真实版本。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这种事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然而，人们依旧会坚持权威版本，以至于要有哪个描写战争的小说家含蓄地暗示同志们并非那么完美无瑕，批评家立刻会群起而攻之。实

际上，现在已经有两种历史：官方历史和口头历史。那些“头儿们”不那么光彩的一面终将曝于世人眼前，这不可避免。

教 育

我接受了一位聪明又年轻的女性的采访，津巴布韦大学制造。她是她那一级中最优秀的毕业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向许多人提起过她。大家的评论增加了以下几点：现在，她不会有良好的发展，原因是：首先，她是白人；其次，她不讲政治；最后，她是女性。三点中任何一点单独并不算什么，可把三点加起来，那就意味着她不会有前途。千万别以为津巴布韦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老顽固只存在于斯大林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听说过这种奇事吗？白人政客居然和黑人种族主义者站在一起，他们憎恶、迫害自己的同类，与此同时还大倒苦水，谴责种族主义。

过去的看法不会被轻易丢弃，已经有整整一代学习文学和历史的年轻人脑子里塞满了斯大林主义。一位历史学家，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历史之父，在大学上课时说自己在解释史实方面犯了点小错误，可学生们根本不愿听这种话。“我们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些。”“可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学的是错的。我写了那本历史书，可我发现其中有部分是错的。”可这根本

没有用处，学生们学过的才是真正的历史。

一位朋友访问了一所历史课程还同二三十年前没有分毫变化的美国大学，说他访问过程中一直想到《父与子》中的一章。那一章中，巴扎罗夫带朋友去看望两位老人。那两位老人就是历史和启蒙的化身，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却一点儿也没有变，还生活在昔日正义与胜利的梦想中。

一部戏剧/电影的剧本提纲

《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

有朝一日，这个年轻人将领导一场民族运动/一支游击队/一个国家，无论流放中或在狱中，都代表着人民。可从一开始，他身上就毫无大众领袖的风范。他羞涩，有点像学者，总是在观察周围的一切。具有那种领袖风范的是另一个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中，他的声望最高。只要他一讲演，人群立刻为之疯狂，他站在人群面前，双臂张开，仿佛要拥抱所有人，人群则齐声欢呼，万岁。大家都预计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可他颠倒大众的能力毁了他：他喜欢受人景仰的感觉，还在私下里度量自己在白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他同意同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了个“出卖者”，甚至是叛徒。不管怎么说，那个面带羞涩，满身学者气的年轻人接替了他的位子，并

证明自己才是既有高明手段又坚忍不拔的谈判者/党和军队的领袖。（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导者都曾扮演过上述一个或多个角色，而缺乏奇里斯马魅力的二把手夺了一把手的权这种事也发生过不止一次。）

随着历史之风的转向，他领导的党赢得了选举/丛林战争/国家独立，他也立即成为可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人选。事后诸葛亮们总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历史。他要和各方打交道，前殖民势力、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还有飞往世界各地同各国领袖会见，可做个大众领袖对他来说一直不容易。他缺乏那种口若悬河的才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从来不能令群众为自己倾倒。他观察自己身边的同事，他们中有些人轻而易举就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所有人仿佛把心都捧在手上，闪闪发亮，就像他们别在胸前的徽章。只要他们登高一呼，他们就被一种信任的气氛层层包围起来，人群仿佛在喃喃低语：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他也渴望人民的爱，私下里，就像个腼腆的恋爱者。对公众演讲时，有时他会口吃，也有时会因为控制过度而显得学究气，那时他的泪水会夺眶而出。

这个深陷入羞涩之中与外界隔绝的男人变得骄傲、严峻，甚至冷酷。有些人称他为圣人，他的表里如一无人不知。他生活简朴，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有多简朴。他身边一些人开始拼命敛财，他常常制止他们的过分行为。

他的第一任爱人/妻子已去世了，也可能他觉得她那种朴素的乡村作风对自己不利，他又遇上一个女人，对她一见钟情。这个女人身上有他所没有的一切：高大的身材、奔放的情

感、美丽的容貌。她说话大嗓门,笑起来很爽朗,性格外向,她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或许,安排她来自非洲其他地区或其他部族会更有意思,更增加她对他的吸引力,不过欣赏水平不高的一般观众会把她看成外来人。)这个男人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犹如活在牢中,可这个女人的出现释放了他。突然间,一切过去令他感到棘手的事都简单起来。当他俩晚上和朋友们在一起时(这时每晚都有聚会),她同晚会上的人交流,不仅用口,而是用她的全部身体,没有人能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当她站立于高台之上时(随着她一步步接过第一夫人的角色与权利,这样的场合也越来越多),她征服了台下的每一个人,不仅用她浑厚的声音、美丽的面孔,也用她庄严耸立的双腿与乳房。他看着她,欣赏她,充满爱意,却已隐隐不安。她是怎么做到的?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分?怎么自己就生来与之无缘?他同她开玩笑说(用她特有的方式,这种玩笑要是不加以注意也会很危险),她可不是选出来的,做好他的妻子,做好国家的第一夫人也就够了,千万不能越界。

"废话,"她大声嚷嚷。她的话伤了他的心,他就像手指轻轻一碰就闭合的含羞草叶一样,关上了自己的心门。看到他这样,她把他紧紧抱在怀中,他又感到生命的暖流在体内流淌起来。

"废话"是他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当他说他俩的生活必须简朴时;当她从某个夫人会议上回来,告诉他自己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个户头,他却说不行,浪费人民的钱是不诚实的行为时;当她有机会把手伸进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随着国家的发

展,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他向她提出警告时,他始终以自己的诚实为荣,全非洲、全世界都知道他的这项美德,可让他引以为荣的东西在她身上却连一个细胞也没有。当他说我们必须树个好榜样,必须遏制国家的腐败时,她实在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行?腐败?大家不都在这么干吗?"有时她还会逗弄他,说他即便在个人生活中也有些放不开,缩手缩脚。"你脑子里这些念头从哪来的?谁说不行?有法律说不行吗?"

确实有法律,还是他亲自颁发实施的,规定部长和公务人员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数额,比如说,每人只能有一处房产。

可那些人从没把那条法律放在眼里。国民们等着他实施法律,他们会支持他,他们是他的人民,是他们把他送上权力的宝座,他们信任他,相信他会同自己站在一边,会捍卫革命的纯洁性/党/独立战争,可他什么都没做。国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第一夫人手上的腥味有多大。他们冷眼旁观那些部长们,知道他们都能干出什么。

领袖也在观察自己的妻子,他爱她,需要她,只有她才能令自己维持同外界的接触,而这是多么重要。于是,她把自己变成了个大富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丑闻乍现,再不处理几个说不过去了,那几个公务官员都被判有罪。全国都睁大眼睛看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时又有流言悄悄传开:他不能实施正义,那几个罪人说了,要是自己受了罚,就会把他妻子给抖出来。更让他伤心的是她从来就不知道她给自己的伤害有多大,还总是说自己太爱挑剔,就因为自己腼腆内向的

个性。

现在，突然之间，他狠下了心，冲她咆哮，就像个感到所有一切正从自己手指间流走却又无计可施的男人一样大喊大叫。他所选择作为同盟的政权正在一个接一个崩溃，而现在，这个女人，这自然造化的尤物，他生命中的一切，也不得不制止她了……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中，赌气不说话，用一千种方式显示自己受了伤，他也越来越合上自己的心门。他冲她大吼，命令她服从，因为自己的权威，这时他也感到断绝了同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一切联系，而她则觉得自己生活的向前的脚步被粗暴地，而且是不公正地打断了，她成了他的冷酷与谨慎的囚徒。

最后一幕可放在机场，他、她，还有一群随从正要去参加个国际会议，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毁了机场的贵宾厅，他们待在一块匆匆忙忙从普通候机厅中隔出来的地方。今天，消息传来，又一个政府倒台了。她环顾四周的一张张面孔，这是首相，那是内阁部长，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位，可或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没资格再待在贵宾区了。今天刚刚倒台的那个政府的领导人也带着家人出现在贵宾区，他径直向她丈夫奔来，请求庇护。到这时候，他还在吹，好像那只是一场短暂的运动，他过不了多久就又能掌权。她对自己的丈夫耳语："无论如何不能给这个家伙提供庇护，公众会把你们俩联想到一起。"她靠的是古老的直觉，跟失败者走在一起会让自己倒运，当然，她用的语言属于理性。可她那一个坚持原则的丈夫代表自己的国家向面前下台蒙羞的领导人表示欢迎："当然，患难中朋友

更该守望相助。”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其实并不大喜欢这位“朋友”，她倒是挺喜欢他，钦佩他，虽然在他自己的国家中他被视为暴君、恶棍、刽子手。

她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这个同自己结婚这么多年的男人同那个逃亡总统，还有他的家人说话。他的样子糟透了，可腰挺得笔直，身体有点僵硬……他们说他“傲慢”。不过她自己再清楚不过他并非那样的人……究竟该用哪个词才能准确地描绘出他身上所有那些品质呢？她站在那里，已是个可悲的形象，虽然她自己还不自知。这时，一群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妇女也走进候机大厅，现在在她和这些妇女之间只有一根临时拉上的隔离绳。这群妇女是去印尼出席世界替代技术妇女大会的代表，她们看见了自己的第一夫人，停下脚步，相互低语。带团的两名妇女和她是同学，她俩走到隔离绳边，轻轻击掌，以示敬意。

她也轻轻击掌，等着她俩发话。

“还记得我们吗，夫人？”

“当然。”

三人隔绳而立，面面相对。她，伟大的夫人；她俩，谦卑的旧同学。

两人中一人说：“请别忘了我们。”说完，转身走了。

代表团中的妇女一个接一个走到她面前，隔着绳子对她说：“请别忘了我们，夫人。”说完回到自己的队伍中，背对她而立。

南部非洲的未来

一位著名的南非律师，一位自由主义者说："千篇一律的政治让大家都昏昏欲睡，眼中只看到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公正。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仍在轰隆隆向前，黑人正在轰隆隆向前，他们周身都是才华和活力。不错，我想，会有流血……"说到这儿，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又继续说："可不会像预料的那样。我们会达成协议，到那时，南非的前途不可限量。再过十五到二十年，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精彩的地方。松开刹车，全速前进。"

到此访问的欧洲政客：没有任何希望！不是由于津巴布韦，而是由于南非。南非要是硝烟四起，津巴布韦也会卷进去。要预知未来？先回顾历史吧！赞比亚支援了津巴布韦，却削弱了自己，现在那里已是灾难；津巴布韦支援了莫桑比克，也削弱了自己。就算你自己水性再好，可身边全是快淹死的人也不是好事。

南非的自由主义者：南非为什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自打我记事以来，到如今都五十年了，这个国家的政府一直冷酷无情，令人厌恶，却很成功。北边，博茨瓦那人口稀少，举国陷入一种快速致富的气氛中；赞比亚连自己都养不活；津巴布韦

倒是能养活自己,可不大关心自己的土壤;纳米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都被战火烧成一片废墟。整个南部非洲将成为又一个灾难地区,到处是腐败的反动政府。

一位刚刚访问过扎伊尔的津巴布韦学者回来报告说:“过去是城镇的地方现在满目荒凉,没有电,没有交通,没有邮政,旅馆都关门了,也没有汽油。我去看了看那里的中心图书馆,那曾是座不错的图书馆,可如今,馆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几年领不到工资了,靠盗卖馆藏书籍养家糊口。书架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学校也开不下去了……根本没有教材。那儿的景象实在怪异,简直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就像神怪电影中的场景。过去还是富人聚居的郊区,现在一到那儿,映入眼帘的是数百处炊烟,家家在门口用树木、灌木生火做饭。等那些都烧完了,还有什么可烧?怎么会这样?电力供应中断了,输电线路一个区接着一个区地崩溃了。现在,那儿根本无基础设施可言。”

“难道你还看不到津巴布韦正在发生的一切吗?我们已经好几星期没有电力供应了,铁路系统也瘫痪了,不知道电话还通不通。煤甚至没法从煤田运到医院,这个星期哈拉雷各大医院一例手术也没有做。烟草仓也无煤可用,那可是这个国家赚外汇的主要途径啊。他们从南非借了六部火车头,第一个星期就报销了两部,还有两部也跑不了了,等待修理。这个时候津巴布韦已经在原地踏步了,可穆加贝还要用国家55%的运力帮助赞比亚把货物运到港口。还有公路,这个国家已无力养护自己的公路,除非全盘交给别人。我去了趟某

省，听说那里的公路正在翻新，瑞典人出的钱。第二天，我的车开上一段新路，法国人在出钱养护这段路。难道我们就总这样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我要，我要，要图书馆，要火车头，要许许多多。”

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学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黑人农民：交通运输，那就是一切。除非穆加贝同志组织好交通运输……

白人（出生于这个国家，而且计划继续待下去）：首先，要放松对投资的限制，不过单单那样也改变不了什么，还要做些别的。金钱一直在涌入这个国家，数以百万的金钱，可大部分都浪费了。那些援助机构根本不了解轻重缓急，根本不知道该从哪个层次开始。要是这些小子们得到培训，懂得机械，铁路系统就能运行；有了训练有素的人员，工业也能运行起来。看看津巴布韦航空公司吧，他们那叫飞行吗？我看从天上往地上掉还差不多。可他们决定要有家航空公司，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家，那是门面。可就连去训练别人的人也要先花钱去培训。要让我来分配援助资金，我会先拨款建立师范学院，要

说有差距，这就是差距。穆加贝应亲自给优秀学生颁奖。知道吗，这些黑小子一心只想学文学，天哪，他们把英国人那种势利眼完完全全给继承了过来，视技术性工作为粪土。去年，在美国的时候，我不断遇到就职于航空业的英国技术人员，他们选择到美国工作，也到欧洲重视技术的国家工作。可在这里，要让技术人员得到培训，再得到社会的重视，简直难于上青天。除非在这个层次上的黑人青年能得到像样的培训，再多钱投下去都只能打水漂。

"知道吗，日本人一年培训出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我们的四百倍。"("我们"在这里指英国。)

"培训、培训、培训，我们需要的是培训。"

政　治

一位白人商业农场主，他的农场位于高技术农业区，也就是塞卢斯从洛马冈地人手中换来的那片地区。他申请成为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ZANU)党员，党派来两名重要成员与他面谈。

农场主的话中火药味十足。"我要告诉你们三件事：第一，我有张大嘴，也不打算改变自己。"(他以攻击政府政策而扬名。)

“还有什么，同志？”

“第二，我在这片土地上种地种了三十年，而且还要种下去，用我最拿手的方式。”

“还有呢，同志？”

“我不会离开这个国家，就算你们把我的房子烧了，叫我住在泥坯房，我也会待下去。”

“欢迎加入 ZANU，同志。”

放　弃

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离开津巴布韦，稻草也能压垮骆驼。

“干吗要离开？你疯了吗？”

“就算吧。我搬了家，在花园外面建了堵水泥墙。每天在系里我都听到有人对我说，居然建起水泥墙，白人都这个样子。可人人都知道那些头儿们买了新房子，人还没搬进去住，第一件事就是筑起围墙。整天都是白人这样，白人那样，这种种族主义我受够了。我要走了。”

一位科学家走了。他多次为自己的实验室申请购买仪器设备均未获批准，理由是外汇紧缺。他跑到机场，看着那些该死的头儿们一个又一个上了飞机，飞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那种事儿从来不缺钱。

另一根这样的稻草是学校的新历史教材,其编写之初衷是纠正白人版非洲历史中的一些错误。首先,书中有不长的一章讲白人统治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改变了非洲文化。在书中,那段时期被称为“积极歧视”。其次,当年那些到金伯利的钻石矿碰运气的冒险家们原本个个走投无路,身无分文,可在这本书中他们都成了资本家。还有,另一本教材,让学生自由想象中世纪的非洲国王,身披华丽的盛装,两旁有嫔妃们侍候着。“书中一个字也没提妇女的重要作用,她们仅仅是国王的嫔妃,真是垃圾。我是个历史学家,我只要事实,要是人们都热衷于这种政治垃圾,那我就要走了。”

那个因为围墙而走的男人又回来了。“这鬼地方,我真想抓住它的肩膀把它晃清醒点儿,不过我不想再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也有耳闻,在远离津巴布韦的地方,也能遇上一两位津巴布韦黑人,甚至是某位“头儿”。

群山中的檐廊

又一次,我俯瞰着群山、湖泊、河流、森林。它们上空有一架微型飞机,其所有者是一位当地农场主,这会儿正坐在驾驶舱里和他一块儿飞的是咖啡农。他们在群山、山谷、公共领地

的上空盘旋，搜寻水土流失的痕迹，一旦发现就报告给当地的土壤保育委员会。

白天黑夜，我听到各种点子从他嘴里像泡泡一样冒出来。

在公共领地，到处都能看到又肥又壮的山羊，黑人为什么不把山羊奶做成奶酪？他们喜欢重口味，肯定会喜欢。为什么不……？

一个妇女刚刚从阿根廷回来，说那里种的东西和这里差不多，玉米、南瓜、西红柿、土豆，可那儿的穷人用这些东西能做出几十种菜式。为什么不能把阿根廷的技术移植到这里？

一位老居民想到，早年的白人家宅中虽然没有电力、冰箱和自来水，不过里面有些东西改进一下可以用到贫穷的公共领地。比如说，被冰箱取代的保鲜柜。具体做法是：用双层板做柜身，板与板之间空一英寸左右，中间填满木炭。柜顶上放一只铁槽，底部凿一排小孔，放满水后，水从小孔流到木炭里，蒸发后带走热量，因此柜子内部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可用来保存黄油、牛奶和肉类。

我说："我们家屋外有只大铁皮水箱，天热的时候，水烫得手都不敢放进去。可我们从没想过用那水来洗澡或洗衣服，真让人难以置信。"

"他们干吗不……？"

"我们干吗不……？"

"要是……会怎么样？"

在咖啡河谷中，政府的艾滋病宣传已经奏效。"不单单政府，我们也一直在宣传，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喝啤酒跳舞的时

候再也不敢尽兴了。现在他们都转向宗教了，你知道又唱又跳的那种。那是好事，他们的日子够苦了，周末要再不能快活会儿，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咖啡农在穆塔雷大白天被人抢了。那天，他到银行去存支票，两个抢钱的以为他是去取当月的工人工资。“他们倒是挺在行，”咖啡农语中带着几分佩服。“一人下脚把我跸了个跟头，另一人伸手夺走我的包，我还没从地上爬起来，两小子就跑了。我追到街角，可那两人的车已经走远了，看不清车牌。他们肯定一直在观察，直等到人行道只有一个人时才下手。不过他俩运气不好，我包里只有几块钱。”

热烈的拥护者

在哈拉雷一座漂亮的公园里，我成为聪明小偷的受害者。两个笑容可掬的青年向我走来，一路陪着我，还问我是否愿意赞助一项援助活动。其中一人提议，不妨把表格摊在他的背上，好方便我填表签名，说完我就一副满是诚恳的样子转过身去。我填表时双手都没闲着，他则把手悄悄伸进我的手提袋，拿走了一百英镑。整个过程中，他的同伴分散开我朋友的注意力。

我把这次遭遇说给一个耳中听不得一点对津巴布韦批评之词的妇女听，开始她显得相当痛苦，突然问了一句：“你说那

俩小偷很聪明?”“对,太有才了,我实在想不出在伦敦哪个小偷能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她坐直了,轻轻叹息一声,却明显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仿佛一个骄傲的母亲。

温　泉

白人统治时期这是个受欢迎的游乐点,可现在已荒废。泉水池和洗浴房都没人用了,旧日设施中只有那间售货厅还在卖冰冻饮料。年轻人挤在一张支架台旁的长凳上喝啤酒,在纸板上用啤酒瓶盖玩跳棋。旁边另一张桌旁,一位老年人坐于当中,身边围了许多年轻人和孩子,都是男性,听他回忆过去的事情。他们坐在那里,仿佛被自己的专注催了眠,一动不动。他们常常一阵大笑,旋即又一动不动,生怕错过了一个字。这一幕,伴着周围优美而狂野的景色,又令我想到意大利,想到那里的激情与享乐。不过眼前这一幕中只有坐到那群喝酒玩棋的人们旁边才会感到享乐的气氛。

我想起居伊·克拉顿一布洛克说过的话:“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任何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让他们开心起来。而我们则最不懂得快乐之道。”

自打我记事起,我就听到白人男性就何以如此发表长篇大论,各个层次都有。有的说:“咱们到底哪儿出毛病了?”也

有的问："咱们的文化中到底有什么，让咱们开心一下如此之难？那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北方的气候吗？清教信条吗？还是工业革命？"（所有糊涂账都算到工业革命头上。）

咱们大家都被理论家唬住了，很难说非洲人身上有什么而白人没有，或者我们身上有什么而他们没有，但事实确实是，在非洲上上下下，旅行者都注意到，非洲人善于自得其乐。

传教士莫法特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躺在行军床上，难以入眠。河对岸，那些黑皮肤野蛮人敲着鼓又唱又跳，没一个不开心。他发现了上帝赋予他的任务，就是终止这种罪恶的享乐。他们也确实努力了。

那天下午，好几个小时，长椅上喝啤酒玩跳棋的年轻人来来去去，有的加入到那位老人的听众群中。

如今，在欧洲，哪儿还能见到年轻人围坐在老人身旁听故事？

要是有人问：女人们到哪儿去了？答案是：她们在生火做饭，给孩子洗澡，哄孩子上床，之前她们还锄了地，拔了草，收了庄稼，补好了泥坯墙，铺好了茅草屋顶。

讲故事的人和作家

传奇故事、笑话、逸闻趣事像肥皂泡一样从人们的口中接

二连三地飞出，你可以说那都是些蜚短流长，可它们自有一种史诗般的特质。那是因为津巴布韦感到自己的重要，也因为旧日王国的回忆尚未走远。后来，白人殖民者说这里是上帝的家园，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骄傲早在他们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就已存在，即便他们都离此地而去也依旧会存在下去。

津巴布韦有不错的作家，数量多得惊人，也有相当好的小说，不过他们最拿手的还是短篇小说。或许，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娱乐就是"摆龙门阵"，说说邻里间的事儿，还有"头儿们"最近又在打什么主意，这些很自然就取得了故事的形式。这里既有用英语写作的，也有用其他语言写作的，比如说绍纳语和恩得贝勒语，也极少被翻译成英语。那些是怎样的作品？回答是：非常暴力，满纸凶杀、犯罪、激情、乱伦。这种书销量和读者群很大。

图书小组请来参加会议的妇女自己编故事，写诗，那些妇女一开始大声说：不行，我们哪行！可几乎与此同时就在出点子，拿出故事的雏形。那时，我已看到了作家的诞生，或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听到她们的名字。或者，至少可以说，那里营造出有利于创作萌芽的氛围。

已经有一部由妇女创作的挺不错的小说面世，作者叫齐尔西·丹加拉姆巴加，不过那部小说的出版也历经艰难。那部小说名叫《紧张的混乱》，开始津巴布韦国内四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首先出版的是伦敦的妇女出版社。在那以后，津巴布韦出版社才有勇气把它付印出来。小说面世后遭到许多批评，说小说太"负面"，书中对黑人妇女生活刻画不公正，可妇女们自己

却说:“我作为一名绍纳妇女的一生从未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简而言之,这是本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不过批评家都是男性,都对这部小说心怀敌意。这种状况仍将持续下去。

津巴布韦批评家大都很无知,却有无知的勇气,也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现在,津巴布韦出现了一批新作家,他们诋毁“津巴布韦文学先辈”的才能,查尔斯·蒙哥西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这怎么可能!”可实际上在其他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在七十年代的瑞典和挪威,新生作家抨击自己的先辈毫无才华,还用马克思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妒忌。那些人都清楚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它已经统率了几十年的国家的现状如何,可他们压倒先辈之心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似乎说服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很健康,依旧有生命力。现在,在瑞典和挪威,那一年代被称为“黑暗年代”。

八十年代在英国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而英国的所谓“撒切尔主义”更给这种现象火上浇油。撒切尔说话总是说“我们”、“我们和他们”、“不是我们”。那群新作家也一样,在他们口中,才华只属于他们自己,还有就是他的同道,他们写的批评文章报复心之重,让我的欧洲同事们常常问我,你们那儿的人都怎么了? 回答常常是:都是因为撒切尔,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个老问题换上了新装。如今,有一整代读者和作家都相信文学批评与恶意歹毒密不可分,就像在津巴布韦一整代人都认为批评缺不了马克思主义术语。

在英国,批评文章要是发出了强烈的仇恨,或嫉妒的气

味，人们可以随手把它丢到一边，再去拿篇更理性点儿的。可在津巴布韦，人们没有别的选择。

在津巴布韦，作家大多酗酒，或早逝，或彻底放弃写作。我也会。

下面列出一些津巴布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些我挺佩服：

查尔斯·蒙哥西：《等下雨》、《西沉的落日，旋转的世界》、《旱季到来》

齐尔西·丹加拉姆巴加：《紧张之中》

西玛尔·齐诺代：《朝露》、《带刺的收获》（这部描写丛林战争的小说遭到批评）

S·恩雅姆福岸德萨：《无神者之旅》

姆塞穆拉·齐蒙亚：《乡村之晨与城市之光》

威兼姆·萨伊迪：《旧砖》

蒂姆·麦克朗拉玛：《卡里马》

该回家了，但这里也是家

我决定对我的神话之乡来次飞速之旅，或许就是想确定下那地方还在，那沐浴在月光、星光、日光中，沉浸于四面八方之来风的小山还在。我甚至想到那阴暗丑陋的木屋里看看，

或许，我会隔着窗对那些从屋里朝窗外偷窥的小脸说："喂，你们好吗？能告诉我你们的心愿吗？"

在转向小山的路口，过去这里一边是大片大片含羞草，另一边是养牛的牲口栏，现在竖起了一块大告示牌：擅自闯入将被起诉。

是该这样。写这几个字的人还挺在行。

离开津巴布韦之前，在哈拉雷不远的地方，在刚刚落日的黄昏中，我窥望过去，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仿佛看到一个步履轻健的年轻人刚刚从群山中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双眼还时刻警惕着消失的猎物的魅影。他背上背了一支长矛，手中拿着一只弹弓，三条瘦的猎狗陪在他身边。

1990年，奇迹之年

一位年轻女性登上飞机，从东地中海地区起飞，她身边的男人对她说："跟我说说世界上的事儿吧，我在喜马拉雅山待了几个月，一张报纸也没看过，也没听过新闻，感谢上帝。"

"好吧，让我看看，从哪儿说起呢？苏联放弃了共产主义，它的加盟国放弃了联盟；柏林墙倒了，两德统一了；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

"真有趣，现在跟我说点实话吧。"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和他的 ZANU 赢得了选举，再没人提泰克雷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问，那家伙是谁？穆加贝还想实行一党制，可他的同事再也不想听那样的话了。

1991 年

穆加贝同志正式宣布，放弃共产主义。

谁说没人能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不过津巴布韦大学仍在党的掌控之中。

为什么还要这样？每个人都在想。

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穆加贝的位置上，发现自己承受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所有情感，自己所珍视的一切正从指间悄然流逝。他骄傲、威严、坚守原则。在津巴布韦，人民最恨的是第五纵队，人民宾馆，党总部大楼，还有体育场被人们看成大而无用的白象。他的同事们贪墨成风，仿佛生来就是盗贼。一党制成了历史，津巴布韦经济也一片狼藉，可至少津巴布韦大学还在，至少还可以把它控制在手中。

然后，再次，行进中

1992

肯尼斯·卡翁达不再是赞比亚总统，他主动辞职。在那个毫无章法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可不那么招人羡慕。

在津巴布韦，人们也不再说："穆加贝为什么不……"，"穆加贝该……"人们已不再有期待和希望。

货币贬值了，现在津巴布韦元只值过去的四分之一，这让业已穷困交加的人更加走投无路。一个新缩略语，ESAP，总结起新的经济政策，其全称是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老百姓说，现在要勒紧裤腰带，穷人要吃更多的苦了，或者按绍纳语的说法，糖到头了。由于干旱，榨糖作物失收。领导们一边央求国际投资，一边把责任都推到跨国公司头上，可跨国公司还在等着电话能通，官僚手续能简短点儿。在农业区，有些农场主已彻底放弃了对电话的等待，又用起丛林战争时架设的无线电网络。有人开玩笑说："干吗不用传声鼓？非洲人用那也挺好的嘛。"

一次集会上一个人冲穆加贝大叫："史密斯干得比你强。"他当即被拖进监狱。可全国上上下下都有人说同样的话，还有："史密斯至少是个诚实的人"。甚至还有人说："我们需要个新领导人"。在情况错综复杂的国家，人们总相信领导人的

更替会带来形势的好转。有谣传说，国家会很快有个新领导，穆加贝会辞职。他们说："可怜的穆加贝，那些坏头儿让他的心都碎了。""头儿"这个词也越来越少被听到了。或许，它毕竟还是一种爱称。

莎莉·穆加贝，罗伯特·穆加贝的妻子，去世了。人们说对穆加贝的同情使国人又团结起来，至少团结了一段时间。

饥荒正在走近。过去有项政策，粮仓里至少储存一年的谷物储备，可今年的储备早空了，大头儿运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了莫桑比克。与此同时，政府不再鼓励农民种植玉米和其他纤维作物，叫农民转种能换来外汇的经济作物。好像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至少要为这种愚蠢的政策负上部分责任。接着，雨水不至，现在津巴布韦要动用外汇到南非去买粮，可由于干旱，南非自己的玉米也短缺。那项创意十足的政策确保了津巴布韦至少今年之内都要捧着讨饭碗了。可要是明年降雨还是不足，该怎么办？

图书小组经历了十二个月的艰难时期，有两位部长觉得小组编的妇女读物不对自己的胃口，最后更高层的干预拯救了这本书。书名定为《建设完整社会》，它也反映出妇女们的看法，在这个社会中她们都不受重视。又成立了八个地方性图书小组。更多的地方性小组在自发形成。

从林学校中的那位年轻教师和他的妻子又复合了。

那个年轻的农场助手，也就是那个跳伞冠军，现在成了一名奇里斯马式基督教派的牧师。

多萝茜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被送进了学校，由阿尔顿出钱。在结构性调整的经济政策下，许多孩子要交学费了。阿尔顿出钱给孩子们买了书本、服装。两个孩子其实一点都不开心，他俩不喜欢学校，主要因为学校同学老欺负他俩，说什么："家政工人的小孩怎么能和我们上一所学校。"孩子不高兴还因为阿尔顿有漂亮的大房子，他们没有。

《先驱报》，这个国家的主要报纸，也开始活跃起来，开始具有批判性，不再像《真理报》。现在有几种不错的杂志，新的独立报刊也在计划中。

一间拥挤的政府办公室里，一位已经等了五个小时的白人老太太向一位工作人员发牢骚，却招来那位官员恶语相向。旁边一位黑人男子对工作人员说："别那样跟老人家说话，我们可不爱听。"其他人也表示支持，纷纷说："我们不喜欢你的态度。"于是那位工作人员礼貌起来。

德克兰·古尔德，一位七年来一直在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爱尔兰人，被驱逐出境。和我当年一样，他被列为禁止

入境者，用的法律都仍是南罗时代的旧法律。那条法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变过。

要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罪名还是算到南非的被破坏头上，许多津巴布韦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南非已改天换地。

津大的情况不大好。津大在联邦时期初创时，它有民主国家常见的自由机制。可在一项新法律即大学修正法案之下，大学将置于政府，也就是 ZANU 的控制之下。副校长可以开除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员，根本无需报批。学生们的日子更艰难了。能走的学术人员要么已经走了，要么正计划走。人们希望那条压迫性法律能尽快被废止。

这个月，也就是一月，津巴布韦作协召开会议，抗议中央情报机构对其成员的骚扰。或许，由于是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培训出来的缘故，津巴布韦秘密警察也大脑愚蠢，手法笨拙。人们在问：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要有秘密警察？

在一座白人商业农场上，我听到一些令人作呕的种族笑话，其根子都是政府的无能。这座农场上，包括工人和家属在内，合理居民应该是两百人，可实际住了七百人。农场主说："到这时候差不多该有四千了，我得赶走一部分人，虽然我也不想这么做。他们就要待在这儿，在我这儿总比在公共领地过得好些。所有白人农场上的人口都超过同等面积的公共领

地的人口。"他要灌溉大片土地，用他能搞到的宝贵水去种植政府叫他种的经济作物，这样才能养活七百人度过干旱。"不管怎么样，我会让自己手下的人填饱肚子，可来我这儿讨口饭吃的人越来越多，我该怎么办？我不得不赶走他们，要不自己手下的人也没饭可吃了。你觉得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一条新法律允许在某些指定区域无需批准就可占据白人农场。此种威胁长期存在，它意味着农业经济生产中相当一部分处于不确定状态中。农场主不再向自己的农场上投钱，尽量把钱投入动产。而与此同时，政府手中还有大量未分配出去的土地。据说，那条法律的目的就是转移百姓的注意力，让他们别再整天盯着政府的过失。

津巴布韦今年计划猎杀大象的数目不是以往的三千头或三千五百头，而是三万头。否则，象群会因为饥荒而死亡。一位勤勉的年轻人说，非洲象并非不可驯化。他正在训练非洲象，或许部分大象可为人类工作。

和家养的狗一样快乐地放养的猪，现在在不得不圈养了，因为它们的破坏实在太大了。之前那种生活简直犹如在伊甸园中。

西马斯，一条高贵而机智的狗，主人的忠实朋友，去世了。

从林里一群七匹母斑马，打头的一匹在树干上擦双颊，然后额头，然后脖子两边，然后身子一侧，擦完了再擦另一侧，井井有条。她又站到小树下，用低矮的树枝擦背，接着又走到一棵小树苗旁边，迈步从树苗的上方走过，让树苗的嫩枝擦到她的腹部。她做完后，下一匹再从头到尾做一遍，接着又是下一匹，直到每一匹都做了一遍。旁边一匹公马一直在看，母马的举动让他发了情，下边挺得像根橡皮棍。它只盯着那群母马，等它们都擦完了就在母马刚刚擦过的树上把躯体又刮又擦。我们就在十步开外处观察这群斑马，可它们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有些地区的旱情如此之严重，不单耕牛，就连耐旱能力强的山羊和野生动物都在死掉。农民们现在开始射杀刚出生的小牛犊。

维多利亚瀑布大酒店，一座旧式的殖民地风格建筑，世界最了不起的宾馆之一。这里宽敞、凉爽，日子过得慢悠悠，好像在梦中，又像身处象牙贸易类的电影之中。一个黑人青年搔首弄姿，像只孔雀般展示自己一身的打扮。他的牛仔裤在膝盖处特意开了两道口子，上面还别了两枚彩色环形针。他走起路来一步三摇，那样子仿佛在接受别人的鼓掌。

没人能够评估出艾滋病的长期后果，官方资料说到 2000 年截止，一个人口为九百万的国家将有一百万人死于艾滋病。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的妇女的染病率世界最高，达到四十分之一。在津巴布韦农村地区，许多妇女靠跟男人睡觉赚钱养活子女，送他们上学。那些妇女被说成是娼妓。在一所城市诊所，最近每四名新生儿中就有一个被测出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大多数男人还不肯戴安全套。性生活混乱惹人羡慕，对男人而言。"一头壮绍纳公牛让许多女人大肚子。"

一位编辑说："要救这个国家出路只有一条，政府别再念经般地唱什么结构性经济调整了，现在必须头脑冷静，审时度势，别再让意识形态歪曲真相。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批评，而不是把所有批评都看成敌意，它应该如实描述我们所处的形势，然后采取行动。可咱们的政府能办到吗？"

一封信："每当我想到独立时的那些梦想，我就想为津巴布韦放声大哭。太让人伤心了，太让人伤心了，你不这么认为吗？有时候，我真的会哭。"

不过，去过扎伊尔、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回来的人会说："我告诉你，跟上述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津巴布韦人不算是活在蜜罐里。在内罗碧，木板房绵延几英里，根本没人管。津巴布韦政府至少还有羞耻心，至少还在计划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宅。"

一位气象专家："腐败？别逗我笑了，同罗伯特·麦克维

尔那种人相比，他们只是小学生。几乎糟糕？那又有什么？他们会学。南非也闹干旱了，那才算是新闻，唯一的新闻。”不过：“打仗时我们熬过来了，我们也能熬过这场旱灾。”说这话的是一位农村妇女，住在一个十年中没下几滴雨的地方。

1992 年 4 月，信件、电话

“今年的雨季结束了，下个雨季还要等七个月。尽管今年雨水充沛，可还需要三到四个这样的年成才能补上过去的损失。因为没有饲料，养鸡户已经开始宰杀自己养的鸡。出于同样的原因，猪也被宰杀了。牛已经死了成千上万头。我去过东部地区，亲耳听到了它们临死前发出的哀鸣。怎么办？没人知道。”

“老百姓发火了，说真的，他们发火了。要是现在举行选举，穆加贝一票也拿不到。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说，咱们打了那场仗到底图个啥？还不如让史密斯……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不过不是暴风雨。”

“穆加贝说白人农场主在囤积居奇，其实他是在分散老百姓的注意，可老百姓不会上他的当。白人农场上的老百姓吃得比公共领地上的好得多，大家都要挤到白人农场上去。”

“穆加贝要是辞了职，谁能代替他？”

“这仅仅是气象图上的短期变化吗？还是永久性的气候剧变？谁在乎！无论农场主还是饿肚子的老百姓都不在乎。人们唯一在乎的是：十一月雨水会如期而至吗？”

再来点历史

南罗得西亚于 1924 年成为自治殖民地，不过其防务和原住民政策仍处于英国监督之下。南罗得西亚在原住民问题上一直效仿南非的压迫政策，而英国政府从未提出异议。由于黑人的反对，把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建成一个统一联邦的建议失败，北罗得西亚于 1963 年宣布独立，成为今日之赞比亚。与此同时，南罗得西亚也要求独立，可要求被拒绝，除非在合理的范围之类赋予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以治权。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拒绝交出权力，英国于是开始封锁。作为南罗得西亚白人的代表，伊安·史密斯在 1965 年发布了单边独立宣言，自行宣布独立。在此之前，小规模的破坏、暴动、抗议在南罗得西亚境内已存在许多年，可 1965 年的单边独立宣言可视为内战的正式开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武装纷纷成立，进入丛林。这其中最主要的党派是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和约书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这之前，恩科莫被羁押在一处偏远、荒凉的拘留营

中，长达十年之久。说到那段经历时，他说："那就像月球的阴暗面。"在反抗政府军的游击战争中，这两支武装，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规模武装时而合作，时而又对抗，情势复杂异常。而且，大量的黑人在政府军中服役，黑人士兵实际构成了政府军的主体。当南罗得西亚白人最终承认自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时，英国从中斡旋，拿出和平协议，包括有史以来第一次赋予全体黑人以选举权。他们把选票投给了罗伯特·穆加贝和他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恩科莫被邀请担任总统一职，但他拒绝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被视为穆加贝和政府的敌人。分歧显而易见，穆加贝代表绍纳族，而恩科莫代表马塔贝勒族。绍纳，或马绍纳族是这里的原生民族，马塔贝勒兰则是南非境内祖鲁族的一个分支，当年他们离开故土，一路向北而行，以躲避好战成性的祖鲁暴君。他们在现今津巴布韦西南部建立起一个军事独裁体制政权，都曾设于布拉瓦约。布拉瓦约的原意就是杀戮之地。后来白人用诡计把国王洛本古拉骗出城，那城市倒也名实相符了。马塔贝勒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历史上对它与绍纳族的袭扰究竟有多大，对比历史学家们还没有统一意见。

葡属东非，后来的莫桑比克

就在黑人游击队员在丛林中与南罗得西亚政府军激战时，葡属东非的黑人也在与葡萄牙人激战。在津巴布韦诞生之前几年，他们就赢得胜利，领导战争的是解放阵线，又称解阵，领导人萨莫拉·马歇尔拥有大众领袖的一切素质，他英俊、英勇、足智多谋，似乎理应能够成功地领导政府，把莫桑比克建设成一片乐土。1986 年，马歇尔死于几乎可以肯定由南非秘密警察策划的空难事故。

抵运原本是由南罗得西亚白人政府创立的一派武装，其目的就是滋扰、破坏解阵。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覆灭后，南非就接手了抵运。抵运的全称是全国抵抗运动，就是要抵抗解阵。它由南非提供武器和资金，把莫桑比克彻底给毁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入马拉维和津巴布韦。抵运匪帮仍在烧杀抢掠，南非或许会向自己的狗发号施令，叫它听话，可不会有多大用。萨莫拉·马歇尔遇难后，希撒诺继任总统，那或许是世界上最不会让人红眼的总统宝座了。

南罗得西亚身处内陆，有一条铁路通向贝拉港，津巴布韦同样也依赖这条铁路，这个港口，以及输入石油的管线。津巴布韦军队一直守护着这两条生命线，铁路线和输油管线，当它们在战斗中遭到破坏时，军队一再把它们修复。当年，贫穷的赞比亚虽然自己尚未脱离险境，可依旧支援了反抗南罗得西亚白人政府的游击战争，它的领土，遭到南罗得西亚政府军飞

机的轰炸，有时甚至城市也不能幸免。同样，津巴布韦也支援解阵抵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南非。

这几国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可实际上，真正的关系依旧是：如何抵抗外部压力，把国家和政策掌握于自己的手中。

可现在，南非变了"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该这么问：那几百名，甚至几千名只会破坏和制造骚动和不满的男男女女会失业吗？失业后他们能干什么呢？这些狡诈、残酷的家伙，他们会坐下来，带着慈善的笑容看着他们一手毁掉的莫桑比克恢复元气吗？他们会看着自己昔日在那里搞暗杀、破坏的博茨瓦那繁荣富强起来吗？他们会看着自己搅起各种不满与仇恨的津巴布韦安宁下来，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吗？那些家伙，如今他们靠什么度日呢？

农 业

白人统治时期大多数非洲人住在原住民保留地上。白人把肥沃的土地占为自己的农场，把那里的黑人赶到保留地上。过去也有所谓原住民交易区，黑人可以在那里购买土地。富有黑人农场主的存在是津巴布韦农业的成功原因之一。解放后，保留地变为公共领地，重新安置计划将黑人安置到无人耕

种的土地上（仍有大量此类土地未分配出去），也有的被安置到原先白人拥有的土地上。重新安置计划原本想建造苏联那种集体农庄，即便苏联人的经验只有失败。如今，这些新获安置的农民究竟以何种方式拥有土地尚无定论，相关的政策仍在讨论中。

译后记

从2007年12月接手这份“活儿”，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已过去了。看到这部颇有点“分量”的纪实作品终于行将付印，我们几位译者都感到如释重负。

对于莱辛，对于津巴布韦，之前我们了解有限。前者，我们只知道她是当今世界著名女性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者，我们只知道它曾是南部非洲反殖民运动中的“明星”，出了个传奇人物——罗伯特·穆加贝。从翻译这本书开始，我们进入了莱辛5岁到30岁之间的25年，而南罗得西亚、马绍纳兰、哈拉雷、布拉瓦约、大岩脉、乌姆武奎山脉、赞贝西河、卡里巴大坝也成了我们见面或电话里交谈时常出现的词。2008年7月，凤凰卫视一连五天播放了一部介绍津巴布韦现状的专题片，给人印象颇深。希望本书的出版也能令国人更多了解这个已取得巨大成就，却也面临着同样巨大困难的年轻国家。或许，不久的将来，这座“上帝的花园”会向更多人展示她的魅力。

翻译是制造遗憾的工作，无可奈何，只希望遗憾之后尚能对读者有所补益。至于遗憾，只能留给译者自己了。

本书的翻译由叶肖、何雨奇、黄亦军共同完成，叶肖负责第一部分，何雨奇负责第二部分，黄亦军负责第三部分，谨此说明。

译　者

2008年11月于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
作者=（英）莱辛著
页数=524
SS号=12466525
出版日期=2009.01